世界預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實價七角

原著者　H G Wells
譯述者　顧鼐董
發行者　博文書店
印刷者　辛利印刷公司
上海：南成都路寶裕坊四十六號

總經售處
新嘉坡正興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光明書局

序言

當這本世界預言剛剛付排時，世界大戰的序幕已在歐洲的一個複雜的小國——捷克斯拉夫揭開了，以後的進展如何，固然不是單憑我們淺薄的見識所能預料，但是我們可以斷言：本書的能夠恰在這種時候出版，定能使我們的讀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獲得不少便利。

作者威爾斯是當代英國一位博學多才的作家而兼政論家。他的作品全是靠了他豐富的科學知識與想像能力寫成。關於他的思想，沒有人能加以具體的解釋；因爲無論對於身旁的事實或在自己所寫的作品裏面，他總是站在冷眼旁觀的立場，有時看來好像一個社會改造主義者，但有時又有些傾向於資本主義。

他的作品往往都是屬於預言一類的，而這本世界預言就是一部最偉大最出名的心血結晶，幾乎把他所經歷過、看見過、聽到過、讀到過的一切智識與經驗，完全交織在內。他把這本書公開獻給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們，沒有一個讀者像其他作家的讀者那樣，提出過一

個不滿，或認爲不妥當不正確的建議，這裏有着過去人類進化史的簡明而確切的剖析；有着目前一切政治，文化演進情形的公正的報導；有着未來世界「拆穿西洋鏡」的忠實的預告。他把過去、現在、未來引成一條直線，毫無間斷地做演算式的推算，當我們讀下去的時候，好像自己正在跟着遠古的世界，不知不覺地步入未來的世界中，全當可以說是整個的預言，也可以說是整個的史蹟。我們簡直分不出一個未來、現在和過去的領域來。只覺得這是一篇完整而不可拆開的東西。

當然，在微細的描述中，我們是不能希望牠毫無錯誤的，因爲威爾斯究竟不是一位先覺的神怪，他只是一位具有精密頭腦的「時代演算家」吧了。當他說得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似乎是一粒橘子的核或是一小片胡核殼」時，他並沒有以星相家的眼光去研究「某一種植物到了某一處時辰，將要成爲大戰的禍首，」只是說：戰爭既已到了一個佈置就緒的緊張局面，任何一件小小的事物，都有促使牠爆發的可能，關於這，我們可以舉一個別的作家描寫第一次大戰爆發的例子：

「巴瓦利亞第十六步兵團的備忘錄上，曾記有一個無事之夜，實則此夜並非無事，不過个夜所偶發的事被人忘記罷了。在巴瓦利亞森林裏躲藏着的卡爾剛自他陰蔽的處所爬了出來，伸了伸懶腰，打吹欠時，一粒子彈忽的一聲飛進他的口裏，在他的頭顱底下穿了一個窟窿。這事在卡爾的夥伴中起了一個平淡的笑談。

…………

美必替伍長的表七點鐘了，這時大地上千尊大礮一時怒發………」——（Emrl Lengyel：粉墨登場的希特勒）

「一粒橘的核或是一小片胡桃殼」正可做這樣的描寫文章看。

這書的原著，早在五六年前就已出版，但他的預言，有許多地方，都像現在才寫出來一般地「中的」了。是明顯的就是他對於中日戰爭的預示、他早已知道中國在必要時將一致團結禦侮。而這一個團結是這樣地堅固，沒有人能將牠擊破。他說起戰爭一起，日本即將「佔領北平與天津。他們在北平建立了第二個傀儡國，但他們覺得維持這個國家、是很困難的，尤其

是這些地方中心的南邊與西邊。」「戰爭的勝利（日本）一共得到三次；但每次又是重新爆發。」「四川及南方諸省對於國民黨的抵抗供給了用不完的費用與助力。」最後他說：「日本愈走愈遠，想放手也不可能了。」「一九三八年的全年，日本希望有好消息從包圍了武昌的月形塹壕中傳來，但是毫無所得。」於是「一九三九年初，他們開始退到南京。在南京，傀儡的和沮喪的殘剩者，知道日美已經開戰，大阪和名古屋已落在共產黨的掌握中。」這幾句短短的預言，都是他從讀過的許許多多關於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書中，仔細用一種準確公式演算出來的。現在已經有好幾句完全「中的，」其餘也已成為目前熟悉中日形勢的人的口頭禪了。

世上有發生的許多事情，往往粗看似乎非常神秘，但一經合理的解說；就瞭然了。這種解說能力是一個預言家所必須具有的，本書作者威爾斯在不欲累贅地煊耀自己博學的條件下，對於這這一點已經充分地辦到。

全書共分五卷「　」「　」「世界復興，新國家的產生、」「新國

家的鬥爭、」「統制生活下的新國家、」本已全部譯就，但因受環境所迫，祇能將前兩卷印出，其他三卷只得等待來日再出版了，這是應向讀者致歉的。好在各卷還都有單獨存在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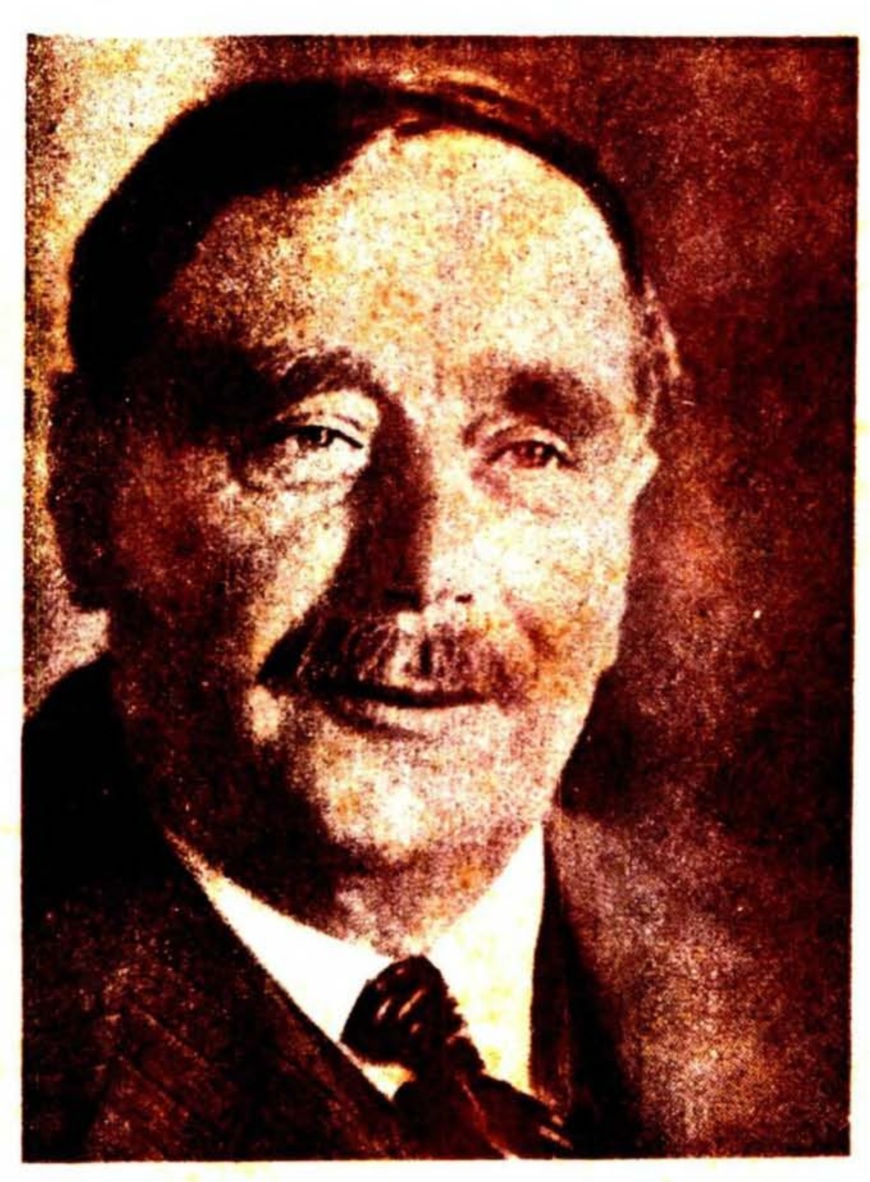
譯者程度低陋，譯筆難免有錯漏的疵點。但自信經過三次修改及參攷別的譯本校正後在正確與通順兩點總算盡了很大的努力。但若讀者仍舊覺得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希望不吝指教，以便於再版時更正！

最後，我們能在本書裏附有好幾張精美的插圖，還得以十二分的敬意，向供給這些插圖的影片公司誌謝。這些逼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照片，是由該公司出品「未來世界」的影片中剪來。我們處在目下緊張局面中，常常具有兩種矛盾心理，就是一方面希望世界大戰爆發，以刺激陷於苦悶中的心情，一方面却又畏懼世界大戰的爆發，因爲牠將帶給我們以無限的苦痛。現在××影片公司既已根據本書的原著，攝成極逼真的片子，我們從此可以處在安全的小小影場中，預觀大戰的演進，以滿足我們的慾望了。這張片子常在國內各地開映，讀者

在讀了本書之後，再去看一看這個逼真的場面，一定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印象！

說了許多累贅的話，害得讀者消磨許多寶貴的光陰，好，就此告退吧，敬請本書原著者威爾斯先生登場！

譯者九，一八，一九三八。



作者近影（波卡德君畫）

目次

卷二　明天以後……………………一七九…三八六


導


言

賴文博士(Dr. Philip Raven)的夢書

不幸得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賴文博士在日內瓦逝世了，這是國際聯盟秘書處的一個十分重大的損失！從此以後，日內瓦地方就失去了一個身體長長背脊微屈，步履不大穩健，斜着頭深思的熟人了，全世界也失去了一個思想靈敏的頭腦。他無間斷的專一的工作，異常活潑的心理，正像在他訃文中所說，獲得全世界知名之士的讚賞。一般人也因爲他的逝世，突然都認識他了。

他的名字在報紙上不常見，以這樣一個生前無聞的人，死後竟能引起世界極大的震動，眞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從阿司羅(Oslo)到新西蘭，從畢尼諾司愛利司(Buenos Aires)到日本，差不多每種重要的報紙上，都有了關於他的記載。克利夫爵士(Sir Gedfrey Cliffe)

了一個很好的簡略的回憶描畫，說他是一個具有非常樸素坦白專一和有力的人格的人。他的相片，在刊物上刊出的有兩種：早年的一張，看去好像是雪萊和馬克斯頓（Maxton）的混合物；後來的一張，是用快鏡攝的，他在國聯大會場的入口，斜倚在手杖上，伸出一隻長而瘦的手，做一種特殊的說明的手勢，和巴爾孟爾爵士（Lord Larmeor）正在談話

他的事情很忙，但他還能抽閒來幫助同事們共同思索和解決一些較爲廣大的問題。在他死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關於他對於未來世界的指示。大家都急於證明他的工作的重要，所以把他比較重要的文稿報告節略和演辭，篇成了三册書，預備印行。

因爲大家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要我出來，擔任刊行他的遺著。但他死後的那些歌頌我却沒有參加。因爲我在學術界的地位，還不夠使我寫一篇頌揚他的文字。但在實際上却必須我把他個人的態度和自然的魔力素描出來。但我也沒有這樣做。我們正開始共同進行着一種事業，誰都沒有預料到他會死去，所以對於這種意外的危險，也一點都沒有防備。現在已快過三年，我和他比較親密的朋友們作了極困難的討論後，才決定公布我們和他的這個

特殊合作的事實和內容。

這就是關於本書的問題。我把賴文博士付託給我的一種草稿藏了很久。這些草稿，我以爲我向來爲牠躊躇的，倒並不是一種過慮，因爲這正是一冊一世紀半未來的簡單歷史。牠是未來世界的投影，也是現代神祕的預言。到現在又是三年多了，這三年來的事變，一部份事情，足以證明這預言的不誤，因此我才有了勇氣和我朋友的敍述連繫在一起，決定找一家書局把牠出版了。

關於本書的起源，和牠怎樣落到我手中的故事讓我簡單地來說一下吧！在大戰完結的那一年，正是賴文博士離開白宮到日內瓦去之前，我就和賴文博士開始締交。賴文博士在閑暇的時候，總是歡喜一種新奇的思想，恰好一九一六年我出版了一本將來怎樣(What is Coming?)的小冊子，發表關於貨幣的一些意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指出戰事中、資源的浪費和債務的繼續積累，一定會使整個世界陷於破產。就是牠將任債權人階級自由宰割世界，使這破產的世界，重新用一種方法來解決。就是公平無私地削減一切債

務，降低金鎊金圓以及其他金貨幣中的金成份。在那個時候，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爲明顯的必要事實，但現在我承認，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觀念——因爲我沒有去掉貨幣的價值是內在的一種觀念——可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所發生的貨幣和信用的動搖的實際教訓，那時我們誰都沒有。我們缺乏經驗，一想到貨幣，就覺得不自然，好像有智慧的兒童想們到牠時的情形一樣。到了一九一七年以後，這個安定金價的觀念，有好多人認是明顯的事實，但是大家認這種觀念，不過是一個沒有智識的作者，發表對於「貨幣專家」的神秘事情的外行評論而已。我的這種意見，竟然喚起了賴文博士的注意，他到我這裏來談談這問題的可能，同時再和我談談我所提出的其他的一二戰後的問題。這樣，我們便就熟識了。

賴文博士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一樣，他並不對人在智慧上有所驕傲，他對於坦白的思想，能夠很坦白地接受。他對一個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能夠談他的問題；如果他認爲和一個僕役談話而能夠獲得新鮮的觀點時，他也會這樣做的。他口頭愛說「明顯」這一個字。他見到我只有五分鐘，「這事我的愛親的朋友……」就這樣稱呼我了。「這是十分明

顯的事實，但人們都自負聰明，不肯去考慮一下；到後來再去追悔，可惜已經晚了。在這次戰爭後，金融和貨幣將有很大的混亂，倘使你去告訴負責的人們，要他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戰勝國家搾取復仇的罰金，戰敗國自然須擔負償付；但他們竟沒有人理解，他們倘使那樣做了，貨幣會對他們發生非常的情勢來。他們只注意他們相互間應當怎樣做，至於貨幣對他們會做些什麼，却就沒人理會了！

他大着喉嚨抗辯的情形，我現在還能想像到。老實說，在和他交談的最初半小時內，我是很不喜歡他的；後來我漸漸看熟了他的這種樣子，這才使我十分的喜歡他了。他太自滿和自信了，對於我這個緩慢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性情比較起來，覺得是太快和太生動了。我不喜歡他說話要明白的準備，也不喜他用了特別的姿勢來幫助他的說話。他在我室中踱來踱去，從不坐下來的，當他用着破碎的嗄聲談話時，終是向四處看着書籍和圖畫，揮舞着他瘦長的兩手，好像在游泳的樣子。我在上面把他比做雪萊加馬克斯頓，但在最初我想起的是杜莫利亞（Du Maurier）有一時很有名的 Trilby 中之史文嘉里(Svengali)——一個修了面的

史文嘉里。我覺得他是一個外國人，我在本能上對外國人十分驕傲，正像我的原則是大同主義一樣。他是巴爾(Pelliot)的一個學者，在他到日內瓦去之前，是我們外交部中最明亮的裝飾品之一，這在我看來，似乎有些不調和。

我以爲羞怯，是一種我們英國人的過分的謹慎。我們常常疑心人家也是和我們一樣講究着細微的道德。我們把自己常常約束到不誠實的地步。我覺得我自己在用筆寫作時，也許是一個魯莽的人，但是在社交之中，還和我們同胞中的任何人一樣小心謹慎和處處掩飾。賴文博士直率的態度，襲擊了我的思想，我幾乎覺得他有些無禮。他想把我的思想當做不成問題的談論資料，但是至少，他也應該把他們己的思想同樣當做無問題地來談論。我有時候會疑心他到我這裏來談話是談給他自己聽的，利用我當作一個「助音板，」聽他的談話怎樣的發音罷了。

他稱我做「淺近的事情的發揮者，」當我們見過了幾面次以後，他還是重複着說出這個不很恭敬的名詞來。他說：「你的缺點，或者就是你的才能；對於一件事情。終是敏銳的感覺

不精確的記憶，謹捷的握住了分寸，不耐煩去知道牠的詳細，而急忙就去求了解整個的東西。事業家倘使聽到你的話，他們一定很恨你，他們想你這個人的思想真是簡單得有些可怕。但是，曉得你，你也和他們一樣，你想把一切的複雜除開。你是一個不耐煩窮究一切。而又是一個喜歡追根問底的人。如果我沒有必須要做的職業，我也要像你樣的追根問底了。花費有暇的時光，和你一道窮究事變的真相，這是十分有意思的。」

讀者，請你恕我自大，我引用了他對我這樣的評論。但是要明白我和賴文的關係，要明白這本書的精神，那麼，我這些引用實在是省不來的。

實在說，我却實是他心理的活力的一條出路。我在他面前的時侯，他能夠丟掉巴爾(Balliel)，和外交部，以後又丟掉了祕書處。他是東歐地方的一個大同主義者，他恢復了他本來的面目，我竟然成了他想像中的伴侶，他的沒有聲譽的朋友，一個智慧不及他的助手，——他的華生。我慢慢地喜歡到我們的這種關係了，我對於他的外國體質和他的姿勢也就熟習了。我慢慢地同情他，當凡爾賽和議展開時他所表示的痛苦和憤怒。我的對異族不信任的一種

偏見，在他的智慧的，好奇的，強烈的熱力下竟然消失了。我們互相發覺了彼此間可以獲得一種益處，靠了我有一個現成的清淨的想像，而他有着豐富的智識，我們可以來共同合作一件思攷上的遊戲。

常來和我談話而有才且有創見的朋友，鄧恩(J. W. Dunne)，他在多少年以前發明了飛機，以後曾努力想時間和空間對於意識的關係問題。照鄧恩的意見，以爲我們是可以在某些地方預料到將來的。他在他的名著經驗和時間(Experiment with Time)那本書中，舉出了很可驚異的觀察來做佐證。那本書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我覺得這本書是令人很可注意的，而且也很刺激人的，所以曾替牠寫過一兩篇論文爲之介紹。這論文竟然獲得全世界的出版物來競相轉載。

賴文博士看過了我對於經驗和時間的介紹以後，就去找到那本書來讀，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我。平常他和我的通信，只是短短的條子，譬如說他將要到倫敦，告訴我他的住址的改變，問我的行動等等；但這次竟是一封很長的長信，信裏面說，像鄧恩那樣的經驗並不希奇，他

對於書裏所說過的還能夠增加許多上去，換一句話說，他能夠把這些經驗把牠擴大開去——在睡和醒之間，所預料的事情，不應該只是明天或下星期的小事情；時間的距離，大可以加長些，只要你有了長路程的思想的習慣。（鄧恩的試驗，主要的是在講清醒和遺忘間的微睡的頃刻中的預告）但這正是懷疑主義者得罪迷信者的日子。替大衆作事的人，關於這些較弱的暗示，不應該做鹵莽的聲明，這些暗示，除了一個人自己的心裏明白以外，不大容易和幻想區別的。倘使有人對這些預料的事情表示很活潑的興趣，那麼，他或者要犧牲大部份的勢力的。

他說了這類聰明的一大堆抽象話，就突然完結了，但我看了這一封信，使我就生出一種印象，覺得他在開始想說的話比他已說了的還要多。

後來，他回到了倫敦，突然來到我的研究室裏，把他的意見說給我聽。

「這個鄧恩的事情——」他開始說。

「怎麼樣」我問。

「他有一種方法，可以捉住。不自覺的睡眠和清醒間的流動着的夢。」

「不錯。」

「他在他的牀邊，預備置放一本雜記册，在醒來的時候，馬上就把他的夢寫下來。」

「就是那種的辦法。」

「他發覺到他夢中的事情，有幾項是幾天幾星期甚至幾年後實到他心中來的事情的預料——有時候是十分明白的。」

「那就是鄧恩!」

「那算不得什麼。」

「怎麼樣，——算不得什麼?」

「我也做了好久了，自然算不得什麼。」

「那麼……」

他米視着我的書籍的背面，好像是找不出相當的話來回答的樣子

「怎麼樣」我向他問。

他回轉來用一種要說不說的神情望着我，接着是微笑。他就像要預備坦白的談話樣子。

「我能怎樣說呢，除了你我是素不告訴任何人的。這幾年來，我不時在睡與醒之間，永遠在讀一本書——一本無形的書，也可說是夢書。而老是一本同樣的書牠就是一本歷史。」

「那是不是關於過去的事呢？」

「大多是關於過去的。也有許多非我所知道的事情，比況，說述北印度和中亞細亞的非常事件。而且，牠是正向前邁進的繼續地向前邁進。」

「邁進？」

「對的，正要從實現的『現實』中經過。」

「一直進入到『將來』的境界去嗎？」

「不錯，」

「那是……那是一本紙做的書嗎？」

「不完全是紙做的。很像你的朋友白朗路(Rrownlow)的新聞紙。和我們所知道的印

刷並不一樣，是但很容易讀的生物的地圖，雖然那字母和拼音都有些奇特。」

他停了一回「我懂得這是胡說。」

接着又說：「但是，牠是驚人的眞實呀！」

「你曾翻過那本的書的每一頁嗎」

他想了一回：「不，我怕驚醒了好夢。所以不敢亂翻。」

「夢還在進行着嗎？」

「對了。」

「直到你自己明白你是在做夢。」

「我以爲，——不正是那樣。」

「以後就醒了嗎？」

「是的，牠就不在那裏了。」

「可是你是常常在溫讀嗎？」

「大概至得——確定的。」

「不過有時候。」

「啊，同人在醒的時候讀書一般要至內容很生動的，我們就容易見到好像在書中看電影一般。」

「這本書還在那邊嗎」

「是的，我想這書是永久在那邊的。」

「你有時也把這些寫入筆記簿嗎。」

「從前是不寫的現在記起來了。」

「隨時就記下的嗎?」

「我採用速記的方法……你曉得我積有很高的一堆筆記簿了。」

他又閉了兩腿，站在我的大鐘傍邊，注視着我。

「你現在可以對我說了。」我說。

「是的，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不過我寫得太草率了，我的朋友，別人是看不懂的。除我以外，不要說你看不懂我的速記符號，就我自己，在寫後一星期，也會認不得的。近來我已把牠抄錄出來，有些是我口講由他人記錄下來的。」他說。

「你想想，」他站起來說下去，他並且在我的室中踱來踱去，「假使這是事實，這就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了。可是我絲毫沒有證據，你呢，你的意見以爲怎樣？」

「有可能性的」我有「我看來是可能的，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一回事，我還有點懷疑。」我說。

「我是不去告訴任何人的，除你以外。自然，我倘使告訴人家人家，一定要說我瘋了，或者說我是一個騙子，倘要知道這一類爭吵，只要看看洛其(Oliver Lodge)，看看李愁 (Charles Richet) 這一定會破壞了我的工作，喪失了我的地位的。然而，你該知道，牠實在是可靠的材料，……我告訴你我是信任牠的。」

「如果你抄錄一部份出來，我就可以看到牠。」

「當然你可以看到。」

他像是在猜度着我的心思說，「最大的弊病是我太信任那些話了，好比我自己說的一樣。」

他不曾把筆記寄給我。但是當我下一次在柏爾尼（Perne）碰到了他，他夾在彈簧書夾裏的草稿交給我，以後又給我了兩册。這些草稿大半是用鉛筆寫成的有些係是他在書桌上用墨水寫的，其中的五十頁已打好字，當然是出於他的口授的，他要我妥爲保存，用心閱讀，用打字機把全稿打出來，奇還他一份。這一件事是我們兩人間的一種秘密，我們兩人都想着，最好將來出版時，不用作者姓名，在這期間，且等待事實來證明或者推倒這本歷史中的所有意見吧，事實的輪子，會給牠以確定的估價的。

以後他就逝世了。

他死得十分突然，這是施了手術後的結果。

我聽到了他的死耗，馬上趕到日內瓦，告訴他的繼承人和遺囑的執行人——李諾先生(Montefiore Renaud)——以這個夢書的故事。我很感謝這位先生的客氣同他明瞭世界大勢的劇變，他很勞累的盡他能力收集了斷片的材料，一概託付給我處理，除了賴文博士已給我的三個書夾裏的材料以外。另一個夾子裏寫的普通字；此外再有一屜子的稿紙是用他那特殊的速記法記下來的就是這本歷史了。這本書的末一冊，便是第四個夾子中所有的材料。所構成的，那是用速記寫着的，(而且連頁碼都沒有標明)編爲倒數上第二冊。賴文博士似乎是其快的能力，提着在記憶消失之前，記下他夢中的印象。他準備自己重新謄錄一過，但他並沒有對及將來會有人要談牠，這種材料，只是供他個人需用的吧了。牠是一些不精確的極簡單的速記的混合物，人名地名等的專門名詞用普通字，標點僅用空格，而且常常用一個字來代表一個整句，甚至一個整節。三分之一的速記材料，已經用普通字重新抄過了，或是用打字機打出；倘使沒有這些來做嚮導，恐怕這整部的材料，便沒有方法把牠整理出來。因爲這樣，我不能替他做成一本連續的敘述，使這冊歷史的首尾完全。原稿中，有幾編十分明瞭，但是有

些是混亂和隱晦，我已盡可能的範圍，把牠抄錄了一遍。至於不能銜接的地方，那就自己寫了幾段來爲之補充上去。我以爲我已經把在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五九年中間的世界所進行的鬪爭和變化的事情，作做成一本完全的歷史了。在二〇五九年空中獨裁的時候，就讓位於世界範圍的「現代國家」——牠在這一本歷史出版的時候，一定是十分熱鬧的。讀者或許能夠在那一部份看出了極大的缺陷，或是極大的省略，可是並沒有使世界團結的歷史的主要道路，有着疑問的地方發生出來。

這古怪的「將來的大綱」的真價值，讓我再來略說一下吧！

有一些小意見，就是反對把以下的歷史，單單說做一光輝的政論家的想像的夢。我現在把這些意見放在讀者的面前，但是我並不強求讀者來把牠接受。因爲第一，這本歷史中有些地方已被證實。草稿的最後一部份，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其中有許多部份，寫的時間還要早些。可是牠明白地指出了後一年大柴大王克魯格(Ivar Kreuger)的死；林白(Lindhergh)的孩子被綁的悲劇，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同年，莫利遜(Mollison)

飛行世界的宣告成功；德國希脫拉(Hitler)政府的成立；同年十二月美國戰債的討論；日本於一九三三年侵入中國的本部；羅斯福(Roosevelt)當選爲美國的總統；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這種種的預測竟是這樣詳盡，使我有些難以解釋了。我以爲這些不是偏於能夠預告一類性質的事情；牠們也不是從任何從前的形勢中能夠演繹出來的，賴文博士在一九三〇年怎麼樣能夠曉得這些事的呢？

第二：有一件使我比讀者更爲不安的，那是賴文博士完全沒有理由要想對我神秘，不論在天上或是地下，他沒有理由對這材料怎樣到他那裏和他怎樣把牠寫下來的情形說誑。

倘若沒有這些考慮，我想我準備和一般人的意見一樣，認定這本歷史的著作，是賴文博士有意選擇出來用以發揮他的想像的。這實在是日內瓦秘書處的一位職員虛構的故事，他有不尋常的機會來對於事物的趨勢下一個判斷。或者，讓我們說他是希伯來式的有條件的預言，是在一種假的受靈感的情緒中產生出來的。本書的文體，完全是賴文博士的文裁。在現在和距今一百七十多年後所用的字與不大有分別，這是和我們以爲將來的文字中應當有

些改變者的期待不合。表現的態度，是和賴文博士在公共場所中自覺的發言完全不一致；至少，思想的習慣不是他的。無論那說話的習慣是怎麼樣。也許他的夢景凌駕了他清醒時的信念，也許這是我們思想的上進被壓迫的一個顯例。豈歷史真的會同這本書所說的話會一樣嗎？

我須得承認，起初，我還以爲這整個的事情，是一種推算的練習。我很想對於賴文博士的正文大大地加以註釋，我也想參加進這種遊戲，因此我在這工作上頗費上了幾個月的功夫。後來，我的註釋，竟比了他的正文還要多，當我把牠修正時，我又識爲我加入的這些註釋，大部份是庸人自擾的穿插，對於聰明而多見聞的讀者很少有所幫助。倘然讀者對於本書發生興趣的話，多半能夠自己來構成意見；如果看不起本書，他自然將更看不起贅在上面的註釋；那麼，我的註釋，或者會像在公共圖書館的書籍中所看到的鉛筆寫的東西一樣地令人感到討厭。要是這部歷史不過是推算的歷史，那麼註釋也是不適當的，要是本書裏面有了較多於推算的東西，那麼，註釋實在是一個極嚴重的無理的糟塌。最後，我便把那全部的註釋完全刪掉

了去。

但是我也需要把這些章節排成功次序，所以有許多不可省的穿插，仍得保留起來。我已經試了幾次的安排了，因為這些章節在賴文博士寫下來的時候，並不是依照了牠們的適當的篇章次序的。我已經把幾處不平的地方變成更為平坦，但我仍舊希望把他所遺留下來筆記照原樣的為之發表。

我們在這裏開場係開歷史中的一本新書，雖然牠並不是賴文博士交給我的夾子中的第一張紙，牠很順利地講述着最近數年世界劇變的進行。在我看來，牠的述說是十分新穎而動人的。牠根據了一個新的觀臨，來分析世界大戰的主因，從敘述「失敗時代」的故事，（我們所處是在牠的開始的數年）就自然的連續着流露出來。除去這一編「導言」外，真正的敘述，大約是從一九二九年到二一〇五年的終了。最後登記的事變，是在二一〇六年的元旦。牠順便提到了那正是劇平紐約的高樓的鋼骨燼餘的一天。本書的印行，當在二一〇六年的新年之初——或者說也許在新年之初似乎更覺妥當些。

著者 H. G. Wells

卷一 今天和明天

一　紀念的記號

人類的歷史，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中間，發生了一次變遷，歷史的範圍，因此就擴大，並且是統一了。從前，牠不過是相互的關係，日漸密切的集團歷史的結合；現在，便明白和自覺地變成爲一整個了。許多種族，社會和政治的命運，完全匯合在一處，從前所想不到的可能的事情，現在牠的遠景便在人們的想像中展開了。這一個遠景，又使人們的思想跟隨着發生了無限的變化。

思想變化的第一階段一定是破壞的。有些生活的義務的概念，過去曾經指示過或是滿足過最有能力和最有智慧的人物，這些概念，自然是偏狹和武斷的。過了十年，人們就開始不再相信牠們，牠們也就失掉了指導的力量。思想的本身沒落了，價值也就隨之而減少了。舊的

信仰失掉了勢力以後，人們的心理也就感覺到不安，於是只好盜名，欺世，自棄，浮躁來自行苟安了。從前，每個人所屬有的民族或地方，都具有一種特徵的文化，他們相信這些文化，一直是正確而無可非難的，現在，都變成解體和破碎的簾幕了。在這個單一的世界中生活着的我們，那些必要的行為，隱約地現出在舊概念後面，最初還不免有些模糊暗淡，為的是傳統假面具漸漸溶解歪曲和彎折了。

現在，紀年學院還未完成了改訂的工作，還未確立下社會進化的重要日子，我們敘述對於人類的經驗以及人的心靈和意志的發展，最好仍舊用現在通用的呆笨而不合宜的。世紀半做單位，計算基督紀元以前和以後的時期，我們是從基督教世界繼承的這個狹隘的制度，任意分劃一百年為一方塊，在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書籍裏，採用了已經有兩千年了。牠使許多人（除了最謹慎的）的歷史見解陷於不正確；青年學生應該常常留意於這種謬誤的分劃。皮特華脫(Peter Lightfoot)說過，我們說的是十八世紀，我們想的是由一六四二年「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條約」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大敗時期的風俗習尚和態度。我們

說十九世紀，在心裏所引起來的圖畫和想像，是煤氣燈及蒸氣運輸時代的東西，從拿破崙後期到秩序恢復的窮苦諸年，一直到一九一四年所引起震驚全球的世界大戰。在二十世紀的階段中所喚起的想像，是飛機世界的電氣化及其他；但在一九一四年前，飛機是一件稀有的東西，（第一架飛機在一九〇五年升空）而用蒸汽來發動行走的火車輪船，到一九四〇年代，還不能完全用電氣來代替。我們要每一個時代的青年，首先去憶記那些毫無意義的世紀的型式，以後再去爲之糾正，那是一種多麼麻煩和費力的事呀！所以，我們紀年的記號，倘使有人來爲之修正，那是一定受到每一個教師所歡迎的，到了那個時候，修正了的紀年，使人家能把我們人類的歷史，列成功一個重要的集團。

這個問題紀年學院正公開的提出請人們從各種的觀點來加以討論。他們提議把我們人類已經知道的和可以用年來計算的歷史分做了若干長短不等的時期。這些時期的劃分，自然要引起人們極熱烈和極有興趣的來討論，因爲我們對於事變的價值，大都各有自己私人的估計，就是古代的文化社會，也有着很多的爭論。我們的紀年，可於過去四千年來某一年

發生某一項最重要的事件，是可以確定的，還有由於進行沖積層研究的賽爾威康福特（Selwyn Cunniferd）委員會縝密而耐心的工作的貢獻，我們也可以用作確定另一個一百世紀內重要事變發生的十個年期。我們就過去的五千年來說，現在可以無疑地應該採用的分劃點，第一是亞力山大去征服希臘的時期，西方偉大的希臘——拉丁的貨幣帝門主義的階段就從此開始，這是由亞力山大大帝赫爾斯彭脫（Hellespont）開始，其終點或許是耶麥克（Yarmuk）戰爭（六三六年）或許是在耶路撒冷城陷落於阿曼（Omar）教王時（六三八年）以後便是回族和蒙古人壓迫西方的時期，這才開始了基督教封建主義和伊斯蘭（Islam）封建主義相互對立的時代：就是亞細亞稱霸的時代。到了一五七一年萊配陀（Lepanto）的一戰就結束了。以後，第三時期便是舊教和新教改革的時期，主權國用着有組織的常備軍來互相競爭的時代也就從此開始，就是所謂歐洲稱霸的時代，或稱國家主權的時代。最後一九一四年慘酷的世界大戰的浩刦到來時，這時大西洋文明的新經濟方法的向外擴張，為歐洲內部國家主義的緊張所代替。由戰爭得來的結果，便是對於人心啓示了一個不完

全歐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不自覺地已經打成了一片，成了一個系統，但是仍受「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和帝國相互競爭的思想所束縛着。這個心理的驚恐和覺悟，是「現代國家」時期開始的標幟。這個最近的時期的開端，就是我們現在準備要研究的失敗時代。牠是「現代國家」時期的第一期。第二期，不是一個新時代，是以麥其非(Megeve)的宣言開始。四十五年前，這個宣言，成了人類的普通常識，由此就結束了失敗時期，這時期繼續了有一百五十年，

這部歷史第一次的出版日期，是在耶曆(C.E.)二一〇六年。到銷售了好幾版後，牠的出版日期，將改成現代紀元(M.E.)一九二年，一八九年或一八七年。倘使依我們紀年家的決定，是把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或是俄國社會革命開始的一九一七年，或是凡爾賽和約簽字的一九一九年作爲失敗時期，以及爲世界統一而衝突的時期的決定的開始。第二個日期，照現在看來好像是更合實際一些。

有組織的世界制度的概念，在一九一四年，大家還是都以爲不是人類所能實現的；可是到了一九一九年，這個概念的力量十分強大，竟能盤據在許多人的腦海中。大家想出「現代

國家」這一個概念來，這些概念現正在萌芽之中。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已經自稱是一種世界制度。大戰後一般人因身受過戰爭的痛苦故確認大戰是一個純粹的浩刦和損失，但是我們在過去已經看到那可憎的數年的浩刦的人，那認爲在大戰中，物質同生命的破壞，雖然是空前的，但也並不是不可抵的浩刦。我們認定大戰可以使人脫離一些破舊的見解，但只是一種呆笨的和強制的脫離，把這些見解變得荒謬而陷入可悲的境地，所以人類命運辯證發展中戰爭是免不掉的步驟。

二 現代國家」觀念的出現

大戰前和大戰後的世界，有着重要的不同。在那種使人窮困而同時也使人清醒的風暴發生之前，不論當時怎樣貧窮，人類總算能夠在世界上建立起秩序和快樂來。有這樣見識而能夠明白認識的人，只是極少數的卓識者罷了；但在浩刼之後，這個思想即傳徧到廣大的羣衆，成了大家的期望。最後，成了能促進有組織的羣衆行動的工作的信念。

大戰之前，能夠預先感到並且把牠來宣傳這個觀念的人，我們在現在看起來，像是一種莫名其妙地膽小和懦弱的人。除了雪萊（Shelley）外，在大戰前說世界制度有改革可能的話的人，大都帶有不能現實的氣味。在他們大多數的人中，被維多利亞時代「放浪」的恐怖支配了一切，一般作家們都用着得意的神氣，笑着他自己的提議。這些先知中間，竟然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們自己的推理的。白朗（Maxwell Brown）最近發現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偉大的分析（The Great Analysis）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裏面有着「現代國家」的基本的結構的預言。在當時，這確是一種可驚的，有先見的著作，可是說得十分小心，甚至在書中不敢署下了作者的姓名。以這樣一個可以使世界革命化的計劃的著作，竟使作者自己不敢署名！據他說，爲的是怕人家對他非笑得使他難堪。

一到現在這個概念，變成我們現代生活的基礎，已經慢慢地把那班反對的人的愛國主義趕走了，在一世紀半以前，就成爲志士們所想實現的理想和奮鬭的目標。這是依照了怎樣的心理和行程實現的？白郎的一本有趣味的書叫做大戰前現代國家的預言者，（Modern

State Prophets Before the Great War)曾經做過一個詳盡的研究。他追溯這一個概念，該到這一個概念的萌芽期，指出牠的最初的現表，完全不是和平的，而是征服世界的夢。他說牠同乎常的習慣和實際的常識做了長時期的鬪爭。在他大著的許多附冊中的第一冊，引取了幾千種引語，遠溯到基督紀元的初期。所有一神論的宗教，在精神上統統是「世界國家」的宗教。他攷查巴倍爾坦(Babel Tower)的神話，認爲這是最古的世界大同論者，或者是曙光以前的先知，企圖着解釋人類的區分之謎。（現在我們極有理由認這神話是倪披爾(Nippur)的愛彌兒古特卡(Enmeral (Gudeka)就是古昨蘇馬埃(Sumerian)人的寓言家做的。）

白朗指出因古代許多帝國的生長，和那時官家把許多神祇集合了一齊供奉的緣故，形成了混合的宗教的發展，結果必然地引到一神主義上去。至少是從釋迦牟尼時起，人類大同的理想，成功了一般人的活信仰。這種信仰，像是一種感情，總是在存於世界上的某一處。但是，這種信仰的最初，只是一種簡單的情感，以及對於生人的一種動搖的同情。從這情感進而爲一種實行的事業，還是最近時代的事，牠的必要的條件，直到現在尚還沒有完全，

白朗對於人類歷史做着更重要的貢獻之前，已經簡單地研究了一下人類的發明。他指出至少在過去的一萬年，從克羅馬琴特斯（Cro-Magnards）人把他們的皮衣帳幕印花以來，印刷的藝術，時現時滅，在十五世紀之前，從沒有到達了印刷書籍及普及文化的階段。這些事件，也從不曾在人類行爲中佔得了重要地位。他集取關於人類屢次要求飛行而沒有成功的事件來做佐證，像在柏得拉典（Bedrashen）最近找出的第四時代的滑翔機，去年在米拉柏拉灣（Mira ela Bay）發現的被撞壞的于州（Yu-chow）機，以及有趣的毀損了的裝飾品和人的遺骸，（這些最後的東西，是在二一〇四年地震之後，由測量飛機克勞福特（Crawford）的深海照像中初次被人注意，以後又被拿坡爾斯（Naples）生物試驗場的滑水艇綏門（Sal emin）號的滑水者所尋得現經葛羅馬立丁（Giullo Marinetti）教授證明是台得拉司（Daedalus）和衣開洛司（Icarus）的神話的滑翔機的遺骸。）白朗又追溯到從愛爾遜（Aalesund）的碑文和古代中國近巴夏峪（Bahia Coqui）處石穴的刻文起，一直到西歐人在十五世紀最後建立了渡過大西洋的交通爲止，美洲是有時候從東方，有時候

從西方，不斷的被人們在發現這樣的發現，共有十六次之多，大多是依據了現在的記載可是沒有效果的單獨的發現，或者還不止這幾次，不過不曾把遺跡留下罷了。

這些古人，他們用了有進取的精神而能力不足的成例，來幫助我們瞭解失敗時代的長期鬬爭。我們現在看來，地球上這樣明顯和唯一清醒的人事的安排，不曉得我們的祖先，在把牠完成的時候，是經過了不知多少的困難呢！

我們對於這種成爲流產的一切沒有結果的發明，那是十分容易解釋的。首先不妨把渡大西洋航行的例子來說：也許古時有到了美洲的航海家，到後不再回來過；也許他們在回來之後，因爲找不到必要的幫助和必須的資斧，能夠使他們在死的以前再行去一次；或者他們碰到了許多的險阻；或者他們在第二次的企圖中竟是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故事，被說傳而成爲離奇的神話，大家就對實質也不再相信了。人類在沒有很好的帆船航海的科學。水手的羅盤時，要想跑到美洲去，那真是一種勞而無功的冒險。

再從印刷術來說，中國人發明了有系統的製造廉價的標準紙後，印刷書籍及知識的普

及，才成爲實際的可能了。最後，人類達到飛行的目的之遲緩，那是沒有法子的，因爲人們在還步得超過自然的飛翔前，必須要冶金学達到能夠做內燃機的一點。不到這一個時候，人們是不能夠建造又強大又輕便的東西，達到升空的自由去和空氣的迴旋相搏鬭的。

對於公衆的幸福，作集體的服務而組織單一的人類社會，這一個概念，同樣要等待交通器具能夠迅速進化，能夠戰勝地理的隔離的時候到來。這一個迅速的進化，在十九世紀時方纔可以達到。蒸汽，石油，電力，鐵路，輪船，飛機，有線電和無線電，十分迅速地接踵而興起了，牠們把人類織成了從未見過的一片，不知不覺在不到一世紀的時期間，那些絕對不能實行的組織，竟然變成了可能的，假使要文明繼續着下去的話，而且還變成非行不可的組織呢！

大戰所以在歷史中佔了最超特的地位，就是因爲牠指出了那一組織的必要的緣故。這是從未有人認爲必要的。凡百事件，必先有了完成，然後始有承認。大戰之前，主張把全世界組成一個國家的預言者，從來沒有感覺牠的需要。所以他們對於人類的統一，表示出一種有禮貌而又羞怯的姿勢，認作漂亮而有益，但並非是必須的。大戰之前，最明瞭的世界合作的要求，

出自第二國際。大戰之後，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把國際聯邦的超國家，弄成了模糊而搖動的暗影，爲了這緣故，甚至大多數最先進的作家，也以爲所需要的最後的組織，就是將現行的制度來加以補綴，以便阻止或者和緩戰爭，並阻止無產階級的暴動發生。

共產主義運動，是由某些偶然事件的結合，奪取了俄國，作爲牠的基礎，同時還證明了牠的理論價值。然而，後來牠是從世界大同的社會主義的立場退却了，不再前進了。牠的理論，爲了實行的需要，那是十分不夠的，牠的觀念的發展，被馬克思的自大主義所妨害，並且再加上俄國式的保守的武斷。馬克思的固執以及虛榮的堅持，創造了一個和達爾文主義相互並列的學說，這個學說，對於後來共產主義的發展，那是投下了一個不耐和倔強的暗影。牠最仇視社會主義的烏託邦派的，所以在列寧迫切地要求政權之前，「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毫無把握的前途，表示出非常愚昧的驕態。「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說：「打倒資本主義，」除了造成千萬種的幸福之外，還會有什麼？共產主義堅持着經濟的社會化是必要的，但是牠在俄國得到政權之前，沒有顧到牠技術的困難。牠僅在一九二八年，就是取得政權後的

第十一年，才產生了牠的遲緩而不平均的「五年計劃」一一九二八年之前爲實現社會主義，牠却沒有概括，一切的任何工作計劃。牠在試驗過程中，不得不憑藉臨時的權變，倉皇想出的辦法和戰線的更改，用着漂亮而惡俗虛偽而詭辯的恕辭說整個世界的運動，牠從未有過來自圓。

這本世界史的讀者，已經曉得從列寧死後共產黨精神和智慧的力量，監督不住，和抗拒不了那個有力而專一的和才能有限的喬治亞(Georgia)人史太林(Stalin)的獨裁。在有機智而和有創造才能的列寧死後，史太林就急速地壓倒這樣一個聰明而麻煩的，且是少不來的人托洛茨基(Trotsky)——他倘非缺乏權變和必要的尊嚴，一定做了列寧的繼承者。這便使我們失却了那個「現代國家」能夠在俄國最先出現的希望了。有創造能力的忠實信徒真是可怕的。列寧把馬克思的教條弄得弛緩了一些，並且還弄反了一些，史太林又把列寧主義做成了新而更僵硬的教條。此後就是政治的教條主義者在一個急需才能的鬪爭中，支配了所有的技術家，正像好幾世紀基督教世界的神學的爭論，把歐洲陷入貧弱和荒廢，使

統一影響的利益縮到零度一樣，所以在俄國，政治理論家的迂闊，確是阻止了組織上的效率，青年人都被訓練得虛驕而仇恨外人。牠的實際上的影響就和法德意以及蘇格蘭的整個的愛國主義毫無分別。

俄國，因爲心理的發展隸屬於政治，而政治和社會的階級又貧弱和缺乏批評的活力，可和駱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 在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所指出的戴奧克利興皇帝 (Diocletian) 時代一樣——有了好的意思，但是缺少精神來實行專制俄國的革命，本來抱有領導人類的野心，但是一開始即行失敗了。牠的世界大同主義，比了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世界大同主義不會支持得更長久些。

俄國的建設運動，免不掉要落在西方發展的後面，列寧的銳敏的頭腦，當俄國表面處在領導地位時，就預先見到了。（見歷史文件集中的左翼共產主義。）但他的觀察係出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不是自由思想中的回聲。

「世界國家」一概念的成爲一個革命的目標，到底在西歐成長到完全的程度。最初牠只

是暗中生長着。到了一九三三年，任何觀察者看到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制的專橫和德國國社黨的紛擾，很像別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到處關稅壁壘增高，和對貿易的限制等事實，要得着錯誤的結論，認爲世界大同的觀念，到處會在種族信仰和國家主義的前面退却的，但是在這一個期間裏，「現代國家」的萌芽正在生長着牠的崇信者正在到處集中力量！

「世界國家」的預言者，需要有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金融風潮發生和全世界經濟生活的不斷地走向崩潰之路，（金融風潮不過是一個序幕而已，）這樣，他們的信念才會有了勇氣。到了那時他們才開始說話，他們在從前只是倘促地部份地和無結果地批評着公共事務，並且引爲滿足，到了現在纔堅決地要改造世界。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實現世界革命，雖然他們仍舊避免「革命」這一個名詞。這一個目的和意志的弄得更爲確定的，那很可以用來說明社會生活的改變，並不是靠了一個或兩個超人，突然在覺醒之中成功爲領袖，被大家所欽慕而出名就可以行得的。領袖並沒有多大的用處，「世界國家」這一個概念，是一種人類思想中傳布得十分廣大的運動。

白朗在第二本附册裏，集取對於歐美五十個模範演說家和著作家的精確的研究，他列了差不多有兩千人的一個表，兩千人所產生出來的結果是平行的，這些結果，大都擺在百科全書和圖書館裏供作參考。在每一個例中，那些慎重狹隘以及保留的意見，都變做了更爲高聲和更爲明晰的講述世界形勢的話了。從一九一七年後，這些模範人只是說：「應該做些什麽？」而且都帶着溫和的聲調說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以後，他們又突然地說：「必須做些什麽！」並且漸漸地說得明白起來了。這是影響世界上一切較聰明的人的一種普徧的公論運動。思想的互相交換，是否有過，現在是不曉得了。但是發展是十分迅速的，幾乎令人辨別不出有什麽先後來。

一切聰明人的結論，可以簡單的敍述如下：他們認識人類社會，已經成爲一種分不開的經濟系統，中間有着無數的新穎而潛伏的幸福的可能性。一九三一年，這個概念，竟也出現在思想很頑固的法國。比方像一個無名而又短命的法國的內閣總理拉台爾（Laval）的告別美國（他在那年不知爲了什麽使命而渡大西洋，直到現在還是無人曉得）的演說，就是一

個例子。而我們又看到世界有名的大聲演說家像美國的胡佛(Hoover)總統和英國的首相麥唐納對他這一個演說又都發生了都響。

這種的思想，旣然有了政客們對之作口頭的恭維，已經足夠時髦了。然而努力着實現牠到邏輯的結果的人，還只是少數的聰明人，這些邏輯的結果，就得要否認現代許多政府的主權，建立起有權力的中央統制機關，預備補充或是代替牠們，使軍火和主要經濟物品的生產，脫離了利潤尋求者的管理，並保護工人，使工人能夠得到適當的工資。

一九三二年到三三年，瞭解這道理的少數人說得很爲明白。他們提出了這些無限制的改變，不再看作是有利的事情，看作是挽救文明，使世界免於浩刼所迫切要做的事情。而且還不僅是挽救他們那時就看到免除災難之後，不一定就是一種淒涼而又恐怖的安全。這是十分不可信的，同現在的秩序混亂和貧寒對立的前途，就是人們前所未知的「一種豐足繁榮和機會的富有。」一九三二年的明白人，他們相信世界的秩序，普徧的富足和人類創造力的不斷增加，在將來盡屬可能的；同樣相信現在活着的我們，在實際上能實現那一種思想時，會

得充滿了生氣和活力的。

文明的人們，他們並不因爲具有了明瞭的遠見而就得到快樂。他們不單被同時代人的貧窮恐懼所苦悶，他們確信自由的世界，本是人力所能達到的，可是受阻於魔力因此就不能實現，這是他們所感到痛苦的事情。他們看到數萬萬的生命發生了痙攣而變成殘廢，他們生活的可憐，犧牲的不正當，可是，他們看不見人類的生活，這樣受着摧殘和饑餓的必要。他們看見數百萬青年，傾向於使用暴力的生活，折肢斷體，很早就走進了可厭的死亡之途，他們想在這種狀態之外，建築起他們的安全快樂和自由世界來。

白朗在稱爲「一九三二年的台脫拉史(Tantalus)」（譯者按：希臘神話中說壽斯(Zeus)的兒子，被罰立於水中，水沒到他的下領，但他低頭想喝水，水就退去了。）的一章書中，引出了這樣的四十個例子。但是神話的台脫拉史是被上帝的命令所放，在表面可以達到而實際不能達到的地位。但是人類並沒有受到這種可憐的命運的支配。全世界的「現代國家，」在大戰的十年之內，在我們人類的想像中大放光明，看來一面是荒唐的近，但另一面又像

是離奇的遠了。過了一世紀熱烈的昏亂和無秩序，「現代國家」才能從潛伏的可能中漸漸地頭抬起來了。

現在，我們必須從這些戰鬪和受苦的一代人，——所謂「半光明的一代人」的故事講起：

這是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企圖統制他的命運。從前是由風俗傳統外部的需要和偶然的事情等造成不可抗的結構，他只在裏面想他的解釋和安慰，對自己的天性，不願有怎樣明瞭的智識，對自己的命運只有用傳奇來歌詠。他信奉統治在他上面的上帝，想借此來逃避去他辛苦和患難的責任。他牢牢固守着反對理智的成規，並企圖毀滅每一個懷疑的思想家和邪說的試驗家，因爲這些人妨礙了他的恬靜和卑屈。他寧願安於貧賤，不願由新的努力而得到痛苦。現在因了許多顯明的意外事件，特別由於不同和不協調的文化在世界的範圍裏相互不信任和破壞，使他不得不看到現實。在變化的氣勢更爲廣闊時，就是卑屈，也要使他感覺到不安了。努力在他前面，激勵在他後面，他不顧他的深刻保守而開始認識他「應當怎

樣」的使命，不自主地被迫着問他過去的是些什麼！

現代「世界國家」的觀念，當我們在回顧到那些不同的人物表現出這種意見的時候，當我們估計着他們最初爲了實現牠而努力的時候，我們在公道判斷他們之前，不但在他們生存的社會裏需要明白愚昧，成見和惰性的深度，就是在他們的內心裏，也需要和這些東西爭鬪。我們要寫出來的，不是光明和黑暗的衝突，是在盲人中剛睜開了眼的人的鬪爭。我們要知道，雖然他們爲了遠見到今日的文明世界而遭遇迫害，但他們仍不是屬於我們的時代，還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在他們內心中所想像的，和現時實際發生的大地大不同。白朗的書中，有幾章是專門研究着早年對於「現代國家」預言者同時又是事業家的人，他的結論，指出了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對於「世界國家」明瞭的男女增加得極快。他舉出他們的文字和口語，常有驚人的先見。他又尋出他們的生活情形，以及信仰和行動間的矛盾，充分地顯示了個人生活的條件性。

他寫着：「這些男女們在安全而又莊嚴的研究室裏，能夠看得十分明白。在休息着的時

間中，柔弱而又精細的腦筋，能夠逃出了直接的生活，各方面都感悟到因果關係，看出了社會事變在時間和空間的經緯中的永久價值；但是外面擾亂的喧嘩聲侵入了研究室，把研究室的門撞開了。以後，同時代的生存，歡樂騷動、戰爭和市場等等的騷擾聲一齊都闖了進來，本日要做些什麼急迫的問題，把我們共同命運的美麗思想，驅散了。」

白朗再爲這段說明舉下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一九三七年美國進步黨領袖彼得勞特(Peter Rautt)革命宣言的草稿的真蹟，這是無疑的，在那時是一種令人感動的文件。他把勇敢的殉難，來作最後的證明，證明他忠於他心中最好的思想；但是，在這草稿旁邊，有着一堆乘和加的小數字，却喚起了大衆的注意。白朗找尋證據的本領真好，並且還有着他的一組勤勞的助手爲他幫助，於是，他便能十分精細的指出這些數字是什麼。原來當彼得勞特在預見許可他替我們計劃一個新世界的時候，他的思想並不完全集中於這一個目的上，他的思想是游離的，有一個時候，他就忽視了宣言而去計算這些數目，他是正在努力於工業證券的投機，在他腦海中活動的大部份，正在考慮着賣出的時候是否已經來到了。

二十世紀時代的智識分子，像那社會心理學家所稱的「分心」的例子，比了這個更爲動人的，我們還不能找到。在十九世紀的中葉，西歐和美國有一種叫做「散光幻鏡」的原始的娛樂，把透光鏡排成爲雙個筒式，使塗有顏色的畫片，映到幕布上面，這也有稱爲「幻燈」的一張畫片，先從怪機器右邊的透鏡投出，後來又把光移到左邊，這樣，器械所投的畫一半便散失了，而另一半則變得十分明亮。真實的變作幻景而消失了，幻景的微弱暗示，最後竟變成唯一可見的真實，顯然的這是我們祖先所認爲「幻」的效果。在某個階級中，我們不容易決定那些部份是前進的或是能退的，或者決定全體中的那一部份是真的。大家失去了對於已成習慣和制度的信仰，「現代國家」的思想，便在人類的智慧中誕生，正像不大機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玩意兒是差不多的。

三　舊制度的不平衡的積累

我們把失敗的時期比擬爲舊式的「散光幻鏡，」這不能算是太過。「現代國家」已在

慢慢地自覺，而且努力着實現自己。但是，那瓜分世界的六十個以上的主權國，完全不預備擁護這個「現代國家」而使自己消滅。「現代國家，」並非是一件永遠在增強的東西，那些主權國家，也非是從此一直衰弱下去永不抬頭的。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十年中，確實是有這種和平而有秩序的新陳代謝的暗示，有許多東西，可以被解釋做在許多政府和文化的形式的分歧中人們能夠慢慢建立起一個世界的社會來。但是，這些暗示，比起立刻準備着抵抗牠們，和把牠們弄反過來的計謀，是表面的，而且是不大重要的。

我們且考慮一下，那時有何主要的現象，使許多人的心中在期待一個世界大同的社會。在那時候，已經完成了極大部份的金融統一。倫敦城區的放款遍於全球，實際上金鎊成爲整個世界的貨幣，金鎊和各地方貨幣的交換變動率很小。各地的經濟生活，完全變成一致了。大部份地方貿易的進行很少障礙，但是英國人還希望他們那自由貿易的世界主義，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羅馬的國際農業院，發表了農業生產的按年的統計，向商品運輸作進一步的世界統制。人口的大遷移和重新整理正在進行着，任何的政府都不來干涉或是加以阻礙。比方

的說，成羣的俄國和波蘭的人在收穫的時候，漂流到德國的東部去做短工，到了收穫之後，重又回來了；幾十萬個意大利人到美國去做了幾年工。賺了錢，就重又回到他們的故鄉了，一般的旅行者，可以自由地到全世界比較安定的區域去，無論誰都不會問他要護照來查看一下，除非他到郵局去取掛號信或是其他的事情要證明他是什麼人的時候。

有些雖然是很小但是十分重要的聯合服務已經成立了，而且在全世界已經獲得了穩固的法律地位，比方像郵政聯合，便是一例。一九一四年以前，一件交到收件人手中的寫成的文件不論牠在世界的任何一角，和現在是同樣的可靠，雖然及不到現在的迅速。（歷史文件部最近重印一本小書叫做國際政府，是吳爾夫（L. S. Woolf）在大戰期中替老費邊協會所準備的，對於這樣的辦法總結了一回。他羅列了關於貿易、工業、財政、交通、衛生、科學、藝術、文學、毒物、妓院、罪犯、移民，和一些小的政治事件的，二十三個重要的世界協會。）這一些世界範圍的合作，尤其是對於英語的民族，好像預示着由十九世紀各式的政治結構的聯合，能夠平穩地過渡到人類的安固的聯邦。「世界國家」的觀念。在那時候已經有許多人曉得，像鄧尼

遜(Lennyson)爵士，他早已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的洛開司來廳(Locksley Hall)的一書中有過這樣的思想。但是，那時候卻沒有任何的努力去實現這一觀念，並且也沒有感覺到這種努力的必要。大家都期望着由事物的內在力量的發展，可以自動的來把牠實現。

沒有系統的事變，人們十分相信着他的內部必定有着某種潛在的力量存在，這雖然是當時的普通錯誤，但是也可說是唯一的普通錯誤。牠影響各派的思想，馬克思的信徒在當列寧還不曾威風地走進世界，並且還不曾有「布爾雪維克」的改進共產主義之前也是認定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是必然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學生們，也在「自由競爭」中，找得了一個仁慈的天意。極端的社會黨和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都說「信賴進化，」正像基督教徒虔誠地信賴上帝一樣。二十世紀的世界，唯有「布爾雪維克」運動，才能把人類的意志放進共產主義中。在十九世紀。不論是革命的，或是反動的思想，都被那種不負責任的懶惰心理所溶化了。孫教授(Prof. K. Chandra Sen)曾經說過，維多利亞時期中的希望，乃是麻醉劑，並不是興奮劑。

現在我們在有紀律的制度中生活着，也是從辛苦的戰鬬中鍛鍊過來的勝利者。我們曉得，從一切的外表看來，一切有希望的事情是怎樣的空虛。我們關於科學的試驗從演繹的智慧主義中怎樣解放出來，已經有過一般的序述了。在那裏我們描寫偉大的機械發明行程，是增加着每一有作用的物質的能力，完全不管牠對於人類起了些怎麽樣的影響。這些發明，在人類間可以促成世界範圍的理解，同時也可以促成世界範圍的屠殺。

發明家和研究家所創造出來的這些新機會，已經被人們所濫用，可是這並不能說是發明家和研究家的錯誤，因爲這是在他們所管領的範圍以外的。他們還不曾有他們自己的共同文化，他們都各在自己的領域中工作，對於自己所發明出來的東西，被人們作斷片的不規則的使用，他們也不能負什麽責任的。生物學——尤其是社會學的發明，比了物理學和簡單科學的實際進步，本來落伍得很多。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發明應用，也是較爲困難。牠們所影響的事物，大都在社會習慣中根深蒂固，一切新奇東西不能自由加入的。我們在用沙石鋪成的道路上，十分容易用汽機或是鐵路來代替了車馬，但是這樣的改變，我們却不能把路和車馬

去加以處分。當鐵路代替了車馬的時候，人們還是一樣乘着車馬去競爭。可是人們却不能把新的社會制度社會政治和工業的關係建立起來，使牠和舊的同時並行着。這確實是一件更覺麻煩和緩慢的事情，因爲這不僅是一驅逐問題，乃是改造問題。舊的要變做新的，但社會的進行，不能停止了片刻。爲了時間上的不同，生物學上的舊東西被機械上的新東西所擠出，這是避免不掉的。這種事情，在二十世紀中正達到了最高的高度。

我們還可以用一個病理學來做比喻。從前人沒有研究過活的機體的合理的發展時，假使人的身上有了某種不規則的生長時，他們感到十分痛苦而且沒有辦法的。因爲那時候的醫生，他們還不能完全治療這樣的毛病。這些病症中，有一種是由血液中的所謂紐爾密(Zinmi)的比率，使一個人的骨節，不論是局部的或全部的都發生了生產過剩。患者的外形慢慢地改變，變得不再像他過去的自己，竟成爲他過去自己的諷刺畫或稽滑畫。他的舉止，粗野而笨重；他的頭蓋骨，古怪地擴張着，他的肢體的比例改變了，他的肌肉也失了常態，總之：牠是變成一個怪樣子，並且變成殘廢，最後自然是走進了死亡之途。大戰前的百年間，人類社會也發

生了和這絕對相像的事情。在機械的發明和實驗物理學的刺激下，社會的骨骼，肌肉和胃腸都發生了腫脹，牠的神經的統制，不能和牠互相符合地擴大，而變成了畸形的怪狀態。

大戰前的時期中：有很多觀察者已經模糊地認出了這個世界是在不合理的發展。大家喜歡講的，便是「精神的」進步，跟不上「物質的」進步。在那時原始而簡單的精神和物質的對立，還能被人所認承。平時講這一些話的人，總是帶着一種他比起全世界來要高明的神氣。有的時候，講着這些話就好像有了很多模糊的暗示：像那什麽使他人抑制着自己啦，不要叫現代的發明用得太快啦，或者是禮拜堂裏多去幾次啦，或是早些用着簡單些的儀式結婚啦，或是多多讀一些偏向於「精神的」一類的書籍啦，或是男女不要混合在一處洗澡啦，或是辛苦些工作而少拿些工資啦，或是裝得更紳士樣子的服從法律啦，好像這麽樣一來，一切都變得好好的了。人們祇曉得這些事情，絕少有人認識社會機體的不調和，正在逐漸的擴大和增加，一直到大戰以後，人們才有了正確的認識。

青年的讀者或許要問：「中央觀察局在那裏呢？牠應該把這些不規則的事情來登記着

才好；教授和學生的團體在那裏呢？他們應該想出些調整的計劃來才好。」

在那時候並沒有中央觀察局，中央觀察局是過了一百年才成立的。因爲精密的討論、計算、批評、和預測的複雜組織，在那時候的人是還不曾夢見過的。那些有思想的，充滿着在嚴肅的活動的城市中，只是在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三〇年間於空中獨裁之下歷史博物館和圖書館像網一般也組織了以後才存在的。至那思想的母親——世界百科全書的機關，也直到二〇一二年才建立起來的。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人們對於經濟的力量，以及牠在社會所起的影響，當無適當的估計；那時候祇有幾十個教授以及一些對這基本研究有興趣的人們散處在全地球。就各種的意義講，他們都是分散着的，他們的交通也並沒有系統。他們既無研究權力，又無適當統計，威望也極小，祇有少數的人注意着他們所想的或是所講的。

他們或者是祇值得受到這樣的漠視而不能得到更好的待遇。他們互相愚蠢地爭鬥和互相輕視，他們還互相的渺視並且故意的誤解。當我們讀到那時期出版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論著時，我們就能認識出世界智慧的生活，在那方面是十分的落伍。那些出版物的作者，寫得

繁冗而又嚕囌，並且空虛。而不可信，至於那些試驗科學領域內的工作者，却每天都在努力着增加新智識和改造舊智識，以冀達到新鮮和實際的勝利、這兩種人竟然生在同一個時期，叫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很不容易相信的。從一八一二年城市中第一次有用公共的煤氣燈時起，直到大戰爆發，這世界便先後爲煤氣、蒸汽、石油、電氣所改造。電氣科學更是有着長足的進展，地球上向來不被人所認識的地帶，也逐漸被探險家所找出，逐一在地圖上添繪上去了。以前從沒有想到的原子化合物和無數種的物質，現在大都被人所利用，瘟疫也被人所遏止和克服了，死亡率只當了從前的一半；生命增加了一二十年延長的平均時期。人類在物質上雖然有了這些成績，然而社會和政治科學，實際上仍是無用和沒有進步。在那整個的世紀裏，沒有一件事能夠表示人類應用了社會的、經濟的、或是教育的原則，具有了什麼成績。

到了大戰以後，才開始，把社會制度當作純粹的科學的檢討工作。「社會生物學」的講座，也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倫敦社會科學院中開始設立，而且在該校設立社會心理學的講座的主張，還不過只有一些暗示，以後就差不多連消息也沒有了。一九六八年，倫敦北部斜坡上

的新建築，因爲壓力太重，引起了土地的崩陷，泰晤士(Thames)河的河道也就因此而變了牠的形態。接着，又是倫敦第二次大火，把一大堆的材料焚燬，英國博物院的無價的材料也一同遭受了焚燬。至於其他處所的損失，雖然也很嚴重，但是比較還不算大。克萊爾市場(Clare Market)的一切有趣的機關的文件，也包括在內。那一個社會生物學的講座，確實是歐洲的第一回呢！

因爲社會科學出現得很遲，十八和十九世紀先進國家的精雅的文明，雖然爲社會所限制而淪入不安的境地，但也解體了。同時候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曉得是什麼緣故把牠裂成碎片的。二十世紀初期的歐美人，對於破壞他們生活的社會政治力的明白，並不比羅馬帝國的國民在羅馬滅亡時明白得更爲清楚。表面的安全發生了，以後便是毀滅的發生。那時候的人們，對於這些現象的原因沒有加以分析，多少年來，連十分勇敢和先進的思想家，也只是跟隨在事變的後面。他們把握不住當時發生的是些什麼？只好在好久以後才明白已經發生的事。他們從未預先見到那時沒有見解，所以也就談不上任何理智的統制了。

四 馬克思和亨利喬治的評

當人類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時候，沒有能力去診斷一般的事情，可是也有一二個屬於例外，這是讀歷史者所不能忽視的。當中最顯著的，就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他同志們對於經濟發展的分析和預測。

不論怎樣，馬克思主義總是值得我們來加以注意，牠把十九世紀和他同時的生產方法中自己毀滅了的元素是理解得十分特別的。當沙皇覆滅之後，牠偶然被革命的俄國選擇去做了炫耀的信條，就使牠在動的思想史中占得了極重要的地位。

馬克思是脫利佛司(Troves)地方基督教徒中的一個猶太律師的兒子，這位律師在社會上是很有地位的。馬克思在彭恩(Bonn)和柏林曾受過十分良好的大學教育，當時他的急進思想，被這良好的大學教育所溶化。他又和蘭開耶(Laneashire)的布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是至交。恩格斯比馬克思要客氣得多，而且還能幹得多。當恩格

斯在英國歐文（Robert Owen）派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下，馬克思便整理出關於經濟發展的理論，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了。這些主義，包含在一部還不曾完成的鉅大的著作——資本論中，在一八四八年恩格斯和他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也可以見到一個大概。他主要的功績，就是明白地認識了社會和政治的方式及其影響，必須依賴物質的需要——「唯物史觀」。他主要的錯誤，就是瘋狂地嫉視中產階級——布爾喬亞（bourgeoisie），這個原因，由於他是一個沒落了的貴族，或因他在物質和智慧上，都須依賴商人恩格斯，所以對中產階級嫉視得更甚了。他企圖把陰謀和政治行動來應用他的理論，但結果是徒勞。當他死在倫敦的時候是怎樣地失望而且憤怒，萬不料他的學說竟會在他死後出名的，這因他的信徒遵着他的主義組成了一個有紀律的共產黨，更因列寧（Lenin 1870—1924）把他的學說現代化了他的名字才能在歷史中永垂不朽。

已經完成的事變，現在使我們洞悉了，讓我們來考察他的一般的主張吧。我們看他英勇的思索，那一些是被說中了的，那一些是並沒有被說中了的。這裏所謂英勇，是從他當時心理

的氣概而說的。

每個小學生，現在都曉得生活中主要和永久的衝突，是在過去和未來，也就是已經完成的過去，和前進的努力之間的衝突。初步的生物學的課程，便是教他瞭解這一個衝突。他在那裏開始看見，並且明白已經完成的東西，繼續着自動的鬭爭，想把新東西，新生的個人和觀念，人種的擴大的需要完全來束縛住。人家告訴他，這樣的衝突，通過了全部的歷史。在古典的神話裏保守的沙透倫 (Saturn) 吞噬了所有的孩子，其中只有一個孩子得到逃脫變成賈荷 (Jove——譯者按：賈荷就是羅馬的主神。) 後來賈荷神自己又怎樣把撲羅米宙斯 (Prometheus 譯者按：此乃半神半人之神) 束縛住，這是每個愛讀雪萊的作品的人都曉得的。我們只要向學生們舉出在羅馬共和國和猶太國的歷史中所記載着的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鬭爭，羅馬的平民脫離，和猶太恢復舊土五十年節的紀念祝典，約瑟夫 (Joseph) 在埃及的神話，英國關於死守耕地的法律；與斯登李夫來特 (Austen Livewright) 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歷史上的破產 (Bankruptcy Through the Ages) 的那本書中研究得十分明白：這一些大半

是提醒學生們，告訴他們生活中的種種鬪爭是永久的。但是。馬克思和他的同時代的人，一樣不懂得歷史科學，專門用假哲學家黑格爾(Hegel)所想出的奇怪的「辯證法」。他把這種永久的對抗，只用他周圍的工業生產的話來表示。這是他的心理研究的不完備。一切企業家和資本家，都變成了他書中的丑角，用他資本優先的利益，去處分那生產的「剩除價值」從這一點上他所有的購買力愈是增大。社會的經濟愈覺得不平衡。

馬克思好像總是把「限制的所有」和「生產的所有」分不清，這兩者的區別，我們在現在看起來，那是十分重要的。為了利潤而剝削和為了支配而摧殘，尤如急進的兒子和保守的父親，在他看起來，竟然是一個東西。他沒收尋求利潤的「資本家」的財產的主張，是十分空泛的，像是一些也不明白經濟活動的真正心理。他並不感覺到，假使我們要找東西來代替為利潤而生產的粗野刺激，就要把各種複雜的動機來加以組織。他沒有一些實際的能力，倘使我們曉得他從來沒有謀過生活，那也就毫不足怪了，他享有一個先知者的特權，他因自己是一個天才，所以就十分弛緩和懶惰，他是不曾把他的鉅著完成的。

一九一七年後列寧在俄國當權，列寧比馬克思有能力，而且思想也細密得多，他是實際組織起共產主義的革命力量的人，列寧使共產黨（在斯太林佔有的時候以前）成爲世界上最有活氣的創造力量。至於馬克思和列寧，兩人在智慧上的主要差別，早有伊斯特曼(Max Eastman 1895—1969)在他那本有名的馬克思和列寧一書中講得十分清楚，這本書到現在我們還是值得一讀，列寧總把他自己說做一個馬克思的門徒和代表者，後人的批評，才啓示他努力的細密的光輝，他只是想從一個較老的先知的陳舊學說中，獲得一些實際的常識而已。

在十九世紀，還有一個著作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對於限制的財產的摧殘的影響，應該同剝削的刺激的效果分開，或者明白得更爲清楚些。他是對經濟問題的著作很出名的。一個美國的印刷工人，他看見人類的生活進步爲地租增高所阻限，他的簡單的救濟方法是征收土地稅。正像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是馬克思的簡單的救濟辦法一樣。至於被沒收的財產和世界的資源，應該怎樣去管理，那馬克思從不曾有一些觀念給了他的

門徒。同樣亨利・喬治也從不曾指出了在他所提倡的不可馴服的個人主義的世界裏，這征稅的當局，對於不斷增加的稅收怎樣去使用。

這些前輩的短處，我們在現在對之只有微笑。但我們笑的，只是因爲我們比他們出世得遲緩，比他們多了兩世紀以上的經驗。我們須得對他們表示出一種很大的感激，因爲他們畢生的工作，是勇敢而不自私的。

實在說，我們感激的倒不是他們所做的事情，乃是他們替我們去掉了一些東西。我們看到現在明白暴露出來的世界經濟生活的廣大的輪廓，是十分的簡單，但是，我們應該想一下，這些人所生在的時代的雰圍，以及風俗習慣，大都沒有經過批評，錯誤的概念，向來受着人們所崇敬，迷信的拜物教符咒，巫卜的盛行，當權者幾乎瘋狂地壓迫着思想和言論。他們不得不用着那些成了問題的術語，不得不通過一種複雜的心理和道德的糾纏，以表示着實際的問題。既成的制度和習慣，大家總承認是永久不變的，這些流行的見解，到了他們才敢破壞，雖然我們現在看來，或許這是一件小事，但在那時卻是一種重要的解放。在他們的時候，假定事物

是一成不變的幼稚的習慣，是差不多普偏的心理。

經濟發展必需通過尋求利潤的時期，這是馬克思主義至少已經爲我們指出了在這個時期內，財產的集中，失業的增加，購買力的鋭減，甚至市場的縮小。一九二八年以後的人類活動的停滯，很多人認爲，這是馬克思的預見的證實，於是，大家就認爲這是共產主義已經解決了社會問題的明證。

現在我們既不被先其混亂的心理所牽累．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這幾年中艱難的活動的基本行程，照我們看來是極簡單的。我們懂得人類幸福的永久條件，就是價值的一般水準的永不跌落。我們在通貨委員會中，有十分徐緩的和力求進步的世界機關來，爲牠保障，使一個全圓終年都有着交換任何種同樣貨物的價值。牠的價值的減縮是很小的。同樣，也不許價值的增加。有錢的人，既不能得着不勞而獲的利益，也不會受到不應受的損失。當我們人類的生產能力增加起來的時候，我們使全部財富的全圓價值，也依照比例而增加起來。債權人既不會發財，他的合理的期待，但也不致被人剝奪。負債人，也不致被人要求他出着力

所不能的償付。

在那個時候，人們想消極地能夠變成富翁那是沒有辦法了。在空中的獨裁之下，賭博是被嚴厲地禁絶了；高利貸也和偽造貨幣一樣的被列而爲貨幣罪；給人金錢於人，只是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而不是使他去得到更多的金錢。賭博的精神，我們認爲是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的問題，牠暗示着對生活有根本的誤解。我們沒有投機家，股東，高利貸者或是收租的地主。這些「獨立的」典型，在地球上完全見不到了。土地和天然的資源，現在是屬於全人類所有的，由人們直接或是派代表去組織各級的管理部。有租田的耕農，和開發的公司，然而沒有轉租的權利，也不許可永久私有其資源，由積累地租而得到利潤的種種事情。因爲現在我們個人生產效率平均的不斷進展，只是使整個的社會得益，從而使我們的集體企業不斷地擴張，開時反又日益增加。我人的生活享樂將被提高，不然進行世界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的數目將因此而減少。後來生產的效率增加，人類社會必須再提高牠的消費力量，並且一年年地擴充牠的活動。要不然，牠就崩潰了。倘若牠的進步不再繼續，牠便墮落到呆板、煩慮、惡行和衰敗之中。

物件的量和類必須要逐漸的增加。

這些必然的條件，構成爲現有秩序的ABC，現在似乎很明瞭了，於是，我們就頗難設身處地在那二十世紀的人的地位上了，因爲在他們看起來，這些都半是新奇而生疎的事情。他們還具有「生存競爭」的心理，不曾整個地人道化，我們倘若用一世紀半以前的眼睛來觀察，那麼心中就須費去十分巨大的力氣，我們必須想着文明的心理，根本是從最初的極不社會化的動物的混亂衝動和競爭中慢慢地進化而來的。

五　自由競爭和貨幣紊亂使舊社會陷於不安

二十世紀的世界經濟的交換尚未有共同的通貨，所以交易不但不能因之而精確，並且極容易有偽造的弊病。那時候還想不出一種有效的方法來。固然，在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普偏繁榮的第一時期，曾有過一種通貨和信用的臨時的世界系統，用金鎊爲基礎，集中在倫敦的城區，但這不過是偶然的，這種制度的得以實行，實由於黃金的繼續發現；當生產效

力增加的時候，有許多黃金出來阻止了價値的暴跌。其次，便是各種環境幫助了英國，使她能夠在蒸汽運輸的發展之中獲得了居於領導的地位，並且還有利於世界自由貿易的發展。

世界大同主義的盛衰，正像月亮的圓缺，可是，在同時代的人，却不能懂得這究竟是什麼力量在起作用，也不企圖去把握住這些力量，把牠們組織起來維持永久。倫敦城區佔有的世界金融界的雄長地位，不幸在大戰後崩倒了，但又沒有新的東西起來替代牠，所以這種把金鎊爲基礎的假的大同制度，能夠得到一時的成功，是由於現在所有的黃金不斷的增加。倘使一旦全世界黃金的來源告盡，那麽，這一個制度，必然要大大地失敗。大戰以後世界工業的衰落，就是由於美國人和法國人把一部份的黃金窖藏起來的緣故。

本來在那一個階段裏，我們是有很多的機會的，可是竟沒有人切實地努力去取得了地球上的全部領土和天富資源，把牠們從零碎、混亂、和浪費的開發狀況而變爲整個的系統。世界上還是有着六十多個「主權國」每一個國家，對於在他自己國境內的天然富源，有着絕對的統制權。在這些的政府下面，公司或是個人，也都有着權利去自由處分他們所取得的一

小塊，雖然他們處分的情形，各國並不一樣。開發各處的礦產，使用地球上陽光和能力資源，根本的原則，只是爲了個人的或團體的利潤；當時各政府的干涉利潤的爭奪，也只是爲了本國人反對國外競爭者。在近一百年的時間中，幸虧黃金和發明都源源而來，尋求利潤的制度，因爲和金屬貨幣制度有着連鎖的關係，足以使人類的生活極度的擴張和繁榮。那時我們不易得到多數的人相信，更不易使支配公共事務的製造業者商人、礦山主、農業家、和金融家相信說這制度不是永久的，世界等待我們急於把經濟方法作重要的改變。人們要經過大大的破產、失望、等的階段，那才可以醒悟。

「個人進取，自由競爭。」這是十九世紀的標語。但一切競爭的自然結局，便是競爭者獲得勝利。當大量生產的現象第一次在美國出現時，便證明了這個自利的力量。競爭勝利的團體，他們壓倒了新的競爭者，凡是足以危害他們統治的新活動，這些團體便都要來破壞或是限制牠。歐洲各國的政府，對於限制競爭的工業同盟和工業集中也極少抵抗，牠們的規模，十分迅速的發展到超過政治的疆界以外。美國曾經有過切實的努力，阻止着企業走向獨占方

面。爲了這種阻止而努力的著名領袖，第一個便是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23)總統，他主要的結果，就是雪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這個法律，是被一班律師們常引做作武器的。

這些結束自由競爭的聯合，很能統制貿易和阻遏新的發展。霍克爾 (Hilary Heoker) 在他的初期繁榮時代中事業的遏阻(Sudies in Business Coagulation Dnring the Fisst Period of General Prosperity) 那一本書中，引出了兩千個以上的例子：由雷水果和食物到收音機、汽車、房屋的改造，鄉間路旁的人造燈光，又舒適而又經濟的鐵路工廠，在這一切的事例中，豐富的供給和有效的改進的秘密，都是爲着要尋求利潤制度而陸續被收藏了起來。一九〇〇年以後，全世界新的日報的創辦停頓了，這便是言論自由的收縮。報紙和通信社，大半落在強有力的集團的手裏，他們對任何新的刊物能夠加以破壞或者是摧殘和他們意見不相合的學校。他們使公共的意見，變成了一律的刻版文章。

這樣求取利潤的制度，倘使碰到不能完全操縱的國家時，他們也要起極大的取締作用

的。取締的辦法，就是收買政黨，使其主張保護關稅。樂觀者總說自由競爭制度是無止境的進步方式；但是，世界在明顯的崩潰前，普通消費者的經驗，就和這種理論不相合了。他現在住的房屋、穿的衣服、用的器具、旅行中運輸的工具以及他所受的教育，依照當時已經曉得的和已有結果的發明的標準來說，依照霍克爾的計算，在平均的二十五年至五十年中，早應更換了。但是所以還不更換的原因，並不是爲了失業的勞動，和材料的缺乏，乃是被榨取地租和尋求利潤的制度妨礙了。

這種現代化的進行遲緩，就是因生產效率增加後，解雇工人便也隨之而增加了，工人因此就更陷於貧困失業的人便到處可以見到。當二十世紀走進三十年代時，這些可憐者，正好像從病體中排洩出來的東西一樣。

六 生產過剩的難題和發生戰爭的關係

在「戰後」的時期裏，有一個所謂「生產過剩問題，」在討論中占著重要地位的。就實

質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極簡單的事情正像那自由競爭過程的完結，是爲了勝利的競爭者圍結起來和企業的停頓。所以生產中尋求利潤的結束，是爲了效率增加而成本繼續減輕；換一句話講，就是僱工對於生產率不斷地低降。這些呈現在表面的事情，我們的祖先，不論是有意或是無意，都沒有顧及在我們看起來這眞是很奇怪的。這些企業僱工的收縮，會得引起了失業人民的比例的增加，也是同樣的事件。土地的擴張，生活程度的提高，以及黃金源源而來而引起刺激的效果，把一部份被擠在一般經濟生活外的人類日見增加的現象，不僅隱蔽並且運中和了五十年。然而那個時候還是有波動，就是所謂「貿易循環」機器的輪軸雖然因一時的阻滯而停止不走，但等到困難沒有了，便又繼續走起來。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人們慢慢地認識了用公開競爭利潤的方法，來進行人類的事務，實非可以持久的方法，至於那些從這方法獲利最多，並且最有利於永久維持這方法的人們，也承認了這一點。實在的，如果就他們整個的階級說，他們是完全不知道有馬克思的分析。

我們曉得，管理世界的第一任務，就是在利用繼續着擴張新的大企業的方法，把人們從

積極的經濟生活中排出來加以阻止。但是這樣的思想，那時已經被大家討論了。平民們的本能，比了政治經濟學家的智慧聰明，只要、錢由此可以「流通，」工人們由此可以找到「工作，」他們可以贊成浪費和奢侈。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是需要沒有報酬的公共支出來調劑牠的，所以在這一個時期，世界上大都容忍着軍備擴張和戰爭準備。已經節省下來的能力，須在某一種地方發洩，私人經濟的世界，是不願意在那時候的政府，用節省下來的能力去建築大規模的住宅和進行教育社會的建設事業的。社會中的建設，只允許供給利潤的集累者所享用。因此，人類不斷增加的生產率，便在古代戰爭的傳統中找得了出路，牠容納了從生產中退出來的大部份的男人，只需有一年的光景，大宗的軍械和其他軍事設備等都分泌出來了。現在假使不是陸海軍這一個惡癰的生長，那麼在競爭的私人企業中所潛伏着的生產過剩的難題，就會在十九世紀末年表現成功極大的羣衆失業。社會革命也許早在那個時候爆發了。

但是，軍國主義對大宗利潤的生產，供給了浪費的出路，緩衝了革命危機；同時牠也強固

了社會壓迫的力量，破壞的手段的積累牠的規模，差不多和人類潛伏着的財富的增加相並。所以，人類遭受着軍事專制的奴役，也就是爲利潤而自由競爭的不可分離的一面。自由競爭制度，是軍事專制發生的必然條件，因爲有了自由競爭，所以才產生軍事專制。自由競爭制度的需要軍事專制，正像一隻船在開始沈滅的時候，需要把壓艙用的沙袋去投給破壞和死亡一樣。二十世紀初期軍國主義的階段和生產過剩的難題，同樣現實了有關的兩面。這個現實，便是社會機體無計劃的擴展。

在好戰的準備中，人類的能力，病態地增集着，找不到別的方向去宣洩。這在二十世紀前進的時代中，怎樣在世界的面容上變得更爲明朗，那是我們值得注意的。人類的各種集團，慢慢地都有穿制服的人參加了。那些叫做歷史大觀(Histerical Scenes in a Hundred Volumes)的着色的畫册，現在在我們的一切學校和陳列所中都備有着了，並且自由發散在每一個有兒童的家庭内。這些書籍，極有興趣地顯露着我們祖先怎樣日常生活？軍事的偏見，是怎樣開始？怎樣稱雄和怎樣完結？這許多圖畫，大都是真實的圖畫雕刻或者照像。自古以來軍

事行動，終是吸引了畫家的注意的，每一個時代，各有關於戰爭的圖畫，從中世紀的小規模的戰爭起一直到歐洲大戰的百哩戰爭。但是，我們研究的興趣，並非關於戰爭，乃是關於社會的生活狀態。在戰爭最多的十七世紀，一般人說生活受着兵士所擾亂的極少。戰爭是一種特殊的職業。一六四九年到一六六〇年的第一次的英國共和國是在英國國內戰爭中建立起來的，但是戰爭正在進行之中，我們在聽得到槍聲響的地方，還可以見到有人在做打獵的遊戲。英國與斯頓(Jane Austee 1775—1817)的小說，對於當時的海陸戰爭並沒有一些微弱的回聲。在韋馬(Weimar)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他是歐洲文壇上「大人物」時期中的德國的大人物，他不顧德國軍隊在琴拿(Jeea)戰爭以前怎樣地需索着木材和飲食的供給，正當在戰事進行之中，十分喜歡同他的「異族敵人」——拿破崙——作一種社交的會晤。

畫成穿軍服樣子的十八世紀的帝王，我們是不多見到的。那時的裝束，是一種尊嚴的長袍，不是戰士般的戎服。獨只那位冒險的拿破崙的空前的威嚴，才弄壞了，歐洲的社會生活，不

論到什麼地方都是軍服，連女性也傳染上了這種穿軍服的時髦，甚至那肥胖的女親王，竟也戎裝了上校；腰裏纏着金色的帶子，手裏拿着明亮的軍刀，領着軍隊前進，但走在軍隊前面時脚步還跨得不大穩健呢！從法國的路易·腓立普（Louis Philippe）和英國的維多利亞（Victoria）女王——所謂「家庭國王」——即位以來，有一個短時期曾經回到了文雅的服裝，這是對於拿破崙風氣的一種暫時的反動。但十九世紀的中葉，兵士又恢復了他們的威望，軍人的制服，又漸在社會上占起勢力來。一八七〇年後，歐洲羣衆，竟是沒有一堆中間不站着兵士。

所謂世界大戰，這不僅是屬於歐洲的，而且在美國的街市人口中，也加強了不少的軍事元素。那時候招募了不少輔助的女兵團，後來，再在世界上穿起了誘人的兵士的戎裝遊行。在戰爭以前的美國，除了退伍兵的遊行以及華盛頓地方以外，要想在平常的時候看見一個穿軍服的兵士在街上行走、正像見到最少見的鳥一樣。穿戎裝的人自己也感覺得不自然，因爲他容易使一個覺得已能解放了的人民起疑心。大戰的發生，便把這一切完全改變了。大戰後

德國和解除了武裝，國社黨的運動和共和國徽圍的運動就應時而生，他們努力爭取德國人應有穿着適當的制服的自由。至於半軍事半公民的穿制服的童子軍，在南非洲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一年南非洲戰爭和大戰之間，就已開始傳播及全地球了。

在下面，我們至少還要講一下國社黨的運動——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波蘭的類似的運動。我們在這裏引用黑衫隊和褐衫隊的緣故，只是想說明世界大戰中和大戰後軍人和公民的生活界限已經是泯沒了。

過去，戰爭不過是在邊界上的事情，「前綫」的事情對於後方一般公民的生活，還不致有怎樣的危險發生。但是，投擲炸彈和散佈毒氣的飛機出現以後，便把這種情形改變了。還有，人們會得用宣傳來做武器，在戰爭的危機下，社會叛變的危險益形增大，也是使交戰國的整個的面積，完全變成爲戰爭區域的一個元素。起初，這變還只是在實際戰爭的困難中；以後，因緊於戰爭的危險，把任何公民的自由的遺跡，完全廢掉了。各國的政府，因爲日益感到使人人都聽受調遣，宣誓効忠，受迅速的紀律手段的制裁的好處，更爲努力而使之實現了。

在這一世紀之內，人羣的外表，由不整齊的個人的自由集合，一變而成爲一團制服的混合。以後每個人的衣服上，大都有着官職，表示出來，歐洲軍事化的社會在波蘭的戰爭當中竟達到了最高的一點。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毒氣面罩盛行一時，有的人真正的載着，有的人只是掛在頭頸上。還有，刺刀也頗盛行，準備飛機上面有人跌下時，假使還沿着的話，就刺死了他。爲了保護頭腦和身體，用以抵抗像雨一般的毒針的金屬帽和金屬肩章也出現了。有些公民的樣子看起來比了兵士還要可怕得多多呢。

在那時的軍事當局，碰到了一個難題；就是想給予人民以保護的一種器械和輕武器，怎麼樣才可以使他們在反對敵人時候生出效力，在暴動的時候就變成爲無用的東西呢？因爲在紛亂擾攘的那幾十年中，壓制和煽動雖然十分厲害，但是一班職業軍人，他們都感覺到人類爲反抗戰爭而暴動，「軍紀完全喪失」的危險一天一天增加，雖然牠們是違反邏輯和不聯結。

在舊世界多數城市的街道上，立刻出現了爲應付空中侵略而設的特徵的黃色警柱（

在法國是藍色，美國是紅白相間的顏色）警柱的表面是玻璃的，當正式的空襲警報發出以後，這玻璃就被打破了，裏面有着呼吸器和救生用具，是預備爲中毒氣者用的。同時，我們看見每一條街上都增加了十分明顯的指路牌，指引着到煤汽室和醫院的去路。在這時候，街上所有其他輝煌而明亮的標記，實際上完全被停止了，這自然是連帶而來的事情。

在二十世紀前期的城市裏，霓虹燈的廣告，照得半天通紅。這是廣告最盛的時期，紐約的 Great White Way，倫敦的 Piccadilly Circus，巴黎的 Grands Boulevards 還有許多其他的地方，都大都有着熱鬧娛目的多色的圖畫。這情形叫我們想起來真是感覺得美麗動人。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地上照徧了燈光，當空襲的威嚇的警報來了，把所有的燈火來熄滅，這是變成了必須的事情，除了那火星樣的偷偷地指示避難人到救生所去的燈光以外。

戰爭的恐懼，到了一九三〇年以後，傳播得十分迅速，黑暗從新把夜的城市，籠罩住「夜生活」變成了在偷偷摸摸的黑暗中進行，犯罪的事件也增加了。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時候，所有的民間醫院和醫生們，多半爲了歸併入軍隊而不大容易看見，直到二〇一〇年以後衛生

事業才在法律上重新成為民營的事業因為陸軍和市民的醫院及藥房等，早在一九三三年的法國開始合併了。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舊世界上每一個醫生，至少在理論上是屬於軍隊中的，他們穿着容易識別的制服，並且還服從嚴格的紀律，他的住宅和他的醫院，都掛着了特殊的黑色和黃色的方格。一切看護婦，也都是同樣地去受了登紀，就是普通的大衆來看病，也要和軍隊一樣辦法的。到了一九四八年。實行這些規則的城市裏，一般受了寒冷或是打破了踝骨的人們，就得立刻列入病人的範圍內，標明了號數，穿上了黃黑色的軍服，自己走去或是被人抬去就醫。在理論上講，這些醫治的系統是普遍的，但是實際上制服和醫生都不大容易找到了，因為在那個時候，社會正當在瓦解，而軍事化的進行，正是為了想要克服這種的瓦解呢。

在波蘭的戰爭以前，普通的建築，受到軍事需要的影響很少。衣服的軍事化，是在佈景的軍事化以前，甚至軍隊的建築師，所造的營房和類似的軍事建築，不過是尋常房屋型式的簡單膚俗化而已。換句話來說，祇把那些普通不堅固的房屋，變成為堅固罷了。現在還有些存在

着的圖畫使我們看了發生驚異，這些就是圖畫上的房屋，都是在英國的陸軍部下產生出來的，表示這是適合於教練官的家庭用的。軍隊中的人，祇是被波蘭衛突的經驗所喚醒了，大家都覺悟到倘若我們還重視這些城市的話，那麽這些尋常的城市，就有大加改造的必要。在以前砲台的建築，對於城市的生活是極少發生影響的，雖然那裏是需要有砲台來防禦的城市。從前的要塞，是在城外三哩乃至五十哩的地方的，砲台、戰壕和其他的軍事設備，大都和城市離得十分的遠。現在，首先是柏林，以後在但澤華沙巴黎和杜林(Turin)幾乎全世界大家都明白了空中戰爭不但要在城的周圍築砲台，並且十分迫切地需要在城市中間築砲台。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是大蕭了，大家都沒有知道，倘使要脫離經濟的困難，前面排着一條好的路，就是投資在房屋的摩登化和改造上面，一九四二年以後，在戰爭驚恐的狀況中，爲了要抵禦炸彈和毒氣，不得不把城市的建築完全加以改造，不過，在那時候的大城市，已經陷於十分窮困的地步了，牠不願意爲了繁榮而做的工作，終久不得不爲了駭怕而設法進行。

最明顯而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建築爲了避難用的三合土的地窖。牠的遺跡，到了後來，還

受着好奇的旅行家在巴黎和柏林等處懸吊着。（至於倫敦的地窖，已經崩壞了，那是由於地陷和大火的緣故。）接着，便是停止崇高的建築，大家努力於設計巨大的有甲的屋頂以及其巨大的支柱。幸而因爲當時社會的貧困一天厲害一天工業破壞，也是厲害一天，還有那最後戰爭沒有支持得長久，終算使世界上一切城市，得免掉完全堆積在這樣一整個的畸形的大覆蓋的下面。

到了二〇二〇年，建築設計的傾向仍是畸形的。一九四五年和二十世紀末年的這一個時期中所建造起來的大建築，絕少有能夠抬起頭來睥視着世界的。大家都稱那一個時期是「第二埃及時期，」這並不是偶然的。在那個時候，有着極多的機會，可以把堅實而具有彈性的新三合土的材料，來代替了鋼骨的建築，使建築物更加典雅和輕巧，然而，建築還是那樣的不行。那時候的人們是怎樣地怕用這新三合土材料呀！我們現在住在高聳雲霄而又時常在改進的家庭裏，這些房屋倘然被我們的曾祖父們見到了，說不定要恐怖得抱着頭向地窖中跑逃咧！

七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

把世界大戰記載起來的書籍很多在阿脫楷買（Atacama）所藏的歷史材料的目錄中，到最近爲止，共書有籍和文件凡二三六二七〇五册，其中有一八二〇〇〇册以上是專門研究——或者是大部份研究——關於戰爭原因的。我們倘若到過那個收藏着已經死去的和幾乎全部被人忘卻的材料記載的大圖書館中，憑吊着那長而靜寂的走廊，真沒有比了別的事物可以使一個學生更爲瞭解我們和那個時候的人的心理差異很多。沿着那發着亮光的書籍的長列中，看不見一個閱覽的人，或者我們能看見一個靜悄悄打掃的工人，在那裏考查材料是否有了損壞，或者有一個青年學生，正在耐煩地校對某一本流行的書上的綱要是否正確；或者是看見一隻黑貓。除此以外，一切是清淨明朗，靜寂無聲，書籍都悄悄地躺在書橱裏休息着。

在凡爾賽（Versailles）和約以後，全世界爭吵幾十年了，一個學生會在這像蜂巢樣的

滿列着書橱的地方，找到了「戰爭戎首爭論」的紀載。那學生姑且坐了下來，隨手取下幾卷書翻着，他在今天可以讀牠的全部了。因爲不管這一類書的原文是那國的文字，但是早已都有基本英語的譯文在裏面了。他會想到，他現在是在讀着瘋人們記載的東西，像那時候普徧的把人腦着的問題，現在是已經在人們的心中完全消失了。

戰爭的計劃者是德國嗎？戰爭的戎首是法國嗎？英國應該要負絕大的責任嗎？這一個學生，十分困難的把他的心放進了他的幻想世界。中間有着希奇的人物的化身，像「法國」「德國」等，同印度古代的神一樣的怪誕而難信。但是這人卻被人當作真實的，在道義上負有責任的個人一樣，受人所痛恨信仰，恐懼和愛好。就戰爭的直接的事實來說，那是等於在這些偉大的神的祭壇上，舉行着無目的和無結果的屠殺。死的，殘廢的和負傷的人大約有二千萬，還有無量數物質和財富全被毀滅，這在前人的瘋狂想像裏，是一丈有意義的偉大的鬪爭。好在我們在這裏不需要把他們的瘋狂復活。「戰爭戎首」的問題從來沒有解決過，可是再也不曾有人去研究了。大家都把這個問題渺視，讓牠一直漂流到荒謬的領域去，除了留下那三

百尺高的被人忘掉的書籍和文件來證明牠以前的重要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會餘下了。

戰爭的原因很是簡單，就是人類所用的器械，比了政治和社會的智慧的擴展，進步得太快和太不規則，因此前者和後者成爲不相稱了，這自然要發生戰爭了。因爲這世界已經被六十多個的主權國瓜分了。所以交通運輸的新手段，以及各地產品消費的新經濟生活，正催促人類去重組一個「世界國家。」人類只有兩條路好走：或是靠了條約和合理的安排，使這些主權國大家聯盟起來，以應付新的需要；或是讓不斷地強烈化的相互壓迫，發展而成爲世界征服的企圖。大戰前的數十年，英法德俄美以及日本的制度，都是像當時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就是說，在這地球上只許有一個「世界國家，」可是誰都想變做「世界國家。」當歐洲的治國方法初次想出來的時候，誰都不曾意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這些廣大的可能，到後來是展開了。在十八九世紀，戰爭的地域有限，而且利益也少得很。一到二十世紀戰爭的規模，擴大得超出了任何的限度，由戰爭所獲得的利益，却絲毫也不見。但是，一班政客和外交家們，還是繼續玩着他們舊日互相反對的把戲，使可怕的戰爭成爲必然的爆發。他們是被迫得這樣

的，他們不能統制，或者在他們的中間，至少沒有人有活力和想像來企圖統制。他們是被驅使於經濟的需要，他們要違背常理武裝起來。他們要威嚇，要把這樣的事硬幹到底。

大戰的發生我們可以用這些力量來說明，可是不能說明牠特殊的可怕性。為了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國家領土的擴張，是被相互間的壓力所限制，但是財政和工藝企業的膨脹是沒有限制的，不但沒有限制，而且還在無情的和無限的進步牠們擴張、發明、催促、售賣；牠們把新奇而可怕的武器拿出來，解決着比較小而陳舊的爭論。所以關於軍備的膨脹，就是因為大戰實在只是首次啓示經濟和政治間特殊的不相稱。一切鬬爭，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會中作了一個形式的結束後，仍舊在繼續進行中，而且比了以前還更擴大。但是我們且來先說一下關於大戰中我們應該曉得的詳細情形。

上次大戰的結果，人口是弄得很少了。我們有很多基於大戰經驗的小說，和個人的回憶可以讀到。這些作品有不少寫得是很好的。我們不論讀任何一本書，都有一點興趣和教訓，可是每一本書都不大精確。大戰爆發時的畫圖，仍舊能夠使我們發生着感慨，那時的人，全不覺

得事變的嚴重和危險，就是幾千萬受苦的人和幾個月內就死去的人，他們也是這樣的毫不覺得。許多講牠的小說，開始終是敘述假日郊游，或是俱樂部集會，或是具有同樣漂亮的背景。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天氣是十分晴和的。

戰爭的本身，是可怕的而且是不聯結的。除去專家之外，誰都沒有討悉那些聯結的必要。舊式的歷史，中間充滿了人名、日期、戰事等等，這是供給人家便於記憶的材料，準備在考試時候應用的，並不是使人懂得歷史的行程的。考試早應該在教育中廢棄了，牠應該陳列在學生的舊貨攤中，和地球儀、算盤、石板、竹杖等東西一樣。但是為了要保存對牠的記憶起見，我們可以發明一種「考試」的通俗游戲，使大家在突然選擇某一個題目時，比賽着誰寫得快和寫得多。

在我們中間，不大有人能夠寫出一部世界大戰的簡史來。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將軍的名字，像海格 (Haig) 吉青納 (Kitchener)，佛倫煦(French)霞飛(Joffre)，福煦(Foch)和路登道夫(Ludendorff)。還有像譚倫柏格 (Tannenberg)，馬恩(Marne)，松麥(Somme)

巴興特爾 (Passchendaele)，法克蘭羣島 (Falkland Isleo)，求脫蘭特 (Jutland) 等地的著名戰役。這些對於現在普通的公民，是絲毫沒有意義的，他不曉得佛倫煦是不是真是法國人？福煦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還以爲福煦是德國人，佛倫煦不是法國人呢！他不曉得也不管誰在這些衝突之中打過勝仗，或是敗仗。甚至他把戰爭看作游戲的興趣都沒有。那些戰爭，並不是活潑的戰爭；司令官的才能，多半十分平凡，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所以應付不了那些戰爭。他們的動作是愚蠢的結晶，不管計畫或是執行，完全是昏頭昏腦的。他們的回憶錄中，常常是充滿他們自己的自辯，以及他們個人的憤怒和惡意，人家讀牠們的時候，覺得還不如傾聽着兒童敍述玩弄軍棋時所說的假話。這些應使後世驚奇的戰爭，除在幾個專門家的心中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經是暗淡、模糊、凋萎和遼遠的悲劇，那次大戰的記憶，已經使得大家快要完全消失；那次的大戰，在我們集體的意識中的生動，也像帕羅邦納賽的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或是帖木兒 (Tamerlsne) 的征伐的武功一樣。他們絕不像成吉思汗那樣偉大的軍事觀念，具有着歷史的重要和戰略的光榮，並且在我們日常的教育課程中，還佔有一

席地。

關於這一個衝突，曾經說過些什麽大話，如果大家好奇而想知道，最好去一讀邱吉爾所著的世界危機（1923）（1927）。我們在這一本書裏，可以找到一切用英國觀點爲主的呆板而誇耀而英勇的十九世紀的歷史。「歷史劇」的富麗的辭藻，完全集中在鬬爭中一個最小心的人物身上。他顯出了一種天真活潑的稚氣，使他的故事能夠動人，可以補足其他的缺點。他同十三歲孩子的感覺一樣地不靈敏。他的士兵，完全是玩具的士兵，他喜歡把他們整排整排地打倒，把戰爭看作是娛樂。把他自己以及一切被忘卻的將軍和戰爭的政治家們，看得像孩子氣的認真。他對他們那種可悲的愚蠢，下過了嚴厲的判斷，把有一部分的人對之恭維，有一部分的人對之責難，滿臉顯示出那種守正不阿的神氣。他深信着他是在爲後代的人著歷史，深信着後代的人來讀了牠，對於牠的作者是會發生崇拜或是妒嫉的。他相信，他生下了孩子，就是創造了讀者。他興奮的讀着他自己的歷史，以爲別人也會和他同樣興奮的。我們從他的書上，不但可以看出了他的時代和我們自己的時代，心理上有着巨大而深的鴻溝，他使我

們能夠用好玩和寬恕的同情，來渡過了這巨大而深的鴻溝。

路登道夫、葛來孟梭(Clemenceau)、費歇(Fisher)和福煦這些人物以及其他的大戰領袖們的回憶錄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還不能有那樣的吸引力。在這些人的生活中，戰爭是一件得意的大事件，所以他們後來不再會想到旁的事情。他們不像邱吉爾那樣的天真，叫人家讀了以後能夠恢復疲憊。也不像獵犬那樣的對了各種東西都有着興趣。他們在衰老中發憤寫作，倘使有別人用筆來咒詛他們，也不見得有這樣遇到。他們是已經成長的人，但是又是發育不健全的人。

有許多書籍寫着戰爭的更嚴肅的現實，過去十五年，歷史館在留給後人的戰爭畫片(War Pictures for Posterity by Pen, Pencil and Camera)的一書中已經撮述了一個大概，每個人都應該翻閱一下的。

開頭的幾卷，主要的是說在大西洋和北歐諸國，突然捲入了破壞的旋渦之中，我們便看見他們國內的羣衆，在首都城市的街上示威和歡呼，像潮水般的青年，停止了他們的工作而

來加入，這是戰爭開始時的熱鬧以及不可想像的兇猛和英勇。以後便是第一次的接觸，鄉村中發生了大火。一般好奇的旁觀者，被他們都認爲敵人的偵探和便衣隊，捉去遭受了野蠻的槍殺。許多可怕事情的出現，正像是一陣可怕的怒潮的巨浪。被這巨浪侵入地方的人們，大家到處逃跑，無其數的羣衆，很可憐的背負着小而簡單的行李，在黑暗的街道上像「喪家之犬」的不知奔波，向那裏走。「拍拍」的來復槍和機關槍聲，是前進的軍隊，盲目地和敵人接觸着。他們最初是踴躍歡呼，後來又變成了可怕的兇暴和艱苦。新的戰爭，不是過去的任何戰爭可比，在東方戰線上的法國人，他們用了無限的狂熱，穿了明亮的軍服，受了「馬賽曲」的感動，向前去進攻。他們是遭受屠殺了。在三星期之內，他們損失有三十多萬人。德國軍隊大批通過了比利時，百萬以上的軍力，快到達巴黎時，忽然受到了堵住。在這些圖畫上面，我們看見東比利時，法國和東普魯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時的風景，這是怎樣的美麗，可是在兩個月以後就被損毀了：彈丸洞穿，壕溝縱橫，到處是堆積着流血的死屍，以及無數萬饑而餓的，和殘廢的人類的呻吟。

這些接觸的地方，以及汚穢痛苦和擾亂的區域，逐漸擴張開來，片時間，就通過了東歐，從北海到阿爾卑斯(Alps)完全變成了「戰區」，所有的房屋也變成了一個廢址，每一枝樹的樹幹，完全顯示出樹皮裂爲薄片而落下的遺跡，幾百萬蹲伏在戰壕中的人，像老鼠樣偷偷地走來走去，穿着破衣的死屍，躺滿在地上，不能埋葬。這樣，求取厚利的經濟制度，使得人類剩餘的精力，完全受了狹的成見和歷史的傳統所束縛，不允許有別的出路，日夜不休地在地雷、炸彈、機關槍的轟炸和人命的陸續毀滅中消耗了。

新發明以及從前未曾試驗過的新武器，很快的被採取使用，使鬪爭擴大而能力增強。原作「航運」用的齊柏林(Zeppelin)飛機也變做了戰爭的武器，飛到敵人後方去，進行着轟炸城市中沒有武裝的人類。我們看見到炸裂的開花彈，落在汚穢小城市中人家的屋上，把病臥床上的祖母和睡在搖籃中的嬰兒炸得粉碎，我們再看見成羣的大衆，驚恐地尋找着地窖，和洞穴去躲避最初階段的空中戰爭，還不過是用炸藥和引火物，後來，在戰爭進行之中，用毒氣炸彈的藝術也發展了。首先，非交戰的人口，只是遭受着爆炸和死亡的命運，現在又加上痛

苦的窒息，潛水艇是一個大戰中的新奇怪物，最初只用來沉沒作戰的船隻的，以後又以之來攻擊商船。關於無警告擊沉柳雪退尼亞(Lusitania)號而溺死了一一九八個男女兒童的事件，都已有了動人的敍述。依照當時的標準，柳雪退尼亞號是一隻華麗的巨船，她從光明安適和信任之中，突然降落到黑夜的水中去作着拚命的和沒有希望的爭鬪，這個時代的著作者，認爲這是一種時代象徵。十九世紀一切文明的成績，許多人看來是在走柳雪退尼亞的下沉之路。

這些，使早年在潛水艇中服務的人，引起不安的情形，到達了極度。這些潛水艇，實在是一種戰爭的機器，在初發明的時候，還有着許多的缺點。我們現在所見沿地中海及大西洋的礦山用的或是深海探險所用的大潛水艇的平安和舒服，在從前的潛水艇是一點也沒有的。這些潛水艇的壓力系統，還有無限的垂直射程，大多只有使我們生出誤會，不能使我們瞭解大戰時的潛水艇，到底有了些什麼能力。在那個時候，潛水艇的下沉，只能達到一百米突的深處，再下去，那就受不住壓力了。牠很容易漏水，當牠漏水的時候，鹹水很容易使電瓮生出影響，綠

氣又放了出來，使水手們感到痛苦和不能呼吸。如果在一百五十米深的海底，這種脆弱的器械，就會完全變壞並且是毀滅了。在牠下沉的時候，雖然他們也帶着壓縮的養氣，可是裏面的空氣完全變壞了，呼出的炭氣的繼續凝集，使他們感覺到一種特殊溼冷的不舒服。因爲他們不能在水中潛伏的時候太長久，他們能夠在水中潛伏一兩天以後就得要出現到水面上來開動牠們的燃油引擎幾小時，以使重裝電流。那種潛水艇，有着武裝的機關槍，並且裝有水雷炸彈及其他的炸藥，這樣開始去追逐和毀滅在水面上的敵人的船隻了。

這是一件困難而又十分危險的任務。因爲潛水艇沉下到水中去後，什麼都看不見了，在潛水艇裏的人們，完全像盲人一般，祇有近水面的時候，能用一種周視鏡，看看周圍有些什麼，而且能夠看到的距離是很有限的。在水面上的時候，牠們和水面上的任何的船一樣有望遠力，可是，牠的危險，也同水面上的任何的船一樣的。所以十分可怕和十分脆弱的潛艇中的水手，是在極不舒適和半窒息的狀態之下，摸索着他們進行的道路。去擊沉敵人的船。爲要看清被追逐的船隻，牠們必須走到水面上來，這樣，牠們就給敵人以砲火攻擊的機會了。牠們身體

的鋼皮很薄，只要被一粒彈丸穿破了，牠們便不能再潛伏到水面下去了。當牠們在沉下去的時候，因為煤氣的泡和石油的煙，會洩露了牠們的所在地的秘密。使牠們發生了危險。

潛水艇在最初雖然有很多的缺點，然而牠確實是一種極厲害的武器，尤其是在中歐國家的手裏。牠們曾經毀滅了不少的船，擊沉了幾萬個人。到了後來，攻擊潛水艇的方法也慢慢地進步了，有一種小艦隊，中間有許多船，喬裝成商船模樣船隻，把潛水艇引誘到水面上來，然後，就對着牠們開火。因了這樣，所以有一個時期，牠們不敢再去攻炸那些毫無危險的船隻。還有把爆炸的水雷，預先埋伏在牠們的某支航線上面，在港灣中也安置了水雷的網。有的時候使飛機和特殊的飛船偵察牠們，用了信號引導驅逐艦去追擊牠們。以後人們又發明了巧妙的偵探器具，用以去發覺牠們的所在地。牠們在水面上被砲擊和猛撞，在水中又受到深海的爆炸物阻難，能夠把牠們的薄片炸裂，甚至兩者間只有數十米突的距離。

這是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間潛水艇戰爭的簡單情形。可憐，一直到戰爭終結的時候，人們還是進行着這種戰爭，一面毀滅別人，一面自己也被人家所毀滅。潛水艇的建造和下水，

從來不曾有了停止，人們坐在裏面滑行下水，到達發冷的地方，常常担心着水雷的衝撞，担心着前面有深水的爆炸物埋伏，隨時會碰到無法可救的可怕的死亡的可能。能夠有了回轉過海港十次以上的潛艇，不大有，大半是一出去就不再回來了。單就德國人來說，喪失的潛艇數有二百隻，每一隻的損失，完全是深海中遭遇到的憂愁和失望的悲劇。到後來潛艇的反對者，指出了潛水艇裏面發生了士氣的動搖，一隻沒有損壞的潛艇，受了敵人追擊，逼得無可奈何而投降了。這樣，有一兩次，新的潛水艇的指揮官，就故意用了潛水艇須得修理爲理由，或者用其他的藉口，就把潛水艇駛回了軍港。可是，從大體上說來，我們人類平凡而又英勇的服從，使這樣的戰爭，仍舊繼續着進行。在這特殊的祭壇上，德國人犧牲的血肉最多，他們的兒童們，是志願而且服從紀律的，向着國旗行禮之後，帶了他們的小行李，走下梯子，進這一架輕輕搖蕩着的呆笨的殺人機器中去。這架殺人的機器，後來也就做了他們的棺材。

他們的服從，使我們明白大戰給予我們一個最根本的教訓，大家對於新的情形，雖然認識得十分明顯，但是這種認識，侵入人們習慣的道德中是十分遲緩的。數百萬的人，睜着眼睛

做着奴役，受着恐嚇，歷盡艱辛而被人屠殺，不但沒有一些怨言，甚且還帶着一種天命的驕傲。他們爲了服從那盲目而有成見的命令，並表示最愚笨的忠誠，盡力去殺死和他們毫無仇怨的人類，他們自身，也很慷慨地任人家屠殺，決心着作戰到底。戰爭畫片的篇幅，繪出了大批屠殺那些面對敵人而死的人。許多很大的大規模的屠殺，實在令我們寒心！從戰爭開始的時候，法國人遭受了大屠殺之後，又有譚倫柏格(Tannonberg)和馬蘇廉湖(Masurian Lake)俄國人的大規模的被殺。以後還有所謂「僵局」的時期，就是在戰壕中戰爭時期。在西方的損失較少，兩方的敵對行爲，變成了炸彈的拋擲，和來復槍的刺殺，大木棍短兵相接，狂風一般的衝突。可是在東方，俄國人的軍火用完了，單單靠了犧牲人的血肉來維持他們的陣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終了以前，損失的人數在一百萬以上，然而他們還是繼續着服從命令，在離開主要接觸的中心較遠的地方，還爆發了不少的小接觸。在戰爭畫片中，關於英國，數千普通的兵士，在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的苦特(Kut)被俘後的那種苦楚，也有着可怕的敍述。(可是辦理那些投降的俘虜的將軍，以及其他的官佐，被土耳其的勝利者款之爲上賓。)

在紀載上，關於英國軍隊的憤怒，並沒有有效的表現。

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法國境內的英軍和法軍，他們斷續恢復了大規模的敵對行爲。新受訓練的英軍，受了他們將軍們的命令，密集着前進，這些將軍，倘然不是糊塗的可憐蟲的話，那麼，對於他們調動去這樣作戰的人的命運，終不至於不明瞭。因爲他們不是糊塗的可憐蟲，他們決不願增加他們的罪過，他們這樣的給予士兵的痛苦以及生命的浪費，真正是毫無心肝呵！這些人的心理。是一件值得討論的問題，他們指揮着一班可憐的孩子們，肩挨肩地前進，前仆後繼地進攻，致被敵人的機關槍所射掃光了。六七百個人的隊伍當中，或者僅有一百個人能衝進了防禦的火線，去投擲炸彈，作白刃的短兵相接，並且，在德國的戰壕之中他們投降了。在他們中間分離了的小軍，在炸彈炸毀的洞穴以及被奪得的地位中，仍舊苦鬬了若干時日。從幾十萬家庭之中募集來的一代青年的精華，那是怎樣受着大家的被愛，怎樣爲大家所保護，他們還受過不少的教育，可是現在竟是這樣毫無意義的被犧牲了。這一代青年人，費了極大的代價招募來了，受了訓練，又派到戰場上去，最後被拋棄在荒郊，屍骨丘積，腐肉

喂之蟲鼠。那時的攝影又告訴了我們，以後的幾個月，幾千兵士，在他們倒下的時候，還是成行列的躺着，他們的隊伍，好像是還要準備跳起來再進攻的模樣，但是，近前一看，他們是已經在腐爛了，很多僅賸有白骨的手，沒有眼珠的眼眶，全是變成了朽腐的枯骨。

英國的總司令，發出了報捷電信，竭力贊揚着他受損失的旅團的英勇，把這些怪誕的事，說成了勝利，說那次七月的大進攻，佔地有一哩多，俘敵差不多一萬二千人。但是，這捷電中完全不曾提起，說有兩倍的英人，被德人俘擄了。

這一次戰爭的可怕情形，洩露出來得十分緩慢，至少，英國的檢查員總算是能幹的，那些將軍們在別方面都不行，但是說謊的本領都十分高妙。英國和歐洲的大陸，祇隔了一個海峽，因此他們更加容易把事變對英國公衆說謊。這些對英國的軍隊，也有一種特殊的影響，就是他們感覺到在和「家鄉」不同的另一個世界——戰爭的世界——裏殘忍和荒謬，那是自然的事情。這樣可怕的殺戮，竟計畫出來了，並且還執行了好久，不但沒有遭遇到暴動的反抗，而且不論那些犧牲者的家族，親友或殘存的同志，完全沒有提出了任何的抗議來。這真不能

不算是一件怪事了

在奧地利阿門尼亞(Armenia)以及他處的俄國軍隊，也正式宣布了同樣的英勇的勝利，可是德奧方面，卻竭力指出這個消息的不確。在德奧方面，也是有着可怕的損失，雖然這損失比了他們的敵人或許要少一些。次年（一九一七年）的英國人，又是勇敢馴服，而重新開始再來一次大進攻，可是策略改進的地方很少。

但在那時，法國的軍隊，開始表現着他們的活潑和聰明了。他們對環境比較熟悉些，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又近，比起英國人來，不容易和叛亂思想隔離。中間有一個倪維爾(Nivelle)將軍，那時是担任着法國的總司令，他做了邱吉爾所稱的一個「試驗，」結果近二十萬的人是喪失了。這就是集合了無數的步兵，向砲火密集的地方前進。葉彭格萊(Ybarnegaray)中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法國衆議院辯論中說，在一小時內，他們變成了「瘋人般亂跑」的一羣，一切隊伍的次序和分別，完全消滅了；大家估計着受傷的人將近一萬五千人，實際上比了這數目還要多七倍；受傷的人，有許多已經過三天了還沒有得到應用的照料；結果，這班不

幸的人身上生了疽，四肢切斷而至死亡。後來，首次發生了反抗，表示人類的服從，是有相當限度的，法國的某一師團，在被調加入前線繼續着這種無益的戮殺時，忽然拒絕開往。邱吉爾說，當局對於這件事十分「焦急」，無疑的，這情形使每個把戰爭作爲游戲的聰明人着了忙。邱吉爾又說，這一師團參戰的成績，「並無不合」，牠的反抗精神是傳徧開去了。

在這一個痛苦的世界裏第二次清醒的反抗，便是俄國專制惡魔的傾覆。沙皇制度的心理的和道德的衰頹，我們已在一般帝制的墮落中說過。這個腐敗達於極點的政府，突然崩潰到不可收拾，牠廣大的領土內秩序大亂，俄國首都的志士，幾個月來一直在那裏對西方的革命家作着虛幻的模倣。他們是受了第一次法國革命的感動，或是由於對英國國會的崇拜所致；在這形勢中，俄國人民慢慢地不願繼續戰爭，有了一個確定的事實。但是，第一個共和政府的領導，是一個能言不能行的律師政客克倫斯基(Alexandre Kerensky)。他們既不能繼續戰爭，又不能完結戰爭，於是「用協商來實現和平」的呼聲雖被抑住，但仍在交戰國中傳播着政府的積極壓迫。這種情形雖然報紙嚴密的爲之隱瞞，但也無效。急進派想在斯篤霍姆

(Stockhoem) 召開一種和平會議，後來俄國的二次革命，擁護着人數少而堅決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他們的能夠取得政權，祇是爲了別無較好的出路的緣故。因爲他們明白確定允許和平，就是付出任何代價也有所不惜。俄國的軍隊，就在這消息下解體了，許多士兵都陸續回家了。德國在東方的軍事當局，看見前面的戰壕都空了，很客氣的，歡迎着俄國舊制度的長官，這是爲了一種「狐死兔悲」的情緒發生了。

一九一七年，好像人類已經從戰爭的夢魔中驚醒了。法國有十六個軍團發生兵變，被牽連的達一百十五營各師的士兵，大家選出委員來，整營的向巴黎出發，要求政府合理的結束戰爭。賴發爾 (Pierre Laval) 說，失望的士兵的一個最後希望，便是斯篤霍姆那一種的失望，使生活不可忍受。但是，在美國加入了戰爭以後，這風潮算平靜了一些，統制着西方世界的各強權，追逐他們可怕的夢想，還支持了有一年之久。

戰事畫片的一本書中，有一卷（二十一卷）完全講述在法國演悲劇的一團俄國步兵。俄國於一九一六年，武裝起來了一萬五千人，遣送到法國去，準備加入在前線同法軍作戰的

隊伍中。可憐，這些孩子們，有許多還不曉得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分別，就是戰爭的表面目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明白的。他們聽到自己國內發生革命，便決定討論着他們對於革命所取的態度，他們選出代表，並且表決他們是不是應該再繼續戰爭，就是說，應不應該去參加倪維爾那時替他們所準備着的一個「試驗。」結果是他們選擇了自以爲容易作戰的地帶，加入戰爭。法國的指揮，待他們十分殘虐，他們傷亡差不多有六千人。其餘的人便脫離了前線，並且是反叛了。他們不願意再行作戰。可憐，這些沒有自衛能力的人，被殘虐的法國軍隊所包圍，集中了機關槍，向着他們突然開起火來，他們都在道機關槍下面犧牲了。這可怕事件的詳情的攝影，起初對官廳是隱藏起的，後來發表出來了。

法國人對於自己軍隊的士氣失掉信仰差不多一年，那時不敢作什麼大的進攻。但是他的聯盟者在巴興特爾(Paschendaele)的戰爭中，還供給了四十萬人，和三十萬的德人對敵。在春季的時候，德國人從西方調動了不少的軍隊做了一次大進攻，這一次的進攻，起初是成功的，以後便失敗了；因爲從美國開來的生力軍，增援了他們的敵人，在血泊中極力反攻，他們

的敵人終算得到了可怕的最後勝利：最後九個月的戰爭比了以前任何一年的屠殺還厲害，從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起，到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止，英國傷亡了有八十三萬人，法國人和比利時傷亡了有九十六萬四千人，德國傷亡一百四十七萬人。大戰終了以前，有二百萬美國軍隊運到歐洲，其中有一半以上加入過這可怕的戰爭。他們的傷亡，一定不會少過三十五萬人。葡萄牙人和大家所想不到的地方開來的暫編軍隊，也是死傷枕藉，但是，這些小實力的損失，我們現在已經說不出精確的數目來了。

這是一個戰爭的概算。在戰爭畫片的一本書中，有三卷或者是可說比較最可怕的，中間專門講着大戰中大羣的人，所遭當到的痛苦和滅亡的詳情。這三卷書，像是解剖學書本中顯微鏡下攝成的圖畫，只要舉一例，便可以概括全部。小的人物，是被他們的寫作、談話、或是攜有照像機時偶然選擇去，放大了來代表未留紀載的幾百萬無名的人的標本。我們所敘述的，是那些被棄在防線間已經有了許多天，被飢渴所困憊，和他們自己腐潰的臭氣所窒息而又活過來的人說的。我們所有的故事，是那些已經走進腐爛的死屍堆中，躺着差不多不能夠呼吸

的人，和中毒的人的故事毒氣的害處十分厲害，而且是各式各樣的，用了許多混合物，在人類的身體上，留下了終身痛楚的毒害。我們有當時蠻幹的手術的敘述，以及心理錯亂的統計。還有許多殘廢的人，面孔沒有肢體折斷而變成了可怕的怪狀的圖畫。成千成萬失去了快樂和受傷的人羣，被藏在一種特殊的機關裏，一直到他們死亡。他們是可怕，可憐而又無希望，就是在活着的時候，世界也已經把他們忘掉了。

一個人靈魂所受的損傷，或者要比身體所受的還更可怕。在搜集到的很多可怕的實事中，有一項最可令人悲哀的，就是一篇使用刺刀的演講，是一個英國的參謀官，對着正在受訓練的一班軍官學生們所講的。這一篇演講印出來以後，又被反對戰爭的宣傳家們所重印。他是那樣的兇狠，我們在現在看起來，幾乎不會相信。我們一定以爲那是喝醉了酒，或者是在發瘋。但是，他在演講的時候，聽衆們喜笑讚美，上級長官對他熱誠感謝；他演講完畢了，大家還拍掌三呼。我們從這些事情看起來，可以懂得他所表現的，那是軍隊中的一種共同精神。

「倘使你見到一個受傷的德國人，」他說，「不容氣的，可以把他殺掉。」

他對於收容俘虜，完全反對他主張在他們投降後就把他們殺掉。當他講到他下面一個伍長怎樣屠殺一羣德國的孩子的時候，他是對那伍長十分同情而且稱許的，「先生，我可以拿這些傻瓜們來幹掉嗎？」伍長指着一羣被解除了武裝的敵人問。

「可以，你幹去就是了，」軍曹說。

這一個誠實的伍長，是從台特莫爾（Dartmoor）監獄裏釋放出來的罪犯，他在幹掉了一羣被解除了武裝的敵人後，回到軍曹那裏，被軍曹大加誇贊；他談到得意的時候，還討論很快把刺刀抽出來，接着幹「下一個人」的技術的困難。

這是過去和現在的戰爭所賦予一個人的精神。像這樣勇敢的軍曹，在每次交戰的軍隊中，多得不可計數。現在，我們可以引證一個英國的文件，因爲這文件是自由發表的，但是，別國的許多參戰者，他們要發表東西，却不能有這樣的自由。實在說，英國的士兵，是和別國的士兵一樣和平的，但是，恐懼和殘殺，把社會上逐漸培養起來的各種約束和容忍，那是會很快從人心中失掉了的。歷史是不該寫成淡紅色和金黃色的。對於俘虜和受傷者，不只忽視虐待和「

殺掉，」而且有許多是被酷刑拷打以至於死亡。他們所以這樣的幹，或是爲了報復作用，或是藉此以爲行樂。我們在一串的攝影中，看見到被殘忍而切斷四肢的身體，這些被切斷的肢體，或是在他們快要死去的時候，或是在剛死以後的不久；割下以後，他們還要陳列出來。那幾千萬人一走進了戰區，竟然像是走出了文明的疆界，走出了我們現在所曉得的任何種人的生活，墮落到比了野獸還要兇惡。

從一九一八年的夏季以後，德國確實曉得牠要戰敗了，因此戰鬪的精力也就消失了。因爲封鎖的十分嚴厲，所以到處都現出了窮困和飢餓、全國的紀律，也就因之而懈弛了。在前線後面的鄉村裏，有了許多流亡的人們出現。德國的高級指揮部，當時和敵對者處在同樣的境遇中不相信自己的人能夠進攻，也不能相信對於敵人的進攻會受抵抗。他們急急願意投降，運氣壞的人，就在路上遇着了從台特莫爾來的試驗的伍長們。

可是不論在什麽地方，倘然還有人想效忠和服從，還是無情地被高級指揮部所犧牲的戰爭畫片二十七卷的上面，畫有德國的機關槍手，在他深坑中担任着防禦，以抵制英美軍隊

的前進。這些人讓自己被毒氣所攻襲，他們像被繫在武器上面，脫身不了，只有繼續着放槍殺戮，一直到進攻的敵人到達面前。那時他們就遭受到不留情的處理，敵人或用刺刀把他們刺死，或是擊出腦漿來。他們現在喫了主人發明毒氣的虧了，於是每次進攻的軍隊，就把他們殺死了來洩恨。這樣的無意識的盡忠，竟一點也抵抗不了，挽救着外部對德國的巨大壓迫。德國正當在這種壓迫下衰竭了。到了十一月，踰武的德皇出亡，屈辱的休戰條約簽訂了，德國軍隊秩序大亂地退回來了家，他們是革命的，但是因爲他們的觀念不十分清楚。

說到「他們是革命的，但是觀念不十分清楚，」我們很可以把對於主要的戰爭的敍述結束了我們只須一提起意大利的軍隊，在卡波勒托（Caporetto）一戰的失敗和戰後的瓦解，中間就有八十萬人死傷和被俘，至於聰明的人，那就「逃回家去。」我們也不去敍述海軍戰爭，主要的最後一戰是在求脫蘭特因爲當時德國海軍提督們，如果想再來一戰，就會遇着了兵變的危險所以牠是最後的一戰。至於是不是英國勝利，那從未有過精確決定。這種的爭論，在波蘭戰爭中便消滅了。

關於這些海上的爭鬪，在戰爭畫片的各卷中，有了許多的照像和敍述。比方像求脫蘭特的一戰，英國巡洋艦國防號（Defence）連續的全部的攝影，用了極快的速率，駛去進攻一個被擊而正在下沉的德國戰艦威司吧登（Wiesbaden）號。那一次勇猛的機械的前衛是十分可怕的，這一衝，好像是不可抵抗的，並且是不可否認的光輝，以後，突然一陣使人目盲的閃光，告訴救援威司吧登號的另一德國戰艦到了，牠的砲火，擊中了國防號，國防號也立刻炸壞完結，只剩下一股上升的黑煙和飛散的碎片。說起來也很可憐，有了八百個人的身體被炸開而成爲焦爛，以後，就是滾滾的波濤，染上了一些顏色。

這一類的圖畫，多到不可計數。

現在我們且回過頭來，說一下「革命的，但是觀念不清楚」的那句話。這就是明白那時人類的形勢的關鍵，全世界的人，大多是極不願意戰爭的，倘若不是在開始的階段，至少在第二年還沒有完結的時候，就是這樣。戰爭真叫人們煩死，叫人們憎厭了。戰爭中並不曾有了那種吸引人的想像以及令人驚心動魄的巨變，甚至求脫蘭特的大海戰，我們從熱鬧和好玩的

觀點上看來，也只是一個完全的失敗。然而，那些比較上不算多的堅決主戰的人，卻還能夠使大規模的破壞和貧窮繼續下去。這是有一個極簡單理由一方面，戰爭和當時的統治觀念相符合，另一方面，那數萬萬的人羣，雖然看見了恐怖陸續的展開來，不勝驚恐和失望，但是對於生活的另一前途，沒有怎樣明瞭的概念，可以走去卑逃避了戰爭的無情的後果。

這一句「使戰爭完結」的空口號，不能完結了任何的東西，因爲牠不曾指出在人類事務的管理當中，用什麼去替代好戰的政府。羣衆渴求和平，還是一個沒有形式的否定。但是，和平必須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必須有人設計出來和維持得住，因爲戰爭比和平是更自然。我們最後獲得人類的和平的人，曉得和平的維持者，應該是怎樣強有力和堅決，怎樣需要有強有力的武器的設置以及十分的謹慎。

八　亨利福特的和平船事件

在那些戰爭時的紀載，眞是可怕極了。有一個十分奇特的航行故事，在篇幅中閃耀着。這

個航行故事，雖然是古怪而又兒戲，但卻預示着大事件的就要到來。這是一個航行於紐約到挪威的載客的輪船。大家對於求脫蘭特的黃昏的，大戰以及戰艦上隆隆的礮聲完全慢慢忘掉了，戰艦的名字也不再被大家所記憶，只是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已。牠們從迸出的火燄中，衝過煙霧結束了牠們的命運。這些戰艦的名字，現在只有專家才能告訴我們；是「雕帖洶」(Lutzow)或是「偉大的費列特克」(Friedrich der Grosse)；是「獅」(Lion)或是「鐵公爵」(Iron Duke)；是「先鋒」(Vanguard)或是「巨像」(Colossus)；連人帶船，不是沉沒便是蹣跚地逃掉。談起這些事，現在是十分不合時宜的，倘若不說出牠的大小以及在裏面被擊而沉沒的成百成千的人數，牠們比了爆竹的箱子還不見得更為重要。但是在求脫蘭特一戰的前幾天，從斯干迭那維亞到美國的航線上，有一隻載客的輪船，名叫奧司卡第二(Oscar II)，橫渡大西洋而來。牠這次的航行，直到現在還是重要而有趣的，因為牠把那些開始誕生的生活的新概念，和那當時流行的弱點，簡單而老實地混合起來了，奧司卡第二在歷史上又稱為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和平船」——牠是普遍屠殺中一線悲喜劇的微光。

福特是一個心理極自然而具有機械的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而且也不曾有社會中一般人的壞脾氣。他是愛迪生的好友，有着和愛迪生一樣的精神。關於愛迪生的事業，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他的發明和事業的發展，我們暫不敍述。福特是生在經濟擴張的時期，並且在這一個時代長大的。他把經濟擴張，看作了事物內在的必然，或許他在未到七十歲時，他從不會懷疑人類的進步是不斷的罷。他真是好運氣，這個時代給了他一種信仰，使他去設計一種汽車，能夠做到當時所沒有的那樣的健全、良好、價廉、加之他異常能幹的精力，使他組織了大規模的生產。他的心中卻從來不曾想過能夠買他汽車的人是不多的。他大宗出賣他的"flivver"或"tin lizzie"（就是當時大家對他汽車的一種親暱的稱呼，）他終於把美國的道路、運輸、以及城市的計劃完全革命化了。他改變了每一個正在發達的城市的外形；使小有資產的人能夠住在距離工作地和商業中心地稍遠的地方而不愁往返的不便；使他不但從馬路上趕走了馬，而且還把馬從田野裏趕走，因爲他製造了農業的曳引機。他在這種事情中所做的工作，比了任何人要多。他在迭兒本(Dearborn)創造了工廠。照現在看

起來，規模也還算是大的。他變成了富翁了，而且他變成了世界上，——尤其是美國——的著名人物。但是他的人生觀還是簡單和質直得令人驚異。

大戰發生了，他最初聽到了這個消息，同大多數說英語的民族一樣的驚異着不敢相信。他從前曉得世界上有軍隊和國家，但是他好像從沒有想到他們是會發生戰爭的。他覺得戰爭是一種錯誤的行爲。他同了和他有着同感的那些美國人互相交換過意見。在一九一五年初，他們已經在交戰國方面搜集得充分的見證，使他們可以相信國內的多數人民，也是和中立的旁觀者一樣的發生驚訝，渴望着蔓延日甚的野蠻的流血早早了結。曾有一個代表團去見威爾遜總統，因爲那時的威爾遜，和他的國家同樣是極端的和平主義的。美國人中間有着一種十分普遍的野心，主張美國應該單獨召集一種永久的仲裁會議，或和其他中立各國聯合起來，站在戰場的邊緣，對各交戰國的政府，繼續着貢獻調停的任務，一直到他們肯接受時爲止。那時候有人主張派遣一個代表團把這觀念到歐洲去宣傳，於是這代表團怎樣渡過大西洋的問題就發生了。福特立刻答應派一隻船，來送代表團前去。

嗣後，他把這提議經過了特殊的想像，想把這船做成一隻熱鬧而好看的船，替牠取名叫做「和平船」。牠應該載一批中選的十分有聲譽的代表到歐洲去，等他們一到，大家一定會停止了戰爭來看牠的。這隻船一出現，使瘋狂的歐洲就會警醒過來。「我要叫那些孩子們走出戰壕來，」福特說，「他們不情願戰爭，他們能夠互相攜手，這是他們最願意的。」在他這一些話的後面，好像有在前線召開一次總休戰的思想。「聖誕節的時候退出戰壕，永遠不再回去，」這是十一月間他在華盛頓的一處公共會議中的簡單的演辭。各式各樣著名及有力量的人物，大都請來了，參加入這個代表集團。他想請總統出來公開的贊承罷，可是，總統是一個極有修養的政治家，不見得肯在福特的這個「姿態」上浪費了他的演講。他正在考慮着，他應該怎樣單獨來一種姿態。

那時候的美國，有他負盛名的和人民相信的人物，來代表着美國偉大的和慈愛的理想。中間有好多人因了各種理由，一直到現在仍舊被歷史家所記憶着，像愛達姆士（Jane Addams）愛迪生布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及白爾班克（Luther Burbank）。這類

名字，在現在低級學校的萬有全書中，或許就可以找到的。福特的企圖，想把他們一齊都歸納在一個流星船的船中：就是美國聯邦的各邦省長，著名大學的知名學生，其他重要的人物，完全被他所邀請加入愛台卡馬（Atacama）的歷史博物館中，已經搜集了幾份福特的殘在的請柬，還有那些有名的個人，對他提議的猶預或規避的答復。有一些人，在將要動身的時候，突然的疾病大作，不能去參加。再有些新聞記者、電影攝影員、攝影家、速記者、打字人、譯、行李管理人、傳達員、都不憚煩而前來。內中有一位叫做羅絲卡絲可維敏(Rosika Schwimmer)的匈牙利太太，她的能夠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就是因為她是這班人中間的一個組織，此後又是隨著說不見了的緣故，很多的冒險家和瘋人們，大家在福特公開宣布計畫的時候，踴躍自薦，願來效勞；當時曾經花費了很大的困難，才算阻止住了大家。沒有使他們完全走上奧司卡第二的船上。

那一次和平船的航行，還有不少的詳細情形，可以供寫作者的材料的。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整個的航行，又不是關於福特或是其他和此次航行有關係的名人們的成名的問

題，而是關於此次以反對戰爭的思想的消息，和這個思想的變遷，向人類的理智申訴。

可以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這次的航行激起了反響，而且是一個大而遠的反響。不論在美國或是在歐洲的知名的人士，爲了要顧及他們自己的名聲，大家認爲應該對牠表示同情，雖然是一種有愛莫能助的同情。比方像威爾遜總統；他是對之表同情的，但是仍然是有愛莫能助。舉凡西方世界上有雄心的善變人物，他們完全出來擁護這和平之船。我們可以從各方面看出近年對於世界和平有着廣大的鼓吹，可是這些善變人物，又立刻開始動搖而轉變而離開了。

他們爲什麼要動搖呢？因爲這計畫一開始，就有些人對牠有了隱忍的惡意的仇視。這種的仇視以後越來越厲害了，不論美國的輿論或是歐洲的輿論，大家都開始把和平船中的每一個弱點，每一個微小的笑話，加以誇張並誤解，而再揑造出一些缺點和笑話來。一種訕笑的宣傳開始了，到了後來，有名的人一個個紅着臉，大家脫離了這一個集合，他們無意識的道歉；把這個計謀的重要的清醒點便埋沒了，當福特和他的留餘的代表們，在船上討論和演說的

時候和他們在一起的新聞記者，再對他們的主人揑造一些謊話和無意識的故事，好像他們這樣的做是受人指使的樣子。

現在，我們確實曉得他們是受着指使的。在歷史文件集的中間關於這點記得很是明瞭。當我們的學生們，把那一長段被隱沒的歷史的樞紐一根一根解開來的時候，我們更加明白當時令人痛苦的不忠實，和混亂的見解的不一致。美國的輸出貿易，在戰爭狀態的下面，是從來不曾有過的繁盛，各種的軍火，用了極高的價格售給交戰國。如摩根（Morgan）公司那樣的大銀行，正因爲供給這些物品而變成了債權人，使整個歐洲，在財政上附屬於美國。果然，美國的金融業和大商人們是並不曾預先見到這類事的，他們並沒有遠大的先見之明之後，突然感覺到他們是處在極有利的地位了，基於他們的傳統觀念，他們必定要利用那些好處的。福特呢，天真得夠了，他們說，「這事情並不是他應該來管的，他爲什麼要播進來，破壞這有利的形勢呢？」

在將這件好事翻成爲一件危險事的時候，他們祇能巧辯。大家是不能不理睬福特的；的因

爲他有着大的名聲，他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輕視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他弄成可以藐視的樣子，才可以把他打倒。美國的熱心的輿論本來可以用在一個更崇高的目的上面的，但是現在却用在反對福特了。美國輿論的可怪的傳統中之一，就是新聞記者不應該有什麽顧忌。有一些新聞記者是反對道德的人，他們甘心墮落，他們只要能夠把福特挫折，使福特遭到失望，要是沒有卑劣的手段，沒有誑話和詭計，那是萬萬不能辦到的。

他們用種種方法，使福特自己也懷疑起來，福特確實被他們弄得失敗和失望了。這一個半生不熟的天才的人，既遭受了他的朋友們的鄙棄，於是對於他的計畫也失去了信仰。他慢慢地懷疑他的同伴，並且相信起他的敵人來了。

我們祇能接受爲我們而保存着的證據，就是那些在我們面前的證據，那些反福特的報紙的宣傳中，有些詳細點，也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在愛特卡瑪有的剪報册，一百大本其中很可怪的一些已經在歷史文件集中轉載着了。在國外作爲福特座容的新聞記者和作家們，他們揑造了關於代表團內團員的鬧毆，領袖間的爭論，福特爲他的書記將銷鍊繫在他的牀上，以

及其他許多離奇的事，完全用無線電傳送回國。這類消息，有人曾經對福特說過的，他是能夠有權力阻止這類消息傳出的，因爲他們也留在他的船上。可是，他被他崇信言論自由的概念拘束，雖然那些自由言論在實際上，完全是自由說謊。他還是十分勇敢的說，「他們願意怎樣說就怎樣說。」「我們的工作會得自己來證明的。」

他不久患了感冒這種病，在現在是消極好久了，但在那時卻很猖狂。在那些不靈巧的醫藥照料之下，他到歐洲的時候不論精神上和肉體上是消沉而且疲勞。那時，他有點相信，整個事情是有些愚蠢的。他被包圍在訕笑中，無能力抵抗，只有退讓。他是眞的退後了。

他在克里斯丁那（Christiania）臥病了，他說，「我想頂好還是回家去，到媽媽那裏去罷，」他足不出戶，雖然全挪威的人都想急於見他，並且要對他恭維。

但是，他的運動，還自然地在擴大。挪威人熱誠歡迎着這個代表團，他以後在那些不願捲入衝突漩渦中的歐洲小國，像瑞典、瑞士、丹麥、荷蘭等國中，也受着同樣的歡迎。在那些國中的民衆，他們都十分相信這個新異的干涉辦法，或者眞能幫助了戰爭的完結。或許福特是失望

了，可是他的同伴們，還是有些很好的人物。他們在瑞典、瑞士、荷蘭、舉行了大大的公衆集會，他們的活動，對於德國和英國的和平運動，確實生出了鼓勵的影響。他們努力着去和一些政治家，政客們把晤，他們喚醒了德國及英國軍事當局的警戒的仇恨，因爲雙方面的軍事權威完全以爲這個代表團足以動搖軍心。因爲繼續和解的中立會議在斯篤霍姆已成立了，雖然牠的存在，也是在動搖着的。但他們說，這個會議，確阻遏了德國引誘瑞典加入戰爭的漩渦。

以後，福特擁戴和平的組織，慢慢地失去了重心。那時候有一個更大的運動，就是大家趨向於由協商而得到和平的計劃，把這個組織籠罩住了，尤其是威爾遜總統那種空泛而不確定的姿態，促使這一個運動的實現。威爾遜的所以能重新當選爲總統，就是因爲他是「使美國超然於戰爭以外的人。」但他領導他的人民，由虛偽的和平主義及有力的軍備的階段中，在一九一七年捲進了戰爭的漩渦。這運動在達到頂點之前，和平船的氣泡，便完全炸裂了。船上的打字生、攝影員、和書記、完全遭遇了被辭退的命運。福特自己也竭了人力所能夠做的，使人家忘掉那隻和平之船，但是留下來的紀載，那是毀滅不了的。

他引導（雖是在名義上）他的航行人衆到歐洲來還不滿五星期，便一直住在挪威的旅館中，避免比他更加熱心的同伴，厲行減削他的財政的負担，最後；他突然離開自己的同事而回家，他是逃走了。他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不顧他的同志，偷偷地離開了他的克里斯丁那旅館。在最後一分鐘，有人曉得了這個消息，急急從牀上跳下來，向他勸告和反對，但他一切都不顧的走了。在最後一年尚未完畢的時候；他甚至停止了財政上的供給那些拋棄了事業和位置，完全信任他的誠實而受人訕笑和厭惡的男男女女，大家只好各自找尋道路回到他們的舊巢去，或者是另外去找尋新的道路。

究竟有些什麽事情發生了呢。使得他偉大的思想，會得中途改變的？在這個愛護和平的十字軍首領的腦中和心中，又有些什麽奇怪的轉變發生以致使他和以前完全成了相反呢？這是只有使好奇的歷史家，猜揣的，因爲福特他已經忘掉了，現在已經無從去對他的頭腦和心臟作周密的檢討了。

我們先應該曉得，當和平之船正在太平洋中的時候，華盛頓恰好發生了一件十分重要

的事情。就是美國正在迅速生長的軍事工業，以為除供應海外作戰各國的原文需求外應該有一個國內吸收他們生產品的市場，這市場是一個有清償能力的國內市場。照一部份人的意見，美國是可以超然於戰爭以外，這是好的；但是美國必須準備着戰爭，美國必須武裝起來。美國總統的考慮這種提議，已經適當顧及他在下次選舉中所能得到的票數和輿論的贊助。他的十分小心，正是一個政治家的本來面目，他權衡了這一個提議，在某種的躊躇之後，便欣然同意美國應當「準備着」戰爭，軍火應當集合起來。軍隊應當操練，國旗開始飄揚——美國的國旗是一面十分令人心醉的旗幟，——軍鼓和號角齊鳴，軍事的緊張，激動了廣大而和平的美國的人們。

福特有着龐大的大工業的企業，直到現在，他仍是從事於汽車和農業機器的生產，但是，他也能十分迅速地改作軍事材料的生產。這一個產業，就是他的創造；也是他的化身。他的產業，正是使他和普通人相異的地方。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看見他那樣拋棄了自己的業務熱心來管世界的閒事十分為之擔憂。這多半是他們比他明白在先，倘若他立在「準備着」的

運動外，像他担心着去做的，那麼別人的產業，一定在他的產業旁會得興盛起來，最初是製造戰事的材料，等到戰爭過去後，也可以反轉來變成功一個大工廠，大宗生產着汽車和其他的東西、在法國，這個從軍火製造移轉到汽車的製造，是雪鐵龍(Citroen)組織所預先見到而且是實行過的。福特怎樣會看不出這個傾向呢？

但是，他從前曾經在忽忙時宣布過自己是反對「準備着」的。他已經威脅地在他工廠的屋頂上掛起了一面「國際旗」來代替了美國的國旗。

這是十分明白的，在每一個經濟家的頭腦中，那時候一切主要的力量完全在起作用。他把世界和平爲目標的新的宣傳運動，曾經十分生動而慷慨的響應過。一九二四年羅赫納(Lochner)在他美國的古訶德(America's Don Quixote)一本書中報告過他出發時離開紐約的談話：

「你最後還有些什麼話要說！」一個新聞記者問。

「是，有的。」他回答說，把呼籲和平，和反對『準備』，來告訴國民們。」

「這一次和平船的使命倘若失敗了呢！」另一個人問。

「倘若失敗了，那麼我再發動另一個。」他毫不躊躇地回答。

「人家都說你是不誠實的。」第三人批評着說。

「我們現已經使和平的宣傳在進行了，我把這進行一直推動到底。」

以後，就有第二次的思想來了。當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戰爭漩渦中的時候，和平船是已經成爲一則陳腐的老笑話，福特的大工廠已經準備好做軍火的生產了。

福特是時代縮寫的一個代表人物，所以我們要在歷史中給他一個重要的地位。生在二十世紀的普通人，既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戰爭的製造者，福特是兩種統可以算得。福特是一個普通人，他的出名，不過是由於偶然的環境和非常的精力。

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要特點，便是猶疑不決，福特在他的和平船上，把這種不決斷的神情，表現得十分明白。倘若我們把人類統一的偉大鬭爭，比做人類動機的複雜的奏樂，那麼和平船的航行，不過是前奏曲，開幕前哨子的吹聲，至於人類統一的正樂，那還在後面呢。

九　延長戰爭危機直接作用的軍火工業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軍火工業」膨脹的直接的活動，怎麼樣促成功大戰和維持着大戰的屠殺了。倘若我們要明白二十世紀中葉的緊張和殉難情形，對於那個勢力的正確瞭解，那是主要的。

這些「軍火工業」的發達，就是鋼鐵工業發達的結果。鋼鐵工業在一七〇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的百餘年中，由不足道的手工人的活動，進入了鉅大的生產狀況。鋼鐵工業在世界上鋪上了鐵路網，創造了鐵船，後來又創造了鋼的輪船，驅逐走了海面上木質的帆船。（這些在劉克·席曼爾(Luke Zimmern)的Entwickelung und Geschichte von Kruppismus, 1913; 歷史文件394112中）在另一個階段裏，鋼鐵工業的注意力又轉移到了世界上殺人的武器上面。

大砲口徑和大砲射程不斷的進步，戰艦鉅量的擴張，以及時常拆毀了舊式的而另建立

巨大和更精緻的型式，這些，完全是軍火工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重要的利潤泉源：世界各國的政府，他們在事先並不覺察到這些，可是軍事工業，能夠在短時內靠了他們健全和習慣的售賣方法，把牠創造的新奇物迫得各國的政府不能不承受。各國政府間的敵視，本來是傳統而不能調和的，大家十分迅速地認識了忠君愛國觀念的衰微，和這些大工業的利潤的不相容。這些大工業的販賣部，他們或是直接去收買當時大多數的新聞紙，或是想法去管理牠們，在學校中也十分嚴密的注意於軍事教育，培養着好戰的風氣。這些大公司的經理們，依照了工業主義販賣的既定規則和習慣，除了利潤以外，只曉得創造新奇的戰具，絕對不想到其他的結果，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他們做了許次的試驗；在一九四〇年的波蘭戰爭和以後的十年中，表現了他們的最後拚命和可怕的震動。

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初期，人類使用着這種新式的戰術，感覺到十分的不愉快。牠還不能滿足了人類經常的戰鬪本能。一個發怒者要做的事，便是去毆打另一個人，並且使他羞愧；但是，假使一個人在距離十哩遠的地方，被一顆子彈打倒了，或是在洞穴之中，中了

多亂！這有些什麼意思呢？這樣，人們並不是在和他們的同伴共同來嘗戰爭的樂趣，而是在共同味嘗地震的恐怖。我們已經指出過，在愛特卡瑪貯藏的戰事書籍，對於可怕的新策略，以及非運動用的品質，涉及很精和卑下不顧人的尊嚴的機械，充滿了無效的抗議。這種抗議，完全是無效的，因爲牠對於那些製造和維持戰爭的勢力，沒有明瞭的判斷。正像兒童在怒號啼哭的時候一樣，他們或許不想去看一下那些使牠痛苦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我們在現在看來，那些營利的個人和公司，他們製造了殺人利器來出售給任何人，好像是一種瘋狂的行爲，但在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初的人看來，這在世界上是極自然的事情爲了新工業品繼續的擴大而應用於戰爭中，爲了和平時代商業的經常的出售方法不受任何限制，那麼自由製造及買賣殺人利器的行爲就自然發生了。直到世界大戰的浩劫現實以後，戰爭的無用，才算完全證明了，人們仍舊讓自己像羊羣般被趕進營房去，讓軍火商人積極的生產和出售新的殺人武器，他們被壓迫着去消費這些貨物，同時自己也被這些貨物所消費了。一堆更多的和更危險的戰爭原料，繼續的積累起來着。

彭加里(Bengali)的一位諷刺家孫教授(Professor Chondra Sen)(一八九七年一九四二年)在印度(是幾篇重印的文字)的一本書中，有一篇古怪的，像是科學的論文，稱做對於幾種聰明動物的愚蠢的比較研究，把人也包括在這內。他感到人類在這個時期中，看着專門製造摧毀自己用的物品，而竟漠不關心。他把那時在世界上快要絕滅的幾種海禽像企鵝等研究着；——在二十世紀這時期中毀滅了的幾百種動物，因而推測出人類也要遭遇到和此相同的命運。他開頭就說被屠殺的企鵝他大批的印出了這些非常的動物的攝影，牠們集合在南洋各島的沙灘上，注視着屠殺牠們的人類的前進。牠們在一個長而傾斜的岸上散處着，當屠殺的慘劇在進行的時候，牠們靜靜的立着，或是搖擺地走着，或是輕輕地拍着牠們粗矮的羽翅。牠們好像不大關心着同胞的被人屠殺，也不被這屠殺激動而逃走或是抵抗。(我們可以說，關於企鵝的心理，不曾有過充足的科學觀察。試驗心理學的復活來得太遲了，所以來不及做這些工作，我們現在只能猜測，當屠殺正在進行的時候，牠們奇怪的頭腦是有着怎樣的思想。有一種見證，指出了這些動物，具有好奇心並且十分和氣的；具有同情心而

且也是幽默的牠們是具有可造的才能在鳥類的智慧測驗中，牠們的地位十分的高。然而，牠們允許着牠們自己絕滅。）孫教授十分相信，一半是認真，一半是嘲笑，說牠們並非沒有心理，不過心理有了缺陷和錯誤。牠們能夠有許多的思想體系，但是沒有社會保存的思想。他指出海象也是這個樣子，十分迅速地被毀滅了的。（最後的幾隻海象，後來被一個日本瘋人殺掉了，一九八五年「海盜的暴動」中，當保護的巡衛撤退的時候，這個瘋人，因爲急於想造成一個「不朽的聲名，」就殺掉海象來「創造記錄。」）但是，孫教授在考慮過各種可能的例子後，說是社會愚蠢的獎章，應該歸人類所得。

他十分漂亮的模倣着當時社會研究的方法，對於他所稱爲二十世紀初期的「人類企鵝，」攝取了各種像片，成千成萬的人類和企鵝，搖搖擺擺地去看着戰艦下水，看着閱軍和大操而大聲歡呼。凝視在天空中他們軍用飛機的奏技。他並且在人類攝影的旁邊，也刊出了企鵝的各種攝影，不管是由儌倖的偶然，或者是由於人工的安排，牠們和人類的情形，正是相同得奇怪。他開出了一張軍火公司的股東名單，內有自由教會的現任主席，英吉利國教的主教，

許多教士，藝術家，法官以及其他各種敦厚的人。他引了許多英國國會在戰前辯論的紀錄，（是一九一四年初關於海軍預算的辯論）史諾登（Philip Snowden），（就是當時急進的社會黨員，後來成爲史諾登子爵的，）表示得特別地明白。從這一些辯論看起來，人們對於危機的性質，看得十分明白，而且也公開地說出了，只是並不怎樣地感覺到罷了；他們能夠覺察到事實，但不是深刻的覺察，能夠引起有效的行動，這個小小的差異，是我們注意應該集中的地方。

人類爲什麼呆望着槍砲而不表示什麼呢？況且人們也已經看見，在大戰時有兩千多萬人痛苦地被犧牲掉了，爲什麼不繼續行動，做一些和那時機相合的事呢？況且軍事的準備，正繼續增長，可怕的戰爭正可能地在人的眼前增加。後來有人發現，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會議中，美國的皮次賴姆（Bethlehem）大鋼鐵公司，是積極反對海軍軍縮的。不論怎樣，這公司和希爾（Shearer）所控告的三個造船公司是有關係的。希爾說，他承受了反對海軍軍縮的任務的委託，但是，他們答應他的錢，卻並沒有給了他。他曾經被公司僱用過，這是用不到爭論

的問題只是在他服務的程度以及薪金的多少。企鵝們對於有關係的公司或希爾，大都沒有做出了什麼有幾個人表示着憤怒就算了事。這正似有時候一隻鳥看見了取魚油的人怕得叫起來一樣。詳細敍述，請參看：C. A. Beard 的 The Navy: Defence or Portent，一九三〇年；歷史文件重印，p. 270, 112。

問題的關鍵，就在世界上沒有一些哲學的教育；對於原則和一般的觀察，並不曾有了聰明的批評社會科學在那時完全沒有，人們所受的教育，大都未曾叫他們去認識事物間的關係，大多數的人們，完全沒有知道事物間會有什麼關係的。他們想像着生活的這一面儘可以變動，但是那一面卻不會受到影響。工業家和金融家他們共同建造了偉大的軍備，強迫着當時的政府來購用，完全不顧後來的結果怎樣，在現在看來這是糊塗絕頂的行爲。這些宣傳軍備的人，在他們的私生活中大多數倒也是十分可以敬佩的：有的是溫柔的愛人，有的是挺好的丈夫，有的愛好孩子和動物，有的是好人，對於下人也十分有禮貌。有人最近在巴黎發現軍火業最大的經紀人，柴哈洛夫（Basil Zaharoff）的一張畫像（據說現歸奧朋（Orpen）所

有，頭戴三角帽，乾淨的小仁丹鬍子，頸上掛着俠義的勳章，看上去是一個極漂亮的小紳士，雖然有些兒容易令人發笑。可是那些做主教和牧師的股東們，除了被我們曉得的一些相反的例子外，大都有着可愛的基督教徒的人格。但是，他們要着他們的紅利，因爲要付那些紅利的緣故，所以大衆的心裏，必須常常燃着戰爭的恐懼和必要。

比較最方便的做法，便是收買輿論。到了那時候，你可以出五百萬元或是一千萬元，整個的去收買一種大報紙。單是一隻戰艦所得到的利潤，就足以償還這個數目而有餘了。講到報紙，依照最好的傳統的生意經，天然是要受僱或是出賣於戰爭經紀人的。這又有什麼錯誤呢？在那個時候，新聞紙是一件生意，不再負一種服役公共的職務。一個十分忠實地報告着戰爭危險的日報，牠的銷路自然會被人家所破壞，牠是競爭不過資力雄厚的報紙的，這些競爭者，因爲有錢可以收買一切最有吸引力的特點，對於普通讀者，在各方面完全可以勝過牠的。

這並不是報館裏的主人和軍火商人有意要傷害某人。他們只願出賣機器，並且還希望那些機器趕快賣掉。報紙也並不是願意人類遭受大批的屠殺，牠們希望要有銷路並且還需

要有廣告至於屠殺只是一個附帶的問題，是合法的生意中不幸的附帶問題。近視雖然產生兇惡的結果，然而牠並不是惡魔。

那些士兵呢！弗洛得海姆(Freudheim)在分析士兵心理的時候，畫出了一位亨利・威爾遜爵士(1864—1922)在退休的時候，裝出着儉樸的樣子，他身上穿着襯衫，捲起了袖子，在他別墅的花園中鋤地。但是，當他在做軍事行動指揮者的時候，打扮得十分威風，佩有鈕扣帶子和「勳章」。由一個在郊外不足稱道的退隱書記，一躍而到上帝般的重要，這個變化真是令人可驚的。在和平的時候，亨利・威爾遜在他自己的日記上說，是一個固執而受人討厭的人；但是在戰爭的時候，他卻變成功一個不可批評的人，像是一個上帝了。我們就可以曉得任職及升遷，是對於個人十分重要的。但是就照我們所能說的來講，他並不是愛殺人而殺人。倘若有人給他飲一杯血，他一定是要感到討厭的，然而，他的生活確是在血池內的。

這些以士兵爲職業的人，他們想到屠殺的時候，他們祇有極少數的人說他們的屠殺是他們隨意這樣做的，因爲這未免太不近人情，所以我們更不要說他們是覺得快樂了。倘若他

們能夠多多想到屠殺是可怕的事的話，人類也會立刻變好些了人類對他們的國家是從小就用感情來矢忠的。在他們的服役中，自視很高，並且還瘋狂地好戰，他們不看見而且也不願看見他們職業以外的事情。他們的宗教教師，隨時隨地可以告訴他們，凡是他們的作爲，完全是對的

年代久遠的基督教教會，在那個時期的戰爭中，頗有直接的利益。本來人們對於宗教儀式，日漸趨向於忽視和嘲笑，但人們因爲所受的損失和死亡太多的緣故，所以又轉而求上帝的保佑。在當時的小說中這是十分容易看得出的，被大家輕視的候補的牧師們，又成爲戰爭小說中從軍的英勇的牧師了。

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有一部份的人覺悟到我們人類前途的危險。這樣的人每天在增加着。在他們前面的問題是這樣的：怎樣可以使人們脫離去他們散漫的心思而把他們前面的醜惡的現實，來集中注意。以後，又怎樣去組織他們偉大的努力，以擺脫那不斷發生的，而且一次更危險一次的戰爭狂熱，並擺脫着要使全世界的社會瓦解而陷於永久的

貧困的威脅。

這些着急的人們，找不着一個中心的敵人，找不着一個統治的魔鬼而對牠爭鬭。倘若找得到的時候，就可以成爲直接的爭鬭，但是，報紙的表面上是十分虔誠希望着他們的勝利，實際上是反對他們的。舊社會和政治的傳統，不管裝做什麼樣子，大都也是暗中反對他們的。歷史是反對他們的；因爲從有文字以來，牠對戰爭這事是看得慣了不但希爾福爾的現任主教以及自由教會評議會的現任主席們，因爲他們駭怕分不着紅利。而且天主教的教會以一切基督教的教會，口頭上雖然擁護着和平，但暗中卻敵視和反對着能使世界和平穩固的唯一的世界監督，新的精神的努力，倘若要收效，必須先來承認這些基督教會的信條，不能夠作爲取悅或是指導世界爲前提。

戰爭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觀念：不但存在於世界各地人們的腦海裏而且也侵入了他們的血液和習慣中。少數有眼光的人的周圍的，完全站滿了這些人，這些少數人所要進攻的，不單是一個砲台、而是在他們心中身外的各種不同的混合的動機和錯綜的利

益。

一〇 災禍根源的凡爾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反對中歐同盟國的戰爭，「世界戰爭」在表面上算是完結了，中歐各國失敗而屈服了。在凡爾賽舉行和平會議，這是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勝利的德國人對法國提出和平條約的宮殿。現在是法國和他的聯盟者提出條件來，這自然是一種復仇觀念和嚴正裁判觀念支配着的形勢。到會的各國大家坐下來，共同來糾正他們祖父及父親的錯誤。可是，時候已經晚了，在閱讀他們議事錄的時候，我們確實看得十分明白，這是歷史的傳統和人類世界統一的兩者間銳敏感覺衝突的發展。倘然「世界國家」的觀念在會場中找不到，但至少牠的聲音可以在會場外聽得到的。

在一九一九年，世界上確是有着極多的聰明人，他們慢慢地認識了「世界國家」的必要，有不少的人，像我們已經描寫過的福特一樣，他的本能和感情，兩方面都明白懂得了這種

觀念，但是也不曾有過一個人，他有勇氣用智慧來認真解決一個世界的制度，把牠代替現在存在的各國政府的問題。因爲大家都不免有些怕負担起這一個重大的責任。然而，我們現在懂得十分清楚，這就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倘若我們要避免一天深陷一天的連續的災難，這便是唯一的前途。但是，這種計畫的新穎和廣大，爲了不合理的習慣，把他們留住在歷史的故轍中，所以使他們畏縮不前。

在我們看起來，他們好像淹在水裏快要死去的人一樣，他們願意靠了游泳浮起來嘗試着抓住稻和泡沫等來救他們自己，雖然近傍有一個梯子，但是，他們堅定地拒絶着從水中好好地爬出來。

在他們的世界制度的理想中他們沒有人能夠走出純爲避免戰爭的政治協定。人類還得再嘗五十年的艱苦，那才會有了廣大的認識！好戰不過是人類分裂徵兆的一種，並不是最嚴重的徵兆。

參加和平會議的一切代表當中，威爾遜總統是感受到將來的暗示的。他對於那一層解

決的貢獻，固然免不掉有缺點，但是可以使我們大略曉得些那時的政治理想。他把創造出共國共和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所遺留下來的真精神，帶了去解決這複雜的世界問題。在這類可怕的討論中，很多的到會者，像法國的克里孟梭英國的路易喬治，意大利的松銀諾(Sonnino)、日本的西園寺，比利時的西曼士(Hymans)，波蘭的派特里夫斯基(Paderewski)，羅馬尼亞的布拉庭拿(Bratianu)，捷克斯拉夫的彭尼士(Benes)，希臘的唯尼之洛士(Venezelos)哈查士的弗沙爾(Feisal)，還有很多現在已經凋謝的人們。在這一切的人中，竟然沒有人能夠感覺得除了任何民族的利益的考慮外，整個人類，在這次的解決中也有着利害關係的。他們是不能調和的「代表，」他們是國家利益的律師。威爾遜僅僅在一個很短的時期，獨自地代表了人類。或是至少他在外表上是代表了人類，在那一個短時期內，全地球的各地都對他發出了非常的和緊要的響應的聲浪。這一個形勢真是令人十分着急，全世界的人類，對於威爾遜，說的一句話或是做的一個姿勢時，大都叫起來熱忱地擁護和崇拜人類也把他拿來當做和平的對象。在人們的眼睛裏，威爾遜竟神化了。他不是一個平常的政治家，竟然成了一個

彌賽亞（Messiah），成千累萬的人，信任他是一個帶來了無限的幸福的神；成千累萬的人，甘願爲他而犧牲那一個響應，是二十世紀之初的頂有光榮的事件之一，顯然「世界邦國」的觀念，那時候已經形成，牠已經在娘的肚中裏震動，牠是活的。

但是以後有了焦慮的數十年，牠又停止活動了。

威爾遜的遺事，就是在不相同的背景和不相同的服裝中，重演了福特的舊事。他們同樣是被太偉大而且是他們不能去實行的理想所握起，在一個短時間內大出其風頭。以後，就降落下來，好像一片落葉被一陣巨風所吹起，以後又落了下來一般。世界上不久就大家曉得了事實上的威爾遜，只是愛慕虛榮和喜歡場面，並沒有深謀遠見的思想和大量的慷慨的。他並不站在代表人類的立場上，而是代表了美國的民主黨和他自己。他爲了黨的勢力，犧牲了美國人民對他的愛護；爲了求得社會的贊美，犧牲了他在歐洲的聲譽。只有一個很短的時節，他是生存着的非凡偉大的人物。以後還有一個很短的時候，他仍舊是一個最出衆的人物。他去拜訪過歐洲各國殘留的宮廷，在歐洲的各個首都，他受着歡宴，並且放棄他的主張。我們對他

這種並無結果的快意的游歷，在此無須多加研究，我們所關懷的，只是他的思想。

很明顯的他然要求某一種的世界和平。然而，他是否有時候能夠去理解，世界和平即是世界來監督人類各種重要共同利益的意義，這是頗可懷疑的。他好像對於極有把握去幹的事情，沒有澈底的去研究過。他並不曾想，倘若他有時想的話，他也不敢尋求，像在我們目今存在的集中的世界統制，這樣的世界統制，或者是超出了他讀的書和他的理解之外的。他的計畫，徹頭徹尾，純粹是一個政客的計畫。

他所理想的典型，是想把歐洲及美國的議會政府簡單地改革一下，俾更適合於廣泛的結合。他的國際聯盟，像是從凡爾賽和議中出來的，是一個標準的十九世紀的政府，在地球上把範圍擴大開去，中途就萎謝了。這聯盟有一個上議院，——就是理事會，——和一下議院，——就是國聯大會，但是，爲了要免掉各個主權國家的多疑起見，牠沒有執行權，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軍隊和警察，沒有實際權力做任何事情。就政治機關說，牠是廣闊而毫無效能的。牠完全是世界各國政府的代表，不是世界各國人民的代表。實際上牠並沒有做了一些事情，使世

界上的普通人民，感覺到國際聯盟是他們自己的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代表是，各國政府的外交部所指派的，國際聯盟的作用，依照一般人的想像，就是代替各國的政府行事的。他們是國家主義的政客，然而，他們却被派到日內瓦去消毀國家主義的政策。國際聯盟終於變成了一個被人訕笑的機關，是爲了敷衍人類當初表示出的統一要求，使他們漸漸忘記這種要求的。

可是，在那個時候能夠做旁的什麼事情呢？倘若威爾遜是代表着人類不成形的願望的，他在他所接近以及應付的政客中所引出的印象，是將他看成功一個不忠誠的妄想家。大家是把他當做那樣的妄想家來應付他並攻擊他。倘若我們想要得到比這個沒用的聯盟更實在點的東西，唯一的道路，便是做一篇革命的檄文，昭告世界上所有厭戰的人民，共同起來敵對他們的政府；對全世界說，像一九一八年所能說的「世界邦國」的日子的到來。這一定會喝起地球上遠遠近近各地的回晌的。

威爾遜這人是不能夠這樣做的。因爲他沒有想像的能力，而且對待政府也沒有那樣的

勇氣。他和平常的政客一樣，以極大的主見爲達到小目標的手段。倘若他能勇敢點和偉大的話，那麼，他也許會失敗或是會完結的。在這等世界情狀之下，他總是會失敗和完結的啊！如果他那一種勇敢的號召繞一世界，人類前面永遠提出真問題，也許可以使世界的失敗時代縮短數十年。

他所做的事，只是爲了要獲得眼前人民的對他歡呼的虛榮，但對於人類的希望，却擺出一種莊重的自許面貌，從游行的車子中或是在裝飾的走廊上對着羣衆鞠躬，莊重地退回到同舊時的外交家及政治家舉行的秘密會議中。這樣，最後就國際聯盟出現了牠既不曾創造也不解決任何事，過了一二十年，在歷史上隱消去了。

這一個聯盟並不是消滅了各主權國，反而保全了各國的主權。聯盟的規約，既是和約的一部份，由和約劃分得十分不良好的疆界，聯盟的功用，竟保障牠得十分長久。在很許多的其他規約中，也包含有懲罰德國，以及和德國訂有同盟者的條文，正像迦太基（Carthage）在查彌亞(Zamia) 大敗以後，被羅馬懲罰一樣；而且懲罰得這樣嚴厲，於是不能履行條約的義

務是必然的，但這又是一個永遠的口實，以便繼續着使德國的屈辱。這並不是一個解決的方式，乃是一種永遠的懲罰。德國人變做了勝利者的奴隸，他們一代的人，幾代的人完全是在債務裏生活，由初生直到老死。爲了要使這種辦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國便被解除了武裝，而且不能再繼續的武裝了。

法國人唯一的思想就是「德國必須毀滅」(Delenda est Germania)（見莫理斯·亨貝思著"Study of Pertinax" 1939），協約國的其餘代表集合在巴黎的近郊，懷着凡爾賽條約的忿怒從事工作。他們是很願意把他們的職務作爲被懲罰的意思的，使大家都明了懲罰德國是怎樣的重要，反而將重重困難問題置之一邊。對於那些思想平凡的人，把事情弄得來糟糕，不會把事情驅使前進，如果法國人畏懼德國重整軍隊，英國人則又想德國的海軍工業再事競爭，意大利和日本，在各處找已經的損失的補償，看到作爲大陸主子的德語民族和離散衰落到被統制的地位，他們也是極得意的。

威爾遜的陳舊觀念在那已生了栓塞症的歐洲發生了更惡的因果，就產生了一批所國

家威爾遜總以爲國聯就是統一的證人，他被這種差誤的認識所蒙蔽他就贊助歐洲地圖從民族的單位上重新分配。波蘭由此恢復了。我們在歷史上看已到這個國家當在十八世紀就被瓜分了好幾次，波蘭正當平原中央土地廣大，在歐洲商業很發達時候，牠的獨立生存是感到重大威脅。地理上很是不利於牠中世紀個人主義的騎士和貴族所統治下的農民集體。但俄國，普魯士和奧國的瓜分波蘭是用極野蠻手段的。當拿破崙大戰爭後，關於這個，已經滅亡的波蘭帝國有一種動聽的神話，感動法英美國的感情。爲鄰邦野蠻地吞滅了的粗暴的貴族與他們的農奴，居然被理想化爲文明的，勇武的，卓越的民族，是怎樣被異族壓迫和踐踏。要恢復波蘭，——要決心恢復波蘭，這是威爾遜總統的光輝的雄心之一端。

波蘭果然恢復了。但這個從一世紀多的奴隸生涯解放中出來的波蘭並不是有高尚精神並大度量的人民，足使全世界自由主義者與以同情和希望。一個適成個反比例偏隘的愛國政府建立了。並且立刻進展爲一種侵略的復仇的和強蠻的獨裁，開始猛烈地迫害牠的太廣闊的國境四周的落在牠的網內的其他弱小民族（約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從前的波

蘭是曾刼奪和侵略的國家，莫斯科的城下有過牠的鐵騎的踏踐和搶刼的，現在也沒有改變牠的本性。立陶宛(Lithuania)的一維爾納市(Vilna)居然被牠突然進攻強佔了，並且東面一直展進到加里西亞去。(Galicia)。當波蘭去征那被壓迫的烏克蘭(Ukrainia)和路登尼(Ruthenia)人時，牠的殘暴完全和牠從前所身受的一樣。一九二二年，這一個耀武揚威的新國的預算竟有三分之一是化在大的用途。

不但波蘭是重新在地圖出現了。由歷史的傳統，感情方言和地理的研究的變為一個族新自主國而且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南斯拉夫，(Jugoslavia)芬蘭，(Finland)哀沙尼雅，(Esthonia)賴脫維雅，(Latvia)立陶宛，衰微的匈牙利，土地近闢的羅馬尼亞，也一齊出來來爭各自的主權自由，所有這些野心、敵視、聯盟、諒解、誤會、公開的或是秘密的條約，稅則，經濟競爭等等，在人間的加添了糾擾和苦難。第一次的所謂世界議會排斥俄國，原因是為牠不認了所有的鉅額戰債，這就是西方的帝國主義所嚴重關心的。頂可怪的是以國際的和事者及民族的自決者，自居的美國，也站在國際聯盟之外，甚至因為威爾遜總統的個孫決心，

想自己和他的民主黨來實現拯救世界的不朽的光榮，所以他也失去了多數參議員們的同情。

參議院做了些妥協的企圖後，便完全否決了聯盟約章，洗手不再問世事。威爾遜總統不再能做永久的和平之王了，並且在這奇怪時代，使他迅速地退回到了凡人的本色。他死的時候，使他十分傷心和十分失望。美國同福特一個樣子，回到了經常的賣買和造損益決算書的舊漩渦中，而歐洲人却把威爾遜的名字寫在城市、街道、草坪、以及車站上，盡力利用他所遺留下的這個失勢的國際聯盟在他們的事情中。

倘若俄國和德國，爲了他們是遭受排斥的壞民族，所以不能參加國聯，但是，那些在遼遠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和日本人却又被容納在國際內，認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這原因顯然是爲了牠們是同爲趨向於「威斯特發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型式」的「好朋友。」歐洲人實際上一些也不曉得那些遼遠而古代民族的社會心理，這些從各方面集合起來的政治家當中，好像誰也不曾想到政治的行程，完全是以心理的事實爲基礎的。國

聯在許多困難之後，延緩了幾年，雖然成立過一種智識合作委員會，但是他的活動，就我們現在能夠蹤跡的來說，這不過是一些非實用的知識，不曾有過一件事情指出這個委員會對於聯盟有什麼理想的興趣。

倘若我們參議了後來的事件來說，國際聯盟在美國參議院否決參加後立刻實行解散，豈不更好。那時候歐洲的列強，理解到牠們立刻安定全球的計劃失敗了，或許要立即着手組織限於歐洲範圍的調解和合作的另一聯盟。國聯完全不能監督或改變了日本的外交政策，（這是依十九世紀的歐洲型式所鑄成的——這是使牠墮落做評論時事的機關的一個因素。

牠的權威減少了，牠報告的勇氣和辛辣氣味却反而增加了。後來的幾個報告書，是一種很有意思的歷史文件。國聯會員國逐漸停止了他們的津貼，書記處也落寞得和沒有一樣。國聯就像海牙法庭樣，在飢餓的五十年代中間或以前便漸漸不存在了。牠在第一次的波蘭戰爭後，已經在歷史中沒有了地位，但是牠辦公的巨廈，在一九六五年還是仍舊屹然不動。在一九六八年，和以後的幾年，被全世界運輸聯合會的西方分部用作附屬的辦公處了。

在凡爾賽條約中，唯一的研究我們人類財政以及經濟生活的部分，便是對德國課以鉅額的金錢賠償。這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奇怪非凡，但是對於凡爾賽的政客們，卻是很自然的事情。政治的生活，仍舊是深植在舊日純粹戰爭的傳統之中，仍舊集中在疆界和軍事的利益之上；牠是很不理解經濟的現實的。我們已經指出過，用鉅大的勢力來要求經濟的統一，就是大戰唯一的真實原因。然而，凡爾賽是完全忽視了這一點的，好像這一些原因，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樣。

在那時我們能夠聽得到的，祇有一個特出的聲音，便是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坎斯（J. M. Keynes）的大著歐洲戰後的經濟一書上，他發着抗議和警告賠償支付，將使信用和貿易解體的呼聲。協約國他們相互間欠了一大堆的債務，他們一些沒有取消的辦法，而且在「政治的」國際聯盟的旁邊不曾有「經濟的」國際聯盟，因為不曾有人提出過經濟戰爭的節制來。美國人——連威爾遜也在內，——依舊是在財政的個人主義的階段上；他們把賺錢算是個人在法律範圍內聰明與否的事情，而美國人所理解的法律，對於開明的

自私自利，不過是一些有趣的障礙，並不是有效的牆壁。當時美國娛樂的方式是撲克牌戲，所以那個偉大民族，便在大戰之後坐下來玩他們的撲克牌，把法國和英國當做了主要的對手，互相欺騙着，看誰贏得世界的信用和黃金最多。

大戰後的十年內，人類的智慧，慢慢地覺到凡爾賽和約完全把戰爭沒有結束。牠不過是流血的暫息。牠所以這樣做，爲的是在各個主權國間傳統的鬬爭中，開闢了一個更巧妙而且是更破壞的階段。各個獨立主權國的存在，不論他是赤色白色，一概是戰爭，只是被一種縝密的錯誤教育，使人們對這種淺顯的事實看不見。戰敗各國的民族，感到這個條約太不公道，然而要確定指出那幾部分來却也不易。他們感到向他們提出這一種條約，不過叫他們在上面簽字，把他們的簽字，看做把犯人帶來受處罰一樣。他們自然要盡力修改這種束縛他們的條約，或是在暗中違犯，或是不顧牠的條文。但在另一方面，勝利的各國，他們也覺得他們不但侮辱了擊敗的敵人，並且使他們處在極不利的地位。因此，勝利者時刻防備着他們來報仇，所以他們也不肯除去武裝，他們也破壞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保存和增加他們的軍隊。像德國人被

迫而做的一樣。

軍火公司和他們的報紙，自然盡力着使武裝的「安全」的堅持更加強化。比方像法國的人民，倘若想把武器，投在一邊的時候，立刻就有關於德國有秘密兵工廠和軍隊偷着操練的故事宣布出來，阻止他們不要把武器投在一邊。那些狹義的支配法國的愛國勢力，不但使他們自己遍火的武裝着，以反對牠已經傾覆了的敵人，並且還進行一種暗中的和無情的金融戰爭，同美國的把戲玩在一起，使德國不論在經濟上或是社會上企圖恢復的每一個努力，完全歸之於失敗。

那些勝利的列強，他們見到他們的敵人給打得不能再起來了，在分贓的時候十分坦白地就想互相佔光了。這是和主權國的傳統極相合的。因爲他們的「聯盟，」並沒有產生出了共同的情感。在凡爾賽和約簽字的第二年，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就在小亞西亞打起來了。希臘人受到英國的鼓吹，土耳其人也接了法國和意大利的聲助。這是一種帝國主義工具的戰爭。這一次戰爭的終了，希臘大敗，司麥那(Smyrna)城市被焚毀，我們在城市中見到了一次可

怕的慘殺；很多的婦女和兒童遭受了暴行，男子及青年們的被挖出眼睛，有的去了勢，有的屠殺，除去土耳其區域以外，一切的地方，都遭受了刼掠和焚毁。在起大的城市面前，碼頭上密集着恐怖的人羣，無希望的，盼望着他們能夠從被搶刼慘殺，或投入水中以前，找着了船隻逃走，

不久以前，土耳其人已經從古昔的西里西亞省把法國人趕出了，已經把古昔的希太人(Hittites)或亞門尼亞人(Armenians)完全殲滅了。在亞門尼亞人看來，戰時和戰後並不兩樣的，因爲刀和火仍在追逐着他們。他們死的人有兩百萬以上，而且多半是慘死的。

偉大的和平之後，俄國的南北兩部以及東西比利亞仍舊繼續着戰爭，中國也做了盜匪軍隊的犧牲物。波蘭奪取了維爾納，侵入東加里西亞，和俄國人在烏克蘭發生戰爭。一隊愛國的意大利人，侵入弗姆(Fiume)驅逐了一個協約國的聯合衛隊。

俄國的東南部，立刻發生了可怕的大災荒，不論美國或係歐洲，都無法來對他援助。當大戰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災荒，都在盎格魯薩克遜種的社會中激起了慈善家的活動。但是，慈善事業已經失去了靈魂。祇有美國，還有一些微弱無力的舊習慣在震動，但在英國，連這樣的

震動也都沒有。

這便是凡爾賽會議所造成的世界和平和聯合的結果。

於是，他們須得做一些不大悅意的補綴，聊以糾正和約中很明顯的缺陷及不足。君士坦丁這一個城堡，從前是向土耳其人的手裏取去，是協約國的混合軍隊所防守的，但是在斯麥那的屠殺以後，在他們和英國人間發生某種戰爭的形陣以後，在一九二三年便又交還他們了。

在歐洲殘破的局面中，新興和重造國的國界的劃分，極不顧到經濟的學識農民們需要好多年才能發展出來的城鎮市場，或者冬夏季的牧場，現在完全把牠們截斷了。大的冶鐵爐和化學工廠五金工廠全從牠們所依賴的鐵砂和礦源分離了。從前是中歐東南部的金融和中心維也納，只成了一個沒有身子的光頭。然而，在凡爾賽的一切愚蠢的舉動中，最荒唐的及後來證實是禍害無盡的，要算是但澤(Danzig)自由市場及所謂波蘭游廊(Polish Corridor)的創造。

我們且來略論上述的最後紛擾，以表明和會當極壞時所表現的心理乃一種單純而無聊的觀念，好似說德國人是無賴的，因此，凡是反對德國人的，不管誰全是好的。這種心理支配了一切，在波蘭游廊問題上比了任何地方爲更甚。波蘭人是對的，他們是協約國的嬌兒是從美國來的情感的歷史學的愛子。他是來替人家把強者的位置推翻，扶植起弱小和柔順的人的對於飢餓以及有欲求的人，他準備盛滿了好東西去給他們，而那些從前是有錢的人，就得叫他們空手走出可憐的德國，像是地獄中的魔王一樣，抬起了失望的頭，看見波蘭像天使般在威爾遜的懷抱內。對的，波蘭人不但是許可去統治路登尼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是他們最憎惡的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和德國人，而且他們還得到經濟上極爲重要的東西——「出入的海口」。

威爾遜總統在這上面十分堅持着。瑞士在大戰以前沒有「出入的海口」也過得不差，但這是另一件事。難題就在於在種族的有顏色地圖上，找不出一處能指出是波蘭的界海在威斯脫拉(Vistula)河口的兩岸，那裏被波馬蘭里亞人(Pomeranian)和德國人所居住，倘

若波蘭需要出海的貿易的通路線時（其實波蘭的貿易，大部份是同牠的鄰居交往的）唯一合理的，就在和經過地帶的人民予以諒解。這是最易成功的。在威斯脫拉河口，有完全屬於德國的城市但澤，牠是依賴做波蘭貿易的出路而生的，牠是沒有別的法子能發達的，我們沒有理由去相信這會對於波蘭的進出口發生了什麼困難。牠是一個古代的、誠實的、乾淨和繁盛的德國城市。其中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六是德國人。

以上所述凡爾賽和會在「出入的海口」一句誘人的術語的靈感之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當時的形勢。雖然在征服者的心裏，深信着沒有一個德國人不是壞人，也不能把牠作為將但澤交給波蘭統治的理由。但他們把牠從德國分離開；把牠變為一個自由市，在牠的西邊，他們還連波馬蘭里亞的闊帶形的領土都劃入了波蘭，遂了威爾遜的「出入的海口」的宿願。（這便是爭論中的主要的「游廊」）在游廊以內，沒有可以比得上但澤的商埠，但是波蘭人自己開始在格丁尼亞(Gdynia)創造了一個對抗的城市，這應當全是波蘭的，牠的目的，就在使德國人在但澤做生意的都受挨餓。

訂立和平條約者，爲使威斯脫拉河對於波蘭無量的清潔而芳美計，把波蘭和東普魯士的境界，定在河流的中間，並且定在朝東普魯士一方面的地位。(Jacques Kayser, La Paix en Péril: 歷史文件，711711) 所以東普魯士的人民，像農夫、漁人、以及帶着羊羣要飲水的牧者，大都在能夠看到河流的地方，就給一條邊界線，和波蘭衛兵的槍桿阻止住不能前行。而且，向東的鄉村，是平直而低窪的地方，從前是被一道堤塘所保護，以免洪水，並免陷成沼澤國界把該堤切做了五段，因爲波蘭人毫不注意於這些堤塘，所以不久堤防多失修了。甚至加細國(Garnsee) 國界線把皮旭夫司威特 (Bischofswerder) 大城市從他們的大東站切開了。

但是，我們不願意把這一個使人惱怒的解決說得過于詳盡。使人最生氣的事，要算是那游廊的本身。交通線向來就是，鐵路是東西方向建設的；大河是南北直到達但澤。現在波蘭人設法去破壞這兩路方向的交通，把一切交通沿着南北盤來盤去，以和但澤避免每一個往東去或是往西去的德國人，要受到好多次的邊境盤查繳納關稅以及相當的躭擱，值得紀念的麻煩倘若特別快車經過走廊的時候，窗戶都得要關閉起來，這真是麻煩極了。但澤城自從和

德國的貿易切斷後；他們在波蘭方面的生意，便慢慢地被格丁尼亞所奪去了。法國的資本，傾入了格丁尼亞，傾入了他們南向的新建鐵路之中，於是法國金融業，馬上也捲入漩渦中了。

但澤的遭受辱和危險，在德國人的想像中，熱烈地燃燒了起來。那一個走廊使他們，在激怒和平條約中任何別的事件，都沒有使他們激怒得那樣厲害的，牠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的爭論。在古時的西利西亞也有一個和此同樣的難問題。在薩爾(Saar)流域有一個傷痕，被強迫從奧國界的地方，也有一個受傷的痕迹之外。還有許多苦痛的憶念和寃屈。這等地方，對於柏林很是親近；這使德國一切生活都感到煩悶擾攘。

在凡爾賽和約簽字後的十二年中，波蘭游廊，明白地顯示出是歐洲形勢裏而頂危險的原素。牠破毀了每一次軍縮的計謀。牠指示着歐洲直接再走上戰爭的道路。在一九一四年前，歐洲的政治家中，對於戰爭抱定宿命論的態度，看作可怕而又是無可避免的一件事，已經明顯的在重新出現而且更爲擴大了。

歷史真有再現自己的形況。關於這些公開的創作，沒有一個能夠提出何種確定的辦法；

但這個時期，差不多沒有一個政治家不在有機會的時候大唱其反對戰爭的高調，自然，他們是巧妙地避免着說那種具體的，可以引起辯論的，不愛國的或是容易傷有關于列強的情感的話。

二　國際聯盟並不能使世界和平實現

那個徒勞的理想主義者威爾遜，當我們在完全忘掉他之前，我們當喚起讀者，注意。他許多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不要因他個人的缺點，就斷定他理想的野心也是同樣不可能的。他的狹小的自大，對於德國的懲罰和許多旁的事情，不過說明當時組織國聯的不利，後來變成了牠的致命打擊。在那時候要實行一個世界制度，心理方面的準備還不大充足，沒有一種思想的體系能夠出來維持了牠。——世界國家——「現代國家」的種種觀念，大家對牠的認識還不大清楚沒有把牠加以充分發揮，而國際聯盟就是最偬促成功的急就章。

我們就很快談到這需要德·文特（一八〇〇——一八三〇）和他同志的終身擘畫了。這是需要社

會心理學有着極大的發展和應用，使主權國家的混亂狀態，完全被中央的統制所代替，那才有遼遠的成功的可能。威爾遜以為他能夠集合幾個同情者，替人類的統一寫下了一個藥方。他毫不想到前面任務的偉大、複雜、親切和深奧。他企圖着把補綴那時代的破舊系統就當作了新的。他夢想不到貨幣的改造，全世界實行純社會主義的需要，以及教育的完全更改，這樣，人類的和平和安全才能夠建立起來。然而他雖然是狹小和盲目，好像他總是站在時代思想的前面。

這一個早熟而又毫無效能的聯盟，對世界和平的實現，實在是祇有阻礙而沒有幫助。人們的自由思想，關於這個問題的主要點，被牠是阻止了的。有些有好心思的人們，曾經組織過（比方像在英國）國際聯盟協會，從表面看起來，好像是幫助牠的，其實對牠是反抗而並不幫助；對牠的會章和工作，做着有效的批評。他們說，有了牠總比了沒有牠好一些，實在，這樣組織，開始就錯誤了，比了沒有還不好。在戰後十年，一般人的心中，關於世界政治的活潑，以及建設的思想的分量是異常的小。這顯然是國聯的無能，那是無可爭辯的。人們對於已經放棄了

的世界的統一；不得不重新開始研究、

十二年以後，「現代國家」的運動，還只是在找一些概括的公式，以作努力於自由和進步之用。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部份的而且是混亂的表示出不滿的各種主義者，還得拉攏在一起，大家互相來諒解和合作。他們的精力，大部分已經消耗在暗中的爭論，相互的懷疑，以及局部的嘗試中間。二十世紀的中葉已經完了，世界上關於「現代國家」的宣傳和教育，還沒有多少人擔任起來呢。

一二 凡爾賽和約後金融和社會紀律的崩壞

我們已經指出了世界戰爭超出了空前的範圍和破壞，完全因了世界鋼鐵工業的發展，這種發展的情形，同了人類的政治以及社會的概念來互相比較一下，是一種膨脹的狀態。但是，在戰後的最初十年，在團結得不緊的人類社會中，有着別的不相稱的發展，開始在其他的許多弱點中表演出來。我們從經濟的觀點看來，戰爭這一事件，就是人類別無他方來分配和

消費那些過剩的生產，但是，戰爭必然的結果，尤其是對於國際貿易的干涉，使牠在許多只產生原料而當未開發的區域裏也成立起工廠來，出產製造品，使全世界生產的工廠的總量，增加。等到戰爭停止，剩餘生產品的消費，或者停止了維持那數百千萬脫離勞動工場的工人時，這個事實便變得日見明顯。在戰爭後，不管軍縮有了多少次的會議，而戰爭的準備，仍舊在繼續增加，但牠毀滅的人和破壞的物質却不十分多，所以還不能解除了困難的形勢。

還有，生產的能力在擴張的時候，我們見到消費的能力，却正在積極地縮減；出產的效率愈是增進，工銀勞動者便愈見減少；貨物愈多，消費者愈少；消費者愈少，商業的利潤也愈小，股東和個人企業家的總消費力也減少了，於是普通投資者和工銀收入者的，他們的境遇更是困難了。這是一個「生產過剩的難題，」足使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們十分焦急的。

現在的青年學生，或者要問：「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加整頓呢？」可是，叫誰來整頓呢？我們應用經濟學的現代的上層結構，例如大衛・劉賓(David Lubin)局和經理總部，以及牠的

廣大的統計組織，數十萬的分站和觀察者的指揮整理和分配。這些組織，在那時候還不存在，只有盲目的估計得不好的力量在那裏調整。人類的普通利益是在繁榮，但是沒有專門的人使得繁榮繼續維持下去。顯然的把企業的自由，加以極大的修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那些管理政治的人，就是最不情願担任着這種修正的人。

自從生產活動膨脹以後，銀行和金融組織都也膨脹了。這是一種不規則的膨脹，可以說，這是物質生產已經擴張的結果，並非相互補償和有統制的發展。

現在我們看得十分明白，世界物產的分配，於企業式是消費方面，是屬於社會主義和社會政策的一部份的工作，是應該在公共批評下進行着，考慮各種要求和需要的理由，所以我們不容易明瞭二十世紀的人對這些事情的態度。我們不會去夢想把這些事情交給營利的私人作有效的管理，這等於我們不會把法庭和學校出讓給任何的私人一樣。但是，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人們還不會得明白這一個道理，還有待於學習這一個教訓！

二十世紀的初年，因爲有許多銀行和貨幣的故事，似乎不能相信的，所以這些故事便變

成了最吸引歷史心理學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易得結果的領域了。銀行和貨幣的體系，是從實用的複雜錯綜中生長出來的，牠是演化出來的。並不是有計畫的組成。向來不曾有人，想衡量一下任何的實行是否是和正義及結果相合，大家都以爲只要當時能夠行得通就罷了。人們把這個試試，又把那個試試，把這樣做做，又把那樣做做，把他們做後的意見完全隱藏了起來。隱藏，在這個系統當中是主要的，關係於大衆利益的事，應該公開的發表，可是這個並不被人瞭解，於是，影響普通人的購買力和工業企業的信用的根本決定，完全是在秘密中實行，對於貿易及工作的限制和刺激，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不論在什麼學校或大學的普通教程中，對於這些主要的事實，大都沒有明顯的提示的。私人企業的專享權利。爲教律法官和習俗所重視。人們失業與否，對於他們的貯蓄上了人的當。就是景況好起來，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們完全不同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經濟壓力和運動的一切知識，他們祇看見一些令人不快的混沌之詞，或種種錯誤的解訴以及人力所告成的價格，及匯兌的變遷等等，這類事情構成一種濃重的霧，霧裏面還隱約可以看見好些神秘的人物。

諾爾曼（Montaga Norman）就是這些神秘人物中的一個，他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銀行的行長。他是全部歷史中最不可捉摸的人物之一。在他的週圍，興起了好些的神話。他根本就是一個神秘的人。他的容貌很是瘦削，並且還有鬍鬚打扮得像一個藝術家和音樂家，一點不像當時的銀行家。他是怕羞很出名的，或者因爲這個道理大家都說他是「神氣。」他專門化名游歷，和突然出現於人家料不到的地方，用了這種習慣而刺激人民的想像。他到底爲什麽要這樣做呢？那是誰都不曉得的，或者他是爲着好玩而這樣做。他供給了不少的證據，給一九三〇年調查金融的麥美倫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由那一次的證據和他一二次公開的演講，使我們曉得了他所從事的暗中活動着的教育，然而照我們現在看起來，那是極不完備的。他對於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及環境關係的學問，一些常識也沒有。就是他對於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思想，也不是我們現在認爲一個普通公民所必備的思想。他的所以適合這個黑暗的職守的主要資格，是因他在英國銀行服務以前，就和私人銀行往來，獲得了許多實際經驗。這種經驗的積累，是爲我們現在所曉得的人類財富的偶然和短時

擴張的時期。明白些說，他對他的職守並不虛心，因爲銀行活動在非常狀態之下也能獲利。他的心中，因此就有了許多成見。然而在那個時期，他是被認爲有魔力的「專家，」所以在戰後的困難中，他竟有了巨大的力量，可以破壞或使歐洲每一國幾百萬的人貧窮或富有。

在戰爭和戰後的時期中，一種另外的暗中活動的金融的大勢力，便是一大羣的私人銀行。摩根銀行可算是這羣私人銀行的中心，是一個最典型的銀行。這個銀行所進行的業務，他的規模，比了許多小國政府要大。他對某國訂約或拒絕某種借款，就有決定那國政府命運的力量。創辦該銀行的摩根(J. P. Morgan)，是美國「紳士」和德國貴族的合種他內心的貪慾，同樣也流露於搜集名畫和普通「美術」品上。他後來死於大戰爆發的前夜。但是，他和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爭論中所用的一句話，以後竟被大家用作反對全部私人銀行的最兇的武器。「羅斯福、」他抗議着說，「要我們都有一隻玻璃的錢囊。」

第二個羅斯福總統，便立刻復活了那種要求。

透露着貪婪，弄權詐的習慣的話沒有別的話說得比這句更明白的了。摩根並非不誠實，

但時常奸許，這是他生意上的規矩。他堅持着不公開的錢囊，隱藏了動機，使一件生意準時完成。他死後他的傳統，還是活着；他的銀行，變成了信用的堡壘。他所做的錯綜的交易，在歐洲民衆的生活的周圍，像懸掛着暗的蛛絲網一般。這個事業，做了不少害人的工作，正像蜘蛛的織網一樣，殺人而不見血的。然而，當時的人大都不能夠懂得了牠。不論那種特殊的事情祇能在有條理的研究者經過了多時的研究後，才能模糊弄清了頭緒。

這些神秘的銀行世界的系統，結合了統制着廣大工業的黑暗人物和集團，使消費的力量，陷入了困頓和不規則。比方有一個神秘人柴哈洛夫(Sir Basil Zaharoff)，他是軍火的經紀人，但是，他仍舊是被我們學校的兒童所喜歡的人物；還有克魯格(Jvar Kreuger)，獨佔着世界安全火柴的市場，借了許多的款給各國政府，最後，被人家發覺了他僞造大宗的證券，他爲逃避詐欺之罪的懲罰，結果便自殺於巴黎。（我們要曉得現在博物院裏所看見的安全火柴，消費的數目以十萬萬計，因爲那時還沒有別的便利的大源，牠們的製造和分配，是一大規模的工業。）克魯格不像摩根，他並不是貪婪的人，所以既不窖藏，也不搜刮。他什麼都不顧惜

甚至法律也不管；但他建築了許多華麗的巨廈捐款作科學的研究。（像北京人的發現，在考古學上是一個可以紀念的事件，這是靠他的捐款而辦到的。）摩根是居奇和積累，克魯格是掠奪但又贈與。摩根花費了他的錢，去收買那名畫的真蹟，原稿，以及同樣純正而有價值的舊貨，克魯格把他所保管的金錢，用在裝飾的裝術，和靈氣事業以及離奇的建築中，再做了許多非常的試驗。他們兩人的行動，完全是毫不受人干涉的。那時候的金融機構十分黑暗，所以克魯格能夠在幾個月之內把一捲約值五十萬金圓的偽造的意大利證券在市上銷售得像真的一般，把這偽造的證券從有名的放款人處去抵押到借款。這類的把戲，倘若是可能的話，現在，祇須一天工夫就可以在交易所裏查出來了；但是現在也沒有人想企圖做這類事情。這些神秘人和操縱東歐各國貨幣的各個投機集團，以及很多他種營利的集團和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在傳記的詞典(Dictionary of Biography)中惡作劇人的生活(Lives of Mischief)（金融諸卷）裏查得清楚明白的。他們中間最好的，也是幹一些搶劫或是冒險的勾當。他們的大多數，不管後來的結果，只是同鑽堤的鼹鼠一樣活動。

在這時期金融文件的皮篋裏，當黃金和商品價格對世界上每人的信用有了極重要的關係時，我們可以見到新聞紙上有「無名的購買者，購取現金兩百萬」這樣的題目。或是說得比較的模糊些，「大概黃金和無名的購買者買去。」以後，一切小的貨幣投機者，要開始去窺測、偵探、猜度，而且是人工升漲着他們的生意。俾便遷就這暗中所預示的平衡的金融的移動。

其他的神秘人，還有各國的財政部長；內中英國的財政大臣，也許是一個極好的典型。他在每年必須把另一年國家的預算和稅收的整理，總有不少耳語、暗示、窺測、計算和來回的奔走，他們要做一個稱爲「平衡預算」的算術的神秘。當預算快要宣佈的時候，生意像是停止了，投機、保險完全活動起來。要人的妻、家庭、親友和秘書等走動的時候，都成了大家猜謎的中心，被人看得好像有魔法的一樣。他們也自以爲重要得非凡。最後，偉大的日子到了，立法機關集會的時候人數很多，他們可是着急，又是好奇。魔法的醫生，帶了他魔法的皮包，在下議院中佔據了他的席次，有威儀地站起來，開始講述他「預算的演說。」

關於預算的演說，大都引起人家「驚奇」的，對於二十世紀混亂的不測，有什麼東西更能比牠作生動的見證呢？不論什麼東西都有被抽稅的可能；不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免稅；不論誰都可以躲閃在那時的經濟的黑暗裏。這好像並不要緊，所可怪異的，就是世界上這個系統雖然搖搖欲墮，但是竟能支持了這麼的長久。

這種種狀況，是怎樣的驚異離奇，像是航行在洋面上的一隻橫斷大西洋的大郵船，官艙和房艙中燈光煇耀，客廳和餐室都非常的熱鬧而在船的下層，主要的機器，顯然是有了些毛病，機器間中沒有一點發光的配置，而那些照護的人，（有些是戴着假面具的）他們工作的時候，沒有工頭指導，單靠一支微弱的火柴的光亮，或者十分破舊的寶貴的電燈光，或完全在黑暗中轉動着他們周圍的機器。

從一九一八年停戰的時候起，以及後來的幾年中，十分明顯的，這一架機器是已經大大地損壞了。這時候的經濟史，是一部十分可駭而震顫和動搖的歷史，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次更悲慘而叫人喪氣。在大戰的前十年，各種通貨的真實價值，雖然有些變動，但不過是在極微的

限度內的變動，上升或是下降，是經過了較長的時間的。戰爭以後，在匯兌和價格中開始了一串的運動，這是在整個的繁榮時期中所沒有的。通貨的上升、下降、像大西洋的波浪一樣的不安定。大家都覺得他們銀行中的金錢，在幾個月裏面可以變成了沒用的廢紙，因爲支付的時日，慢慢地變成不可靠了。內外貿易的進行，也慢慢地感到困難，因爲製造工業的原料，大多是從國外得來的，國外貿易的糾紛，常常使國內的生產陷於停頓。貿易和工業，在這樣不確定的局勢裏，慢慢的得病起來，像是在地震的狀態中，不管人們站立定或是跑開。完全是同樣的感到不安全；失業的人羣，繼續的增加着。在經濟上佔着優勢的國家，於關稅的後防築起了壁壘，各各用了債務，或是否認債務，或是把經濟突然的膨脹和減縮等把戲，互相來鉤心鬬角的競爭着，世界上好像沒有力量能夠叫他們聯合了行動起來，把他們共同的毀滅。阻止或是挽救。

在二十世紀第二個三分之一的年代，人類是陷在最奇怪的悲慘的狀況中。地球上的人類，比了從前要健康和富足些，在既有的資源中，可以供給全人口安舒的生活什麼也不感到缺乏，那是物質的實際狀況。但是，我們人類好像不能伸出他的手，取得了在手所及的範圍內

的豐富的東西。當我們翻開那時的定期刊物和書籍來看的時候，我們便見到驚恐和困難不但是在增加，並且還日見深刻化。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時期，充滿了受苦，同時也充滿了興奮；至於死在戰場上的人，他們也相信了一個補救的和平快樂，是距離不遠了。在死裏逃生的人，也有人答應給予「適合的家庭」但是，一九三〇年後危機的特色，是缺乏彈性的，牠是無條件的失望時期，不管他什麼的抗議，完全不發生效果的。一個同時代的作家曾經說過，一個人是生存在一個「迷惑的世界」上。

這一個貨幣紊亂的經濟後果，立刻跟隨而來，但是比較深刻的社會道德的破壞以及影響，並不立刻就顯著出來。全世界的制度，一直是爲一般普通人的好行爲所維持，像書記、各種的工人、商人、自由職業者，他們都誠實守時一般的安全，完全依賴成爲習慣的有禮貌的行爲。但是，普通人行爲的良好，爲因他是信仰着收入是安全的，雖然有時感覺到缺乏，但是大體上由保障他生活中某點的舒服和尊嚴，他便想像這是他和社會間的不成文條約，就是他應該有工做，應該有安全，以換取他的服從法律，而且社會對他的貯蓄也應當守着信用。他相信政

府會維持發行的貨幣，而且會顧及貨幣給他應得的滿足的。但是，現在全世界無數的男女，完全用了各樣的話問着他們自己：勤奮、有技能、以及服從法律是否「值得？」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在社會纖維中的黏性物，顯明的衰落而慢慢地變成了塵埃。在整個繁榮的時期內，犯罪百分數的下降，竟又上升起來了。

一三 一九三三年的大停頓

我們把人類歷史來敘述下去，直到社會延擴到二十世紀的第一個三分之一完結時，正當一九三三年，即社會的大停頓時候，失望和驚恐，混亂和不安，是充塞着這一時期，像大風暴發生的前晚一般。經濟生活的車輪的旋轉；失了常度幾百萬的失業者是增加起來了，生活一天天接近威脅和危險。全世界的羣衆，是由困難和缺乏，感到了真實的飢荒了。社會主義的暴動，孕育在各種組織當中，喃喃自語；可是只有暴動，而沒有建設的思想，是毫沒有效能的。在已經發現的各項建設後面，還缺少能力和精神來做後盾。專靠壓制的勢力不論他們對犯罪是

怎樣的無效，終算完全能壓制了民衆的暴動。這樣就使貧窮變爲麻木而毫無感覺了。

各地方的各種事情，都沒有進展公共衛生的注意，對於傳染病的抵抗力減少，嬰兒死亡率的增加，在一九三三年後生育、死亡、婚姻的統計中已經明顯地表明來了。

戰爭十分明顯地逼近了東亞和東歐；牠徘徊、前進、停止，可是沒有人歡迎也沒有能力阻止牠。

但是舊制度的無限繼續，使事情照舊混過去。在一個昏黑的世界中，大多數的人民，依照着過去習慣進行着他們的事業。無餘利的工業，仍舊於減少職員後接連下去。到店鋪來的主顧，也日見減少了。失業的人徘徊于職業介紹所的門口者日多，但只有少數的人能夠得到職業。地產經紀人不再收租了，只能來索還他的積欠。營養不足的兒童，顯着枯黃的臉到寒冷的學校去；教師們因爲薪金減少，大都垂頭喪氣了。水陸交通的破產，使火車輪船開班的次數也減少了，但還是守着時刻。旅館的開門，並不是爲了賺錢，乃是爲了要減少損失。公路的交通，失掉了新穎和迅速，但牠還是仍舊在進行。街上的羣衆行動也缺少活潑的現象。出了事情，警察

也不像過去的銳敏和戒備森嚴，不過是勉強維持着秩序罷了。

凡爾賽和約以後，就有不少的建築事業非常活躍；但到一九三〇年後，建造新屋的愈來愈小了；也許有某些建築師謀得了工作，可是僅爲了必要的修理，或爲房子被火焚燬，須重新造過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世界上將發生很厲害的瘟疫感冒。統計家已經觀察到抵抗力的減少，人數又回復到了中世紀的狀況但是醫生和看護婦英勇地盡着職守。那些眼光遠大的藥房老板，則大獲其利。

在這失去活力的一個階級中，那些在陰暗中生活着的畫片，還並不十分完全，牠們對於一個整代的人所處的貧苦環境，以及這一代人在這環境中由生長而至死亡，也不能傳達出來。我們看見成排的失掉修理的舊屋，可憐的內部，還有站在周圍穿着破爛的男女們。在這些圖畫中，他們像是永久站着的樣子、記載人事的新聞文字，使學生們更接近現實，——了然於沒有地位，沒有顏色、沒有運動、沒有希望或機會的現實。有些人做了些「調查」特別是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報紙，他們所說的故事，總是說車輪走得緩慢得快要停下來了。工廠的門關了，

煙突中也沒有了煙，鐵軌也生了銹。以下，便是那時人們的一篇酷似的描寫，表示一個人類史中的奇特的階段。這是英國一個著名記事作家湯林生(H. M. Tornlinsen, 1973—1969)，寫的。

「在上一個星期，我到卡狄夫(Cardiff)的一小城市去。那是偶然的事情，因爲我從不曾到過這地方。這是一個典型的谿谷，我們不去管牠地名叫什麼，說不定牠有很多的地名。牠的人口，不過六千人。牠的人民，從前有過苦難，不到二十年前，有三百多個人在一個礦山爆炸中死了。我們不能說城裏的人們已經忘掉了那件事，因爲我同他們談過話，一提起那件災難，他們心中還有餘悸。這是他們對自然戰爭的一個可怕的失敗，但是，殘存的人回到鬬爭中去，也不再提及牠了。

「當我從較遠的距離來看這城市的時候，牠的周圍是荒涼的高地，我因此就想起了那些在法國離戰線很近的熟識的城市。正午，太陽明朗地照在天空，但是，這個煤礦區，靜寂無聲，靜寂得像是着了

「事實上牠確然已經着了魔，就某方面來說，這小城市是已經死了。但是，牠的人民，還是依附着這城市的空殼，因爲叫他們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粗粗的看起來，這地方好像是不會有人住着的。前面的建築，已經是成了廢地，礦山外憔悴的機件，像是從未轉動的樣子，馬達間的黑牆上的裂縫，表白了這是蝙蝠和貓頭鷹的家。

「我走到了大街的盡頭，才碰見第一個人。我看見街上的店鋪不但關掉了，並且是成了沒人看管的空屋。這個人是站在大街旁邊的石頭上面，中等年紀，身材靈敏，但又顯出了十分憔悴。他的衣服洗刷得十分破舊了。

「這個城市爲什麼弄得這樣？」我問。

「我正在預備領救濟費。」

「你也失業了？」

「是的，我也失業了。」

『失業有多少時候了？』

他不做聲，祇是伸出了五個手指。

『五個月』

『五年。』

『在這裏的人都一樣嗎，』

『是的，我們是不會找得到工作的』

「他引我到一個垃圾堆上，那裏正有一隻羊把紙來做着食料。我們看了一回在近處的煤坑。

『這就是我們不能再下去的理由，』他說，『你看，怎麼能夠工作呢？』

『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一座銅製的小橋，倒臥在到礦坑去的鐵路軌道上。一個彎曲的水溝滿長了荒草，外面的建築已經荒圮得不像樣子，裏面像是有鬼的。『我曉得這裏有些人，』我的嚮導低聲的對我說，『還有那底下呀，他們停止在那裏，已經有十九年了。你會說他們是傲倖的嗎？』

「五年前有一千五百人從主要的煤坑中跑出來。在這裏是沒有人了，店鋪關了門，許多衣店長排的白粉刷過的窗門，充滿了塵埃和草許多房屋的木料，已經拿去當燃料燒掉了，就是合作社和當鋪的門也都關閉了。人們的生活，所謂節省和奢侈，在這城市中是同樣的事。我並且看見那些教堂的窗子破了，讓鼠雀在東面做窠。

「比了這些凄慘的店鋪和破舊的建築還要壞的，便是許多穿得破舊的人們，整齊地站在街道旁邊，不做一聲地等着。等什麼？什麼都沒有，因爲沒有什麼東西來呀。……

「他們是完了，這些父母們，看着骨瘦如柴的這代人慢慢地長起來；在這代人的心中有着一個暗影，他們的孩子們，在玩的時候，曉得了他們周圍的緩慢的死兆；這些兒童是沒有兒童幸福時代的可憐者。

「他們的家庭，是在人類希望的墓場中。……」

在那一個時期的報紙和書籍，叫人讀了要希奇。牠有的時候是黯淡的一種不誠實的樂觀，有的時候是無一種望的拚命。邪僻和幽默，侵入了民衆的藝術和文學；在每一種的作品裏，

有着很強烈的風格和氣味，但是對於同時代的生活的現實，却無一些的把握。關於安心的和故意「十分快樂的」書籍，編印和出售也極多，有種是傾向於宗教的神秘和別一世界的運動，有種是斷苦着趨向於抑制的清教徒主義。淫慾過度的放縱，就激起了檢查和迷信的壓制，這兩種事情，完全是人類尊嚴降低時候的兩面。人類面對着金融和政治的複雜問題，大都變成了神經衰弱。

一切的神經衰弱，顯然的有着不可解釋的成分。我們現在看起來，脫離苦難的出路是擺在那裏，可是沒有人明白的看到，或是看到後勇敢的實行這好像是不可信的事情。在社會心理學家的心裏，還是存著那種盲目和不努力的惡習慣。實在出路是十分明顯而且也看得見的，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早經被數百聰明，公正的觀察者所指出了。當白朗在研究「現代國家」的觀念時，有了兩大附卷的書專門引這些人的話。比方：「世界主義，貨幣膨脹和公共工程」（在一九三二年英國的報紙上所引出的）確實說出——至少是一般他說出了人類逃脫的道路。這些是沒有下好定義的不成熟的話，但是顯然裏面已經包含了有終結的改

造的形像。「世界主義」預先指示我們合理的世界管理；「膨脹」是明白地指出了我們現在對於債務的加重，和價格水準動搖的完全的限制?「公共工程」是我們的祖先的社會主義的概念。

但是，和平和自由在沒有達到以前，這樣散漫的理解的閃光，須得要集合起來，使牠燃燒成一個更強的光亮，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概念，就是需要從少數人傳播到多數人。傳播給他們的時候，不單使他們看作一個思想和暗示，而且要有力量，使他們的心理飽和，並且還要決定他們的生活。只有在那個時候，人類才能夠指揮意志力，和引導對地球上的事情做着有效的改組。

在人類的腦海裏，應該發生一種提倡清醒的鬪爭，把錯誤的觀念，因襲的曲解，從不批評過的格言和不可能的「權利」完全拋掉，把道德的，物質的和生物學的各種關係的觀念，一概加以肅清；我們會得看見這個鬪爭成功時，已過了有三代的人了。我們歷史的下章，將去分析這鬪爭的許多因素以及決定的力量。

在失敗時代大約有八十到一百萬萬的人活過。比起現在的平均生命來，他們當然是短促的，而且是不健康的。他們大都長期生病和衰弱，在現在像是出人經驗之外的。他們的大多數是勤勞的，可憐人慣住在汚穢的喧鬧的環境中，他們在草屋、小村、地窖中度過一種不衞生和慘淡的情形，差不多像人類祖先的穴居一樣。少數能夠指揮「家僕」的人，他們是靠了犧牲大多數的人的幸福，才能比較的過得舒服些，才能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和奢侈。這一代繁榮的少數人，在一九三一年以後也減少了，正像帝俄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就消滅了一樣。

在以後的若干年代，世界上個人對於安全的感覺，一天減少一天，關於明天的事情，一想起來就要神經衰弱，覺得駭怕，而沒有把握。那時人和人之間多不相信賴、而且猜忌、容易動怒和爭吵。在這墮落的階段，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他們的生活像過去一樣。是和平和文雅的。疾病和暴死，又成了人們共同的目的。已經寫過的第一次世界史，是稱之爲人的殉難時代 (The Martyrdom of Man) (Winwood Reade, 1871)。在失敗時代的人看起來，殉難者日多，差不多要到最後的無希望和絕滅了。

然而，在這個混亂的中間，有笑聲，有同情，有相互的扶助和勇氣。那些受折磨的辛苦生活，同了偉大而光明的光線交織在一起。人類既受盡了苦難，他們的頭腦，由於在他們周圍的黑暗和痛苦的積累，竟然變成了懶惰和隨便，但從這些頭腦中，最初出現的希望，以後是廣大的計畫和努力，最後便出現了富於收取的制度，集合起美麗與和快樂的安心，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

卷二：明天以後

一 倫敦會議

舊式政府的大失敗，和獨裁制，法西斯主義的蔓延。

在前面我們已經有過說明，十九世紀的舊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怎麼樣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和三十年代遭遇過災難，這是為了牠的工業生產的發展失掉了均衡，貨幣制度的不健全；時時有使資本主義發生了破壞的可能；在政治方面，又因不善適應環境的緣故，牠的內部，已經沒有能夠使牠恢復的力量了，而那時候的人們，對於新制度還沒有明白瞭解的觀念，就是有此觀念；也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不能叫牠代替了舊制度，因此災難只有繼續下去。

在那個時候，能夠採取集體行動的唯一機關，便是各國的政府。然而，牠們作歇無常，並且選各不相謀。所以大多數的國家，在大戰將作的時候，大都是君主立憲或是議會的民主共和政體。議會是由全體的人民或是由大部分基於不合理的選舉制產度生出來的。這個時期，是

民主主義的時期，民主主義，在那個時候的意義，不像現在這樣，各人都有着相等的機會，依照了他們各人自己的才能，對所屬的機關服務，並且還能參加決定公共的事務。牠並不是在一個小社會中爭愛平等的意思，牠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把那個時代的國家，每一個公民認爲都有相等的才能，應該做任何集體中的決議事件。

像迦太基、雅典、羅馬等，遠古時代的共和國，大都是貴族的共和國。所謂民主的個個人平等參政的共和國，倘若說在十八世紀以前是有過的話，那也只是在像烏利（Uri），恩實惠爾登（Unterwalden），或安圖拉（Andorra），等地小民窮，僻處在人跡罕到的小地方而已。這些地方一般人是不曉得的。他們的事務極少，而且也極簡單，每一個普通公民，大都能夠理解和處決他們的公共事件的。

十五世紀歐洲開始稱霸的時期那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大關鍵。那時有書籍出現了，講學也興盛了，這是一個大大地興奮而混亂的時期，大家對於忠君信神等的觀念，盡情地作着破壞的批評。新的經濟力量自由活動以後，舊的封建制度便緊張欲裂。探險、經商、新的金融狀況、

工業的發展等，這些便創造出了新型式的人物。可是，並不能夠確切的曉得了他們的能力，只是躍躍欲試，要求自由地表現而已。他們對他們所要求的是些什麼，以及他們怎樣和舊時代的人不同，都不能清楚的曉得。他們對於人類關係的改良，也沒有那樣的概念。然而，柏拉圖(Plato) 大約在他們的二千年前就描寫過這種的改良了。他們不曾曉得柏拉圖計劃過創造一個中心誠實而有學問的學者階級，也不曾曉得摩爾(More) 企圖過這種計劃的復活。他們不過是簡單地反應着周圍的事實。一直呻吟在世襲的貴族的虐政下。他們並不信賴着一個專制國王。

在十九世紀，反抗「門第」「特權」以及反抗狹隘的世襲的階級的獨占統治，這是民主主義的主要術語。這些少數階級的獨占，乃是根據着相沿的武斷。因爲這個反抗是流品極雜的人的反抗，他們大都具有能力，他們莫不義憤塡膺，但是，無論從心理上或是社會上說，大都他們沒有確定組織好，因此這個新運動，在極早的階級上所採取的形式，便是成爲伸張一切人類的平等權利。

這並不是說十六十七世紀的急進分子，他們大都擁護着政治由普通的人羣來管理；是說他們對已有的各階級和統治者的仇視，他們形成了一個猛勇的革命的少數，盡其可能的力量，喚醒着慣於服從的消極的多數人，把這些人拖在他們自己的後面跟着自己一同走。在歐洲稱霸時代的民主運動的性質，也是這樣的。在外表上是羣衆提出要求和決定一切，但是不論在什麽時候，羣衆是被推動着和被領導着前進的。那幾個世紀中民衆「領袖」的個性，比同時期的國王們和教會首領們的吸引力要強得多。這種世襲的君主僅一兩個，像鄂蘭吉(Orange)的威廉親王 (William)、或普魯士的腓列特力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名聲，是和克羅威爾 (Cromwell)、福祿特爾 (Voltaire)、米拉波(Mirabeau)、華盛頓 (Washington)、格蘭斯頓 (Gladstone)、羅伯士庇爾(Robespierre)、拿破崙或馬克思（這只是一些雜引的新典型）同樣地照耀在史册之上。

後來在英美斯干迭那維亞、德芬蘭諸國，同樣也有激烈的少數婦女，力爭參政，結果是多數被冷淡了的婦女得到了選舉權。但是，她們的成功，不過止於此。那時候的婦人，除想伸張女

性的勢力外，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貢獻極少，實際上也可以說沒有什麼貢獻。

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們，剛在開始探討：對於「民主主義」的信仰，有一大半世紀差不多成爲全美洲和大部份歐洲的流行的虛偽口語。這原因到底是些什麼呢？甚至在那時期有名的「思想家」他們的內心也是極不光明。他們在心中是怕着明白的現實；他們在本能上努力着把異端去遠就不可克服的成見。他們想像的民主主義，不外是某一個遠處的簡單的小共和國，裏面的人，大都身體強壯而心思正直，在財富和才能上大都是平等的，一地方的事務，由這樣的人組織人民會議來處理，會議中的演說和鼓掌，大都坦白無私。一切古代的民主主義，連羅馬共和國也在內，完全被這類的全民會議所統治，在理論上是至少這樣。大家以爲只要人民在注視傾聽和發表意見，聰明的決定，就可以隨之而生的。

繼着封建制度而起來的是新時代的大都市。我們倘若把民主主義的理想，擴張到這樣大的社會裏去應用，那有了許多明顯的困難。我們倘若要假定社會的主權是屬於人民的，那麽，只有借助於神秘主義。但是，在那時候有一種強有力而且普遍的恐懼，就是倘若人們不來

維持這一個假定，那麼像特權、束縛、專橫等一切中古時代的東西都會回來，所以他們就毅然的採納了神秘的解釋。在黎明期資本主義時代新起的人說，祇要那些舊的不平等不要再見，不論付什麼代價都可以的。他們脫離了原來的壓制，趕快跑到了另外一種壓制下去。

盧梭宣傳「人性本善」的主張，他們發覺對他們有了極大的幫助和效力。普通人倘若不受教師或國王的錯誤引導，他們一定是永久良善的。由此平民便成了一個神秘的東西，簡直是一個上帝。這個上帝的祭壇便是選舉會，神諭便是投票匭。這個在歐洲稱霸時期的上帝，他是遲慢而又龐大，但是，人們聽說他的賞罰雖然遲延些，卻是絲毫不爽而且大公的。在賞罰未明以前事情能夠照舊進行的。林肯曾經說過，你能把一部份的人民哄騙得長久，但你不能哄騙全體的人民長久的。然而為了要促成一個戰爭，或者要利用一種經濟的形勢，為了一種重大的目的而來的哄騙，這樣作孽的勾當是十分厲害的。

在這一個形勢裏，自然發生了具有最高等哄騙能力的輿論機關了。

這個遲慢的上帝，現在證明了對於解決緊急而有生死攸關的經濟、政治之謎，完全是遲

鈍而且無用。然而這些謎。在二十世紀在展開的時候，正緊逼着我人要去把牠解決。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的軍縮會議同經濟會議失敗的經驗，證明了各國立法機關的外交政策是狹隘的自私，證明了整個世界在迅速的經濟崩潰的面前，完全不能成立任何全權的一致行動這些，把議會的民主主義的最後破產，完全暴露了出來。

世界上名義的統治者，他們有一終身的習慣，就是對着有成見和驕傲而莫名其妙的投票羣衆的演說，大都不大願意明白地說出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不能擺脫這樣的習慣，正使勢力認清現實和解決現實的問題加以破壞，他們對於不論那種有效的或是新穎的行動的動議，常常免不掉要畏縮。理由是：爲了他們的職務純粹是代表的。在他們背後可以隨意伸展的那班可憐的不負責任的選舉羣衆，便是代表們所供奉的上帝。這些羣衆的選舉人，容易被人煽動得驚恐起來，像瘋狂般的去反對新而急進的手段。他們極容易中了愛國主義者的宣傳，極容易受驚嚇和瘋狂般的去加入戰爭，同樣容易延緩了一切枝節問題，使外面對他們信仰的重要人物的攻擊，變得懷疑而無力。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輿論，不論他是傀儡的或是黨

派的，只顧挑動他們卑賤的感情，而不去訴之於他們的智慧或是良心。

選舉人或是羣衆不曾受過教育，而且也沒有良好的領導，這便是上層會議無力的基本解釋。倫敦的舉行世界經濟會議，便是上面所說兩個失敗會議中更爲重要的會議。軍備和軍縮，祇是象徵的和表面的，惟有經濟生活，才是根本的。我們的社會心理學家，對於這個倫敦的集議，曾經做過一千種的研究，中間的許多矛盾點，我們到現在仍是不大明白。參加會議的人，同我們現在任何人的頭腦完全一樣。坎比(Moreton Canby)對於會議中提出的種種條陳做過詳盡的分析，然而他們想起後面羣衆和輿論的囂張，想起這些人的衝動和憤怒是不可計數的，他們大家便驚駭而只是在那裏發癡。這害處比了凡爾賽和會做錯的事還要大。

倫敦會議，首先是遲緩的努力於修改凡爾賽和議缺點的會議，想對於貨幣和經濟的紊亂來做一些調劑，來補充一下威爾遜所補綴的歐洲政局。這樣貨幣和經濟的紊亂，使牠的眼光太狹，沒有預見，或者是過於軟弱，無法避免。有一些模糊觀念，像貝爾(Bale)的「貨幣的國際聯盟」，以及爲關稅而設立的理事會和全體大會，幽靈般徘徊在會議開幕的煙霧中。歷史

頗有意做一回不精確的重復，使這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會的主要角色，也是屬於民主黨的美國的總統，依該黨的習慣，每開口總是稱哲斐孫 (Jefferson)，正像共產黨員的每開口必稱馬克思和回教徒的對摩罕默德的崇拜一樣。這次的主要角色，就是羅斯福第二；但是他沒有威爾遜那樣的煊赫，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也沒有那樣的深刻，因為他在歐州舞台上站得沒有那樣的長久。但是當他被選為美國的總統和倫敦會議開會的前後幾月，世界上卻又有一種低聲的希望，認為一個真正的「人」已經起來，他會把一切看得明白簡單，對全人類明白地說着他自己的意見，以及把世界從可憐的煩慮同愚蠢中解放出來。世界在這些煩慮和愚蠢下已經受夠了痛苦，而且做了牠的奴隸。但是，他沒有做到的一件事，正是他沒有明白說過他自己的意見。

他因了威爾遜的失敗而學到了聰明，他沒有到倫敦他自己和他的談話更給人作了細密的研究。他比較願意在奈塔克特海口 (Nantucket Harbour)，在他的游艇安伯傑克第二 (Amberjack II) 中，經過了斷續的音信和多少有權的中間人，應付倫敦的搖動的危機，這

隻游艇在人類歷史中差不多和福特的和平船一樣。不論把牠的志願和失敗來說，都是相等的。

當經濟會議將要開幕的時候，各處的人，大都在探詢關於這個可能的新領袖的一切。「這是我們最後找到的救星？或者我們須得再另外找一個？」歐洲每一家的書店，都陳列出他新出版的著作看向前面（Looking Forward），俾人們大略曉得他們要應付的人是怎樣的一種心理。這本書那些極關切的人讀起來是十分失望的。這個人，明白的說，他是堅定、誠實、和靄可親，正像書前一張照片所表示的有着明瞭坦白的眼睛和大而堅決的面孔。但是書的內容，是政治家的內容，充滿了好意，又混合一些模糊的現代精神，並且缺乏智慧的理解。「他是好的，」他們說，「可是這樣就可以算得好了嗎？」

然而人們在心裏的希望仍是沒有斷絕，因爲他總較勝一籌；在別人是對這個用符咒驅除纏在人類經濟生活上的惡魔的工作，連答應都不肯的。這一個世界經濟會議，或者是羅斯福的會議，也許是沒有結果的。那本書雖然也令人失望，但是還有一些可供希望的重要理由。

大家說，總統有一個「托拉斯的頭腦。」他的同事的幹練，那是無可懷疑的像杜格威爾（Tugwell）摩萊（Moley）和狄更生（Dickinson）等教授，大都具有現代的頭腦。這些人以後的著作，在法律和政治的方法的改造中，生出了重要作用，成爲美國對現代國家的思想的特殊貢獻。據可靠的消息，這個「人類的最後希望，」和這些人十分親暱，對了他們大都是稱呼名字的，而稱他則爲州長。大家說他的謙恭和偉大，就在他能夠尊重他們有研究的和成熟的意見。有一些觀察者更爲樂觀，他們以爲他倘若聽了這些顧問的意見，到後來事情就不會弄得這樣糟的地步。但是，他總比那些歐洲的政治家以及要人們只聽大銀行家和大商人的話好得多了。

然而他確實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嗎？他能夠把握住他要解決的問題的二重性質嗎他像是明白爲減輕債務以及過度資本化的負担，所以主張有紙幣膨脹的必要；這顯然是他感覺到有長期擴張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的必要。他以爲這些是正確的，除非他在「公共的」和「公共扶助的」兩者間起了動搖。這一點，我們現在還不大明白。但是，他也感覺到這些手段

應當有世界範圍嗎他在這些方面的態度，有了一些改變，那是不曾爲人預料到的。這些的改變，是暫時性質，或者是掩飾他一貫的和堅決的目的的策略上的權宜？全世界正需要着羅斯福明白說出他自己的意見，正需要他簡單的指導思想時，羅斯福竟在那裏用他的策略了，這可以說是聰明的行爲嗎？他的治療，是極雜亂的，他像是聽他顧問的話；但並不是聽每個人的意見的，他也並不反對採用複本位制，像是想把各樣的藥都來試驗一下的樣子。

經濟會議在開幕的時候，就想極堅決地使本身成爲有光彩的一個重要會議。當時在各旅館內，家家都住得客滿，街上掛滿了慶祝的旗幟，招待的隆重，是很可以贊嘆的，甚至英國的天氣，竟也十分晴朗，英皇和首相麥唐納的開幕演說，現在讀起來也叫人驚異的。會議的宣言表示着對於人類事情的嚴重，有深刻的體驗。他們說了許多話，思意是倘若會議失敗，世界的災難，勢將加速的到來。他們堅持着世界合作，貨幣簡單和恢復工人工作。我們承認這些話都是實話，但是，這些有益的目的怎樣才能達到呢，那他們就連最小的暗示都沒有了。他們所做的姿勢，除非他們關於形勢中的重要元素，有了細微的瞭解，我們是不懂的。但是，他們立刻又

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有應付的決心而没有應付的能力的情形，這是我們現在所最不能明白的。倘使他們看到了形勢中的主要點，那麽他們確實没有把牠他貫串起來。他們不曾見到他們前面有了任何世界行動的路線。

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赫爾（Cobell Hull）他是一個又漂亮而又含糊的奇人。在歷史的卷帙上，他寫下了「我們該把自私心驅逐。倘若——上帝禁止！——有國家要來破壞這一個會議，以爲牠的局部事業可以因此獲利的，那麽，那個國家是值得被人類咒詛的。」嚴肅而又動聽的話。

法國國務總理達拉第（Daladier）的演說，一開始就有着範圍廣大和清醒的意見，他堅持着頭兩篇英文演說所忽視的地方，就是全世界須陸續進行的公共大工程，俾容納失業的人和恢復消費的力量。這是他認爲迫切的需要的。美國的代表，在第二個星期中就很快的同意了這個意見。但是，在會議中發揮的高明意見，不過到此爲止，以後便鬧着小問題了。這樣，會議顯然是維持不住極高的現實水平線了。每一個代表的後面，大都有着羣衆和輿論的壓力，

開始在他們的身上發生了影響。各國的代表，大家開始堅持着不應當爲大家的好處而就犧牲國家的利益，慢慢地又懷疑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大家的好處。世界經濟會議，不知不覺變成了世界經濟的衝突，正像國際聯盟，變做了外交的論價市場。在開頭幾次會議的一切美麗的前奏曲，完全凋零到沒有結果，因爲，正在人們的意識中誕生的三個條件，還需要有着無限的道德和教育的努力，而且爲了人心，還不願接受這些條件所指示的把一切政治利益完全集合在一起的主張，這樣，迫切需要的巨大的自我犧牲，非那些代表們所能承認，因爲他們大家都有着不可克服的心理的障礙。這便是要他們犧牲那些造成代表資格的情形。我們試想，被任命爲國家代表的人怎麼能夠贊成把各種國家利益合在一起？他們是完全準備着把世界的情形革命化，把正在增加的貧窮變做了希望，富足和安寧，但是必須要依照一種不可能的條件，就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自己，就是他們所看作重要的東西，也不要有了絲毫的變更。在經濟會議中的領導，思想固然正確，可是也有些混沌，個人或政黨的和國家的自私主義，力量太強，他們是無法克服的。

蘇俄的代表，對於世界之謎也不曾做了什麼抉發工作，這是一件十分可怪的事。好多的作家，還在說「布爾雪維克」的政制，就是我們現在的「現代世界國家」的先驅。但這裏並無直接的關係。我們曉得，「現代國家」的觀念，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完全從同一的社會律令和建設衝動產生出來的，但是，「現在國家」是獨立的更成熟和更健全的革命概念。我們就蘇維埃制度的主張國際主義和真實的社會主義來說，特別就他們專一指揮的組織—共產黨來說，統可以預料到我們現時制度的好多特點，尤其是共產黨的組織，是我們「現代國家同志會」的先驅。但是，理論和實行，在俄國是永久有着極大的懸隔，代表第一次偉大計畫試驗的發言人李維諾夫(Litvinoff)，他過分地注意於和西歐各國間的特殊爭論點了。比方像貿易的禁止，以及貸款的困難；而竟沒有利用機會向全世界呼籲。他於世界形勢中一些也不應用共產主義的領導原則。全世界最感覺到的需要的計畫，但他關於五年或十年的計畫一點也不提起。在這裏是明白需要集體的勞動，他甚至不去堅持世界社會主義的必然。這顯然他完全忘記了把世界當作一個整體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一樣。他想着用俄國來

和世界上的別國對抗，他好像是一個普通資本主義國家的愛國主義者。

至於其他國家的代表團體的要求，那更近視並且更庸碌些。因爲他們演說的時間有限，他們把關於人道主義的解辭節成一二句。說完以後，就要談他們的生意經了。祇有從愛爾蘭自由邦來的參議員康諾禮(Connolly)，他抗議着那些演說的人，說他們像馬一樣的，眼睛給蓋蓋蔽得不能旁視了。他主張研究各種可能的理論；即是非正式的理論，也得考慮。可是，他自己的演說，也不曾說出了重要的建設的觀感。他的心裏對英國禁絕愛爾蘭貨物的輸入過關切了，後來，還是說到那項問題就算了。……

玖比堅持着說現代世界國家的概念，對于到會的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所發表的思想系統中，都可以尋得到，然則這觀念在他們的口中說來不自然和無生氣。在美國的聲明書中，牠被包藏于個人主義的詞句及警告；在英國的聲辯書中，牠有帝國主義的前提；在俄國的聲辯書中，牠被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心理以及無情的狂妄語所弄得十分惡劣。第一個例是那班做生意的人，他們不願改變和不願放手；第二個例是那班帝國主義的官員；第三個

例是那班武斷的黨人。每一個關於普通原則上的聲明，大都有了愛國主義黨派觀念以及個人關係的糊塗感情攙雜在裏面。但是無論怎麼樣，有一個不可爭的事實，便是一九三三年在倫敦會議中「現代世界的國家」已經有了微弱的輪廓顯出。雖然牠的顯出還在未來，但是牠像幽靈樣的徬徨，差不多是個個人所能感覺到的。牠在成作人類政治生活中活現以前，還須經過那最壞的失敗時期的階級，還要有幾代的人受着痛苦的磨折，然而「現代世界的國家」纔可以遲遲地來到。

坎比說過，這幽靈因爲缺乏物質的材料，所以當時沒有具體化。世界上每一個大國，正在摸索着自己的道路，以求實現久遠進步的「世界國家」的主要原則，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達到了牠部份的或是一地的實現。坎比認羅斯福第二和他最後改進美國的雄心，是特別有興趣的。總統明白感覺到用膨脹來減輕債務的需要，但是他却不能阻過了已竟解放的精力在投機中化費，他忙於對付的那般人，都是受過耍撲克牌的教訓，充滿了謊騙的精神，「狡猾」已變成了他們固有的天性。但是他還請（有時用兇猛的威嚇）他們指示公開的贊助。

他不曾有現成的合式的行政官員來，監督着大的公家工程；他想立刻把美國的技術人材從，自私的金融活動者變成誠實坦白的公務員，自然有所可能的。因此，他企圖勸導牟利者去放棄利潤，叫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工業，組織在利他的基礎上面，否則他就用社會化來向他們威嚇。然而，他又缺少尊於經理的一個階級去執行。他和威爾遜同樣不曉得英國人或是歐洲人的心理，同樣只能相互誤解，不能與之成立諒解。他的樣子，却是挑戰式的，而且自以爲對的。在會議未完畢以前，他已經開始漫罵了。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個個人都指出美國和俄國間有一種對照的相似：兩方面都同是使國家建設得更科學而具有奮鬪，能力兩方面都感覺到把生產的效率和政治的監視互相調和是同樣困難的。技術人員和政治人員相互間還須同化。兩國的獨裁，都是在對投機者和牟利者作着戰爭。兩方面對世界的合作，大都只有微薄的希望，實際上他們全在集中精力於實現本國內的繁榮。但是，他們的生產率，和社會見解正是不同的，他們從相反的兩極端出發走向共同的目的。羅斯福從個人主義的民主的觀點出發史大林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觀點出發。至於英國的政統，和世界上的另外中間國家，在金融

崩坏的混亂中還在努力求保守。總言之，這時候還未有人想出妥的辦法來，把世界上的意意加以綜合，變成了一種巨大的力量。

倫敦會議不曾達到凡爾賽和約簽字的那種熱鬧的最高峯。牠並沒有產生的結果。牠一開始就是最高峯，以後就接速的降落了。倘若凡爾賽所造成的是一個怪物，那麼倫敦會議是什麼也沒有產生，倫敦會議完全是一種有始無終。

當時的輿論有着不少的暗示，——見哈布萊特 (Habwright) 的 The Sense of Catastrophe in The nineteen thirties，這是歷史文件叢書的 173,192 種，上面載有不少的引語——認爲那時代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紀綱是完全衰落了，倘若隨意揀選一批人出來，對付在我們人類前將到的大破局，那麼比起舊世界的政治人物的這個集會，至少是同樣的適宜。因爲不論怎樣，這些人是大都嘗試過和證明過，他們沒有用是十分顯明了。然而英國的首相麥唐納，他就職業政治之精華，在會場上仍舊滔滔不絕地說着，並且瞪眼四顧，好像還希望從空虛中走出一件順利的事來爲之解圍，使他和他的同類得救，免受歷史所譏笑。在會議

初開幕的盛舉中，有一個時期，攝影家忙着攝下他每一個有研究的姿態，收音的人以收音機收吸他動聽的音調，以及他的豐富的複音；忙碌的記事人員們，大都殷勤地伺候他；他代表們也都裝出尊嚴的神態，（特別是美國人在公共會場上最會裝出這種的神態來）共同來捧他的場；於是這個有威儀的民治主義的最後的政治家，一定相信自己的指揮本領，是有着廣大的神通。他一定是那樣的感覺着，否則他不會留在那裏滔滔不絕口了。他由寒賤的地位爬到世界聞名的高位，完全靠了他的聲音和姿勢，倘若他不相信神通，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相信的了。他對人類一定也應該相信神通的。但是倘若這是他當時的心情，他對於以後幾個月的批評，實難受得住。那時，他一定會得有幾夜天睡不着，在那幾夜甚至他的私人的神通居然也失敗了。

世界經濟會議開會了大約一星期，便失掉了他的光輝。倫敦的城區最初充滿了希望，證券價格也上騰，但是不久又重新低落了。不等到經濟會議散會，世界的衰退又明顯了。在開始的時候，倫敦爲光明的希望所鼓起，好像小孩吹的氣球一樣，一到吹氣停止的時候，牠就收縮

而發出着「嗚——」的叫響，一陣失敗的哀訴。

正像哈布萊特所說的，一九三三年的七月，不論到什麼地方，聰明的男女們，大都談着兩件事情，就是關於集合的代表者和統治們。他們在說，「這般人不能替我們做了些什麼，他們做了比不做更不好。他們使災禍更爲嚴重。」第二，他們十分驚訝地發問：「爲什麼緣故，歷史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現在什麼都不來告訴我們？在民主的狀況下，政治家的失敗，實在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我們的大學，做什麼呢？關於這類事情，也有科學來解決的吧？未必就沒有知識可以研究的吧？歷史上終也有過教訓？未必他們對於毀滅我們的行程，沒有過的分析吧！」

那時侯的教授們，他們大家都正忙着在做歷史、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中的博士論文，所以大家聽不到他們的回答。

三十年代終了之前，全世界都曉得有一無可避免的世界範圍的社會巨災，現在正要降臨了。聰明人能做的聰明事情，莫過於坐在諾亞船（Noah's Ask）上，去拯救那尚可以救濟的一部分的文化，等洪水式的浩刧過後，人類好再行開始。有幾個預言家，這樣地說了好多年，

現在這個救濟的觀念，正像疫症一樣的傳播着。牠準備好的「現代國家」的運動，也就是我們現行制度所寄依的運動。然而，那時的悲觀，並不因對於恢復懷着希望而減少。據哈布萊特所引諭的，有一個作家，把人比做一隻養在家中的猴子，「牠在寒冷的時候，具有聰明和能力，把牠的草墊拉到火旁邊，但牠沒有說明和先見，能夠逃脫了大火的結果。」哈布萊特簡要地敍述着人們當感到災禍快來到時所做的經濟動作，很完全地證明了那個暗淡的圖畫的不錯。

在那十年中，各處的人完全相信議會的民治主義已竟到達了終了的時候。從凡爾賽和議之後國際事件的變動，一直到四十年代發生戰爭，在這時期間，大家在討論計劃和求實現有決斷的政府。現在，他們的努力又緊迫起來了，全世界完全充滿了改變政府及撤換官吏的瘋狂！

在開始的時期，這一個渴望，已經決定生生一些極不成熟的果實。一陣巧辯的「獨裁」在戰後的不久，從波蘭到西班牙而席捲全歐。這些冒險者，大都模做南美小共和國的叛黨領

袖一般的行動。現在讀到普通史的學生，不用去細究這類並不重要的瑣事，但是從此後，全世界就發生了指導的或者近乎指導的團體，做了我們現制度所寄托的現代國家同志會的先聲。

意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法西斯獨裁，比起別種代替議會方法的東西來較爲鞏固。牠的興起，並不關個人的僥倖，乃係一種有目標和有學理的組織。法西斯主義的智慧有限，是浪漫的國家主義，牠的方法，開始是用暴力和可怕的行爲，但牠硬主張牠的黨員當遵紀律和當爲公共服務。牠的出現，是對雜亂的勞動共產主義的一種對抗，牠雖然擁護着殘餘的專制及教會，但是對於爲公共利益而辦的教育和運用私有財產便進行得十分勇敢。平心而論。這種主義並非完全壞的。是一種壞的好東西！墨索里尼在歷史上已經留下了他的威風。

俄國從一九一七年以後，一種更澈底及更普遍的共產黨起來當權了。牠是列寧發明的；列寧爲了適應環境，繼續着改變了黨的組織和學說，直到他在一九二四年不幸去世了爲止。當他還活着的時候，俄國的試驗，好像要領導世界從麻木無用的議會政治，走到一個新社會

的樣子，這真有趣，我們倘若注意初期的布爾雪維克政府，牠有好多方面是表示着現代性的。

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爲共產主義創造了許多嚴重的困難，但列寧在環境的壓迫下，領導了布爾雪維克政府走到了那個現代性。馬克思是被二十一世紀中葉的心理學家就稱爲「被環境限制的天才」。「他總脫離不掉他生存時期的民治主義的感想。當現代民治主義誕生時，已經有了一種傾向，想把一切的特權階級驅除在眞實的民主主義以外，馬克思及他的門徒們既把民主主義當作神一樣的崇奉，更有他只限於無產階級的特別解釋，於是把這個傾向使得更強調和僵化。無產階級即係純粹的羣衆，牠神秘得是不可形容的。

但是眞正的俄國革命，在一開始時便受了實際的及中等階級的列寧所指導，列寧留心愛護他理想中的社會改造避去兩種危險：一方面要不因受羣衆惰性的影響而行動不靈，另一方面不要因羣衆的恐慌而被顛覆。他自稱「民治主義的」蘇維埃政府，就是蘇維埃的金字塔，是一種層級的制度，到上面來和政府人員見面的，不過是些經過步步高昇的機關所濾過的代表們，所以他們大都是純潔的。而且列寧對於教育及輿論，統制得十分周密，使那負有

國家主人名義的羣衆，思想趨於正軌。至於他發明的共產黨的作用，那是爲激勵和管理全部機器用的。

共產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相像，他們的普通概念，是從柏拉圖理想國的衞士）(Guardians）階級脫胎出來的。「近代國家」的觀念，也於這本書具有了萌芽。倘若有一個人可以被稱爲現代國家之父的，那無疑的就是柏拉圖了。共產黨黨員很像那些衞士。在一九〇〇年的時候，民主制度的批評者，正討論着創造一種宗教式的集團，主要是致力於政治和社會的服役，實行訓練自己，自己任命和有自我的紀律。英語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參看關於那些年的歷史文件中的(Fabian News)已經在辯論這類的計畫，但必須有了戰後歐洲形勢的危急和緊張，才能產生出多量的十分超然的拚命的工人和青年，大家聯合起來成爲一個永久的革命組織。

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形成「各部，」他的精神是政治的而不是技術的，這和我們現在的現代國家同志會所不同的地方。但二者也有相像點，就是他們都是堅持着一生都

要繼續的學習和訓練，在黨內實行着自由批評，凡願在這裏面服役的人（在適當的限制之下）一概可加入，那般較爲不負責任的人們，也有可以免去牠的特權和嚴厲的規律限制的權利。但是，首創了俄國共產黨的那些條例：使牠必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原來是十九世紀中急進主義的最後產物，在列寧時代，仍舊保存了許多感慨的老調兒。列寧死後，在史太林的統治下，牠更逐漸回到這些古調上去；因爲史太林雖然忠實，但他倒底是一個沒有偉見，而且是一個疑忌而驕倨的自尊者。

在俄國的共產制度上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民主平等的口頭語束縛着；正像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上面，有了愛國主義及宗教的口頭語束縛着一樣。總至美國的憲法，比起俄國的共產制度來也不及牠那樣頑強的倡導着民主的平等，及堅持下一級的人羣之說明。在俄國的統治者之中間，雖然很難說有一個真來自是由農民和工人中者（。在西歐及美國的公衆生活中，從那社會羣中出身的政客，比較反要多些。）他們却扮作普通人，他們吐痰、不修面、不打領結；他們對于資產階級的安樂，裝作漠然的樣子；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聽見了「階級鬥

爭」的名詞，每一個人表示着贊成。當共產黨的領袖們在相互爭吵的時候，向對方攻擊，都是稱之爲「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這是最兇的罵人話，雖然他們兩方罵得不差。不管那種向現代國家制度前進的運動應當完全除去這虛偽的遺產，還得要經過多年。

俄國進行着的是一種新的試驗，所不幸的，便是牠不能採納能幹的技術家，使組織者和教育家來參加牠的領導。這就是因爲牠裏面雖有對了舊制度社會的妒忌及憤恨的緣故。牠在現代化的企圖中，拒絕着社會中最近代的人的援救。因爲這些人受過獨特的教育，並且還曉得一般人所不曉得的事情，所以就不容易及無產者的地位一律。俄國和法國相同，政客專會說風流話，態度素來不坦白，他們雖不是在那當真破壞，但確實是在干涉和阻止一種新社會及新經濟制度的科學的進展。

史太林在五年計畫中經歷了種種的困難，他就曉得把技術人才附屬於政治人才的不對，一九三一年六月他的演說論新舊技術人才（歷史文件叢書Stalinism, XM. 327, 705）（極坦白的自承：在現代社會中「無黨的」科學家及有特異知識的人的可貴。不幸得很，俄

國的黨政人員，得到了俄國的特務機關(C. P. U.)的活動的援助，便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威的有與保護人。所以一九二八年第一五年計畫開始之後，俄國雖然爲極大的熱誠所鼓動而妄自誇大，但畢是走得十分的笨費力。一個政治家的獨裁，祇會宣傳而不去實行，極能使國外愛護牠的人灰心。當牠的計畫因缺少精確的物質的準備而錯誤的時候，牠却去控告拘禁或是槍殺那般工程師及可珍貴的技術人員。

蘇維埃共產制度還有一個壞結果，就是使俄國的進程，日益和西方創造的活動生出隔膜。他們沒有做成同盟者，但却變成敵對者了。社會崩潰的憂患；在大西洋諸國正當日見緊迫，把重造的文明，從災難的潮流中救出來的希望，正有望於每一個國家、種族、中聰明人的協力同心，在那時需要到革命的性質中有一種新的革命，可不是依照那階級鬥爭的陳舊公式的。暴動的革命．再也不需要了，因爲這個制度，現在已經自己毀滅了。勇敢建設的革命階段已經到來；凡在努力建設的地方，主張階級鬥爭的瘋人的出現，使人們互相的敵視，引起了分裂的破壞作用。在一九三五年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出路(The Way Out)中，曾經論過

這個衝突。——此文被收在用他名字重出版的論文集裏見歷史文件叢書的意見史(History of Opinion)。

創造精力的浪費是極多的，不但在俄國，全世界都是如此的。每一個文明社會中無數的青年男女，代表了人類活的希望，但他們却把寶貴光陰和精力浪費在激烈的爭論上，國家主義的流毒，在國外正使他們的反應更爲複雜。好多人竟完全反對進步，想把世界推回到想像中的過去的樸質時代。所以他們變成了三K黨、國家主義者、國家社會黨。青年的天然衝動，是傾向於做大事，做有效和嚴厲的行動；青年們的意思，原本是很好的，他們的精神完全一樣，可惜語言混亂，釀成了各種不同的結果。「現代國家」的觀念，他們在想像中有了很長的時間幷不清楚，大半是因爲俄國自己的矛盾太顯著，成了一種障礙。

俄國像是在領導，牠想在行爲中領導，可是牠却辜負了大家的希望。在這期間，議會民主主義的舊方法以及舊的國家主義外交，仍在西方世界的各地方活動，牠没有能力去阻止了社會的繼續崩潰，這就因是創造力量分散了的緣故。

二 傳統舊教育的蛻化

費伯爾(Fabler)在他趣味而有意思的歷史的分析(Historical Analyses 2103)一書中，討論在二〇一四年前一百年的戰爭，經濟衰敗、瘟疫、災荒、飢餓等，照那時已有的能力說，人類本早可避免這些不幸了，但因傳統的壓力太大，所以我們人類的殉難也就不可免。他說，沒有這些不幸者代人受苦難，人類心中的愚忠、妒忌、恐懼和迷信，一定不會除清。人的意志，也不會爲了建立「現代國家」而振奮着去努力，犧牲和服從紀律。

費伯爾更具體的批評一九三〇年後教育的衰微。向來大家把學校和學生人數的減少，認爲是真正的退步，把牠和一般生活標準的降低或是公共衛生的退步並列。但他提出了某種最好的理由來說明，舊說世界教育機關的荒廢並消滅，完全不是一種壞事，是社會恢復的必要的前提。

他認爲普通的學校需要再生和根本改革。在尚未這樣實行以前，把牠破壞也沒有什麼

不可他輕視和排斥着以十九世紀爲教育世紀的那種見解。他說，我們若因過去的學校和現代的學校以及畢業後的教育間有點形似，遂以爲是一樣的，那就錯了。這雖然同佔據了青年的時間，但是這些對青年所施的教育內容全不相同。我們的教育，是生活連續的革命的前進預備階級；不過二十一世紀以前的教育，純粹是保守的，嚴格而傳統的，所以牠的普遍的崩潰，是新世界建立所不可缺的先決條件。

教育兩字，除去研究和藝術的創造外。現在差不多包括了人生一切智慧的活動。這不是牠本來的意義，牠本來的意義是爲生活而準備的青年。那時候，甚且在非常的舉例中，三四歲以下和二十歲以上的人無所謂教育，在平常到十四歲就已竟完畢了教育。但我們並不像我們的祖宗，在任何年齡上畫一個界限，認爲教育停止的日子。大衆的輿論，大衆的商議和團體的決定，完全屬於我們的教育範圍。二十世紀初所認作教育的，是不把這些放進去的。

那些日子，大家所知道的，大都知道得十分偶然。在那時期中的新聞紙，大都是屬於私人所有，牠所告訴大衆的，只是些編輯或老闆所要說的；往年電影的傳播以及無線電廣播及其

他，凡在美國完全商業化了，用做了商品的廣告；在英國便爲有勢力的政治家所管理和指揮。書籍的出版，甚至科學著作的出版，主要目的是投機和競爭，世界上已經沒有了知識的中心。

我們看人類沒有什麽知識，也能過得很長久，這是頗可驚奇的。十七世紀前，沒有百科全書，就是書店裏百科全書也不存在；因爲所謂中國的百科全書，不過是一些文章的薈萃。在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有了商營的百科全書，但中間也沒有關於永久組織的紀載。那時的人們，對於知識的永久體系，也不感到什麽需要，這個系統的知識常被修正，一直到二十世紀快完的時候。在失敗時代的人看來，我們連鎖的研究、分類、討論、實證和輿論的組織，我們根本知識的體系，就是說，以巴塞洛納(Barcelona)爲中央城，各處均有分站，各省均有分局，有一千七百萬積極工作的人士，五百萬通信員和後備研究的人士，這在失敗時期的人看來，卻是龐大得叫人不可相信，雖然他們在大家都十分窮的時候，他們所維持的那些完全不生產的軍隊和軍事機關，實際上也和牠一樣的龐大。

我們現時還在擴大這根本的知識體系，也可以稱爲人類的頭腦，我們仍在使牠的細胞

增加，把牠的紀載擴大，使牠內部的交互影響，更是迅速有效。此外，還有在旁邊繁榮着的廣大的獨立出版事業。我們倘若把失敗時代的人類同現在的人類相比，那麽前者整個小說是沒有頭腦，集的體說，是沒有脊樑，只有幾個分散而聯絡得不大好的中心；牠是昏睡無知，牠還須從原料般的知識中，發展出有條理的知識來。

這不獨是普通知識粗野、偶然、錯誤、而壞得很，費伯爾的反對舊教育，就是認舊教育比這些還要壞。明白的說，知識完全在那時的教育以外，和形式的學校以外。教育需要給人們健全的共同信念，就是現代的國家觀念。但費伯爾所指出舊的教育，所謂「初級」學校，並不像供給知識的。就指導的觀念來說，牠們也沒有意思供給。費伯爾引了一九三〇年康恩茲(G. S. Counts) 博士所作美國收成之路(The American Road to Culture,)中一段極可注意的調查，說美國普通學校思想的貧乏，毫無疑問的已被證明。這個使思想貧乏的教育，是有意如此的。費伯爾說，倘若就供給人生的概括的知識來說，這個時期的教育的崩潰，毫不毀滅了何種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有價值的東西，根本就不被放在學校的課程當中。這些普通學校中所

教的歷史是一種含有毒素的愛國主義的夢囈。生物學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一種假正經和兒戲，比方像他們所稱的「兩性的事實」只是用花的解剖來教授。關於經濟的教程，則一些也沒有。十九世紀的「教育」不是開發文明，乃是反對開發文明。學生的父母，政府和宗教的團體，完全注意着教育是應當這樣的。他引了學校的課程表和公共的討論爲證，並且還供給了所用教科書的幾種樣本。

人們說，在經濟活動收縮的時期，科學研究也在衰落的，費伯爾認爲說這些話的人們是太誇大了。雖然是因私人捐助的消滅和節約研究者的人數大大的減少，雖然思想的國際的交換受干涉，和思想生長的速度也遲緩下來，但是，有條理的科學的進步，就是在社會崩壞的最壞階級，也不會絕對的中斷。研究事業，是表現一種頂好的適應性和不可滅性。牠初受財主獎勵，後被軍閥提倡，在俄國、西班牙、南美都避過難，還逃進飛機的棚子中，經過相當時間後，又復興起，到達牠現在稱雄世界上的地位。牠從沒有受過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的嬌養。在繁榮的第一時期，純粹研究的事業，僅足過糊口的生活，當牠可以賺錢時，像劉易士(Sinc air Lewis)

在馬丁・愛羅斯密士(Martin Arrowsmith)中所說的，牠就商業化而墮落了。當衰敗時間到來的時候，科學的寄生蟲便跑開了，可是純正的科學研究者，他們在微薄的待遇中過慣了的。把肚子束緊些，仍舊在各偏僻地方和他的職務相依爲命。

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五〇年間，真正破壞的東西，就是在十九世紀逐步發展的國民義務教育。這些教育除了教人家識字、說話和算術外，其餘只是背誦些傳統的老話．不過在方法上，過去曾經有過了一些的改良，關於嬰孩教育，也曾經有過一些進步（雖然在經濟恐慌的時期早已被犧牲了。）還有曾經出現過，幾個例外的學校但以上所說的，是那時候模範學校的性質，這類的學校，差不多世界上各國都在不斷地增加，一直到大戰爆發時爲止，識字的人和略能讀書的人也慢慢增加了。到了大戰以後，進步的速率，便逐步的低降到零度。除掉了俄國，他們的義務教育是在一九一七年後才開始。但是，真正衰退的，絕非知識或教育，乃是舊社會中約束人的傳統的訓練。

一般人曉得「宗教和科學的衝突」的歷史，主要的是十九世紀的歷史。我們在這裏不

再說基督教的信仰和紀律的結構，因爲在當初頗安定，到了十九世紀，由地質學和生物學啓示的結果，動搖了牠的價值，這結構也就削弱了。在一八五〇年前，歐洲和美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都深信不疑，宇宙是在西元前四〇〇四年創造的，他們的智慧，完全縮在那一個時間的小細胞的圈子裏。他們怕逃出來，他們有怕生地方的心理。讀者已經曉得亞當犯罪和耶穌替人贖罪的故事，從前是被牧師們當作歷史事實來教的，但是在心理解放的年頭，他們便把這些說成「象徵」的意義所經驗到的困難。基督教因了這個不可免的含糊而失去了他的信仰和權威。在爭論開始的時候，好像雷鳴一般，後來便變成了極小的聲音，並且還帶着譏諷。這些爭論的結果，在後幾代的人看起來，比較地更爲明顯，他們確定了神道的虛無，新舊互相抵消。

被人們所公認的基督教的世界觀，不論是天主教會規定的或是新教各派所規定的，大都帶有一種粗野而又極有效的道德律令。把地獄的恐懼來迫人行善，雖然在道理上講不通，但牠有錢，所以教育組織也就在牠的手中了。他們對實際的新見解的抵抗，比了他們辯論的

能力要有效得多。人們隸屬於教會，把小孩托給教會去教育，成了一種社會的習慣。那時沒有現成教師，也沒有別的學校，所以傳統的正統宗教，能夠阻礙了人發展出一種現代的倫理，使教會和對自己在時間空間的位置的新認識互相調和。但是，這些宗教他們舊日不可懷疑的權威也失掉不少了。

在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內，他們所得捐助的相對價值也慢慢減少了，他們又喪失了智慧和道德的尊嚴。但是，直到戰後經濟崩潰後，他們的物質基礎才算完全坍倒。有一個時期，這些大組織和普通人同樣受苦，最後，生產恢復時，他們並沒有恢復了他們的比例的重要。他們舊日的投資已經不見了。當社會收復了地產的所有權時，他們和別的地主一樣地遭難。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一個普通青年，再不能依賴着當教會的牧師來謀生了。因爲牧師所代表的是舊世界觀，便是一個野心的牧師，對了也是十分討厭牠。牧師們見到他們所得的捐助不斷地減少，他們不難換掉特有的服飾，立刻鑽進人羣中去消失了。有組織的基督教會，最後在歷史中便不見了，差不多同波斯征服了巴耳(Baal)後，拜偶象教的祭司不見了一樣的快。依

費伯爾看來，他們只能這樣地消滅了。

社會道德的普遍淪亡，也是這時期的特色。大家認爲這是因一方面基督教倫理的衰替，另一方面現代行爲的道德的智慧標準還沒有確立。費伯爾對這個意見十分勇敢地加以反駁，他承認西方文明的道德，大都是基督教機關所建立的，但否認維持道德的就是這些機關。他把西方文明的道德的消失，差不多全歸社會信任的破壞，我們已經說過，這是那時候經濟的安全和貨幣的價值兩者狂蕩的結果。人們不再對社會尊重，因爲他們感覺到他們受社會的欺騙和被社會所賣掉了。

三　社會沉澱物的分解和結晶

犯罪的團體和急進的政治團體

在這整個的時期內，人羣解體和重集的進行，是極能使社會哲學家加以注意的。普通人對於尊敬上帝、社會正義、以及他的教育和社會的服務，完全失去了信仰。他失掉了職業。他的

慾望，便得不到滿足，於是中心煩躁，一切都變成不可能的了。

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安寧，不是那時所有的。家庭組織和社會秩序都紊亂非凡，大家變得煩躁不安。十九世紀盛行的社會信仰和紀律，極快的退化了，社會的安全也極快的敗壞了。

人類歷史中已經發生過不少次的瘟疫，此外還有不安、混亂、人口的凝聚與遷徙等，所以自古以來，某一時代人類的安寧和滿足，這都是例外的。但在過去，一般人總以糧食斷絕，瘟疫、或蠻族侵入，破壞了社會的結構，才使人類幹起非法的活動來。至於這個新的社會的離散，性質截然不同。第一，這是社會機體內物質和能力的增加；第二，這是由於傳統的法律和政府的無用，因而使膨脹的行程走了錯路。

使社會離散的力量，在十八世紀我們已經能夠看清楚了。這力量在法國革命中以及後來社會和政治的紛擾中已經十分的顯著，但是，牠們只能在戰後才生長到支配其他統制的勢力的地位。

在十七世紀，那時人口稀少，大家能夠安居，所以鄉村維持秩序，只要一個里正就可以了。

地方官和法院中審問一個囚犯，不難對之熟識，而且還能夠明白他的地位和犯罪動機。但是，十八世紀的經濟發達，增加了城市的面積，並且還增加了城市間新修的公路的交通，而維持秩序的勢力，並不能比例增加，所以城市中的暴民和盜匪，都應運而生了。本方里正的力量，不足對付這些新的要求；地方官也同樣不夠了，於是一切罪案有增無已。

用野蠻的刑罰來對付罪犯感到失敗後，以及第一次法國革命種種過火的行動後，每一個歐洲的首都，大都有過暴民的騷亂，此外，還有無窮的超出社會制裁的別種表現，於是政府只有努力整頓自己以應付新環境了。現代化的警察的實力，在全世界都出現了，秩序和安全的新階級也開始了，這個階級，在大戰的前幾年便到達了最高度。那時的世界上，差不多十分安全，一個不帶武裝的人，能夠在大部分的歐洲、印度、中國、美國等處旅行，不會有什麼的危險發生。沒有人想有人對他用暴力來企圖作公開的刦掠。在英語國家和西歐社會的巡警服務時，甚至只帶一根警棍，不再帶別的什麼武器了。

在十九世紀的進步年代，那些使用暴力和流血所成立的許多的限制，完全爲世界大戰

所打破了。失業的數目正在加多；那些摩托車、電話、玻璃櫥窗、鄉間沒有鐵欄的別墅，以及誠實的社會習慣，大都在引誘他們去犯罪，所以犯罪的機會，也比較合法行爲的機會要多一些。現在，正當是世界衰敗的時候，「公共節約」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所以已有的教育、法律和警察的組織，完全談不到很快的擴張和現代化。法庭和警察署的規模、威望、也就逐漸減少了。在這緊張而麻煩的時期內，社會上不規則的行動，正在廣大的發展，需要牠們來解決的問題也正在增加。

非法活動的舞台，這樣佈置好了，犯人和他的敵人（警察）對抗以前，他們早已有了準備。他們脫離了地域的限制，不曉得有什麼束縛，他們經驗到精神的振作和活動範圍的。廣闊犯人的勢力一天一天在生長，法律卻反而被拘束在牠的傳統的覆罩下，不能和牠同時生長。

在這混亂期內的犯罪紀載，現在讀起來真叫人感到奇異。那時是一些怪可怕的事情，我們現在看起來，不過是一些怪異的和情節曲折的胡鬧而已。我們讀牠們的時候，像讀那中世紀的肉刑，或者是吃人肉的宴會，或者是戰爭的殘殺，或者是人類的犧牲故事一樣，抱了一種

驚異不信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在我們中間，祇有極少的人能夠真正明白，這些都是百五十年前活着的人所受的切膚之痛。

在世界大戰前，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歐洲比較富強的國家，他們的犯人本來是不多的，而且犯罪的事實不過像社會上現在須應付的極少的幾件不可忍耐的行爲一樣而已。犯罪的人，大都心理有欠缺或者是智力劣等的一類。他們多數人的犯罪，是屬於感情的和野蠻的行爲。那時候雖然有些竊盜和商業上詐欺的事情，但並不是嚴重的擾亂了社會的秩序。不過當舊制度的道德解體時，情形便不這樣了。聰明和勇敢，使自己覺得是和社會處在衝突的地位的人一天一天在增加，但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道理。他們說，這是社會對不起他們的緣故。他們感覺到愛國主義也欺騙了他們，除掉貧乏和戰爭而外，沒有給了他們別的什麼。他們從來不曾有過了公平的機會。他們在這時候覺悟了，要自己來照顧自己，讓社會也去照顧社會好了。他們就找着他們了老實伙伴的近鄰來欺侮。

倘若你的同伴在你急難的時候不來幫助，你儘可去向他攻擊。所以在人羣當中，要是不

被社會安插的分子密聚在一起，而且蒙受了羞辱，或者聰明人在失業和貧苦的生活中過不下去時，那麽，犯罪的小團體，就會繼續的生長着。

在一九〇〇年時，歐洲的社會，還是以家庭爲細胞單位，人各有他自己的家庭，大家安居樂業。在一九五〇年時，歐洲社會的個人，集合在犯罪的團體或密秘的會黨中，或同化在游民羣中，不管何種公認爲好品行的標準，對於他們一概失掉了作用。

我們倘若條舉社會的罪行，當把搶刼爲第一件大事業。過去，每個有效能的政府，大都只許自己有沒收他人財產的權利，每個聰明政府的行使這種權利，也是十分的謹慎。在過去，私有財產未受調節時，偷取可以攜帶的東西，和侵佔沒有人保護的財產的事情，是永遠存在的。英國社會秩序在最好的時候，便是在普遍繁榮的第一時期，犯罪單子上主要的項目是竊盜（我們把種種貪污和詐欺行爲完全包括在內）其他的罪名均無那樣的多。但是在普遍的繁榮中，倘若有了停滯的時候，那就出現更積極的搶刼方法，來補充普通的偷竊，路上竟有人公開地搶奪人家的錢袋和金錶了，夜裏走入人家住宅的盜賊也增加了。以後，便是帶有威嚇

性的路刼，或是明火執仗的搶刼。在一個普遍的信任的世界；不佩武裝或是不跟隨人，都可以戴有巨值的珠寶，或帶大宗的現金在各處行走，可是，那個信任的雰圍，十分迅速地冷下去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還有單人的或多人的搶刼事件，比方六十年代的嘉羅帖斯(Garrotte)，突然從後面跑來，搶來人家的錶和錢袋；他們會在被刼者的嘴上貼上一張膏藥，有時在倫敦和巴黎的郊外，也變成了不安全了；雖然爲時很暫。在美國，除了近大城市的某些中央區域外，其餘地方，竟無安全的時候。這類事情，在世界大戰後到處十分顯著地增加着。

但是，這種單人搶刼的事情有着十分明顯的短處，使牠自己會趨於消滅的。這類打刼的能夠興盛，必須一般人先有了一種實際安全的感覺，換一句話說，必須要有可以供打刼的人。這樣的打刼，使社會一時感到尖銳的痛苦，然而不是長久的病疾，路刼十分盛行的時候，大家就不敢再攜帶貴重的物品走路了。他們一面避走冷僻或黑暗的街道，一面就多人結伴同行，並且還攜帶了武器。路刼的流行病，過了最高點便也衰落了。

有犯罪習慣的人，他們立刻學習到結了團體努力開闢新的方向。倘若有被搶刦的資格

的人，他們十分小心並且保衛得十分周密的時候，偶然的犯罪者得到的發展的機會，便成爲計畫的犯罪了。在每一國家，犯罪的集團增多起來，牠們便開始定出自己內部的規律來；這規律是集團反抗法律者所必須遵守的。在歐洲強烈的關稅戰爭中，走私商是極賺錢的，人們在做走私時，大家都守着秘密的忠誠，和秘密世界的規則這規則，倘若應用得很嚴，那也很便利的。美國的酒禁，反而促成相仿的秘密團體的發展，造成必要的前提。牠們立刻同些較舊的政治、腐敗的組織和恐怖主義者組合爲一。二十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當世界經濟在繼續崩潰時，社會上一般的安全，美國要比較歐洲更易退步。但各處的崩潰是平行的過程，一會是這個國家，一會是那個國家，罪犯的勢力蔓延開來，對那沒落制度下法律的服從者，作一種新攻擊。

大規模路刼的事件，愈鬧愈兇了。歷史往往容易重複不過略有不同而已。十七和十八世紀。路上攔刼的大盜不見了，但乘汽車的土匪和洗刼火車的強盜便出來了。武裝的土匪，刧掠華貴的列車，這事最初在東歐和美國發生，以後便普遍於世界各地。這種事。必有十多人聯合

了起來才能進行，他們先得找好逃路，和銷售贓物的處所。有時，正當貴客充滿了鄉間的某別墅或某俱樂部時，竟然盜人能將電話線被切斷，大盜得以飽劫而逸。餐館賭場、以及有錢人常到的處所也常常被搶劫，且方法也日見高明。當地的銀行，還有銀行的支行，完全沒有安全的保障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之前，城市中的一個銀行的辦事處，是寬敞而又講究，有旋轉門、櫃台、低而有玻璃隔斷；可是十年以後，銀行的面容便改變了，寫字生被鋼欄所保護，並且還備着手槍，代辦和顧客在可以立即關起來的小窗口交易

兇惡的犯罪，把們範圍和性質的改變，足以影響社會的習尚。戴珠寶、掛金飾貴重的四和以及用其他來炫耀富貴的人慢慢減少了，大家衣服扣得很緊，後褲藏有武器，這習慣從美國傳到歐洲，女人的衣飾，慢慢地也變得在藝術上講究，實質上是不值錢的；各處的社會，大都不再像先前那樣炫耀房屋外面的窗子狹窄，而且裝好了鋼門鐵鎖，和鐵欄，這種屋子慢慢地代替了那種坦露在陽光下供人玩賞的式樣了。城市中商店櫥窗的陳列，也防備得更小心。

爲了要保護自己而不惹人注目，便影響到了汽車的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普通汽車

的臉面像一個兇惡的野獸一般，坐車的人同牠比起來也十分諧和的。在大戰以前，不論什麼車輛，要是看見道旁有一輛車壞了，或者有了他種的困難，一定會立刻停下來，設法加以幫助。可是後來時勢變了，人們都怕那是埋伏；他們平時輕易不肯停車，有時雖然看見有人受傷躺在路旁，但也只管不停地向前開行了。

這樣一來，旅行者便迅速地減少下去。我們要找這種統計，有着某種困難，但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八年間，在歐洲的公路或鐵路上游歷而尋樂者，減少了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減少，除了交通的不安全外，當然有其他原因；普遍的貧困，也是使人不能出門而留在家中的一種原因。然而重要的原因還是不安全。

因為公路不安全而行人漸少，於是許多公路都失修了。博物院和收藏家們認為極寶貴的舊有道路標識以及汽油唧筒等，在地面上是再也看不到了。

掠奪的進步，不過是犯罪進步之一。比牠更可嘆的，便是嚇詐的組織。這組織最初是反對個人，後來是反對社會中整個的階級當人們不顧困出去旅行而被搶劫的時候，強盜就會追

到他們的家裏來。這又是美國人發明的方法。他們的進取精神，真的領導了全世界，普通富人，他們慢慢地發覺到他們自己好像生活在驚嚇的網裏一樣。即使在繁榮時，美國的富人，他們的生活也免不了時受恐懼所侵襲。他們從未有過十分安全，他們的地位的保險品也從不曾完全安穩，嚇詐、綁票和恐怖黨，利用那時巡察的保護不周，板起了臉，漸漸地公開出來了。

對那沒有保護的私人，他們有一種特別殘酷的進攻方式，就是威嚇，和綁架兒童；比這方法和平而略好的是綁架人家所愛的動物。美國名長距離飛行家林白大佐的小孩曾被人綁去殺害，在這案子以前，不知道曾有了幾千小孩被偷去藏匿，待到取得酬金後再行交回。林白事件發生了，才引起人們對這日見增多的討厭事情加以注意。但是人們對此並未曾採取了有效的方法來制裁，在一九三〇年後不景氣的幾年中，無數的綁票和嚇詐等事件遍佈了全世界。他們有組織，很快很祕密地把男女架走，以苦刑來恐嚇而監禁。倘若被追捕得太緊，那他們就不見了，而且再也不能得到他們的一些消息了。暗殺的案子也逐漸增多，有人居然公開在「公民維護會」或「秩序維持會」的名義下來組織團體。要過安靜不願受騷擾生活的

人，他和他的家庭，爲了這些秘密團體的強迫，便不得不對他們貢獻，否則你就不用想安居。倘若他有某「保護者」讓他安居時，那麼，還有別的秘密團體，也會出來恐嚇；使他不得不和他們另立單獨的條件。

被這樣騷擾而出錢的不僅是富人，就是那些小工人和商人，也要拿出他們的薪金或賺得的錢之一部分來避免這無終止的迫害。這些人數無日不在增加。「麻煩」是一個美國的形容字。「你是不願有麻煩的，」嚇詐匪俏皮地對他主顧說。

新時代的人，生長在這秘密安協和自私屈服的世界中。普通人，在這種世界中，十分謹慎地挑選自己的出路。一個人倘若不是某一集會裏的人（或僕役，）他就簡直無法生活。這是太古的情況。這辦法在中國早已盛行了幾千年，這也是在西西利和在南意大利的情況。但在十九世紀末自由和信任的日子退化了，這是反映人們日常快樂的減縮。

綁票不限於叫人家拿金錢來取贖，世界上有一種生意，是永不能撲滅而在增加起來的那就是用實淫來引誘和偷盜青年人的東西。工人被綁了，工廠裏威嚇工人等情形，便變得更

大膽而無法律了。個人常因爭吵而訴諸武力，或復仇的罪在增加。在一個快樂和信任漸漸減少下去的時代，有血氣的人，在被壓迫的環境中，常常不怕悲劇來了結了他。他們用自己的力量來創造法律，他們開始搏鬥和殺人，但未必都受法律的追究。

剩下的富人，像那些金融的投機者，名政治領袖，神秘世界的一時的「大亨，」他們的身邊都僱了衛士以資保護。這些衛士，叫人回想到中世紀末葉意大利城市中僱用的保鏢，以及日本貴族所僱用的武士。這些人大都又重新做了美國富翁的私人衛士。經濟危機開始了不久，那班有錢的人就普遍地維持了一羣必要的僕役，他們保護主人的身體和家庭，並補警察的不逮。

這班衛士從這種職務漸漸變成恃強行兇，那是不可避免的。美國重要的私運酒販，就是作俑的犯人，但這種習氣，是由傳染而來的。侍從人自相吵鬧，在美國、德國和愛爾蘭出現最早。這些吵鬧，多半是街上的小毆鬭，或在跑馬場和各種集會中的衝突，或是關于政治的集會和游行問題上的附帶爭論。一九三八年後，一個政治家倘然不曉得他的周圍是他自己的人，或

是他自己的人已配置在會席中的要處，他就不敢在大衆面前講話。他一定會穿上一件保險馬甲，或者用他種方法來保護他身體上的危險部份。這種保險馬甲，我們在博物院中可以看到有數百件。

一九四〇年以前，「較重要的」男人、女人、或小孩，没有一個敢獨自一人而不帶保鏢出來走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婦女已經獲得很大的解放。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一個十多歲的美女孩背了一個包，可以獨自旅行北歐諸國或美國，平安無事。但到了不安全的時代，這些自由便完全不見了。婦女們倘然没有人護送，她們連在城市中都不敢走路。青年人、弱者、老實人的從前的普通自由，不到二〇一四年，恐怕不會有真正的恢復。正像當時小說所啓示的，直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婦女們對於人類生活的一種普遍的恐懼，就是怕單獨行走的習慣，還都殘留着。

一九四五年以後，又將出現一種新的不安的現象，大家常講到有幾家旅館不安全，那些使人失蹤和陌生人不宜去的地方（不僅是街道，而且是整個的區域和鄉村）都增加了不

少。這些染上了罪惡的地區，有些必須七八十年後才能恢復他們的名聲。危險的大旅館和裏面秘密的電梯、街巷、埋伏處和禍首的私室，還是我們著名小說家最喜描寫的處所。不會因爲事情已經過去便失掉了興味。

二十世紀警察的心理，曾被人做了不少的歷史研究。那時警察、教員或醫生的職務，大都沒有連繫的，這在我們現在看來已是必然的了。這種連繫，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創辦警察的人看來，一定當是一種狂瘋的行爲，他們把警察認作一種活動的障壁和標識，在看見毆鬪、偷竊或人家做着不體面的行爲時，警察能加以干涉，此外，我們就不應希望他能出什麽旁的主意了。他把那旁人「交給他」的人帶到看守所裏，他的上面有警官，這是屬於另一階級的，還有一羣犯罪學專家，在警察機關裏服務，他們極能處理那些非反法律的罪犯，那都是屬於普通地採用了迅速的交通，動力的機器，與能夠大量生產前一時期的罪惡。這種警察，直到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還能工作得很不差。除了賣淫極盛的區域外，他們也頗老實。牠有一世紀，把自由財產安全和社會秩序完全維持在極高的水準上，只是當那干預道德或政治的

事於到他的頭上來時，才證明了他是不能勝任的。

當一個較大的社會組織，「世界國家」開始遲笨而艱苦地奮鬭，以脫離傳統的形式的時候，我們又可以見到警察的任務，越過了警察的能力。倘若牠退讓了，有人便會問「爲什麼這種警察組織不能適應新的需要？爲什麼那時統治的人們，不能把牠改變成適應於新的要求？」回答的主要內容我們已經指出了，正當根本改造世界警察十分迫切需要的時候，國際間的仇視就先變劇烈了，各國的暗探，都十分進步起來，使不論那種國際都不能廣泛的處理這問題。其次，是恐怖的犧牲，生命在債權人手裏，這又是用佔有爲基礎的不論何種社會制度的必然結局。

利潤至上論的資本主義制度，對於牠所促成的失業和敵意。絕對不能約束牠滯留不前死守着牠的窖藏；牠反對膨脹和加稅；直到牠死亡的時候還在主張節約；牠連公共安寧所寄的學校都給裁掉了；牠一方面限制僱用工人，另一方面又限制救濟失業者；牠就是用警察也想節省。牠說，我們還沒有足夠維持現有警察實力的經費，怎麼能夠計畫新的警察呢？

這些警察的組織既是純粹為十九世紀的式樣，經費不足，設備不周，內部又四分五裂：他們屬於一國或一地方的當局所管理，規模既小方法又舊，情形十分腐敗；另一方面，牠所反對的那些破壞勢力，卻是社會發展的不規則的膨脹而形成的魔怪一樣的勢力。警察自然拚命對這種勢力作戰，何況那時，除了這一種衝突以外，還有別的種種衝突呢。

警察的腐敗雖然十分顯著，有些地方，簡直是在犯罪。不過大部分警察的意志像還極健全。可是我們要明白，這並不是全體，乃是大部分。警察組織的大部分，雖在解體的過程中還維持著秩序。他們仍繼續反對罪惡的傳統的戰爭，但是他們的方法，那就十分墮落了。還有那時期的刑律也一樣的墮落，而且也有着一樣的理由。警察和檢查官，大都感覺到對他們反對的勢力，比了他們占着優勢，他們竟是在和地位優越的人作戰。他們反對罪惡的戰爭，變成一種爭吵、這種戰爭，發展得毫不莊嚴，卻像流氓間集團的衝突。他們工作的範圍，是證人易受威嚇，地方上人的同情，有許多時候是在法律的反對者一方面：這便使他們在求取或是運用見證時人來不及選擇。有許多例子（見威爾更生的 Aubrey Wilkinson's The Natural Hstroy

of The Pelroce Frame-up, 11 9)，證明了警察有心在偽造見證，反對他們，認為有罪的罪犯，而且竟不躊躇地把人誣陷。威爾更生說二十世紀初，有幾十萬人，竟為「虛假的見證得着正當的定罪，」因為他們是不能用別種方法來定罪的。

威爾更生雖然曾替警察辯護，可是當他說到他們在緊急時墮落的另一方面時，這種辯護，就不攻自破了。我們大都曾經驚悸地讀過中世紀使行肉刑的記載那時有着一種特殊的刑具，像張開四肢的刑架，緊縻姆指的螺旋，以及夾棍等等粗暴刑具。我們現在可以不必懷疑，二十世紀的警察，和他們力所不敵的勢力作戰時，確實恢復過十分殘酷的肉刑，以處置他們指為社會的危險人物。這個故事，現在把牠來詳細的講，未免有些困難而且醜惡，但有充足的事實，顯示出來告訴我們，在那行為墮落的時候，對於被捕的人，不僅是偶然的處置粗野，而是對他不斷的虐待、壓迫、欺負、用慘酷的刑具來逼迫，以便得到他的口供而使之陷入犯罪中，這方法在當時是極流行的。

人類結社的種類極多，而且也極亂。有些是匪徒的組織，有些是目的在犯罪而成立的團

體，還有是維持安全秩序而組織的非法的保護團體，以及在國內的廣大組織，像現在捷克斯拉夫領土上的奧國諸省的國家主義的蘇克爾(Sokols)，愛爾蘭的共和團體，美國的三K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無數的秘密團體，奪取俄國政權的共產黨，奪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奪得德國的國社黨，他們都在愈益勇敢的規劃中，力求實現着大而革命的經濟及政治的目的，引起這些組織的經過，在實質上沒有完全的不同。這些組織，在機構上說，都是大致的秘密會社的團體他們的結成這種組織，有些是爲目前的特殊的嚇詐，有些是找尋較大的滿意，牠們的分別，就在這一點上而已。當整個的團體對於牠的使命大家有了明確認識時，在有些地方牠不難降落到祇是首領的或脅迫的統治。社會上這類大小的重新團結的所以產生，都是由於經濟及教育的制度不善適應和缺乏活氣的合作所致。因爲人們缺乏先見去保證制度的生長和連續，於是就有這些病態產生，表現愁苦和不滿在慢慢積累，需要一些更密切更有力量和更有結局的人類團結的方式。

文明的人類社會，當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開始時的分裂，是由于人們急切需要

在更積極的團結統一中生活。這在表面上看來是難解，但全是實在的。牠被自己新的凝聚力撕爲碎片，不到有一完全的、合意的、活潑的「世界邦國」組織暗暗長起來的時候，這個分裂的繼續，和社會的精力，已經重新集合，這是無可免的。這正像蛹裏的幼蟲，器官的所以崩裂，爲的是要形成新蟲的全體是一個道理的。

現代國家同志會的自身，倘使就其許多支部來說，最初也是屬於這一性質的，牠是各不同的技術家組織成的團體，他們以爲社會混亂如繼續擴大，大家的職業會消滅，生活中有價值的事情也會消失。他們用不可比擬的全世界相互合作的力量，組織了保護的和進攻的團體。他們的聯合，便成爲一個新的世界。

關於世界海上生活的腐敗，不如陸上的騷擾，傳播得快而完全。這是靠了海軍的威勢的緣故。上屆歐戰快終止的時候，因爲海軍不斷的兵變，把往昔猖獗的海盜的活動重又恢復了。就在那個時候，對於船隻的警衛，還有着相當的周密，一隻反抗的船，比起在城市中的黑暗街市來，要容易應付得多。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有一二隻郵船遭遇盜劫，截留在並非交通要

道的海港裏；但是行刼的人，他們沒有一回來得及把賊物帶走。一九三三年，中國的海軍瓦解了，那幾船的冒險家，藉無線電來告訴那分割了國家的幾個政府那裏表示願效馳驅。但這些散失的軍艦，在被日本收買、捕獲、擊沉以前，所幹的惡劇極少。

一九三九年，一隻坎拿大的郵船大西洋王號，在牠末一次的休假日航行時，被一武裝團體從海上刼去。他們想扣留船上的乘客勒贖，宣稱倘若有人把他們逼得太緊的時候，他們就把所有的乘客完全殺死。但是終於由美國海上及空軍的實力——雖然他們被欠了好多個月的餉，那時還算有點功效——聯合進攻，盜賊的心肝軟了下來，很懦怯地屈服了。

海盜不曾刼掠九千噸以上的大船過。海上秩序所以還能維持，是有特殊的條件的緣故。例如：當時發現還不算很遠的無綫電交通這種秩序。一直維持到四十年代造船業實際的停頓，及世界航業枉度地減縮以後。

新式的犯罪在空中發見，是在歐洲第三次衝突以後，但那時還不怎樣厲害。空中的領域，是人類活動很簡單並能統制的領域。有些時候，飛機竟是世界旅行中最平安以及最迅速的

交通工具。陸上旅行實際中止以後的幾年，看不見的飛機，仍舊在空中飛翔，飛過危險的城市和沒人行走的廣原，飛過鄉間別莊的廢址和放棄了耕種的平地，飛行的人，那時會回憶到舊日的紀律及想起新秩序的到來。

飛機比以前要少些了，正像船隻比以要前少些是同樣的；因爲一般人對於企業大都十分灰心，所以式樣的變化也極少。然而天上像海上一般，當本世紀中葉以前，實際還未被拖入一般的社會崩潰的漩渦。飛機場上飛機的修理和燃料的需求，使這漸漸減少的飛行家們團結起來。空中的暴行，就是在最壞的階段、倒是散漫和偶然的事。最後，是在空中以及空中航線上，新秩序的使者才重新露面。

四　大戰後戰爭方法的改變

戰爭的科學和實際，在這失敗期內，既沒有適當的指導和統制的力量，牠的發展，就依照牠自己的荒謬邏輯進行了。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正當爆發的時候，軍事科學是一種自大而又是落後的學問。我們已經說過，軍政部已經讓軍火工業把極大的武器放在人家的手中了，但是他們的心理，並不曾有了改變，以適應這一個規模。一切陸戰司令（極少是例外的）還是依照十九世紀戰爭的陳舊的傳統，十分拙笨地從事於戰爭。他們還是想到前方的進攻、包抄、衝破敵人的防線等等愚蠢行爲。我們已經極簡單地說過，這種戰法的收獲，實在是可怕的。海軍部方面，或許預先受了技師的警告，因此格外謹愼，把鉅價的艦隊多半藏在有強固防禦的海港中，只讓牠們冒險地出來戰一兩次，以避免戰爭的慘禍。又故意使牠不決定勝負，延長年月。潛艇、地雷、飛機、原始的「坦克車」減弱戰爭意志的有組織的宣傳毒氣的試用，以及進行戰爭時許多老司令的更換，這些多影響了陸上戰爭。但直到最後，一般的「士氣」崩潰了，職業的軍人，還固執着一種觀念，好像他們古來被人尊敬的職業，始終未發生過什麼根本的變化樣子。

這一切的情形，當凡爾賽和議後便不一樣了。有一種不穩的情緒，侵入了世界各國的軍政部及外交部。他們感覺到一些大變化，但並不因這種感覺的積累，而竟把事實不認爲重要，

曾經參戰過的青年軍官們的心裏，就要回憶到那些開始的進攻，毒氣的瀰漫，坦克車的動作，更不能遺忘那些有實際力量和非軍人心理的偶，然官佐任意的傲慢的評論。這等青年的軍官們，後來他們也衰老了，他們當權的時代就不變地重覆「我們須和時代並進。」

倘若前一代的人是十分的保守，那麼後一代的人便非常的維新了。各國的軍政部，他們都急着尋求新穎的發明，秘密的新東西，及暗中的系統的研究。偵探和情報者的秘密報告，被一般軍火商所注意，以刺激這一個發明慾望。

大家都認識了舊式戰爭，實在是一種「完了戰爭的戰爭，」換句話就是說，舊式戰爭就這樣的拉倒了，新的戰法須得極快的來代替牠。外交部向牠要求，他們新開戰爭不行，有國家就得有戰爭。傳統的國家，反對着外來人的組織，依恃在最後用武力去解決的默認。他們想像不出別種的情狀，因爲這就是想係他們自己的不再存在。這世紀的三十和四十年代．瀰漫着暗中的可惱的研究，以發現和擴充新式戰爭的方式。因爲不促成戰爭的他一條路，就是放棄了國家的主權，但人心在那時還完全沒有作這麼的準備。

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五〇年間，戰法上的改變，除十二世紀到十六世紀間的火藥的發明外，是人類從古代的野蠻的結羣交戰以後所發生的最大事情。自古以來，人類主要的衝突完全是「戰爭」—人們結了隊，或是步行或在馬上實行接仗，除匈奴人和蒙古人外，步兵是軍隊的傳統的骨幹，騎兵是輔助的；重砲是用在進攻以前的「預備」。賴美斯（Rameses），亞力山大（Alexander），凱撒（Caesar），拿破崙，他們大都是這樣作戰的。在戰爭的浪漫年代中，戰鬥的榮譽的勝利，大體是一樣的典型：首先用長槍、矛、大刀、刺刀、槌以及和這等類的武器，集中在一處，實行巨大的擲戰、猛擊、推進、衝撞、擲射、短兵相接和肉搏在一團，還有一陣大雨一般的箭或彈丸幫助作戰，這樣的戰爭延長了數小時。結局是一個暫止或是敗退，後來騎兵的追擊和屠殺。這個「公開的戰爭」和長期的圍城相間歇着，後者比較是不大激烈的程序。搏鬥的主人，一面抵抗着敵人，不清潔地蹲伏在挖好的洞穴中或是在城牆後面，以謀獲得暗襲或衝破圍攻的企圖，互施相的殺，一直到飢荒，瘟疫，困難耐而紀律紊亂，或是四周的人的激怒解圍。在戰爭中，非戰人員受了的極大和偶然的騷擾；有些奸淫、掠奪、糧食的搶劫，強迫勞動和偵探

搜索：這些多半是輕罪的加重。整個的破壞，像蒙古人破壞麥索玻達彌亞的灌溉，或英國威廉皇帝的搶刦諾申伯黎亞，在發生時，大都是一種政策而不是一種戰爭手段。倘若要像東羅馬和波斯間在小亞細亞戰爭所造成的那種毀滅，必須進行戰爭至幾十年之久，回教侵入時，最初因爲牠的宗教的宣傳使人不高興，而後來再加上差別的徵稅，引起了人們的惡感，羅馬、匈奴和蒙古人的遠征，又把一個時候的，並且一個地方的各種傳染病散播得極廣；但是，古代的戰爭對於人類命運的整個影響，不免被舊制度下的民族主義的史家誇張得過甚一些。戰爭比人口遷移的重要小得多。農民的生活沒有更改，繼續而勞動，像多數人在農業開始以後的生活相同，各種「決定的戰爭」都是腐儒幻想的高點，所謂偉大的「帝業，」是腐儒們當人們從農民生活長久摸索而走向上了軌道的生活方法時，一種用來眩惑人心鼓吹。

從拿破崙戰爭的時候起，士兵就開始變更人民日常生活的方式了，如徵兵制、繳付龐大的貨幣數量、賠款和捐稅等等破壞經濟組織，是向來所沒有的事情；反過來說，像工業勢力的伸張，新開事業和其他各種宣傳對於人類所引起的影響，走進了軍事領域和一般的生活，這

時士兵便不邀而自來了在我們祖宗的時候戰爭好像薄耕，後來深耕於地面以下的一層，像一個能把地下的泉水引導改變方位，並準備廣大的山崩的用久了的掘鑿器。

世界大戰時的將官們，大都像一些毫無經驗的門外漢，管理着他們能力所不能管理的大機器。從前的戰爭，是沿着「前線」和平方的，後來，突然越過了作戰的軍隊和在他們的頭頂上進行起來，誰都不能站在戰爭的外面。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已經有人說過，新式戰爭是屬於全部人類的戰爭。以前對非戰人員的寬待已經消滅。人們如斯說，有的竟想理解這話的內容。而這時寰球的丘八大人們（多半運佩有肩章、皮帶、飾扣、勳章、殘剩的武裝殘影，和屬於這一類的從前的漂亮紀念品。）正在勇猛地從事於發明新式戰爭的利器和法術。

「勇猛」永遠是傳統的軍事中的好名譽，這些人都是勇猛非常的。他們在這個時期中拚命走在發明之面，使機械工程和工程師，化學及化學家，戰地記者及報紙編輯，生物學、醫藥、甚至金融都被他們利用，使那古來的戰爭觀念，繼續下去。我們已經說過，學校是他們忠實的擁護者；並有軍事工業的幫助，並且也得到舊宗教、舊貴族和忠臣的贊許，雖然沒有那樣的熱

心。牠們的活動是愚蠢的表示，但是牠們的成績確乎令人恐怖，我們三代人類的愁憂都是牠們那無聊的性格的結果。這些都是眼前的事。

在這時期的軍事學書籍卷帙繁浩，其中說得最簡要的一本是富爾——美豈（Fuller Metseh）的二十世紀中的戰爭理想（The Ideas of the New Warfare in the Middle Twentieth Centseh 2001）。在這本書裏，作者提出三種問題：「戰爭是爲什麼？」「是怎樣戰爭法？」「怎樣才算是戰爭的確定的結局？」

他所具的是一個總回答。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明白新式戰爭之意義。每個「專家」都以假裝嚴肅的謙虛，來研究他自己一部份的學說，但是任憑許多部門自然地起來總合成一整體。但到一九三五年，綜合的士兵，似乎只能夠模糊地想到以下的意見：他認爲一些政府或強國已將世界分割了，這些強國是一六四二年威斯特伐里亞的條約所造成的。一切國家都在競爭着，牠們或是積極或是消極的互相仇視：積極的仇視時期就成了戰爭，及至恢復和準備的時期才是和平。戰爭是交戰國間的停止休戰。這停止是出於沒法調處的爭論或利益

的衝突，那時每個強國，都想使敵人投順自己。在二十世紀前，強迫人家來投順自己的事在政府方面以軍隊的多少當作了職業一樣。起初是一個國家開始向人家進攻，越過了國境，進攻敵人的首都。在數次行動和作戰後，首都給攻下了，或者侵入者給擊敗而退回到自己的國境內，那時候就多少要依着戰勝者的意志，來締結和平條約了。國界也依照那個意志而變更，殖民地開始渡讓，賠款也議定了，戰勝國擴張了勢力，戰敗國只好帖服。戰敗國的人民，感到十分的羞恥。直到十九世紀末，這個公式，一直被遵守着不變。

但是，世界大戰時，這個情形就不同了，不只「前線」在消滅，和不參戰的人一天一天的捲入漩渦，而且還要發生旁的事情。列強大都失掉牠們的本來面目。在這裏便發生了一個精細的問題，就是那一種政府才能負責強迫着戰敗者接受或屈服於戰勝者所提的條件。比方像俄國共產黨的新政府，能夠負擔專制政府的種種責任嗎？一切的德國人，都能夠負擔克虜伯和德皇凱撒的軍國主義時的責任嗎？是君士坦丁的傀儡教皇，還是安哥拉的紀瑪爾應當同意於土耳其瓦解的正當政府呢還有美國舒舒服服地加入了戰爭以後，可以對威爾遜總

統的解決，表示不負責任，好像他並非是一個全權代表，這還能算是一個大國的行動嗎？

關於戰爭的法則，更生了一些困難，倘若前線被廢除了，倘若可從天空去對沒有武裝的人民投擲炸彈，那麼，職業士兵的槍殺義勇軍和毀壞他們家庭的權利又怎樣了呢？這好比在一個足球場裏被看客侵了進去，把球拿來亂踢，將裁判員趕走，拒絕承認原來賽球的雙方比數。

軍事當局對於新時代的破壞，是不敢動手的。他認定這些問題並非向他提出的。戰爭永久是屬於兩方面的，以後也還是兩方面的。替牠們來下定義，那是政治家的事。他相信自己的強國，他把他的意志強加於別一強國之上，除用舊的進攻和向首都推進的方法外，還要用宣傳、封鎖、抄襲以及利用一切最新的化學和空中的機械等方法。應用化學和空中的機械，是破壞敵方的士氣和壓迫敵方政府投降的卑劣手段。最後，必須向敗退者的首都猛進而佔領，雖是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也要來幹這麼一次。就是敵人的政府雖未屈服，但未留下一個負責的承繼者時，他也不允許考慮一個在那種情形下應該怎樣辦的問題。這與他無關，戰爭常

會不定期的繼續下去。

他更不過問戰時的財政。他全不估計新式戰爭的耗費，和戰勝者目的達到後所搾得的物質利益，兩者的得失是否合算。這在他是太客氣了。大家不應要求他想到每件事情。他的事情是盡力於最好和最熟練的戰爭準備，不顧耗費的多少，來利用最新的發明。至於籌集軍費，以及怎樣利用以後的戰爭，（或者只是部分地利用他）這是屬於他的政府的事情。他的任務祇限於戰爭的本身者。

研究近代的進步，立刻就引起現在病態的進步的軍人心理，有了可怕的發現。有些軍人，他們一想到現代戰爭能給人的禍害，着實駭怕起來。這在他們的演說和書籍中都可看得出來。但他們仍繼續幹下去。這則固然因為他們有着傳統的鐵石心腸，不願意垂頭喪氣，但重要的原因，卻和已經失了信仰的基督教牧師和主教仍舊守着教會一樣。因為這是他們的唯一的職業。在凡爾賽大會後整整二十年，軍隊中整千整萬的聰明人和專家：航空士兵，機器師的士兵，化學和醫藥的士兵等等。人數比致力於解決當時更嚴重而緊急的金融難關的職員要

多得多，和有力得多。他們爲將來犧牲於他們手下的人們所默認稱許，以及不吝惜的捐助，正在耐心地，巧妙地，嫻熟地，定出可怕的新玩意兒來使人類驚奇和受罪。

這些專門家當中，竟無一人像是超出平庸的，那時正是平庸人——心理的和道德的——的時代。他們在我們已經說過認爲人所承認的限度以內。好像沒人能夠把新式戰爭定出完整的行程來。秘密工作中的人羣，不能得到外面的批評，他們的策畫，自然不但反對外國人，而且還自相排斥。大多數重要的人們，僅是善於升官發財，而不是善用腦力的專家。結果，他們許多的計畫，有了一種互相阻撓的性質。

有一羣這類專家，在英國正忙於準備機械戰爭，在大戰中英國人最先發明了坦克車以後又是他們幹出許多的壞事來。他們是一種固執的民族，所以軍事當局的採用坦克車極晚，可是採用了以後，便不肯再捨棄牠了。當各方面都深刻地感到節約的影響，愈來愈刻薄的時候，他們的軍政部，就在這部門中一點不吝惜的花費在這機械上面。這是一切事情中最不感据指的。這些軍事的「發明家，」生產了各種不同的好玩的陸上鐵甲車，從機關槍車一直到

極大的移動砲車都是與特旭脫（Aldershot）博物院戰爭廢物廊下所陳列的古怪東西。這些和非歇海軍提督石油無畏艦是交相媲美的。

英國人在下次大戰的夢裏，好像鋼鐵製造業勝利地普及了歐洲。由於某種的魔術，（這是什麼魔術，想出來未免太麻煩）這些坦克車，能夠逃脫了兇惡的毒氣，和地雷、砲火。那時竟還會有準備在水下走的「坦克車」，有些坦克車竟能在水中浮起來。漢生（Hansen）曾宣稱（見 The Last War Pr parations, XXIV, 1976）他已經找得能夠在天上飛和地下走的坦克車的計畫。這許多圖樣從不曾製造過，牠不過是使人看見，這些戰爭博物院中所沒有的陳列而有些發笑而已。

英法兩國的專家，以及後來德國的專家們也辛苦地在研究戰鬭機中間以英德兩國人的成功最大，同時能從極遠的空中放射的炸雷，也好像被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完成了。法國人的心靈，雖然有着他固有的才智，但是，他們爲保守的傾向所障礙，不願拆毀舊的工廠來改建新的。想出化學兵器最多的是德國、英國和俄國的專家。德國的被解除武裝，自然逼迫牠的軍

市當局集中於研究試驗和準備一種不被國外所曉得的武器。至於俄國人做相似的研究，是因牠在工業上比較落後。在大戰中德國人是最初使用毒氣的，他們在極長的時間裏，都以毒氣爲戰爭先驅。但在大戰後，美國對這種武器十分注意，受了化學工業的影響，生物學的戰爭，就是傳染病症的散佈，也被廣泛地研究過。美國和中歐的人在這件事中居於領導的地位。

在一九四〇年，中國戰爭的前後各年，分佈各種病菌，已經不獨是理論的可能。那時已經有一種像自來水筆形的小藏蓄器的製造。只須把這藏蓄器的蓋取下，便有可溶的東西暴露出來，以後便把牠投入蓄水池或是流水中。此外，還有玻璃彈可以從飛機、以及火車的窗戶等處擲出，落在水中就會裂開來。在奧特旭脫的博物院裏面，這些東西都有樣本存着。一九三二年以後，依地方爲單位，把醫師們和受訓練的助手招募在一起，而爲之組織起來，這是對受了驚嚇的人打預防針。這事情在那時是很努力地進行着。

但是，關於病菌的使用却有一種躊躇：就是把牠分佈不難，把牠的作用的領域。加以限制那就不容易了。倘若在戰爭的時候，還是要捕獲俘虜（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和佔領城市及土

地，那麼散佈得十分有效力的瘟疫，可以回到了散佈牠者自己的身上。微生物的戰爭，在研究的專家看來；也是一種極不可靠的方法，除非在失敗的時候，想英勇地復仇的人民才來把牠使用。然而，大家以爲，最好還是把牠研究出來。除了日本人在一九三六年努力鎮壓華北的甘肅和陝西時，惡毒地放用傷風細菌，「以便不致進行極端手段」外，官方從不曾允許過。牠的使用，歷史學院的研究告訴我們，負責的列強、被發覺有意使用牠的例子，有的是出於部下的熱心，但未經長官們允許；有的是出於狂熱的宗教信徒的活動，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昏亂時期這些信徒們頗多。至於使用傳染黃熱病的蚊蟲，在一九五〇年促使印度半島的人口大爲減少，他的原因還不曾有人解釋過，一般人只以爲這是偶然的。

所謂「毒氣戰爭」，從牠的方法和發明說來，和微生物戰爭是十分相像的。牠的開始和完結，在人類智慧和意志的歷史中，已經是告了一個階段。牠確是奇怪之極的一個階段，牠使那時的衣飾和城市的建築上都發生了影響。牠的可怕，可以和法律上的酷刑或殺人祭神的故事並列，然而較之更爲顯著的不人道，因爲牠距離我們的時代更近的緣故。牠同那些較舊

的例子，一樣使我們感到人類需要有健全的常識，這觀念把他們的活動連結起來了。牠明白告訴我們，幾千個清醒的人，在一個對於愛國的義務和榮譽的觀念的錯誤見解的雰圍中，能夠合作而產生一種奇離無效而又殘忍的結果。

整個說來，從事於微生物戰爭的人民，是非常莊嚴勤奮而又小心的。倘若他們把個人的資格來重游世界，我們會看到他們都是體面而又和氣的聰明人。但是，聯合起來，他們便是一羣危險的瘋子了。有人估計着，他們的同胞被他們弄得可怕的死亡，和過着苦痛生活的約有一百萬人。

準備毒氣戰爭用的致死物質，現在的人是不曉得的；因爲並不製造的緣故。偶或有時候製造出來，但爲研究生理學所用，而且還在適當的管理之下，所以不被大家所曉得。至於分佈用的那些舊器械，現在是用作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和衛生的工作了。像用來對付蝗蟲；在森林區域噴灑藥液，以消除各種植物病症；定期的清洗和刺激我們的穀物生長，這都是失敗時代的辦法，但後來便合理化了。

費伯爾是一位加爾文派的樂觀主義者，他的學說，在世界中誰是最瘋癲的。他認這些大規模的奇才，是由於戰爭時期突飛猛進的發明能力所「刺激」而來的。以後牠又指出，倘若沒有戰爭的因素，許多年來飛機一定不會被人用得這麼普遍。我們敢信他，他說得太過火了一些，他覺是蘭姆(Charles Lamb)的「焚屋子發明燒猪肉」的故事的現代化，牠有一些拉斯普丁主義(Rasputinism)的氣味，就是古代邪說的復活，說人在得救以前當盡量的犯罪。

二〇三三年和二〇三五年除鼠運動，完全是照了毒氣戰爭進行的方法進行的，這運動把中世紀恐怖的鼠疫，從世界上最後肅清了。在二〇六〇年，有幾處地方允許了散佈「歡樂氣」。用吉祥氣來沖散下降的慧星所放出的毒氣，在二〇八〇年，也要在讀者前發生。在會議室、工廠、游戲場及其他要求特殊明朗，和活動的地方的養氣注入，以及在喜瑪拉耶山休息谷的泰戈爾(Pandanath Tagore)的藕氣的使用，費伯爾也認為是毒氣戰爭的遺產的一部分。

為戰爭而製造的有惡味的物質，現時有一兩種在我們工廠中利用着，並且還受有特殊

的保護。當中有幾種物質，製出來是犯重罪的。這幾種有惡味的物質牠的成份十分複雜，在發明的時候，每一種都經化學的探索過了。當中極少的是氣體，大都是輕浮的液體，有些還是極細的固體。這都是灑在敵人所佔的地位上的。關於這個問題，賈特魯衍復克（Dr. Gertrudu Worker）博士有過一篇論文，是應徵一九三一年萬國議會聯合的徵文。把那時對既有的知識狀況，作了一個概括的論述。她和許多同事合著了一本新戰爭的性質將怎樣？（What Wor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歷史文件 937,205）的書，使我們對當時軍事專家心裏所想的能夠構成了一種概念。這書中有一張單子，列舉了真在製造的毒氣的質料，除了一個重要的例外之外，所有主要的種類都有了。這個調查，到一九三八年爲止，那時候已經考查過的全部領域，後來雖然有些改進，但是，沒有重要的發明。

在一九四○年以後，軍事的研究，也因財政的竭蹶而受到了限制。在一九六○年，爲毒氣戰爭能生產充足原料的工廠，竟能夠開工的沒有幾個了。

在世界大戰中真正試過的毒氣，主要的是綠氣，還有各種綠氣的化合物、綠養化炭、綠十

字氣（Chloropicrin）和其他。這些侵襲肺部損壞肺膶的綠氣，德國人早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伊怕勒斯（Ypres）一役中使用過，殺死了有六千人。後來德人立刻禁止再用牠了，因爲牠是這樣刺激人，人家能夠立刻發現牠的緣故，並且人家能採用預防的手段。屬於這一類的其他毒氣，其作用便不是這樣明顯。受了這些毒氣侵襲的人，立即咳嗽，以後在氣管枝和齒槽被破壞的時候，嘔和呼吸窒塞，並且咳出血及肉膶來。中毒的人由吐痰而喪命，面帶藍色，嘴唇青腫，嘴角還有血污的泡沫。倘若僥倖不死，肺的受傷也很厲害，極易得肺結核或類似的病症。這一組的毒氣，都有牠們各自的特殊的徵象。比方有一種會進攻神經系，引起了瘋狂的興奮，喊叫、恐怖、顫抖、和半身不遂。在世界大戰中有過數千萬人死在綠十字氣，有些專家，還有計畫地要同樣用這毒辣的方法去屠殺全體居民。一九四〇年五月，波蘭的轟炸柏林，也用過綠十字氣，但使用得不很充足。在從德國放到華沙去的空中魚雷，力量倒是用得夠充足的。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南京和中國人對大阪進襲報復時也都用過牠。

黃十字氣，或芥子氣的殺人是更要陰險和殘忍得多了牠實在不是一種氣體，是一種輕

液的液體。當牠冷却的時候，牠能夠在地上鋪成薄膜而不為人所覺，於是黏到靴子和衣服上，帶到了各處，直到牠慢慢地蒸發起來，人們就覺得有牠了。那時人就感覺到不舒服，發生可怕的是心悸駭怕，以後就是咳嗽和嘔吐。牠使人感到一種絕望的痛苦。牠慢慢地殺死同牠接觸的所有有機的物質；牠使受到牠毒的東西燃燒起泡，和腐爛。空氣中有五百萬分之一的芥子氣就足以影響肺部，牠進入皮膚，使眼睛發炎；肌肉變成腐爛的肉胭。牠成了身體中的一種慢性病症，使身體中每一功能都變成衰弱，並妨礙呼吸。受到牠的影響的人，能不能完全醫好，還是一個問題。牠最高的效能是使人感到受刑一般的苦痛和立即死亡，牠至少能使延長痛苦和縮促生命。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華北戰爭和中國由空中侵入日本所用的毒氣多屬這一種。一九四六年柏林的徵兵，也是因為受到敵人要使用黃十字彈的威脅。

實際上這些彈，也曾屢次投擲過，但或出於偶然的失措，或出於波蘭人任用的化學家的不服從，以致沒有發生破壞的效力。從表面上看來，這是和平主義的怠工，幫助了中歐戰爭形式的完結。這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有五個化學工人被槍斃了，可是他們的審訊紀錄，不曾留

下來。

復克博士又舉出一種藍十字毒氣，是和綠十字黃十字兩類毒氣相聯合而不相衝突的。這些東西，主要的作用，是直接刺激神經，它的形式，差不多像觸不到的灰塵。牠們能夠侵入人家戴在面上的毒氣罩，使人猛烈的打嚏和惡心，失去了自制力，因此會自己除掉面罩，把自己暴露於綠的或黃的毒氣的侵襲中。牠們常是連着藍十字氣同來的。

這些毒氣在世界大戰中已經試過鋒芒，大戰完結後，大家仍是加緊地祕密製造。過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時間，這些毒氣的主要能力才被發現出來。有一種元質，在當時曾經引起過極大的討論，就是叫做路易士原質(Lewisite)，係芝加哥的路易士(Lewis)教授發現的，牠出來得太晚了，不曾趕上在一九一八年前使用。這是砒化合物的一種，在一千萬分空氣中占了一分，就足以使人失去行動的力量。牠是無嗅無味的，但當牠在你身上起了作用的時候，你才曉得中了牠的毒。牠的起泡，和芥子氣一樣，而且也產生一種劇烈的病症。

緊接着這個發明而來的，其他戰爭的毒氣，比牠還要厲害：有溫和而立刻殺人的毒氣，有

殘忍而緩慢地神經腐壞的毒汽，有些能夠使人的肌肉縮成一團，比那可怕的瘟病還要劇烈百倍。在這許多研究中，有一段試驗殺死一羣羊的可怕的描寫：「一切羊都在毒氣的威力下，屈服除掉其中的三隻外，牠們都向圍牆衝上，弄得腦漿迸裂。」爲了使這些化學物品發生更大威力而貢獻復克爾士所稱「成羣屠殺」的任務，於是關於燃燒的物質和高等炸藥，便有了一種旁系的研究，藉以能夠毀滅和燃燒那些躲避毒氣進攻的地方，這些地方，便是嚇壞的羣衆會逃去的處所。

復克爾士的概括的敍述，並未包括柯雷脫(Korett)在一九三四年所發明「永死」的毒氣(Permanent Death Gas)牠的成分，守着秘密的，牠的極複雜的配製，是一重大的犯罪。這一種化合物，雖不絕對永久，但是分解得異常緩慢。牠自身既不是氣體；也不是毒質，是一種重而粗的粉。牠的揮發像樟腦一般，當牠揮發的時候，便和養氣化合而成一種毒氣，倘若稀薄在五千萬倍的空氣量中，牠仍舊是有效力的。牠的作用，主要是屬於路易士原質的一類，這第一次是在波德戰爭中用的，爲了要切斷德國和東普魯士的聯合，波蘭軍隊沿着全部的前

線撤退一哩至三哩寬的地帶，滿溉着「永死」的毒氣，東普魯士和德國的交通就此斷絶，使牠成了一個半島，只能從立陶宛或海路達到。雖然這種毒氣的顆粒極重，但最後大風還是把這死的地帶擴展爲十五哩寬，把死的影響擴展到但澤的郊外。

這死的區域，除了幾個有特殊毒氣罩的探險家外，以後不再有人敢進去，直到一九六〇年，那時候大家看見在那裏地上攤着的，並不是迷路進去的人和牲畜的屍身，而是幾百萬鳥鼠以及這類小動物的骨骼皮毛。有幾個地方竟堆積得近一米突的高。戰爭畫片中關於這些奇異的堆積物有兩張畫面：蘿蔔不曾完全毀滅，樹木已經死掉，樹皮也脫落了，有些草也枯槁了；但另外有一些草仍能極茂盛地生長，鋸筍和發育不全的莠草，以及灰色細毛的土木香，像地氈樣鋪在大塊地皮上。

「永死」的毒氣，牠的奇異的副產品，是現在的人所曉得的斷絶生殖的毒氣。這毒氣在最初製造出來純粹是偶然的。一個中國的復仇協會，當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用綠十字氣侵略入南京後，同年組織了一個侵入大阪和東京的空中的進攻。目的是想威脅日本人心。他們是

準備用「永死」的毒粉的但是因爲配製很匆忙而疏忽，中國人没有把牠試驗出來。在這裏，或由於偶然或由於設計，把事情弄錯了，好像起初是化學公式弄錯了，因此當空襲完結以後，除了暫時的瘧疾伴着作嘔和吐瀉外，無別的効果。

這些可憐的飛行家，日本對之不勝其嘲笑。但在幾個月後，根據東京和大阪兩城市醫生的報告，曉得這兩個城市中不再有受孕的女人，甚至幾星期來，小貓小狗也没有發現過，母馬不生小駒，母牛不生小犢，大小鼠類都絕跡了。只是鳥類没有受到影響，麻雀增殖得極繁，母鷄在這些没有兒童的城市得意地咯咯地亂叫，這理由後來是赫胥黎（Crayford-Huxley）弄明白的。

中國的化學家，從錯誤中發現了那稀有的稱爲拍不斯特(Pabst's)的金安琴斯(Kin-etogins)的氣體，牠能夠影響生殖的機能。現在生物學家都曉得了這類氣體（主要是由拍不斯特及其助手的工作才曉得的，）在試驗園中發現許多奇異的花和新奇的變相的獸，那都是因爲使用牠的結果。但在拍不斯特不曾用那獨到的眼光去研究這個問題時，人們只曉

得牠是斷種的毒氣在廿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凡能隔離人進入的地方，都大規模使用過這種毒氣，以肅清傳染的齧鼠，而不久也許牠就要在優生學中作重要的應用了。

但在日本，覺得這種毒氣比殺死了許多人，更爲使全世界震驚。日本的軍閥和歐洲的統治者是同一感情的，而且同樣堅主平民不僅應爲國家効死，還應爲國家生育，供作戰爭的新砲灰。他們的愛國者在沒有曉得中國這種材料的供量是有限的以前，都戰戰兢兢地活着。他們看到人民快斷種了，看到勝利的時候，就是絕種的時候。在戰爭進行得十分劇烈的那些年，世上很有人主張大規模來應用這種新發現那些提議，紀錄在歷史文件五七五二八九〇頁中，主張從空中應用牠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愛爾蘭、中國的全部以及非洲的一部或全部。但是，這是因爲斷種毒氣的製出純粹是偶然的，牠是被偷偷地配合成的，後來配合的人找不到適當的公式，所以人類幸而免此浩刼。等到再發現牠的時候，我們這瘋狂的世界，是已經在空中獨裁的嚴厲的人類的掌握中了。

一切可惡的新式器械，應當怎樣集合起來運用，俾達到使交戰國絕對服從的目的，在那

時的人也許從不曾想到，也許在想到的時候，這計劃是怎樣嚴守着祕密的，現在同計畫的創作者一同死亡了。但是，數百萬人已經窒息了，城市中已經充滿了臭腐的死屍了，以後又怎樣呢？

人們也許對這件事情的興趣太濃厚了，不及作這大的考慮。現在我們對這毒氣戰爭能夠弄清的，也不過和牠的專家所想的一樣，就是認牠是一種單純的作惡和苦刑的計畫而已。這些計畫，像是無目的的隨意破壞，好像在駱安多莫比(Loando-Modi)的人猿雜種中間某一些小人猿所表現的事情一樣。

這些計畫中，有些是嫻熟得可驚的，但是嫻熟到怎樣，要是有人問「為了什麼？」—那就不知怎樣作答了。比方在托斯羅拉岡(Torrelier-Lagoon)的海軍戰爭博物院那裏，有為四個強國製造的半打攻掠潛艇，都是特別設計得作為長距離的毒氣戰爭的根據地的。牠們不攜帶槍砲和平常的戰鬭用具。但牠們有無限的巡洋射程，牠們備有五架到九架的飛機，滿裝着可怕的毒氣彈。中有一個，帶着三十個長射程的空中炸雷，以及一切必須的指導方向的器械。

毒氣彈中有四種毒氣的混合物，但就性質和效率上說來分別不大。這些進攻機中最小的牠；所攜的這種材料，也足夠用之於八百方哩的領土上。倘若牠完全成功的時候，能夠使倫敦和紐約、有啞門、奔跑、戰顫和窒息而變成滿城市怪樣子的死屍。這些船隻，可從日本東京，可從杜伯林侵襲倫敦，他們消滅了世界上安全的最後的角落。

這半打開出大禍來的怪物，現在並肩地陳列在大博物院中，牠們垂下了毒翼，已經放棄了牠們的使命。在失敗的時代中，有不少叫人頭腦痛苦的仇恨和惡作劇的夢魔牠們便是這些夢魔中惟一不變的見證。牠們是人造的——正像人在黑暗時期造過用刑的工具一樣。我們現在過着快樂的和相互信任的生活，倘若環境不同，和我們在技術上同樣清醒的人，我們頂好也應當，能設計和造出這些東西來。

這樣的詳細敘述，有些處所是要叫人生出惡感的。我們為了我們的目的，已經說得很夠了。歷史不應該做成可怕的筵席。毒氣戰爭從開始到完結，毀滅了應該享有快樂和勤勞的人約有百萬到百二十六萬左右。這惡劇已經做得夠多了。他們的受苦，已經過去了，我們的故事

中心，意思是在說世界大戰的愚妄，叫一班軍人感覺羞辱，並叫他們加緊地研究以後，戰爭的科學，與其說是進步，毋寧說是把自己喪失在自己的新發明裏。牠不斷地發明出可怕的怪物般的機器，把人類陷入驚悸和痛苦，傳播病疫和仇恨，破壞工業生活，使整個的地方，變得不能居住；使團結的人，在有秩序的社會中每一連結完全鬆懈，但牠不曾採取了任何步驟去使戰爭成一個決定勝負的局面。對這幾千萬祕密工作的專家，這些「有機智的可惡的愛國者，」—像伊薩克・柏吞蕭 (Issac Burtonshaw 1913—2003) 稱牠們對將來沒有計畫，不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繼續在這裏聚集一堆可怕的炸藥，那裏聚集一堆討厭的病菌；再在別處聚集着各種離奇的殺人毒氣。

當時不曾有過一個概括的計畫，把這些作惡的中心，團結成一個預先想好的整體，他們還不及霍亨索倫帝國，他們對於軍事準備，是被一種把戰事進行到底的有意義的計畫約束着的。在一九一四年，庸俗帝制的德國，確曾有過一種計畫，想依照了條頓族的理想來改造世界文明，使一切近代化，而且以條頓族爲核心。這種計畫，是有胡鬧的成分混雜在裏面，但牠是

合於邏輯的和完全的。一九一四年後，戰爭計畫從沒有恢復過那種的完全；也從沒有恢復到同樣的邏輯的基礎。在一九一四年後的戰爭，像是失去了頭腦樣的。牠同其他事情的進行一樣，但牠從不曉得牠會到了那樣的田地。

但是，全世界各處大都安下了各不相關的地雷，倘若這些地雷同時爆炸的話，牠們所引起來的大混亂，勢將不堪設想。牠們會把人類毀滅，但並不需要改變主要的條件，只須把一些決定的偶然事件更加安排，便足以促成最後的大難。

這些雜和沒有目的的殘忍，把降臨的危險，懸掛在一個沒有組織和沒有保護的世界上，有了七十五年的久長。這是某些歷史家所謂最大不安全的時期，就是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時期。到處有怪事出現——像南京、北平、大阪、柏林、華沙等地，這些事情是極可怕的，足以鼓舞和鍛練人類中較好的分子，去為實現世界和平而努力。幸而在「現代國家」長時期的孵育中，人類傳統的兩種根本禍害，足以相互中和。債權人和軍火商的貪慾，大家相互平衡起來。當軍火發達得價格日昂時，有能力的購買者，就變得日益貧窮，倘若節約運動使人類

生活中的許多好事情完全碰到障礙而無法進行，牠至少在最後也會使人不熱心再進行新式的戰爭，並且對之也失掉了信仰。化學軍火工業也同舊社會的其他模範機關同一命運。就是社會上的一切，大都在消滅，這便是私人利潤的資本主義破産的結果。

五　世界和平景象的消逝

議會的民主主義，必定要取消公共事務中的真實領袖，用奇怪的假領袖來代替，我們已經指出過，靠了各種勢力而生出來的「偶像，」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他們創造不出力量，應付不了危局，只有用簡單的手段，以獵取地位的尊嚴和那較小的權力的報酬。他們跟隨着沒落的制度一同崩潰，而竟沒有方法去盡力阻止牠的沒落。他們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倘若沒有人民意志，他們能盡力什麽呢？

我們已經研究過。這可怕而無力的一羣人，面對着叫人類經濟生活窒塞住的金融崩壞，他們是些什麽的行爲。他們中間是否有過一個人，曾經用這一個月工夫，來接連着研究那個

形勢的明白現實；這是一個疑問。在這爲凡爾賽的卑劣整理所創造而日積月累的困難前，這一個爲民主主義所付託着指導人類事務的可憐蟲的精英，是一個無力而又是難猜的啞謎。民主主義必然要生出這些可憐蟲來，這是爲這個制度所需要的。我們不管這個制度的意思怎樣，在意大利和德國東邊的疆界，大都有着生潰膿瘡的地方，想有人去爲之醫治。在遠東方面，日本和中國的衝突，當歐洲不去抗議的時候，便明顯地變成了一種形式的戰爭。每來一件世界的事變，要求集體行動，都比第一件要高聲。但是，竟不曾有了集體的行動。國際聯盟任命了調查團，對於毫無希望的形勢，常作十分贊許的分析。

怎樣能夠阻遏形勢的黯淡發展？沒有人曉得。各國的領袖，他們重複演着傳統的姿勢，好像他們會做的事情只是這些。但是歷史的型式，不能再供他們運用了。他們已經發覺他們自己，像那些企圖做手勢而肢體忽變雲霧和岩石的人們一樣了。

在那時候的列強當中，日本是行爲最決絕的國家。他們國內在一九三一年，發生了大革命，政權落在愛國軍閥的手中。依照日本特有的傳統，他們在外交上是一意孤行的，憑着感情，

缺少真實的遠見，想對於十九世紀歐洲的帝國主義，做着諷刺的模倣。而且這個統治集團的心理，還是很強烈的，整個爲民族稱霸的光榮思的想所纏住。這些思想，已經給基督教國家受到巨大的犧牲。他們的軍事，是學習拿破崙的方式；他們外交的野心，總以最好的歐洲先例做模範的。這些，現在一概「輪着日本」了。

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他們自己想像着在幹些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研究，使我們的歷史研究部頗爲費力。但在那時代的任何「強國」牠心裏想像着自己在幹些什麼，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謎，這不過是一個特例。從日本的軍隊接連侵入了中國許多的城市以來，已經過去一百五十年了。我們的心理學家，現在承認他們實是不明白，爲什麼和我們同樣的人，竟去担任幹這種絕對瘋狂的事呢？這些十分聰明的人的行爲什麼，是那麼樣的呢？

我們的解釋是：不愉快的現實，能被人心非常容易抑壓住，而且這些人是生活在奇怪而又自然的幻想的雰圍中，正像西方的銀行家、經濟專家、負責的政治家，不到真正崩潰到來的時候，是不會懂得他們的財政和金融方法，顯明地往完全的崩潰的路上直衝的。所以這些日

本軍閥，不能看到他們在大陸上冒險的必然的後果。他們不能看到他們後面的農民，窮得近於不能生存；城市的無產階級，窮得身心退化。他們不能估量一下他們一切工業城市中被驅使的流汗者喃喃低語的反叛聲；他們不能懂得他們國內智識分子的抗議。

牠們的債券在國外大跌，但是，本國經濟困難的嚴重，也喚不醒牠們幻想中的沉醉。日本在踏着西方的覆轍前進時，也極速的生產出西方一切革命的條件。他們的領袖，把這一切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們能夠看清的，中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中國正在同極大的困難搏鬭，以發現集體生存的新方法，來代替牠舊日弛緩的帝國主義。照國際間的把戲的一切規則，這是日本的機會來到了。他們以爲正像大莫臥爾帝國把印度交給歐洲人搶掠，讓他們建設那不安定的英國人的印度帝國，所以現在的命運，正請日本人去嘗試一下同等光榮的機會，使日本類似地統治着大部或全部的亞洲。誰說他們的冒險，就會在那裏完結或者是否有完結的日子呢？無限的權力和光榮的海市蜃樓，在他們的面前開展，正像從有世以來牠開展給一切帝國的建立者完全一樣。

他們的計算，並不顧及新式的戰法，現代產業的狀況，私人資本主義自滅的本質，俄美兩國，而且也不顧中國人口在數目上占着優勢，以及傳統上的統一和精神上的倔強。他們同東普魯士的貴族和英國烏爾斯特(Ulster)——牠是帝國主義者的巢穴——出來的將軍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同樣的想法。那是一個過時的誇大狂，由這一個誇大狂，殺死了近三百萬的參戰者，中國的社會，陷入了極端的解體，而日本的帝制，也到了最後的崩潰。

凡曉得是想這鬪爭詳情的人，可以去研究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本部的專史；滿洲的佔領，上海的試探，傀儡國的建立，一九三二年的進攻山海關而深入關內，從北方侵入中國本部而進據北平。這完全是依照一九一四年前那種舊式戰爭的型式中國的軍備十分可憐，現代的材料又極缺乏；日本人不費什麼力就可達到了目的。

這個階級在進行的時候，日內瓦無能力的國聯，還發出過牠的抗議。在歷史文件中，我們找到一册調查團所準備的「李頓報告書。」但是，抵制這些訴冤的話的，有着英國外交部模稜的聲明，法國軍火工業及其報紙的援助，美國有勢力的銀行以及報紙的在暗中幫助。為了

這些，日本的軍閥，就極有理由的可以不顧一切西方的批評了。

一九三五年，日軍佔領了北平和天津，在北平建立了第二個傀儡國。但他們感到維持這個國家的不容易，特別是維持這些地方的南邊和西邊更爲困難。因爲滿洲、內蒙古以及山西的土匪和叛軍十分猖獗。所以還不能佔據長江流域，和統一改組的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作戰。無論在中國的什麽地方或在滿洲，日本人總是孤單地感到行步都不安全，一種嚴厲的經濟絕交和抵制日貨運動，仍在恐怖主義支持下繼續着。國民黨是爲中國大革命家孫中山所組織的一個指導集團。牠有過種種變遷，大略和共產黨以及各種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像，牠在整個社會中維持着一個有自覺目的的核心，牠沒有重要的中心和形式的領袖；牠是一件心中的東西，這就是牠的中心，牠爲軍事行動所不能撲滅的，因了這個抵抗的緊張，變成了強烈地愛國而仇恨外人了。

一九三六年，日本到中國的軍隊，散佈在滿洲以及廣州等處的數目有一百五十萬人。在廣州的日本軍隊是第三次的上陸，然而牠在中國的統制，始終不出大砲的射程和明晃發光

的刺刀的範圍。他曾用黃十字彈大規模的轟炸了南京兩次，在北平屈服之前曾轟炸過北平，還有轟炸過武昌、漢口，有幾十萬人遭受了慘酷的屠殺。但是這個可憐的無脊椎動物般的巨體的中國，好像能夠漠然忍受這些損失，這是別的國家所不可能的。「中國復興會」在回報日本這種隆情時，突然轟炸了大阪和東京，這舉動震驚了全世界，且由於毒氣混合的錯誤；把這兩地的生殖能力都斷絕了。

中國空軍的力量，在他們未出現前是沒有人曉得的。飛機是從瑞典經俄國運了來。西方的每個國家差不多都私運軍火給中國人。不知來源的飛機，帶着奇異的炸彈，機聲軋軋地渡海到了日本。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一隻日本的運輸船在渤海被擊沉了。一九三六年，三隻日本郵船，在距港五十哩以內的地方，被不知來源的水雷所毀滅。中國的軍械，在北方是從蘇俄購入；在南方的是從英法殖民地購入。當日本的野心愈加擴大時，美國對中國的幫助和同也情愈形露骨。西方的輿論，最初分成兩派：有的對日本疑慮，有的願意中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恢復秩序而不走入共產主義。但是，當日本的野心愈形進展，歐美的感情便一致回到了同情

中國一九三七年澳洲和新西蘭向華盛頓政府提出共同對日，以強國英帝國間的聯繫的提議。他們提議對太平洋一切歐化地和作相互的保障。有時候好像西方各國大家都被日本的說服促進得全體團結起來。但是，戰後協約國對中歐所加的難忘的屈辱，還是令人痛苦，所以團結還是不能成功。

日本在尚未開始確定征服中國的時候，已經有了極大的經濟和社會的危機。最初因爲他攻下北平的容易，和中國適當的軍隊沒有編成的緣故，致使島國漲滿了愛國的熱情和希望。日本在戰爭上得到了勝利的結果有三次，但每次又是重新爆發，好像從沒有人能夠征服俄國一樣，也永遠沒有人能夠完全征服了中國。一個省份被征服了，以後別的省份又出現，充滿了敵意。四川和南方各省，對於國民黨的抵抗，供給了無窮的資源和援助。在那時候看起來，好像除非日本西進到了西藏，在中國永不會有和平。

戰爭的疲勞終於降臨到日本了。農民們只見他們的兒子外出，却不見他們還家，一般商品的缺乏，更加深了飢荒。在一九三五年，日本已經有了強烈的停戰鼓動，以後名古屋發生了

幾次罷工，死傷了數百人。以後，日本開始向國外瘋狂的傾銷存貨，取得現金，不僅購買軍火，而且也購買當時極爲主要的輸入，像澳洲的肉類和美國及加拿大的穀麥。戰爭使國內的田畝荒蕪，到處成爲饑荒，中國的生產力，也大部份消滅了。日本的社會構造是極原始的，不能像德國人在世界戰爭中經濟上顯示了奇蹟。日本的信用和債券不絕下降，甚且肯付一分四或一分五的利息還不能借到外債。但是，我們到了這時候還看不見戰爭完結的日子。

日本軍閥已經愈走愈遠，陷於欲罷不能的地位了。他們後面，那些受痛苦的人民，個個像復仇般的逼迫着。外面俄美及歐洲各國，又正在戰場的周圍注視着，然而日本的軍閥，還依照了他們的傳統，決意圖最後的一選，把大軍侵入了中國中部的湖北省。日本經過了巨大的準備，凡是未被調集的壯丁，都被調上了前線，這是一個「對中國心臟的打擊」。

他們計畫：從南京山東廣東三方面向着湖北集中。日本軍隊所以要有這種分散的根據地，是因要盡可能地徵發鄉村物質的緣故。在廣東和山東，大都有着鐵路，但是這鐵路不大容易保護，而且除了這鐵路以外，也缺乏可通的道路，於是日本人在侵襲湖北的時候，全軍三分

之一，不得不像長蛇樣從事軍用道路的修築。他們能運到的重砲和軍火，比中國軍隊的並不高明了多少；這時候中國軍的作戰，是依仗着四川的全部財富和歐美的暗中同情。日本的三枝軍隊，在武昌周圍連合作了一個鬆懈的環形圍困着，有的時候再慢慢地緊迫起來，但不久便停止了他們的舉動，結果弄成了一能僵局，就是弄成兩方面都陷入耗竭的僵局。不論在長江的上下游，這圍困的環是沒有完全閉鎖的。在一九三八年的全年；日本想從武昌週圍長月形的戰壕裏接到一些好消息，但結果徒然是一些失望。七月間發生了瘟疫，日本的軍醫，用盡了能力仍舊不能撲滅。所以從一九三九年初，他們便開始退到南京。想不到運輸已經破壞了，兵變也接二連三地蠭起了，在他們四周的鄉下，大家起來對他們反對。

那次退却的可怕情形，從不曾有人說得清楚，日本的三枝軍隊，最大的實力有二百萬以上的人；但適宜於退却的人，祇有一百萬或者還不到些。因爲飢荒對他們的打擊，比了中國人對他們的游擊戰更爲厲害。憊極的士兵們，大都沿途倒下坐以待斃，那時中國人雖然願意刀下留情，但是他們沒有食物，也只有死路一條。他們在南京集合的殘餘部隊，人數不過十萬，從

交通線上向北或向南打回去的人更少。這兩百萬人的其餘部分，睡在蒲圻和蘄州的巨塚中，或者沉沒於河底，或者當他們落後在中國的山上曲背行走時，躺在地下不能起來。在南京，疲倦喪氣的殘存者，曉得了日本和美國在戰爭，大阪和名古屋在共產黨委員會的手裏。

有幾個星期，屯駐在南京西邊舊日營房中的日本軍隊，以後，發生了兵變，槍殺軍官，宣言擁護社會革命，和中國的×軍聯合。這×軍是從杭州開來的，不費吹灰之力便佔據了南京。

美國參加東方的戰爭，由於牠把潛艇地雷等的軍火供給中國，日本向美國抗議無效的結果。在渤海方面，日本的運輸船被擊沉，因此對美國的抗議也愈趨激烈。結果美國的參戰，使軍閥的日本軍心完全瓦解。

反對日本的海戰的全史，在最近始被寫出，雖然這也是一件累贅而可議的歷史。每一件當時的紀載，全都隱藏過或精細地粉飾過的。這事件現在是十分的明顯，不僅私家公司製造水雷和潛艇，就是歐洲各國的海軍，也都藉口節省經費，把一大部分十分新的和能用的潛艇等物，拆成零件而賣給南美的中間商人。這些潛艇，或者是整的，或者是拆成極容易裝成的零

件，運到秘魯和智利，再由渡過太平洋運到菲律濱。菲律濱羣島是假獨立的，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第二實際已把門羅主義的保護施之於他們，而日本也從不曾把必需的剩餘精力去對這非正式的保護國挑戰。現在這羣島對於日本的海外商業和交通變成了討厭的進攻的根據地了。

在太平洋中，海軍的形勢是十分複雜的。在菲律濱的東部，有噴火山的拉德倫斯(Ladrones)羣島中，以關島(Guam)爲最大，這島是凡爾賽條約指撥給美國。而且把她當作美國海軍的一部來治的。其餘的各島則委日本統治。依按條約的規定，日本是不能建築防禦工程在那些委任統治的島上的，但當形勢嚴重的時候，他們便不暇顧到了這限制，至少就建立了潛水艇的根據地。在形勢嚴重的時候，在拉德倫斯、菲律濱和亞洲大陸間水上和水下的情形，變得十分黑暗和十分危險。美國的艦隊，威脅着集中在關島和菲律濱之間，保障菲律濱的中立。日本人沿了中國口岸巡視集中。那些參戰的潛艇和曖昧的航船，在暗中活動，他們偷運着軍火和軍需，侵入了日本交通中的弱點。

潛艇在水上面和別種船一樣，可以懸掛起國旗來，獲得國籍的保護，但水雷在水下是不掛什麼國旗的。一隻潛艇，或者能認識同國人的密號，沒有辦法分別出中立的和敵人的船隻，所以錯誤和假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兩隻美國的潛艇，在一九三六年失蹤了，繼着幾隻日本的潛艇，也從拉德倫斯羣島不見了。於是在中立的咖啡館發生起爭論，引起了在深海中殺人的結果。因此美國的海軍，使担負起保護自己的責任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非正式的海戰，已經在西太平洋上發展了。

他們兩方面並不忙着真正的宣戰。這因爲在美國，羅斯福第二的勇敢試驗，使牠陷入深刻的經濟和政治的混亂中；而日本，正竭其全力於執行「打擊中國心臟」的政策的緣故。但美國的許多保守勢力，把太平洋戰爭看成是一個轉移公共注意和公共精力的救命圈。那時候有一種鼓動，想重新兼併菲律濱。在日本失守武昌以後，公開的戰爭運動，變成了不可制止。

後來，那些戰爭的詳情，用不着我們再來在此細說。兩方的戰艦，在西太平洋碰到了，他們在兩天的砲轟而遭到重大損失以後，使分開了。好像日本方面的軍火用完了，沒有法子，只好

在煙幕彈下而黄昏時候退却了。美國人自稱得了勝利，因爲他們能夠到馬尼剌，而日本退到只能保護他們的水雷和潛艇，又因缺乏材料，不能重復出現。兩國國內的危機，現在都在加深，他們的戰爭，就技術的意義來說，是從不會完結的。換一句話說，這兩強國間沒有最後的條約，因爲雙方面實際上都崩潰了。牠們分開了，社會革命把這衝突掃出了舞台。

（讀者當還記得東羅馬拜占廷和薩遜尼兩國間的戰爭蹂躪了小亞細亞三世紀，他們沒有達到完結，就被回教徒從歷史中揩掉了。）

日本的社會，一朝開始瓦解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他們的人口大半是農民，他們受到西方化的影響極少，不難歸附入共產主義中不進步的流派，像廣東、浙江、福建他們同類人所表示的。一小部分西方化的智識階級，內部既有了許多學說的辯論和爭吵，在大城市中爭鬬着，想把暴動的共產主義，依照了莫斯科的樣子而走上現代的道路。這雖不大有効，然而軍閥墮落到成了土匪和地方封建主義的時候，舊貴族的後裔，在這裏那裏重新出現，他的侍衛武士就變成祕密會黨的頭兒了。

祇有幾年的期間，整個的亞洲從太平洋到波斯，好像退後而政治和社會都成混亂，一直退到糊口的耕種貧窮和瘟疫。印度的大部分，現在也回到了野蠻主義，在那些地方，倘若不是共產主義的精神和方法，那是牠的術語和反抗，可以征服了廣大的羣衆。他們絲毫不曾受其他歐洲觀念的影響。牠是沒有任何「五年計畫」的共產主義，或者竟沒有想到計畫。牠是把一切文明外衣脫去的野蠻的階級戰爭。牠殺戮高利的放款者和收稅吏像覺得極有滋味的樣子。牠發展出奇怪的宗教的狂信，牠把衛生咒詛和拋棄。印度的帝國權力沒有被推翻，因爲牠寧可被剝奪去有效的威信和退後到非常的遠，王公們在雖然他們暗中兼併了屬於他們領域最近的「擾亂區域」。但是形式上大都是「忠誠」的。各地方的冒險家，臨時想出一種水平極低的社會秩序，絕不顧任何中央的權力。

六 西方侵略亞洲的懈弛

半現代化的歐洲帝國主義，領導亞洲的作用慢慢地在衰退了。早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

農民共產主義的傳佈，已經引起了印度政府巨大的驚惶，因爲牠和正在中國得勢的農民運動相像。在美剌特（Meerut）有一羣英國的和印度的鼓動家被捕；把他們審訊後，於一九三三年判了重罪，這就證明了這些恐懼的嚴重以及政府應付這個形勢的愚笨。

大英帝國不像羅馬帝國那樣的沒落而滅亡，牠對殖民地的侵略，只是由逐漸懈弛而至失了他所有的殖民地。不幸，牠在印度的侵略弛緩之前，在愛爾蘭牠還得短期的實行高壓政策。……

（賴文斯士的原作散失不全，因此本章說得十分簡略。——著者）

七　「現代國家」和德國

爲什麼人們對於大戰及戰後經濟社會混亂的這種教訓這麼易被忘記？這是在人類歷史中最關重要的問題。這教訓在我們現在看來，再明白也沒有了。爲什麼世界上有思想的大國，每個人都不來對牠注意呢？英國、法國、美國、德國、俄國、意大利的思想，在我們的回顧中，好像

都在想改變成見和改變愚蠢的各種後果。爲什麼沒有人繼續着威爾遜所做的世界統一的基礎呢？爲什麼在一九三二年後，人們竟沒有想要去改造國際聯盟呢？我們曉得在那時候全世界正迫切着需要一種集合權力，來統一貨幣和經濟的生活，那爲什麼失敗時代會延到這樣長呢？我們已經說過幾個重要的原因，像傀儡的輿論機關，反社會的個人方面的利益，傳統的沉重壓迫，學校教師的反動性，由經濟破壞引起的社會瓦解。但如果我們把這些惡勢力集在一起，也像是不足解釋人類智慧，對於所處形勢和極明瞭的元素爲什麼這樣的盲目。

在促成失敗的這些條件後面，還有一種別的東西，這東西就是各種建設的勢力中有一個內在的弱點，和一種根本的缺乏。世界所以不能脫離牠的困難，就因爲脫離後要達到些什麼，沒有一種確定的觀念。不錯，世界上是有極多的觀念，常是混亂的和互相矛盾的。一個快在沉沒的人，要想靠游泳來救自己，必須先找着對游泳能達到的固體東西。牠的缺乏不是在精神方面，也不是在物質方面，完全是智慧的。拯救的決心和物質都有了，但是沒有拯救的計畫。世界並沒有確定的目標，這目標還要牠自己去找。

倘若我們要研究那時候一種極重要的模範的社會文化，就是德國社會文化的心理和感情的表面，我們對於這一點定能更爲明瞭。法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俄國的和西班牙語諸國的社會文化，雖然詳細說起來大有差異，但實質上和德國文化是相像的。牠們的共同點，就是：牠們大都不能理解。現在要是沒有一個大規模的拯救，計劃那就沒有拯救可說了。牠們想各做各的，並且用了相互排擠和競爭的手段，來做那團結方面極感困難的事情。這就是各人都感覺到戰爭的威脅，經濟的極不安定，以及缺少應付病態的金融狀況的能力等等麻痺的影響，從這裏便產生了一種「急躁」的心理，使每一個行動，完全不準確和不合時宜。

要是我們能夠理解，在大戰前差不多把全世界歐化的進取精力的耗竭，我們就能夠理解失敗的時期爲什麼要那樣的長久。我們須着重的指出那使世界社會繼續健康的根本重要的某種事實。當世界急需要人領導牠到統一的時候，歐洲却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因爲歐洲的自身，已經深刻地陷於分裂之境。世界戰爭，不過是世界繁榮的第一時期內表層下緊張的炸裂。歐洲的人民，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佔全人類四分之一，他們在兩世紀來，已經盡了探險、

做科學試驗和傳播文明的作用。他們為了要恢復這個作用，應當肅清恆久的心理的病症就，是仇恨的病症，但這病症在醫好之前，便是要變得十分的尖銳，要走盡使牠的機體衰弱和破壞的道路。

雖然歐洲各國間的緊張，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年在增加，可是直到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戰爭才開始真正的爆發。歐洲的各處，在早十年的時候，都在「埋地雷，」但一想到這事實，大家雖然設法阻止住向戰爭的道路前進，却增加了牠到來時的強猛。威爾遜總統的高明處理，就是波蘭的走廊，——波蘭的「出入海口，」那是第一個爆發的地雷。但牠不過是積累起來的許多爆響中的一個而已。這些爆響，是準備炸毀四壁已顯裂痕的軟弱無能的國聯的。牠們也準備着炸毀的凡爾賽和約的每個遺跡和牠的附屬的「解決，」使牠不再成為人事重新安排的阻礙。

歐洲大羣德語民族的心理，最足以說明這個世界的形勢。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歐洲的歷史，是憑德國的智慧、苦悶、和在其週圍民族中所起的反響等作中心的。牠是具有奇

特的活力而又野蠻的頭腦。牠使人稱讚、妒忌和驚懼。牠成就於物質科學的是十分偉大。牠在數學和心理學中是愚蠢的，但是有着和他們混在一起的猶太人的智慧來爲之補救。把牠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頭腦相比，牠的政治思想較爲缺乏伸縮性，牠既沒有異常明晰的法國智慧的特性，又沒有意大利的勇敢和西班牙、俄國的詩意。這些，都是牠的明顯的短處。牠和驕傲而愚蠢的帝制，頑強地聯合在一起，再加上一種不合理的民族自誇，這就阻礙了牠和別的文化系統的善意的合作。使那屬於牠的政治版圖內非德國人和牠同化的工作，也弄得大爲失敗。牠反而加強法國自衞的國家主義；牠直率地在海上挑戰，也引起了英國的恐懼和激怒。牠甚且還引起美國由惡感而仇視。牠向來不曾戰勝過俄國，即使在革命前的那大棺材中的俄國，也沒有什麼勝利可說。（俄國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前，實在並沒有真正的民族意識；那時不過只有杜思妥夫斯基和沙皇而已。）牠毫不客氣的獨斷獨行，這是德國孤立的重要原因，也是牠在世界大戰中失敗的重要因素。

這個受了傷的德國在戰後，單就牠的韌性和精神來說，仍是歐洲體系中的麻煩的問題。

戰敗的打擊，不能更改一種事實，就是歐洲說話和思想最聰明的一羣人，仍是德國的，他們仍構成了歐洲的脊梁。牠會鬧出些什麽事情來，這是每個聰明的政治家應當關心的重要問題。因爲德國倘若進行得好，那麽所有的事情都會順利進行的、但是不曾有過政治家用聰明的腦子來考慮這些的問題。德國早有驕傲和自大的表相。牠現在已經清醒得多了，牠已經把明亮的帝王金冠拋掉了，牠已經承認軍事失敗，甚至還經過一個屈辱的階段！當初牠並不曾明顯地表示怨恨新共和國在許多艱難中，表現了創造的勇敢、溫和，開始認出了世界政治的意義：

創造的，前進的人，用了憐憫的態度來盼望德國。「如今我們要看看德國能夠做些什麽？」他們說，「我們對德國必得忍耐些。」全世界都責備法國以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來對待德國這羣條頓人，倘若對外勇敢而寬大，對內領導得法那時也許可以負起「現代國家」的任務，而與別的清醒的再生了的世界各國合作。牠也許還在改造工作中獲得領導的地位。這樣一來一九一八年，說不定還是世界革新元年。

但事情進行得沒有這樣順利世界還須再經過六十年的分裂：因爲在德國的領導人來得太晚了斯特萊斯曼知道他的教訓太緩而且死得太早。白魯寧被興登堡的心理的衰敗所出賣。在德人的眼中外國大都是一些好戰和復仇的敵人。他們找尋朋友，但是祇見到外交部。上面已經說過凡爾賽會議怎樣把德國看作世界唯一的罪人，而別的國家，像是受欺的老實人，他們欲令德國永久衰弱，永久受約束和屈辱。還沒有生出來的德國的嬰孩們，要他們準備在生出後就成爲戰爭的懺悔者。這樣，德國在一個不能寬恕的世界打擊下，最初的呼吸，便免不掉氣喘。

德國一切的努力怎樣受阻，猜疑的網又怎樣把牠縛住？這是一個極長極複雜的故事。這班在大戰中吃了敗仗的人們，後來變得暴躁和瘋狂了，好像將被窒息了的生物，爲要得到空氣而掙扎一樣。我們現在只要用想像，就能得到他們所處的地位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完全是爲了要絞殺中歐而做。有能力的戰敗國的青年，不能參加重新建設已經崩壞了的世界的工作，這是留給勝利者的新時代的人做的。他們一直到老死。祇是生活在受懲罰、勞動、担負重稅

的雰圍中不得參預推進文明的工作，說他們會恢復繁榮或是能夠做出大的事業來，這完全是得罪人的話。

這樣受限制的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十分易於墮落、消極或是盲目的反抗。在歷史文件中有一本驚人的小說是一九三二年加斯特（Erich Kästner）著的腓賓（Fabiar）十分生動地描寫着這時期德國生活的個人方面同樣生動而有活氣的另一本小說，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發拉達（Hans Fallada）著的小孩子們現在怎麽辦（Kleiner Mann, Was Nun?）

我們必當承認，這種心理狀態和被束縛壓抑的生活觀念並不祇限於德語的民族。他如聰明而有野心的印度、埃及或黑人的青年，凡是受了阻礙和被限制的民族或階級，牠們的聰明青年——在這些日子中或竟包括全人類三分之二的青年——都是過的同樣卑賤而徒勞的苦生活。還是德國的青年倒尚能回憶一下過去那有希望和榮譽的生活，而且悲憤和前進的精力的蓄積，也比別人要多一些。牠沒有奴顏婢膝的劣等傳統。

真不幸，他們竟沒有教師或領袖起來爲之指出在以「現代的世界國家」代替目前混

亂的制度的工作中應有的地位。霍亨索倫的政府和戰爭的困難，已經造成了他像英國人和美國人那樣的世界主義的障礙。他的新共和主義，是表面而非澈底的，在普通的學校和大學裏，還是被舊軍閥時代的教員和領袖們所盤踞，他們含有惡意的活動着，輿論和一切教育組織，都站在革命的反面，表示他們急想恢復戰前的兇惡，而且也有恢復的本領。新德國的無用，成爲他們的教材，他們堅持着：「這不是德國的，」他們說，「回到德國的帝國主義去」「再來一次」。對於新時代的精神，不論是母親或是愛人的婦女們，大半表示着不能忍的憤怒。

一個銳敏的觀察者奈米爾 (L. B. Namrer) 說：受過戰爭苦痛和戰敗了的國家，他們在戰爭完結後十二年到十五年間。會得重新回到兇猛的愛國主義的，這差不多是歷史上的一個公例了。他指出了那些沒有參加過戰爭的孩子和大人們，他們受到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對於敵人表示深刻的仇恨。這些孩子們，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成了一國人口中的有力的一層。

歐洲的歷史，正當到了這個階級，便發現了希特勒主義的勃興。這是德國在痛苦中重要

的產物，他在歷史中是最不足信的人物的一個。他一定會引起那些把他喚起的教師們或作家們的驚異，我們可以根據歷史名人傳三〇一一二卷，從無數個不同的觀點來專門研究這一個人。這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他缺少尊嚴和可以吸引人的性格。我們能夠聽到他的勸說、訓誨、企圖說道理的聲音，這可以從他的演說的灌音聲片中聽到。那是一種帶有沙音的緊張的聲音，說得十分暴躁，却不相連。那是一個庸俗而不識字的人的聲音，鞭笞得他十分兇猛地呼喊威嚇，在窗邊揮他的拳頭，打毀周圍的家具，以逃出莫名其妙的失望。他的性格，是簡單而誠實的，這或者是他的成功的秘訣。他發洩着過於緊張的失掉自制的德國聲音。

他用一種公平無私的沙聲音攻擊他國人，猶太人，大同主義者、共產黨員、共和黨員、資本家和金融界的首腦，但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憂愁者，便沒有事情，好像攻擊別人而使他們歡喜的那樣。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乃是他們的煩惱，因爲他們是被出賣了。對於法拉達的問題：「小孩子現在怎麼辦？」他的回答是：「屠殺猶太人，驅逐外國人！武裝！加緊武裝！德國的樣子，絕對德國的樣子！並且增加而且繁殖。」

我們必須記住，他從來不曾得到絕對多數的德國人的投票。但是，人民卻任他取得政權，和破壞他們的共和國，壓迫了公共言論和阻礙了自由。他們無力來對他抵抗。他們苦鬥而失去了希望的腦子中，並不發生別的念頭，因此對他所叫喊的國家主義，他對共產黨和他所想像的共產黨陰謀猛烈進攻，他反對猶太人，投機者，自由主義的宣傳，看來似乎有些道理。興登堡能夠信賴他的反叛共和國，對這冒險者的成功，實有無限的助力。

希特勒的攫取德國並且把牠往後拉的功績，是依照墨索里尼的先例的。但從智慧上說，他比那位怪傑差得多了。他應用法西斯政府中一切最壞的手段，但沒有墨索里尼樣真正努力和幹練勤奮的建設。有一件足以表示他蠢笨而軟弱的小事，便是他用了「卐」字來做他國社黨的標識。這個簡單愚笨的小記號的來源極古，牠的作爲裝飾，還是一種新石器時代的特種文化（就是混種人的文化。）那時的文明，就是發生於這種文化。在「諾爾特人」或黑人中是不大有人曉得牠的。牠完全不是代表「亞里安人」的文化。從前的作家，曾說牠是太陽的象徵，但牠似乎除表示一種歡喜以外，一點没有別的意義了。牠在混沌的國社黨的腦子

裏竟代替了一種思想他們把牠看成非常嚴肅。在他們的旗幟、衣服、宣言，以及他們能做的任何地方，完全戴着這個記號。當他統治的鬭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當牠在歐洲復活的時候，愛生頓（Arden Fssenden）曾說牠是「蠢材的標記。」牠對於許多想像力不大好的人們，確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引力。

有一個時期，這時正是牠應當對人類應付世界問題的鬭爭作有價值的貢獻的時候。德國在穿着褐衫和佩有「卐」字標識的青年黑衛隊的騷擾下，脫離了人類智慾的共同幸福，牠的真實人才，都被流放到美國，英國或瑞士去了，有的在嘲笑，有的在隱藏。牠在二十世紀人類統一的運動中，失掉了應有的地位，正像在十八、九世紀世界歐化中失掉了牠的地位一樣。在國內，國家社會黨努力用破壞來代替建設，希望藉吹牛、訓斥、不耐煩、蠻幹和強壓、來恢復牠以往科學的威力，和工業的功能。這是可憐而悲哀的一個時期，一個大國所患了的失心症。在這些時候，德國生活是一種吵鬧而煩惱的歷史，黨派的鬭爭，和街上的衝突、示威、和反示威，被恫嚇的官吏的專橫，及他們指揮的惡劣而失敗的戰爭，把條頓民族固有的好性情都糟掉了。

罪惡的陰謀不斷地增加，這是失意後所生的結果。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德國人民在騷動和衝突中死傷的人數，或因政治關係而被暗殺的人數，約有三萬以上，這還是最低的估計呢！

八　仇恨和殘酷

讀歷史者倘使不明瞭在「現代國家」產生以前就給仇恨統治着人類羣和羣間的關係時，他就無從能夠理解大約在一百年以前的政治生活的特種困難，所有那同時間稱爲的教育和我們現在邁進的教育方式中間的重大不同點。他也無法明瞭的德國人和波蘭人間的爭端的重要點，我們已經說過了，但那種是一般狀況的顯著和有歷史重要性的一例。我們可以舉出同樣的事情五十多件來。沒有一處的人口不是浸透着羣和羣的仇恨中，量數之多和仇恨的深長實實在是同時代的人們所經驗不到所料想不出來的。

所有仇恨大半從同一的主要原因而起的。兩羣或多羣的人口，都有着他自己的狹窄的

和根深蒂固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語言和風俗，人類因事務方式的改換，或者被擠在一起，或者就超越在另一羣的頭上，結果往往形成一種社會失去重心，這樣就成了缺少共同的社會觀念，而使文明化的推動由原始的仇視和接連的激越佔了大的勢力。

凡有混合民族的地方，就有這種仇恨，除了在巴司克人（Basque）的國家惠爾斯和拉伯萊等地方外，這種仇恨大半是很強烈的。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在波希米亞的南東兩部，被仇恨所籠罩的地方好像是沒有界限的。匈牙利人恨斯拉夫人，斯拉失人恨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恨俄羅斯人。宗教的不一，牧師的作惡，甚至把種族的團結都弄壞了。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又恨正教的斯拉夫人；而馬其頓的正教的希臘人在自己中間甚至也分成好多派別。在沙爾但控制的古代領域，經過波斯印度，仇恨的程度更深了。回教就被這兩個古時的仇恨系統所分裂。這些羣衆的深仇不是最聰明的人所能接受的，他們破壞了政治家的種種政策，大家公認這深仇是不能被人所克服的。

用智慧去消滅仇恨是最近的事。我們的祖先在先前並沒有料到那是一種可以醫治的

心理上的疾病。他們不知道沒有仇恨可以生存，好比他們不明白叫他們受苦的傷風咳嗽等現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我們倘若料到，人們的生活被可以治療的疾痛所破壞，直到我們生存的時間內，我們實在感覺可驚。他們不但沒有對仇恨和妒忌盡力去消除，而且他們的神經，受了人造痛苦的多量的迫害也無法保護。在二〇一〇年前，他們住在喿擾不堪的城市中，無法去消滅可厭的聲音；和眩眼的廣告，如果要設法消失，那還要過一百多年，我們才能看見城市中和大道上，有充足的光明來逐散夜的黑暗和陰黑的天氣。在北方，二十世紀以前的人們，生活在夜色的慘淡的半光明間，常常幾星期看不見可愛的陽光。

十九世紀以前，能瞭解文字的人，都明白人類是腐敗了。我們只能研究他們的城市建築，衛生設備，清潔用具。但我們由此推知他們的不覺得不滿意，是由於習慣了的緣故。倘使他們還咳嗽，吐痰，疼痛，盲聾和衰弱而任其自然，時而互相生氣，這完全是絲毫不足怪的。

這樣的生活狀況，現在已經去掉，我們竟不曉得幾百年以前，做一個人是和我們現在這

樣的不同，當我們回想到過去的時候，就能理解當時人類社會使人的視聽和感覺不痛快極了。而且勢所必然，爲了身體和心靈對這種生活方式只有反抗，沒有深切的理解，他們的仇恨是隨時可以發作的。我們在史惠夫脫(Swift)的格利活游記(Gulliver travels)(一七二六)中已聽見一個靈敏異常的聰明人的喊聲，他發現自己是禁固在中世紀的生活中，一方面沒有出路而又不能仰藥自殺，但是一個中世紀城市溝渠的氣味，比起二十世紀的報紙的仇恨的氣味來，就要好許了。當時的報紙，簡直不是什麼新聞紙，而是一種有毒質的東西，每日早晨，人們吸收進猜疑和憤怒的氣息，用不良的消息、惡意的閒談、來發洩他的仇恨心。

仇恨是一種社會的病態的，能傳染並能消除病態，這種惡疾是哺乳動物的神經，所易於感受的、這是頭腦中理智的喪失，這是由於腦的外層，不斷的被小刺激所引起的傳染，可在成年前後的任何時期發生，劇烈的襲擊，可使頭腦回復仇恨，最後可以變爲永久的對於一切現象都發生不滿。

這樣仇恨，既在人類的腦裏生了根，就不易除去。人們常用最大的機智找尋生氣的機會，

而藉養成憤怒和尋求報復求得最大的愉快。他們有認爲「合理的榮譽」但不贊成別人的快樂。我們可從現在的教育料得這病症是易于傳染而要設法避免的，但當時的輿論爲了反對派的利益，竭力宣傳。現在我們不論在心理上或身體上都渴慕着清潔的空氣。我們現代的人類和何甲斯（Hogarth）或拉斐爾（Raphael）所畫的人羣比較起來，不僅穿得好，長得好，營養得好，身體練習得好，而且那種白白的有趣的臉孔也代替了那些煩悶，而虛僞的臉孔。在我們明白了這種烏煙瘴氣之後，我們才能夠明瞭人類的歷史。

現在，這伸展在歐洲中心的七千萬個偉大的德國心靈，他們不能自動治療，支配了牠的病。他不會承認他所受的痛苦，只是由於極大的怒火，他是一切人類中沒有世界合作、世界國家等的觀念的。這些觀念，也正在探求適當的形式和道具。牠比了法國人由恐懼所發生的仇恨，更是深刻。在這對抗的兩個國家中，世界主義是不會得到牠們歡迎的，尤其是德國。

德國在精神上雖然勇猛好戰，牠的軍備比起列強却還落後，但在三〇年代，牠的仇恨的變動，極奇怪地受了無意識的慎重的傾向新影響。希特勒在狂吠和威脅，甯可反對波蘭而不

反對法國，當形勢在極度緊張的時候，牠就藉口對共產黨及和平主義者的動武因而迫害那些曾經替西方文明受過苦的猶太人來出氣。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執政時起，不僅對猶太人搶劫、屠殺，而且作種種合法的暴行。成了德國的猶太人的生活中一件永久性的危險。

斐伯爾在他「政治心理研究」中，曾經說及世界的「仇恨地圖」，在這地圖中，仇恨的強度的着色，差別極大許多英語的國家（除了從前是常青的惡毒島，現在是最快樂的避暑成地的愛爾蘭）和西班牙語的社會，沒有歐陸各國人民仇恨的感覺的那樣強烈。他們的社會，並不怎樣擁擠，又沒有外來的干涉，在內部有着許多地方可供移殖，仇恨的傳染，也不怎樣的厲害。二十年來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南美洲（秘魯的協定後）維持了一種比世界上不論那個地方都自由而富於創造的情性。西班牙的貢獻，從郞南木諾（Unamuno）和伽賽（Gasset）起，有一張很長的大人物的名單，在「現代的世界國家」建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俄國向來不像西班牙樣有建設的情性。牠當時沒有十分多的自由思想者和著作家，牠沒有餘力去講哲學，牠最愛預言或武斷，牠從前有過的思想的紀律，完全在牠努力技術中用

去了但。這並不是一個怎麼惡劣的國家新的俄國學得了仇恨但；仇恨的目標是那些惡毒的帝國主義者。此外還有一種幽默的諷刺，當某一個時期中，帝國主義者衰落到成了一個寓言中所描寫的喫人的巨人，就連帶取消了俄國的許多仇恨。仇恨除了在短時期中的興奮外，並非俄國所特有的東西。

一九四〇年，絕少有人懂得世界上主要的政治病症是和貨幣病不同的，那是一種風土病，若想根除這病，則更難得有人有勇氣去想到必須努力肅清和破壞那些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利益。然而這時，中歐和東歐糾紛的疆界的瘡傷，已經在出膿了，引火線也在增加了。

在許多麻煩了的社會中，最常見的宣洩仇恨的方法，是採取攻擊式的含有暴力或能夠引起暴力的示威，向着代議的機關，使館或領事館進攻；污辱旗幟、石像或其他象徵物；（在印度神聖地方，則殺戮神聖的或禁止的動物像母牛或豬，）在咖啡館和飯店中吵鬧、毆擊、暗殺；在討厭的民族的羣衆中，投擲炸彈，或是把爆炸物擲入法庭和宗教的房屋以及其他不適當的地方而爆發；或是向守衛兵警開槍和越過國境。沿亞得里亞海岸，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有

一種非常強的傾向，想侮辱意大利所特多的一切石像和圖畫。

這是最近發生的事：在凡爾賽和議中，意大利要求達爾馬希亞沿海岸的大部分的土地，而被法國和英國以及協約國所反對。這條海岸線，不論意英法，他們完全是沒有處分的權利的，但在引誘意大利加入戰爭的秘密的協定中，英法曾經允許過把牠給意大利的，但是後來英法對這個約言，不曾實踐，致使意大利的愛國者十分氣憤。南斯拉夫對於保有這被人羨慕的地域，最怕別國武力的兼併。關於這種爭論，他們雙方各執一詞。意大利所具的理由，說這個口岸曾被威尼斯共和國曾統治過，而威尼斯的合理的承繼者是羅馬，在爭論區域中，他們指出城市的公共建築，到處都有意大利建立的標識，尤令人注意的是可以證明法西斯的幻想的威尼斯的獅子，從哈特里安（Hadrian）在英國所築的城牆起，直到美索波達米亞，凡是威尼斯的獅子做過窠或古羅馬的鷹所飛過的地方，他們均有權利要求統治。

英法西班牙、土耳其以及其他已經被解放了的人民對於這理由雖然大都不加重視，但是直接受威脅的人們，卻都異常的氣憤，特別是引起了沿達爾馬希亞海岸的人們的憤恨和

仇視，在那些青年以及易受刺激的斯拉夫人的眼光裏，那些雕刻的獅子和老鷹，這些古蹟已經完全失去了他們的藝術和歷史的價值了；牠們用一種驕傲而好像十分神氣的樣子在向南斯拉夫人挑戰。南斯拉夫人的回答，是塗污或是弄壞這些雕刻。

一九三二年，在羅馬和貝爾格勒間爲了這問題已經有過激烈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以及一九三七年，新的糾紛又起來了；原來這兩次不僅損壞了那些雕刻和壁畫，而且在上面畫些東西，畫成令人見了要生出異常輕視的樣子。這暴行不祇對於壁上的動物，就是墨索里尼的照像和畫片上也常常被人家用鉛筆畫上小鬍子或是可怕的八字鬍，或竟塗成一個紅鼻子，使他那種有精神的人格，變成種種可笑的怪模樣。

在一切人心激昂的區域裏，常常發生，這些惱怒的表現方式。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好像是細微，而無意思的玩弄。但是，那時却可以鬧出巨大的慘禍來。

試想在這些仇恨的區域中，那班漸漸長大的頑皮青年，腦中充滿着怎樣的思想？他們因爲受不住種種的束縛而動怒，他們勉強耐住激怒，對這想做一種生動而有意思的表現，他們

深恨壓迫者，想嘲弄他，又想用各種的陰謀反對他，侮辱他，他也許會想到拿起梯子和盛顏色的盒子，趁着巡邏警察走開的時候，把那可恨的物件塗去，因此獲得了可憐的興奮和顫動的凱旋。那可說是一種糊塗頭腦的極端可憐的得意相了，繼此而來的就是驚惶、衝突、逃遁、槍殺、受傷、坐獄、挨鞭打等等的懲罰，以及繼續抵抗的決心的強烈化。那時候除了準備下次的暴行和下次的騷動。就不想別的事情。常常鬧到在人行道上死傷的肉體，積成一堆，被人踐踏，或是遭受槍殺，再以後就是那一個個天賦的人才，在土中腐壞和消失。這就是幾十萬頭腦中充滿了仇恨的人的生活的下場。他們生存的命運，像那盛開在污泥暴雨中的花朵一樣。

最近海德爾堡大學的詹斯拍斯教授的直系後裔奥托詹斯拍斯 (Otto Jaspers) (2083——) 出版一本他的著作：殘忍的自然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Cruelty)。德文特 (De Windt) 的研究，也曾受詹斯拍斯教授的指導。德文特受他的 (Die geistiger Situation der Gegenwart) 一書的影響是頗深。上述一書對於二十世紀的殘暴研究得十分詳細，讀起來着實有些可怕。幸而我們現在，沒有用那研究那時人類心理的黑暗行程，當做一般教育的

必修學科。這種黑暗行程，使人因受害和得到可怕的痛苦，而來宣洩自己的不可忍耐的憂戚。然而這一切事實；心理學家必須熟知，他若不知這些事實對於人們複雜的心理，就不能完全懂得，而且爲了殘忍心，在人類今日的世界上，好像都没有了，倘若要研究牠的時候，便只有可怕的世界戰爭和世界不景氣時期的書籍，來找尋主要的材料。這裏可以使讀者曉得一個大概，倘若他有了一點想像，他將替自己把那些暗示擴大。成爲數不清的殘廢、苦刑、和恣意凶暴的事情。

舊式的心理學家，承認人的性慾在失去常態的時候，就成殘忍。在普通的術語中，我們仍可用色情狂(Sadistic)的一個舊名詞來代表這種意思；但在我們同時代的專家，已經覺得不大正確了。殘忍離開兩性的領域頗遠，正像現在的人懂得仇恨是恐怖和鬬爭的化合物，是戰慄的挑戰的強硬化，可以變成傳染性的，所以大家認殘忍是克服抵抗的努力，以及挫折的感覺超過了某個限度後的天然發展。我們起初是想把某種東西（普通是一個活東西）屈服在我們的意志下，但在遇到了真實的或預料的頑抗致失意時，那就變成爲殘忍了。

從這個解釋，我們曉得在私人資本的經濟或政治制度的崩壞時，以及隨後而來全世界的不安，失望和缺乏以後，爲什麼會發生許多空前的殘忍。倘若有人在一九〇〇年的時候，從另一星球來拜訪，他也許要斷定他在歐美所遇見的人是和氣、仁慈而又寬大的。但倘若他到一九四〇年再來拜訪，或者會決定這些動物是凶惡得像魔鬼一般。然而，他們是同樣的人，不過處在不同的環境中罷了。

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間，有數萬人自殺，他們都是聰明人，因爲不能再忍受可怕卑賤和殘忍的生活而出此。但在一九八〇年復興的世界紀錄中，便很少有提到關於人或獸的殘忍的。牠不是天性的改變，是環境的改變，那幾千百萬被屠殺過的人，和用過私刑的人，他們都還活着，他們現在的行爲，是極合理而善良，他們大多數，已經完全忘却自己的過去。人類的生活中，已經又有了希望了。瘋狂的年代，早已過去。

九　最後的戰爭（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

從日本和美國干涉的消失，英國的精力專注在應付印度的混亂及南非黑人的暴動以來，歐洲是不可遏止的向着戰爭的大道前進了。大陸的大家仇恨的已經沒有約束，爭點也已簡單化了。

戰爭終於在一九四〇年來到了。那引起歐洲戰爭的是一位波蘭商人，就是波蘭的猶太人。他在旅行中火車停在但澤的時候，他那沒有鑲好的牙齒出了毛病；因爲他的牙鑲得不合式，需要把他的嘴張得極大，用兩隻手插進去把牠處理。他是一個有黑鬍鬚的人，鼻子又長又高，做出來的怪樣子，不用說使人看了不喜歡。因爲他尊重同車的乘客的關係，當他要重新安置他的牙齒的時候臉孔朝着窗子。他不曾想到他的那雙笨手是從比里尼斯山展開到西比利亞戰爭的導火線。

最初挑動的好像是一粒橘子核或者是一小片核桃。

恰巧，有一個青年國社黨黨員，正站在火車站的月台上，把這位波蘭商人的怪面相，看作是在對他的制服仇視和揶揄。因爲這些青年，多半是非常靈敏的。愛國的怒火，正融融地在他

心中燃燒，因此他喚了三個同事的衛兵和兩個警察來，這些年青的英雄們，好像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一樣，少有孤單的行動的。他們迅速而神氣地踏上火車，接着便是凶狠的爭吵。因為這位得罪人的波蘭商人對德國話懂得不多或竟是全然不懂，他就只好瞠目結舌了。但在這時候有兩位同車的乘客來幫他，別人也捲入了漩渦，騷擾的叫喊後就繼以相推相打，國社黨人因為寡不敵衆，結果被他們推下了火車。

那位開始鬧亂子的青年國社黨員，氣急暴躁，同時又看見那個波蘭的猶太商人，還是依舊在用他的手和臉在窗口做那使他討厭的手勢，因此就拿出手槍來把他打死了，別的利器也加入了行動，車站上便起了一個爭亂。這個雛形的爭亂，在司機的人把火車開出了車站後才算完結。然而這事件在政治上弄複雜了，因為在但澤車站的月台上國社黨是沒有開槍的權利的。

這個令人扼腕的事件的本身，本來不用爆發歐洲的戰爭便可解決的。那時本來可向不死不活的國聯申訴，或是對那木乃伊式的海牙國際法庭也可通一個電流，使牠行動起來。不

論那一個機關，我們可以說，還能夠應付一個波蘭的牙醫。這一個牙醫實在是一個罪魁禍首，應當加以緝罰，作為代歐洲受罪的羔羊。但極需要直接有關的各國的一種好意，可是那時竟沒有行使出來。

德國的人心，八年來一直被煽動着為走廊而作戰，德國的重整軍備，公開和秘密地已經進行了好久。但是法國和波蘭，對着德國軍事的恢復，抱了十分的隱憂，兩國的軍事當局，急於想趁他們比德國強的時候就來給牠一個打擊。危機像時時要來到了，可是結果，不過是證券交易所受了一下大震動。現在，不再能忍耐下去了，緊張已經到了極度，災禍的來到，反而能夠使擔子輕鬆，歐洲便自由地把自己撕成了碎片。

這種形勢，在好戰的舊世界裏，是每一「武裝和平」的必然的最高點。在某一點上的時候，就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邏輯說：「現在他們還在不很強大的時候就施之以打擊。」一九一四年英國的不難加入戰爭，便是這有力的暗示使牠如是的。因為英國人那時急於要在德國艦隊還不曾和他們的艦隊均等的時候打擊德國，他們說，這是德國人的「自取之禍。」「寧

可現在，不要等到天明。」

德國現在又是走進了咎由「自取」——波蘭便出來應付這時機。各國的軍政部，大家都忙着調動人馬。當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印刷機正在忙着印刷關於被殺害的商人的各種錯誤記載時，波蘭和德國的空中艦隊，已經開始衝突起來了。波德兩國的邊境，也和鑲得不大好的牙齒一樣，在一九四〇年的一月五日，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一點鐘，顯然的開始覺得不舒適起來。星期六下午三點鐘，波蘭的長途飛行家古林夫斯基（Michael Korenvosky）和三個敵對者作着光榮的戰鬥，後來機中起了火，由空中墮落下來，落在但澤擁擠的郎伽塞街上，因此市政府也連帶着燒了起來。

後來，波蘭從空中侵襲柏林，法國也派了兩百架飛機，在巴伐利亞和西普魯士的上空列隊示威飛翔，但並未遭到抵抗。德人像是被這個炫耀完全嚇住了，他們不曾想到法人會來這麼一手；但他們也立刻決定，不向這太佔優勢的法國空軍迎戰，法國人便也飛回去了。在波蘭和德國疆界上的戰爭仍是繼續着。

巴黎的當局，因爲看到他們的世仇不來抵抗，一時就不曉得怎樣是好，不曉得自己是應當失望，還是應當放心。對德國倘若得到空中的斷然的勝利，一定是極可滿意和極能決定的，但是這些飛機，也要留在國內鎮壓一切國內的不滿者，一個勝負不決的戰爭——在空中是永久可能的——會在國內產生極嚴重的困難的。

從一九三三年德國進行恢復軍備以來，已經有了七年，全世界的外交中心，在這個時期中，看來衝突是慢慢地走近了，不能來設法把牠阻止，現在，倫敦、華盛頓、瑪德里、日內瓦都突然忙得不知所以，大使和公使們忙得不堪的來來去去。日內瓦說：「延緩些時罷，」雖然已延緩了二十年

「衝突就地解決，」這句時髦話現在又出風頭了。牠不但在中立國得到了贊成，就是在巴黎和柏林也得到回響。在實際上，「衝突就地解決」的意思，就是法國應該毀棄對波蘭的條約義務，讓波蘭盡力在德國和俄國間周旋，達到不論那樣的解決。因爲當時的俄國，繼一般的緘默和紅軍的迅速動員，差不多立刻成爲國際棋局中的一重隻要棋子了。

在巴黎方面，十分迅速的想出了最好的理由，他們不主張和柏林的衝突各走極端，在新的戰爭中，第一個被殺的法國人已經被殺了，他是在沿海的阿爾卑斯(Alpes)被一個意大利衛兵的子彈殺死的。

在一月七日，是星期日的晚上，當波蘭飛機在柏林投擲毒氣彈的時候，意大利人也在對貝爾格勒施行着同樣的技倆。同時，羅馬也照會了全體列強，說明意大利決定打擊的理由。像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日的上午的中間，南斯拉夫的不恭敬，又重新突然復活了。法西斯的探員們，為了要常常供給一些使人不平等的憤怒材料，所以他們在做着這種工作時不免有些過火，變成了一幕滑稽劇。星期六那天，意大利全體人民一清早起來，正在計畫着他們一天家用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可怕的消息，把他們驚動了說是墨索里尼的像被人家畫得眼睛和面孔紅紅的像是吃醉了酒，威尼斯的獅子，被人家塗成了狗頭猴子，羅馬的鷹，被人妝飾成了一種恥辱的怪樣了。會說會講和頭髮散亂的法西斯青年，常是眼中流着眼淚在每一條街的角落裏，抗議着這一種不可忍受的恥辱，並且主張戰爭。南斯拉夫對意大利的不公已經夠

了，只是在以後的幾年，那些疑惑的學生們，追溯到這些暴行的來源時，才曉得那種不公是怎樣的誇大，以便作爲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的理由。

有一天，波蘭和意大利的軍隊，他們已經走過了國境，東歐的其他各國，不待有侮辱的事情發生，立刻也開始了軍事行動。凡爾賽全部瘋癡的工作，完全溶解於戰爭當中，充滿了仇恨和駭怕，人民沒精打彩地盲目的進行着瘋狂的戰爭，誰也不能預料會產生了什麼結果。就地解決的理論，使法國和俄國立在戰爭外足足有兩年的緊張。他們找到一個「公式，」法國可以不站在從前聯盟的位置上而去加入戰爭，但以俄國制止自己不作反對這些聯盟的行動爲條件。而且，軍火貿易，也是「公平無私」的進行。這一個公式，用作法國對聯盟者背信的理由，本來是十分勉強的，但牠竟也使德國西部兩年內免掉戰爭。意大利人向法國疆界的挑釁，是不大有理由好解釋的，實際上也並不是解釋得來的，而且也是靜默地不管的。法國的空中艦隊，隔了一些時候出來示威一下，這就益加激怒了的他的隣邦，但整個說來，這還是約束戰爭的力量。這種示威，使外國人見了膽寒，並且緩和了國內一班頭腦太熱的人們。

從這時開始，人們對于一九四〇年「屬于地方的」歐洲戰爭，並不像一九一四年參戰諸國的人民的那樣熱烈。表現熱烈的，只是限於中上兩階級的沒有經驗的，法西斯蒂青年、國家社會黨、「公立學校的兒童」及童子軍隊長們一類的人。他們到處的跑、吶喊、發急處在沉悶、憂鬱和愛心的氣雰中。沒有一國的人民是願意拿着武器，普通的士兵大都偷偷地跑開，不斷「落伍」、這些脫離的人，難以給予責罰；的因爲「逃跑的心理」十分流行，尤其在東歐的農民軍隊伍中，這樣槍斃他們是不可能了。波蘭一旅的人在洛玆近邊加入戰爭的時候，只剩了三十九位長官和五十七個士兵。

從這時候起，「儉省」和軍隊同時進行。戰爭的財政在最初；就覺得非常的拮据。軍隊中所有的軍令，大都用了「使用軍火須儉省」的一句話。

然而，這真的戰爭，比起日本和中國的戰爭來，無論在機械或是科學方面，大都是在更高的標準上。軍事當局者有鐵路、公路、汽車、車輪、電氣材料、各色的槍砲並重大的空軍實力。在後方，化學和其他種的軍火工廠，仍是在照舊地工作。步兵的戰爭，固然不再存在，有的就是技術

家們的鈎心鬥角用「永恆的死」的毒氣，把東普魯士立刻從德國本部切開，這個動作，比東方的不論那動作的技術水準都高明。牠在戰略上是愚笨，但在技術上是十分成功的。

對柏林的第一次的進攻，是用現代的技術和當時最高度的軍事科學來計謀的。那是另一個「對心窩的打擊」，而波蘭的總部參謀堅決地依靠牠的成功，好像德國人在一九一四年全然依靠攻下巴黎的成功一樣。波蘭人十分的不幸。在預備這個進攻的時候，得同許多「專門家」商議，於是這計謀從法國、捷克和瑞典的軍火製造商，由俄國以及國內的叛徒洩漏出來，柏林後來曉得這計謀的大綱，竟像華沙一樣的明了。對柏林的毒氣猛攻，實在是可驚而且破壞得十分的厲害，可是汽車運輸軍隊、坦克車、機關槍等，却被德國用了有效的方法來加以阻止。在距離柏林六十哩的地方，這是在路上及田野中所用一種聰明的方法，內有毒氣障幙——主要的是路易士式的和藍十字的毒氣——通電線地雷，新式的戰壕。當一隊騎兵在柏林之北，就是在柏林和海間的進攻，時在電線，毒氣和機關槍間潰退了，死傷的被俘的不下四萬人。而且波蘭軍隊帶的毒氣面具，在製造上本有了錯誤，有好幾旅的人，聽了旁人的話，認

爲他們是被出賣了。波蘭的主力軍，從來不曾和德國軍隊有過真正的接觸，只是他們飛機數量上的大優勢，挽救了他們的失敗，得免於崩潰。

波蘭集合起殘剩的軍隊來，依照了預先對這類失敗而準備的第二計畫，再行擴張起來，在沿斯特丁和波布米亞的國界築壕堅守。在柏林和華沙的上空，每夜有着空中戰爭。這是一種不決定的戰爭。在數量上，波蘭的飛機佔着優勢，但是德國機器的效能比較要大些，並且駕駛的技術也精熟些。波蘭人所有的新的空中魚雷，比起敵人所有的數目來要多不知多少，能夠跑到二百哩外指定的地方，投擲一個大炸彈，然後再安全地回來。

波希米亞也和法國一樣動員了，可是他並沒有立刻加入戰爭的漩渦。捷克斯拉夫的軍隊，只是留住在他們國境四邊的山中，或是沿了匈牙利的前線列着陣線，靜待着時局的變化。奧國也開始着急了，但他只是守着中立。

在南方的戰爭，一開始意大利人便十分順利，幾星期中牠的和波蘭的衝突形式上並不聯繫。伯加貝亞、阿爾貝尼亞和匈牙利，大家也對南斯拉夫實行宣戰了，意大利的空軍，竟遮黑

了天空，在格魯西亞和塞爾維亞的城市，不大有能夠中立而不受轟炸的意圖的艦隊，開始奪取達爾馬西希亞的港口和島嶼，但是意大利軍隊侵入斯拉夫尼亞和克魯希亞山中，並不像預料的快。直過了六星期，他們方才打到柴格勒布（Zagrred）那裏。

鄉間不適於放毒氣或他種機械。牠那裏沒有可供決戰的中央地點；而鄉間的人民，他們却有山中戰爭的古傳統。這些城市中的百姓是否全被炸死，這類強壯的農民並不受影響。他們從來不應戰；他們從來不成羣出現於敵人面前，但是他們却日夜向意大利營寨中轟擊。他們有好些人在前綫和田野間奔跑所用的軍火，是經過羅馬尼亞而來的，羅馬尼亞有大隊紅軍在比塞拉比亞的疆界，那兒的農民也不肯服從，站立於鬬爭以外，態度不明的，危險的，甚至有一時候是有利的。匈牙利人經過了南斯拉夫的國境，威脅貝爾格勒，但他們的實力則向着捷克斯拉夫，靜待着事變的發展。

在年終的時候，戰爭有一個奇怪的停頓。就是在浦拉格，倫敦和巴黎等處，大家瘋狂般的起來努力停止戰爭，終算暫時收到了效果，侵入德國和南斯拉夫的軍隊，時正留在敵境，但臨

時造出中立區，把敵對行動停止了。他們努力，磋商停止戰爭，使衝突不致連接起來，有幾星期的期間，好像是可能的。德國和波蘭，在波蘭的進展停止後，是否繼續戰爭，尚在猶疑莫決。意大利希望佔有達爾瑪希亞，停止爭戰。好像文明的精神，已經快從幻想中覺醒過來，開始問着，「爲什麼在地球上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英國的內閣，認爲在這時機最適宜舉行一個會議於維維（Vever）「最後」乃修正凡爾賽條約。德夫・古派爾（Duff-Cooper），霍爾・貝利夏（Hore-Belisha），愛倫・威爾金生（Ellon-Wilkinson），和蘭多夫・邱吉爾的和平演說，在全歐洲都有着回聲，被美國的藍道而夫卡路索（Randolph Carruso），和柯里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所熱烈贊助。教皇，坎特布雷的大主教，一些小教派的教會，瑞士共和國的總統，還有能幹而可敬的本尼士（Benes）總統大家都來加入了這個懺悔的合唱，法國在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的社會衝突以後，慢慢地變成和平主義了，牠能幹的代言人是路歇(Louchere)和夏凡（Chavanne）。我們又想起了福特和威爾遜的過去衝動世界和平的概念，又有一次在人類的想像中一閃後

消滅了。這次合唱的聲音，比了一九一六年到一七年的要人要多一些，而且唱得明白，而更一致些，然而並不見得比較更有效了一些。維維的會議，雖延長休戰到一九四一年的六月，但牠仍什麼也沒有解決。軍事當局一過了休息的時間，他們就變得急躁了。他們仍沒有消滅了相互破壞的惡意，於是戰爭便又恢復了，「不等上一次戰爭的果實的分配。」

維維的會議失敗了，因爲「現代國家」建設的概念，沒有人在那裏作代表。那次的會議，又正好是各國外交家的集會，大家便努力於尋求和平。然當解決問題的時候，那些主推國仍脫不了陳舊觀念，這是必然的會引起衝突的復活。他們只要一想起和平的觀念的時候，「一種勢力均衡」的幻想，就滿佔在他們的思想中，那是年年日日在那裏發生搖動，不管普通人和聰明人怎樣思想。專家們現在終是願意要戰爭到底，軍火商人，和法國及斯干迭那維亞的輿論，對於「德國人還打擊不夠」「意大利人正有事於南斯拉夫」的這兩種意見是十分甘願同意的，

希望自己始終不捲入這衝突漩渦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已覺察到出口貿易的愉快

的增加，看到參戰國欠他們的賬極有希望地增加起來了。泰因寨得造船公司，也重新工作。鋼鐵和化用工業的股票價格都向上升騰，鋼鐵工業像患瘋癆的和沒有牙齒的老虎一樣，祇有氣力追逐那唯一的食品——喫人。牠早就不夢想到建造新郵船，或鐵橋、鐵路、鋼架的房屋。但牠還能造槍砲以殺人。牠看不到較遠的目標，也不計算一下，人身上是不是還能夠剩得些肉給他喫。唯一真正要求和平的國家，如捷克斯拉夫和奧國，他們介在作戰的兩派中間，在國境的四週，大都有着可慮的敵人。在維維所表現的人類求和平的意志，還是一個顧忌太多和沒有效力的意志。

戰爭差不多是在波蘭的烏克蘭同時爆發，那裏的農民，已經起了暴動，這顯然有蘇維埃的軍官在指揮和把軍火供給他們作戰，他們對波蘭的戰線，作了一次猛烈的出其不意的襲擊，想使德國的土地，脫離侵略者而得到自由。德國人在休戰時期內，正日夜計謀着怎樣使空中狀況平等。他們生產了新穎而迅速的飛機，還有一種特殊有效的機關槍，於是空中戰爭進行了好幾星期，猛烈的情形真是空前而絕後的。

德國人逐漸建立起來了一種優勢，能夠使用出他們的炸彈和毒氣。洛茨和華沙的震動，無武裝人民的退出，而且波蘭的戰線，也爲便於恢復和西里西亞的交通而破裂了。以後的衝突就更擴大了。立陶宛顯然得到了俄國的鼓勵，攫取了牠的維里納的舊城市；奧國也加入了德國和意大利的聯盟，參與兩方面的戰爭，把南方的和北方的戰爭兩相連結了起來。德國宣布了他和奧國的合併。現在其餘的歐洲諸國，大都先後捲入了漩渦。匈牙利對東方的捷克斯拉夫不宣而戰，以恢復牠固有的領域。於是牽動了羅馬尼亞的軍隊開到戰場上來反對。接着俄國也宣布了牠不能維持牠和法國的諒解，於是紅軍就向倫柏格(Lemderg)出動了。馬其頓業已是內閧到不得了，這一鄉村反對那一鄉村。保加利亞加入了南斯拉夫聯盟進攻亞爾班尼，(Aldania)希臘攫取了羅的士(Rhodes)島，這島本爲意大利所有的。

法國從此看到了牠舊日的安全政策，(使國與國間的勢力平衡，同近鄰敵國背後的一國聯接起來的政策)工作達到了必然的階級。牠的人民，大都十分高興地在躲那築得無限高的堡壘的國境後面，和英美國人共同分潤販賣軍火的中立的利潤，但牠的條約義務也就

難以擺脫了。在倫敦，華盛頓和日內瓦方面，最後一次企圖避免大難的舉動失敗後。法國便於一九四三年對中歐的同盟國宣戰。

從表面上看來，這次新的戰爭，仍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相同。牠好像是要企圖推翻或承認凡爾賽條約這次的戰爭，也有把中歐包圍起來的趨勢。但現在意大利和條頓族的國家聯合在一起；比利時在一種極端的工業困境中，脫離了戰爭。英國是超然局外。法國既有舊日的聯盟者，還得幫助從走廊到黑海和巴爾幹那些由外交部所辛苦組成的反德國的聯盟國家。牠現在是處於幫助人的地位，已不像上次大戰時要求人家幫助了。

俄國是中歐諸國的一個不可靠的聯盟者；牠並不和牠們聯合真正起來行動；牠不過是贊助東部波蘭和比塞拉比亞的新蘇維埃共和國。紅軍就這樣停頓在那裏，擁護世界革命的已經的熱誠，已在俄國人心中早消沈了。馬克思主義已經俄國化得太厲害了，怕吸收了太大的一羣西方的臨時信從者。克勒謨林宮只想把有關的斯拉夫蘇維埃團結起來就以爲滿足。日本，中國和美國立在漩渦之外，專注意於調整他們自己的社會上種種困難問題。

一個膚淺的讀者，也許會認這一切是我們已經熟悉了的主權國政治的棋子的重新排佈。但是在實際上，衝突的各派勢力大爲不同。法國雖然他的內部有社會的困難，還是一個十九世紀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民主議會的形式，以及不負責任的金融和工業。牠國內的青年，除了受盛情式的愛國主義的教育外，竟無心理的組織。牠的聯盟者，是農民的國家，政府是帝制的或議會的形式。就是說，比牠更爲頑強的。但是，中歐諸國，全是新的法西斯的型式，在結構上組織得更爲堅固，被一種自詡爲一個精英的青年人的組織所支配。

這些法西斯蒂，是一種強烈的國家主義，除了些基本的重要事實外，有紀律的精英份子的治理，是走向我們「現代國家」的一個明確的步驟。這些形形色色的法西斯蒂，他們的使命，是簡直在破壞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後便自歸於消滅，因爲他們的頭腦，是全然的淺薄而感情的，他們不能脫出國家主義的傳統而團結起來。在他們和我們現代的教育和行政系統間，沒有連接的關係。但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不論什麼地方大都再沒有發現像他們那樣的東西，而他們的值得注意，正像俄國的共產黨（不管牠的無產階級的公

式）的值得注意一樣；因爲牠們比起民主的機關來，雖是局部的，但卻是真正進步的。在那時的混亂情形中，那五個有組織的「青年的專一」要算是中歐諸國的特點，也是支持我們現代社會的中堅勢力的雛形。個人有紀律的參加人類政府的觀念，慢慢地打入了新時代人們的心中。

在沒有更好的東西出現前，這觀念尚須相當時間佔據在這些奇怪的核心中，像好排場的墨索里尼和歇斯的里患者的希特勒的四團，這是很可怕的事。法西斯蒂是國家主義者，因爲這是那時國家所顯呈的唯一形式。但這種初次的成績，在現時發生的戰爭中被擊碎和消散後，這觀念仍是存在那裏的，這個總合的合作觀念，情願供較大的目標所指揮。在一切法西斯國家的青年，已是不再那樣不負責了。

這些新的戰爭，拿上次的戰爭來相比，不但不是民主的羣衆戰爭，而且就中歐列強來說，或者就戰爭的範圍和性質來說，至少也是空前的。我們已經指出了這新戰爭和舊戰爭間的一些重要區別。這些不同之點，從交戰諸國的疆界的交錯而更顯明了。當初次的衝突開始時，

在波蘭和德國間確實有一條「一戰線」但在一九四三年後這條戰線便沒有了，沒有主要的目標，在普遍全歐的急亟的毀滅中也失卻了中心觀念。

波蘭人在尚未退回波中去前，經過布蘭登堡的時候，想佈置一個「永死」的毒氣地區，可惜他們潰退太快了，僅僅毒化了三個與戰略無關的小區域。一九四三年後，空中戰爭變成了主要的戰爭。在地中海曾經有過一次劇烈的海戰，打算將北非洲和法國間的增援和接濟切斷。但對於法國在大西洋中的交通卻不大有什麼騷擾。

那時的空中大戰，從不曾有過一次像特拉發加(Trafatgar)的海戰或厄克奴馬司(Ecnomus)的戰爭一樣。立體戰爭中，是沒有像海峽、海灣、山峽等的路。可以使較弱的力量，能夠決定了勝負，的確我們現在還不能斷定，究那怎樣是在空中是占了絕對優勢。這種戰爭只是侵掠和復仇，實無擴大而積極行動的意想。德國大隊兵士攻入波中，卻被毒氣和戰壕阻住，法國的侵入意大利也沒有越過吐雷。

使敵方在物質精神兩者都受到了耗竭，這是不論那種勝利唯一的路徑。受苦難的百姓，

被迫而行「消耗戰爭。」「能夠比敵人多支持半小時的人才可以得到勝利，」這話已經翻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當軍事不可能決定的愈形顯明時，百姓也愈發猛烈於社會制度的反抗。被人故意焚燒糧食、森林，拆毀堤防，大水淹了低下的地域，自來水和煤氣的供給也被破壞了。飛行家也專以轟炸羣衆為能事。和野獸的戰爭同樣的殘酷。

雖然歐洲經過十年的金融崩潰和工業不振，但是仍舊有巨量的機器的材料存在着，到處的工廠，都恃強力來保護，和聰明地來偽裝，免遭空襲。一切主角的交戰國，他們大都只開放一部份國境，以便輸入原料。在這時這些國家的政府，還能夠用捐稅方法，從本國人民榨出一點有用的東西來，以償付這些的輸入品。貨物只能在夜中搬過國境。貨船則由引港人引進沒有燈光的海港。沒有被編進正式軍隊的壯丁，被迫着去做挖掘的工作，以築成避架炸彈的地窖，和重新建造防毒氣和炸彈的房屋。這些工作，多在晚上進行的。凡是抗拒和逃避的人，就要剝奪他當天的食糧。卡拉脫 (Eglon Callet) 曾經畫過一張慘淡的圖，題為「最後的安全，」讀者也許見過牠的攝影：一羣帶了鐵鍊的瘦弱而穿着破衣的法國人，在隧道中受着鞭笞而

工作着前面已經有一個人昏過去了，正在用興奮劑救醒他；另有一人已因救助無效死了，但也沒人管他。

在四十年代戰爭中的交戰者或非交戰者的冒險紀載，比描寫世界大戰中個人經略的書籍的數量來（至少就西方的戰綫說）是非常的缺乏。浩大的空中侵襲，好像是很可怕的，比世界大戰時的空襲還要可怕。一開始就有砲聲、喇叭聲、汽笛聲、以及自動車偵察隊的尖銳的警笛聲等：警報發出後就是瘋狂的羣衆，到處的狂奔，找尋最近的避難處所和救助，各種尊嚴而莊重的樣子完全消失了，這種空襲，大多是使人的身體受到極端的苦痛。

關於那些從苦痛而死亡，我們已經給了一些的暗示。差不多各處難民收容所的組織和毒氣面罩完全失掉了效力。有些地方簡直連這類設備都沒有，只用假的面具和假的防禦炸彈的建築物，來緩和「過份的」恐慌和「維持士氣。」在戰爭的幾年中，有幾家能夠支持的報紙，對於這類浩大的空襲，不敢登載一些什麽來，就是在美國，倘若把這類情形詳細一些發表的時候，就被當作「主張和平的反宣傳。」

在空襲發生以後；從柏林寄出一封描寫的信，沒有寄出的月日，簽名是「辛克辣」最有力的批評家，認爲是這小說作家辛克萊路易士（Sinclais Lewis）寫的。其中的一段說：

「我們走過了 Unter den Linden 街之後，又沿着 Sieges Allee 前進，我們到處可以見到躺着的男女、兒童，他們並非均勻地散開，而是極奇怪的集成了許多堆，似乎他們在最後掙扎的時曾經努力爬行藉以求助。這種在死時喜歡靠近別人，好像是中了這種必死的毒氣後的特殊狀態，心中一定是想到了什麼事情。他們個個人都這樣縮成一團。口腔裏完全流着血，氣味是十分可怕，這些人在廿四小時前雖然還是活着的。身體也立刻腐了。公園的門，差不多走不通了。……」

從這情形上，對於一世紀半前大城市內和平的人民，他們死亡的情形。我們也就可見一班了。

參加最後一戰的人，他們的回憶，反不如不參加戰爭的人的描寫更爲充實。後來幾十年，關於戰爭的情形竟沒人寫出什麼，因爲大家感到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在軍隊中識字人的

比例數，並沒有大戰中西方軍隊中那樣高；對於所發生之事情的興趣也已減少了，他們許多只有脫逃、厭惡、酗酒、強姦、搶掠和惡毒。這類的事情雖在加多，然而不是人們能留作紀載的事情。全世界比起三十年前來，已經沒有那時感覺的敏銳了，倘若全世界所受的苦痛比前要更多些，但是，所受的刺激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尖銳了。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許多英國和德國的士兵，他們每天都記日記，這表示着士兵還有着個性的感覺，對於事變還起着反應，他們不是抱着沉默的命運主義，日記中時常露出原始的歡欣，或是原始的憤怒，但在四十年代軍隊當中的性情，却是只有憤怒了。

在歷史文件叢書中，有一本退出武昌時被殺的日本一個軍官的日記。因爲我們既然找不到和這相類的歐洲的材料，我們不妨引用了牠，用以表示在最後一次戰爭中的參戰者是怎樣的感想。雖然牠是一種不十分生動的文件。他是一個智識份子，一個社會黨的黨員，一個對國聯極信仰的人，他的日記，主要的是用密碼文字敵視的批評高級指揮官。但在日記後半段，連這些發表意見的話都沒有了。日記成爲他找到什麽飲食，他怎樣同感冒和痢疾鬬爭等

零碎記載。他像是和一連的人住在一起，他有兩次寫出他設法替他們找到了飲食；他寫出被殺的或失蹤了的同伴的名字。其中有些數字，或者可以成爲他的缺乏軍大的證據。當他被殺時，他已很餓了，當他衰弱的時候，他好像感到他的十分複雜的密碼太難用，他首先改用不大高明的英文，以後便轉入了明晰的日文。最後的一項雜記，是一首沒有寫完的舊詩，我們可以譯出在下面：

陽春天氣煖融融，
遍地櫻花錦繡叢；
勝景應推富士雪，
溫柔難忘婦人胸；
日居島國桃源地，
今陷鄰邦絕境中：
戰地風雲無日已，

何時重見故鄉容！」

是死，或爲旁的事情，阻止他做完他質素的詩。他和他的一隊人，多半是在近開封的地方彼中國士兵追上而刺死的。

關於這次戰爭，有許多的回憶，大都不能令人想到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戰爭時人們發生的奇怪精神：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出發作戰的人們，大都感得他們從絕對安全的家鄉和城鎮出發，在擒得大批財富後，仍能回到老家。永久過着快樂生活的。那時的心情，當是非常勇敢而和順。至於在後一個戰爭循迴中的人們，便感覺到他們再無回家的時候了，他們曉得此去是到貧窮那裏，也讓貧窮生生地啃噬着他們的老家。這戰爭，不是一個短期的征伐，而是在永久的移動着。做過極大破壞的空軍，他們的回憶錄，空洞得真叫人不信。他們對戰爭，只作了個簡單乏味的記載，比方：「二個波蘭人炸死了；」「一個人被做俘逃掉了；」他們好像一點沒想到自己投下的炸彈，在別的活人身上所生的結果。這些青年，有許多是還活着的，後來成了「現代國家」的飛行家，一九六五年後，於「海空管理部」服務。雖然也有些

人把他們戰爭經驗寫得還算好，却是沒人對於戰時的歷史，遺留下什麽有用的文件來。

一九四五年後，衰竭的象徵更是顯著了。失望已侵入了每一個人的靈魂中，甚至使他們失去自衛的精力。他們躺在茅屋裏的床上挨餓着，任憑炸彈在他們的周圍落下。不過他們吸到了毒氣的時候，仍能驚慌地跳起來，咳嗽、吐痰，沿街一直衛到地窖中避難。在一九四二年後，感冒常帶有壓迫心理的極端強度出現，一九四五年又發生霍亂。這些時疫，在那時雖然已經十分嚴重，但那不過是「微生物侵略」的前哨，這些時疫好像是先來試探一下人類自衛的能力的。

除了空戰外，英國和北歐的中立國，他們所受的痛苦，好像他們也在真的戰爭一樣。他們已經輸送軍火到歐洲。他們所得的不過是收不回來的債。起先這類軍火製造的工作增加，頗引起了經濟的不安，但是英國的輸出，使因此降到了不很主要的地位；從前，牠是世界上的債權者，現在因債務不能完全收回，因之輸出也日漸減少，但對於過剩人口糧食的供給，竟也無法在海外買到。牠從前的衛生，已經在一個無情的節約政府手下變得腐敗不堪，那不良氣候

中的住宅已從擁擠而變成不能居住了。霍亂第一次發生時，英國不但鬧飢荒，同時國內的秩序大亂，這種飢荒和混亂，全靠牠極高的機械化軍隊和人民守秩序、和服從的習慣制裁和壓抑住。自十五世紀的鼠疫以來，英倫三島，從不曾曉得有這樣的瘟疫過。他們以爲瘟疫的恐怖早已過去永不會再現了，但是，那些霍亂不過是十年後接續而來的更較可怕的經驗的預兆而已。

兵變和抗議的精神，在歐洲漸形普遍。從前致成一九一八年完結的世界大戰的有力因素，慢慢地變成失望和倔強，在一種新的形式中重復出現。因爲現代的戰爭，已經不能單靠步兵，大規模的兵變，像一九一七年後阻礙法國的進攻，迫使俄國脫離戰爭，和將德國引入最後崩潰的種種兵變，在這時候已經沒有同樣的反動效果了。在令人氣惱的軍紀下面，和容易同「叛亂」的宣傳相接觸的人們，不像從前那樣多了。他們的力量已轉移向專門化的實力上去，飛機師和戰事技術人員，他們能靠了小型的炸彈，機關槍，和無危險性的毒氣，來應付和解散羣衆的集會，那樣的神速簡直不是十八世紀後半期從事巷戰時的革命家所能夢想得到的。

連兵工廠的罷工，也不再像以往那樣的有效了，由于機器生產效率的增加，已經驅逐了大批的生手的工人。依照同樣理由，暴動和階級鬥爭的共產黨的宣傳，在牠企圖把政權攫到自己手中時，却碰到意外的阻力。雖然現在牠還支配著百分之九十的歐洲的農工們的思想。俄國的社會革命不能重演了，因爲新的情形已經完全兩樣。布爾雪維克的成功，就只爲了俄國的落後及缺少受過技術教育的社會層。中歐西歐平民的不穩定。能使發生很大的消極抵抗，及地方革命不過反對牠們的，是全數的飛行家、機師、技術家、科學家、和工人，他們從赤俄曉得了他們，從黨政客所造成的無產階級曉得了造成計畫。不論關於他們自身的政府有什麼意見，——他們已從新專心一意地考慮這個問題，——這些科學家及技術人員等，並不傾向於民主的共產主義。

雖然是這樣，人類的反對新型戰爭的延長，得到俄國的組織人材之助力以後，就採取了赤色暴動的樣式。一九四七年，就在馬賽、中亞田、巴黎、巴塞羅納、米蘭、拿普爾士、漢堡、洛落和哥勒斯哥，大都有兵變和暴動。組織了臨時的蘇維埃政府，時期的延長由一星期到一個月不等，

形勢極爲可怕。漢堡及哥勒斯哥的蘇維埃政府，組織得最完善支持得最久長，必須經過在空前的流血後纔能消滅。差不多各處都有和此性質相同的小事件發生。各國負責的政府——因怕社會暴動普遍開來便停止了形式上的戰爭。但是這一個體系的組織已經被壞了，技術家的態度也不顯明，無產階級對那股票經紀人、及製造戰爭人、銀行家、統治者、階級的仇根，一天感似一天。

三年之後，最後的一戰才算結束。一九四七年倫敦會議上，竭力憑凡爾賽條約來安定歐洲，可是政治家、外交家只是一味的狡猾妒忌對於保全這些人們的顏面，看得非常重要，於是在一九四八年重又恢復了敵對行動。

九四九年春，本尼斯總統在布拉格(Prague)造成一件好像不可能的奇蹟，這才完結了戰爭。他發明一種術語，他不提議訂什麼條約，祇提議「廢止敵對行爲。」每一個國家的領土內，不再實行戰爭，專候一個廣汎的會議來解決。但這一個會議終究不能開成。爲了傷寒、霍亂，最後有斑點的瘧疾，經濟生活之不斷衰弱，以及人類關係的新發展，在本尼斯的暫時「休

戰，心中使成了永遠的休戰，直到今天。

一〇 微生物的侵略

人類最後戰爭的歷史太黯淡無光了，這是因爲缺少詳細描寫的緣故。這情形尤其是在疫症的紀載中爲更厲害。同時，這些疫症，也使戰爭不能恢復。那時候日記書信和描寫的文字大都不時行了；因爲那時候的人，有在少的旁的事情要做，腦中沒有多餘的精力了。微生物好像也在學外交部的樣子，借了人類的混亂，尋找着機會以恢復牠的早已失去了的帝國。

微生物對人類的進攻，不待正式宣戰便全體動員了。進攻的先鋒部隊，是各種傷風的時症以及使人衰弱的瘧疾，盡情的蔓延着，因爲在戰爭狀況下的緣故，所以這傳染並不能消除。交戰國的人民，因爲營養不足而精力耗竭，加以衛生事業的崩壞，於是更給予這些傳染病充分活動的範圍；這些病症，殺死了數百萬的人，並且使人羣已經減少了的活力更爲減少。一般活力的降低，比了真實的死亡率更爲重要。霍亂和鼠疫繼之而發生。過了五年，好像最壞的疫

症已經過去了，然而又來了發疹瘧疾。

這種來歷不明的病症，從前祇是被捕的狗頭猴才有的，現在突然變得好像特別適應於人身，或者有某種中立的媒介，可供這類微菌藏身，使牠還準備着對了人類進攻。或者，以前的瘟疫，已經改變了人類血液中防禦元素。這些事我們現在對之還不清楚，因爲那時候的醫生是或生物學家，大都沒有閒暇來觀察，就是他們有時間來觀察的話，也因爲沒有記錄下來，而凡科學的出版物，不論在什麼地方大都停止出版了。

這些病症，最初出現於倫敦動物園的附近，從那裏傳播開來的速度，快得真有些叫人不敢相信。牠使人的面容和皮膚變色，發着猛烈的寒熱，皮膚癢癢的，心理十分苦悶，引起一種不可遏制的墮落的慾望。以後，患者的精力，於猛然暈倒下去的時候便消滅而躺下來死亡了。這些發疹瘧疾的傳染，不但可由水來散播，而且患者搔下來差不多見不到的痂皮，也能起傳遞的作用。風和水以及失去理性的病者，把此症帶到各處，大約有一半的人類，容易遭受牠的襲擊，就我們所曉得的，凡是一般容易遭受牠襲擊的人，終於都染上了牠，而染上牠的人，必定要

死去了的。

從此以後，世界的不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間可怕的十八個月達到了頂點。最後終算造物使嚴酷而解毒的冬季到來，搭救了殘餘的人類。人們從不曾想出過對這種瘧疾有效的治療方法，或是有益的緩和劑來。牠掃蕩了全世界，但是牠怎樣消滅的，那和牠是怎樣來的同樣是一個謎。現在的病理學家，對之還是莫名其妙。牠不再在殘剩的狗頭猴身上發生了作用，因爲沒有材料了，所以研究的人，無法去做培植和試驗。牠來到了，牠盡力地破壞，最後，大約由於牠內部生產的東西的反作用。好像是自殺了。或者，像麥根生（Mucken-sen）所相信的，真正的病症，並不是什麽發疹瘧疾，乃是當時人的身體虛弱，容易傳染上牠。他想，那種特殊的虛弱，在戰爭的四十年代，不知不覺地已經在全世界傳播着，真實的瘟疫，並不是疾病，乃是身體的虛弱。

歷史和個人的記憶，有其相像的地方，就是牠們完全傾向於抹殺一種不愉快的經驗。最愚蠢的意見，莫若說一個快樂的國家，就是沒有歷史的國家。反過來，人類祇有在真正安定和

繁榮的階段，才能留下充足的材料用作歷史的著述。我們曉得埃及幾世紀內豐足愉快的社會生活；我們也曉得亞述的偉大和武功；阿詹泰(Ajanta)和中亞細亞的宮庭生活畫，供給我們的鑒賞，但是軍事失敗所留下來的，祇是一堆刼灰而已，而瘟疫的各年，便是歷史中的空白。關於一六六五年倫敦的瘟疫，笛福(Defoe)(一六五九年到一七三一年)曾經寫過極好的紀載，但是我們必預警告粗心的讀者，這一個敍述，是事變後由一個聰明的作家所編成，他並非是一個真的目擊者，拉發耶爾(Raphael)所給羅馬的瘟疫，也是一種回憶的性質。歷史上的大瘟疫，咸在殺了無數生命後，不留痕跡的離開了人間。歷史所注重的是社會和經濟的善後處置。在此克利奧(Clio司歷史的女神)又變得活繁了。她又注意到向她前進的事物，但是死了的，就讓牠死了。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繁榮時代，留給我們的是多到不可計的書籍，但是這些書，關於人類較為可怖的史實，只有傳說，而無真確的紀載。那時之小說、書信、日記、回憶錄、圖畫、照片等等，數以百萬計。但到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我們極難找出足使我們明瞭那兩年的情

形的一封信、或是圖畫、書籍、報紙，牠確是我們人類史中最可怖的時期。當時所描寫的記錄，被人認作有傳染性危險而毀滅了。後來，再讓新時代的苗福們和卡倫士（Stephen Cranes）們去幻想一幅新的圖畫吧！

卡布爾（Gable）、達士（Nath Dass）、波得科（Bordisco）和馬提尼（Martini），他們在小說中的描寫像是十分的正確，值得我們讀，他們在大小城市以及鄉村中宣佈着變化快要來了，那時候的城市和鄉村中，衹有死的大都未埋葬而躺着的男女，被飢餓的羣狗和孤寂的貓兒所嚼食。印度的老虎和非洲的獅子，大都跑到荒涼的大街上來；巴西成了野豬的世界，死人滿佈在整個的區域中，野豬卻過度地繁殖着。成羣結隊的老鼠不斷地威脅那些還不曾受到傳染的人。

我們不可忽略的恐怖，還有一種就是被傳染者的自由遊蕩。沒有東西能夠阻住患有傳染病的人留在床上或醫院中，也沒有東西能夠禁止住他們不走進防疫的城市和房屋。這些要死的游蕩者，成千成萬的被怕走近他們的人所槍殺。那種可怕情形，正叫我們現在驚心動

魄，叫我們想起另一種自我保護的行動的悲慘；這是在一九一二年，有一隻泰坦(Titanic)號大汽船和冰山相撞，有些人下了救生船，當正那些墜水的人，用手攀援救生船兩邊的時候，船中的人爲了要避免一同沉沒的危險，竟然痛擊着攀援者的手背。在此時此情之下，大家不再服從社會動物的衝動，那些抵抗傳染的人口——對於發疹瘧疾，或是希望免疫，或是必然死亡——對於在他周圍污穢的患病者，慢慢地表示着失望和仇恨。只是極少有醫藥、軍事、牧師或警察的訓練者，像在抵禦災難，企圖維持秩序。許多人完全在搶劫，就．們所能查到的見證看來，整個說婦女比男人的行爲要好些，但是加入搶劫的婦女，那也是十分可怕的。

這一個惡夢來到了，以後又離去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被遺棄了的城市中也有人在行走了，他們打進空屋中去，回到拋棄了的故居，街上完全滿鋪了白骨或穿好衣服的骷髏，他們還不明白造物的憤怒已經過去，在他們的前面，還有着生活。

發疹瘧疾代替了毒氣戰爭牠減少了世界上人口的一半。

一一　一九六〇年的歐洲

要想進一步瞭解歷史的人，覺得有詳細研究以下問題的必要，就是在歐洲稱霸的時期內，一切建立的帝國和民族國家間確定的疆界，以及對立的文化和不同的傳統，在各地消失的過程是怎樣的？自從這些界限泯滅後，各處志士的努力和忠誠，不復是分散的了。這一些國家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雖然存在，可是祇不過是一個空殼；到了一九六六年，已經完全沒有了，已經縮成一團而崩壞了；牠們的種種形式，完全溶解和消滅了。

對於一般的教育，我們現在可以不必注意，牠在這個世界的崩潰中，個人和偶然的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正像我們忽略了大戰時的和拿破崙戰爭時的詳細情形一樣。又或像吉朋(Gibbon)的著作羅馬帝國的衰亡(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出版於一七七六年與一七八八年)時對於東羅馬朝庭生活的一千年都略過不說一樣。現在，這種歷史，已變成作傳記的參考材料。這些傳記，正把我們作爲消遣的浪漫小說的地位取而

代之，因爲我們的想像，已經脫離了純粹的浪漫階段。我們現時所需要懂得的是那些較大的勢力，牠們在人類複雜反應的後面起着作用。

人類業務的迅速進行不斷地在增加，羅馬制度的衰落，和二十世紀私人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由衰落而至滅亡，兩者間主要的區別，就是在於後者，崩潰得更爲猛烈而迅速。第二個重要分別，就是在有厲害關係的羣衆，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要明白得多。在人類的歷史中，這兩次最重大的衰落，主要原因是：貨幣的崩壞。貨幣崩壞的原因，是由於金融和財產的法律習慣，完全不顧及全人類的幸福而自由發展；還有政治和教育的適應的滯緩，以至整個的體系，到最後完全失掉了嚮導。但是，以前崩壞的速度，正和馬在馬路上步行一樣，是說話及書寫所能表出的範圍。那新崩壞的階段，使全球同時受到影響，牠所激起的反響和思想，以羅馬的先例來相比，正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我們所看見的，祇是壓縮的和簡略的比擬。自從耶穌紀元二世紀末的大瘟疫把已經病弱得很的羅馬帝國弄得十分疲憊以後，直到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商業、工業、藝術、禮儀在城市重新復現這種沒有腦筋的年代，延長了差不多有一千年的長久。

由德國一九一四年侵入比利時到二〇一〇年以後，在空中的獨裁下物質的普遍的繁榮的回復，只經過了一世紀。

單由這種理由，就可想見心理的過程，不間斷的連續。牠前面剛接觸到前提，那一面就已達到了結論。第一次的世界崩潰，延長了許多年代，每一個年代大都消掉了牠前一年代的經驗，但是第二次的世界崩潰，較重要和較迅速的部份，祇要是一個有年紀的人，大都可以看得見的。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八年，那是比較興盛和安定的時代，正像男女的青年時代一般。在一九六〇年的時候，是中年的成熟的末期。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開始時，是好像兒童時代。在國際警察——就是空中和海上航路的警察——出現的第一天，正是積極做事的人們，對於一切發生的事情，看成一個整個的問題的時候。這是可能的。至於在羅馬帝國時代，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有沒有人能夠懂得，卻是一個疑問。

在這兩個例子中，同是舊觀念的被根除，同是國界的消失，同是受了傳統觀念的破壞，債務沒有法子償付，宗教和教育的組織也全無，只有特權階級的貧窮化，以及不法活動的復活，

一切成見被肅清後的大覺醒。這兩者完全是破產的文明先行消滅，是激烈改造的前提。

試把一九六〇年時的世界，作一個橫的解剖，來考察世界上人口狀況的重要部份狀況，以及在他們中間活動的力量。在以後事變的光照下，我們能夠理解，在本世紀的中葉，一切狀況，完全在向着這一點集合前進。但是，這種事情，當時是不是明瞭，還是一個疑問。社會生理的基本力量所進行的目的，到處是同樣前進的特殊狀況，便是因地理的，種族的和傳統的環境而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於目前的解釋，更是分外的歧異。

我們已經考察過歐洲稱霸時的事變，是為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停滯，而經濟方面卻又非常的澎湃，沒有節制和不規則的生長的結果。人類社會能力的無限增加，一則使牠減輕了人口繁殖的擔負（據宗巴特說，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間的歐洲人口，雖然有着大規模的向國外移殖，還由一萬八千萬增到二萬四千萬）一部分是用於離奇的誇大的戰爭。較小的一部分，使用於增進了個人生活，使其益加圓滿和迅速。但是，我們已經說過，在債權者和法律體系內，舊有的保守的勢力，立刻能抵抗和停止新鮮能力的舒展。在人類的經驗中，這是

第二次，金融和財產組織的不善適應的性質，使事業受束縛而陷於停頓。

十九世紀是繁榮的時期，貨幣和信用的組織，較之羅馬時代是更多不同而且更爲細密；但是，歷史的主要還是一樣的，牠的結果也是同樣的。最初是人們的財富大量的擴張和增加，以後便是破壞財富的重稅。自古以來，歷史只是不斷的重複，像歐洲的體系，和以前羅馬的體系同樣，由於猛烈的耗費牠廣大而暴長的精力而結果使自己陷於貧窮。牠重複演着盲目的浪費的故事，但科學給與牠以空前的便利，牠在幾十年中，極快的用完了牠既有的財富，不得已而負起債來，牠的耗費最厲害的時候，是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五〇年間。此後的速率，要緩和一些。

新式的戰爭，若就其破壞的方面來說，終於是證明了牠的失敗。當牠企圖破壞的時候就先自己粉碎了。牠殺得還沒有盡牠所能殺的那樣多。因此現在還有活着來讀這本歷史的讀者。在四十年歐洲大戰中（純粹的軍事行動）所犧牲的人類，總計不過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在戰場上屠殺了的四分之一。然而這些戰爭是人類的科學戰爭所達到的最高水

平線。亞洲的紛擾是又多破壞些，因爲更近於野蠻的水平線，死於戰爭中的人，估計在九百萬以下。在這九百萬中間，差不多五百萬是屬於一九三八年日本最後進攻中國的一段，這是在中國中部，最初形成危局，後來日本軍隊在河口的西部與國民黨的義勇軍拚命死戰，以後終因日軍不敵而退却。

人在没有達到他所預料的那些可怕的犧牲，他是不能夠把戰爭提高到終極的機械的水準的。在這兩個重要戰爭後，政治的與社會的關係破壞的程度，實在比了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紛亂要大得多，但是，戰爭只是這種破壞的序幕，並不是原因。據預言家的推測，這種新式的戰爭，是用科學的方法屠殺人類，可以把人類完全殺完，但戰爭在不知不覺間，轉變成一大堆的混亂；政治的崩壞，債務的不能償付，公債没有人承募，機器被拆毀、暴動，游擊，土匪的衝突，普遍的飢餓和大瘟疫。毒氣戰爭和空中戰爭，已從人類的經驗前消失；在恐怖災荒，瘧疾等，更原始的現實前，人類變成藐小。在二十世紀中葉獲得最後勝利的是「發疹瘧疾」的微生物。世界約二十萬萬的人口由一九三〇年降至一九六〇年時不及十萬萬，其主要的原因

為疾病飢餓是經濟完全崩潰的結果；戰爭在幾次的大屠殺中，殺去了幾百萬人之後，瘟疫又繼續屠殺了數萬萬，在那可怕的兩年內，牠差不多是日夜在橫行的。

茵霍夫（[illegible]）已經說過，歐洲在緊接着戰爭的飢餓和瘟疫的五十年中，已經不能再構成單個的歷史，而是那時候歐洲的一千萬個的歷史。由凡爾賽和約所產生的各種政府，在這整個的時期中，在法律上大部份還是存在，但在貨幣停止以後，牠們已經消逝，已經無效能了，在日常生活中已經不起任何的影響了。像英國和法國等的政府，把牠們的活動，只限於收稅的工作，由一般的說來是徒勞的。牠們這樣的過下去，最後叫人家想起希臘臘丁時期前徵收貢賦的帝國。牠們偶或也管一下地方上的事情，但是，最多的時候，還是任其自然。倘若有地方要起來積極抵抗，牠們也只有不理睬或是妥協。英國政府，在一九五二年對於牠還能找着的那些持券人，好像還在償付牠的各種積欠。但是歷史記載得不清楚，好像是用一種沒有購買能力的虛偽的紙幣來償付的。其他的政府，像意大利和西班牙，他的行政權力所及的地域，也十分有限。比方像羅馬在依日諾瓦，佛羅稜斯，和地中海岸所畫的三角形範圍內，統治是

頗有效力的。而巴塞羅納和瑪德里，在西班牙半島的大部分，除了蘇維埃化的西班牙的里維耶拉，葡萄牙和安達盧西亞之外，力量足以維持秩序。

美國的情形亦十分和此相像。一旦破產的鐵路，在那裏無法行駛的時候，孤立比較更爲容易些，因爲城市間的距離較大，人民的地方自治的能力便更大。他們距離向西開拓的時期還不到一個世紀。鐵路在瘟疫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合衆國聯邦政府的權力，減縮到了華盛頓，正像東羅馬帝國的縮小到了拜占庭，但華盛頓可沒有拜占庭那樣的活氣，在快到第二千年以前，旅行還沒有恢復時，牠祇是歷史上的一個首都而已。德國的成爲統一的國家，也是由於支持過波德戰爭，柏林被波蘭空中轟炸成爲廢墟以後，很快地降爲一羣鄉村的地位。

在幾年中這些破產的政治制度，便真的消滅，一般的運輸和交通，十分迅速的停頓下來，貨幣的崩壞，也愈趨顯著，軍事組織也日漸渙散，把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推到還存在着的地方或省區的首領的頭上，叫這些人出來擔當大任，那真使他們受寵若驚，在這非常的十年中，全世界的城市及鄉村大都認識了此後須得靠自己過活，瘟疫使他們更感這認識之必要。市

政機關，盡他們的力來組織衛生事業，以抵抗傳染病，或者他們把處理事務的職權，讓給臨時機關。當瘟疫消滅以後，他們就好像觸礁的船的水手漂泊在奇島上的樣子，他們必須重新組織起他們收縮了的經濟生活，他們爲了新的需要，用舊的權力、舊的名稱來稱呼新的事物：這裏一個有力的領袖，會自稱市長或公爵；那裏有一小羣堅決的人，也自稱市議會或公民會。另一個地方，又流行着先進的術語，取得權力的是「工人蘇維埃。」實在後者頗和公民會相像，主要的分別，就是牠在新社會階級覺悟。

在這破壞的時期，各處政治結構相差最大，在真實的合法的「治理」間有顯明的矛盾。我們試經過德國的南部，波蘭和法國的北部，牠盛行的是一種社會革命。蘇維埃化十分時髦，但牠們和最初俄國地方蘇維埃的性質大異。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共產主義的領域，模糊地自稱已經服從了莫斯科，但在牠的旁邊，可以使屬於以前財產所有者和僱主統治的地域。名義上，而每是實際上和首都的全國政府有往來。在理論上是敵對的兩種體系間，是不容易休戰的，在有爭論發生的時候，比方欠稅，他們一定要派代表到惠斯敏斯德、巴黎或羅馬去請求權

力，正像中古初期野蠻的酋長，有時會請拜占庭，或羅馬來判斷是非。地方的衝突或革命等事是常常會發生，他們在首都被認爲只是地方的騷動和市政的整理。

在這失去連結的歐洲，散處着舊的軍國主義的殘餘的零星的欠餉軍隊，他們的武器，已經找不到新的代替；他們的軍火供給也一天一天的減少，他們內部，有以軍隊爲職業的官吏，和還未被解散或拒絕被解散的義勇軍，因爲他們除了在行伍以外，別處就找不着職業了。這些人極能操縱着他們的軍官，因爲他們極容易逃走。有些地方，這些縮小的軍事實力，執行或企圖執行舊政府的徵稅，和類此的殘餘的職務，在別的地方，他們公然成爲土匪勢力，雖然有時候挾着堂皇的名義。在六十年代的開始，時時有侵略的小戰爭，舊帝國和主權國再次出現一下，以後便又消滅，或者變成另一東西。一九六〇年以後，甚至有假軍事的勢力擅徵捐稅，和維持秩序，稱爲「現代國家」的實力。他們占據舊軍營和城市中的居屋，及其他一切的便宜。

在四十年代，這些士兵們是新募的生手。以後十年間，凡留在他們舊隊伍中的人，大都成了中年的可怕流氓，他們穿的是補綴的舊制服。中間有些指揮官，已經控制了本區的飛行場

和兵工廠，但軍人們到處失掉了技術工作者的同情，而這些技術工作者，又是他們必不可少的。他們墮落到十九世紀去了，最後得到了幾千做得十分粗的子彈以充實他們軍實的時候，他們也十分歡喜了。

人們處在必須為自己做事情的壓迫下面，一世紀來向交中央政府做的事情，現在完全要開始自己來做了。在大戰中，以及戰後緊張的一年期間，法國有幾個地方的商會，為救濟輔幣缺乏而製造了地方的代幣。實行這種辦法的現在日見多起來了。在我們的博物院中，有幾十萬種這類臨時的歐洲的鉛幣、錫幣、鎳幣以及其他一切種類，像現金籌碼、和以噸來計算的紙幣。在當地的市場上，可以交付房租和完納捐稅，但在幾十哩之外就行不通了。每個地方的銀行，經理常和他的主顧合作，創辦一種臨時的地方信用制度；醫生們設法不經過內政部的註冊而設立診所，大多數城市，還有印刷所開着，在幾年的期間，各地方還有一些，一星期或一月出版一次的刊物，紙張極粗而且不齊，這就是殘餘的歐洲的輿論。但牠們的國外消息，比了謠言也差不了多少，像一些大通信社，都破產和滅亡了；電報組織完全沒有聯絡好的

除在少數的幾個特別城區外，用無線電來散佈新聞的方法完全絕滅了。收報機全被破壞了。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以太」除了幫助空中的運輸之外，對其餘的事情，完全是停止的了。在許多史書中，有一篇長篇雋永的研究，講到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〇年間的郵政電報、電話的變遷；顯然的，倫敦、巴黎和羅馬間的電話交通還是不會停止。關於一九六八年倫敦地陷的消息，是當時用電話打到瑪德里，再從瑪德里用無線電話傳到波宜諾士愛理斯的。但這一個復興，也許和新的海空管理部是有關係的。

世界貿易崩潰後，不但無線電的器具沒有了，而且有許多種交通工具和器械很快的也不見了。像攝影差不多一下子就在世界上被除盡了，脚踏車也變成了別的用品，氣胎常是難有壞的修理過的薄氣胎輪，電燈也慢慢地息去和消滅了，因爲缺乏做燈絲用的適當的材料。一切的電氣材料完全退化了，電車完全不能開行，或者竟是用馬來拖走了。

世界大戰後，日常生活標準，正在慢慢降低，一切東西，大都漸漸消失了。不論在英國或是法國的那一省，自從平民的住屋，在戰時停止建築以後，完全不能恢復過來。獨有柏林和維也

納，戰後的建築曾經有一時十分活躍，所造成的住屋，多過了減縮了的人口的需要。此外，歐洲人的家庭狀況，比了在大戰以前還要擁擠和齷齪些，雖然牠們也從沒有降到中國和印度城市那樣的污穢和貧窮。清潔的退化這樣快，便引起了一九三三年以後報紙的注意。報上常載有怨語街道齷齪路修得不好的文字，以及把牠們和二十年以前的整齊清潔作極可惋惜的比較。

衣服也跟了住宅退化，裁縫業依人口中每人來計算，在近四十年的期間，活動力逐漸的縮小。城市中的人羣，穿制服的一天比一天地多起來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他們穿了制服，不像昔日那樣的愉快。人們因爲缺少新衣的緣故，所以補綴和褸襤的舊衣服，漸漸普遍了。靴子的出產也有限了，當大戰爆發時，靴子雖然大量的生產然而已被徵調供作軍用，後來因爲整個金融的崩潰，所以也從來沒有回到商業上來。而古式的鞋匠，又早已在歐洲被這類的大量生產打倒，所以在鬧着飢荒的五十年間，歐人的鞋子問題是極爲苦惱的。西班牙人有最好的靴子穿，法國和英國人却只好改穿草鞋——因此，生了凍瘡。靴鞋在波希米亞的某一城市還在

生產、城市的名字現在已查不出來。較爲次於西班牙的，要推中歐在鞋業中也占了勢力。帽子在各地也感到非常缺乏。

在向來生活中一些習慣了的小舒服，也有普遍的衰落起來。除了幾個受着特惠的地方還種植着煙草外，香煙的大量生產已經消失，抽煙的人，大家都多半改用煙斗。真牌的茶葉變作了一種罕有的物品，糖也減少了。爲了飲食不良和營養不足而生病的人，無時不在增加着。

在大戰的時期，歐洲人多半已經學會製造暫用的代替品，如今他們在十年之中，管理國內的事情將極感困難。德人對於製造代替品一類的事已經是熟手了。他們有極多的技術知識和能力。他們要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比較的舒服，在這慘淡的幾年內努力，他們造出皮革、棉花、咖啡、茶、煙草、金鷄納霜、雅片的代替品，還有一個寫着各種名物極長的單子，是其他醫藥的代替品。

另一方面，是鈍笨的愛爾蘭人，在生產沒有回復之前，他們身受極大的痛苦。某觀察者，懷疑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出產的布有否百萬碼？他的報告說，「他們在乳酪、蕃薯、紅酒

和政治的刺激上生活。他們用草織衣袍，還染上有趣的色彩，他們因此像是過分誇示他們的聰明；他們把燃燒泥炭、獸糞等物來取暖。」這話說得很粗野，但是正在這個時期，他們建築了一所漂緻的教堂，雖然照一個最近的歷史文件的報告看來。牠並不是堅固的，牠建築在杜柏林皇家科學院的舊址，這科學院因爲在一九三九年「教的生物學有使三位一體的聖教分崩的趨勢，」就被警察廳封閉了。

讀者一定看見過那類圖畫：那是搜集在世史圖畫一百卷中的：也許還曾經讀過那時的許多傳奇和小說等。真正的攝影，在五十年代後半和六十年代初是不大有了，世界上的攝影機雖然還極多，但是；軟片却好像在一九五五年後就斷絕了供給。以後，差不多十年間，除掉遲片的緩慢的曝光外，不再有別的什麼了。我們僅僅得到幾十張這類興奮的快照，這在前幾十年來原是極普遍的。那時歐洲的影片已經絕跡，除了對於單個的人物外，也沒有素描，因此一班編輯先生們只有用極細的心思去畫圖，和以後日子所做的照像的恢復，來補充他們的材料。

關於一九五九年里昂的情形，有六張趣味的快照相片，有的人好像是找到一捲軟片，並把牠沖晒。出來有一張照的是一個中央的大坪，稱之爲 Place Bellecour。這是在市集的日子；從前的照片上，在這一個大坪中本來有一個路易十四全身的立的銅像，但現在這個銅像已經不見了，這不見的原因，大半爲的那是金屬而被熔化了。照片的背景是一些高樓大廈的窗户，從前的旅館和醫院現在外觀已變了没有窗檻的和破損的空屋。但看那情景，還是非常忙碌的，或者是正舉行着一月一次的市集，那裏有不少牲畜，有好幾匹馬正在出賣，還有各種的羊羣，和一排猪棚這些人大半是農夫，他們戴着草帽，穿了破舊的上衣，有的圍上圍巾。城裏人所穿着的衣裳，還是三十年代破舊而補綴的東西。市集中有三個戴着舊世界的高帽子的執事，在前面的一個，是有鬍子的人，他牽了一對牛，套上一輛小車。一個胖婦人，坐在那裏，旁邊放着一籃鴨蛋，後面的是一隻被縛住了的小牛；這個婦人，在照像機前顯出肥大而微露笑容，不曉得是不是在笑後面的人。

另外所攝的一張照片是一個空洞洞的火車站，上面正在做着木球戲。這是十分顯明的，

是一個佳節，有幾種競技正在舉行。軌道上已經沒有鐵軌了，軌道也已被剷平而當做遊戲處所了。玩耍的人的小馬和騾子，大都是繫在月台上，成了一個長列。站房各間的門大都已被人家拿走，但是，站長室、候車室、大食堂的刻文，還可隱約看出。在一個中間的月台上，有兩張的長橙，是給乘客吃點心用的。第三張照片中有一羣人大家瞪視一排房子的廢墟，牠們剛從一個險峻的斜坡上倒下，這顯然是稱爲佛耳維而(Fourviere)的一區。在這裏有兩個長鬚的人，穿了舊的阿爾本尼(Alpini)制服在維持秩序。我們曉得里昂的市政府，那時候有這類的士兵三旅駐在軍營。他們穿着草鞋，有腿上纏着布帶，他們的外衣還算是完整的。

另外的三張照片，使我們看見一個停工了的絲廠的情形。在經濟崩潰之前，里昂所造的絲，大部分還是真絲，但後來羅尼(Rhone)流域好像已經完全停止了原料供給，貿易的不景氣，以及後來的戰爭，減少了繅絲的輸入。可是，製造炸彈的時候，却需要絲，因此也許有過企圖維持這一門生產的特殊的努力，但這個事業，好像減少繼續生產，直至一九五一年里昂公社成立的時候，牠突然停止了維持。其中一張照片是攝的在織機的中間，有大堆的紙散亂着，這

有不少的煤油箱。從外面看來，像是有人企圖在這裏放火。另一張照片上，是一長排綠車，被蛛絲網和掛塵蒙住。第三張上，在一個紡織機的許多紡綞中，有一隻野貓伏着。正在向那些不速之客投之以吐唾。機器是複雜而粗笨，確是二十世紀機械的特色。我們可以看出廠中的窗子，是在拍照時才打開的，窗簾也說不定是剛被拉開的因爲照片中已被大羣繞室而飛的飛蛾所弄暗了，其中大多數，顯然是剛被驚起的。

這些照片的價值，就因爲牠的真實性。還有兩個同時代的用乾片攝的相片，那是司多荷姆大旅館的大餐間的攝影，這旅館已經没人居住，但一切東西都仍在原處，牠和兩個羅馬Caracalla浴室的廢墟的相片，有奇怪的相像地方。這兩張照片是出現在一百年前。另有一張則是英國布來頓(Brighton)舊中央旅館餐室的遺蹟，是在牠們還不曾傾倒而墜進海中以前。但搜集到歷史圖畫中，却是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間，其餘的一切圖片，大都排着次序，運輸部正在開駛數十架飛機；無線電話也已恢復，這些早在複雜的照像機和照像材料開始工作以前。

有些極爲有趣的攝影，是關於倫敦的狀況的現出瘟疫後城內的和空洞的貨棧的畫面，司特籃得（Strand）旅館裏的走廊，改成爲病房，這幅畫令人所得的印象是極深的。其中有一幅素描，畫的是牧牛人和種蕃薯的人，因爲爭奪海得公園、及根新頓花園而發生爭鬪，死了有三百人，這幅素描，也極引人發生感慨。至於因瘟疫而喪生的屍身，沿着泰晤士河流下和堆積在倫敦河（Pool London）的可怕的畫面，後來據說是過分誇大了的。

我們試從現時的安全而想像幾萬萬的歐洲人從二十年代的適舒生活，經過循環戰爭的震驚、駭怕、憤怒等刺激，而進入這樣一種普遍的勞苦窮困的階段時，心中是怎樣的憂急和失望！貧民對於災禍的恐懼，也許不及富人那樣的敏感。就在普遍的繁榮時期，窮人最好的生活，我們看起來，也只是沉悶、灰色、和厭煩的生活。雖然他們本來大多數都應該可以喫飽，但他們却喫得十分的壞，他們在不論什麼時候從未住過普通一點的住屋，他們的景況，是日益壞下去，他們從勞動跌到失業，再由失業變得麻木。但中等階級也同樣由好景況變成壞景況，從一般人以爲還算過得去的生活，變到大家都成爲沒有希望的窮人。

在這一個階段中，到處有一個生活十分不快樂的階級，這就是老人、退休的人、和有獨立資產而無獨立責任的人所共同構成的一個階級。牠在普遍繁榮的早期，擴展得十分迅速，這種多餘的繁榮的人類，已經十分愉快地佈滿於全球，忘掉努力於維持社會紀律和保障他們安全的需要。在不知不覺中，已變成和昔日的貴族和鄉下的紳士一樣了。在投資制度頗爲有效時期，這一層社會，不問一事，他們住在鄉墅享樂成功一種「富足的」社會，有精美的花園、高爾夫球場、跑馬場，山上的體育場、公園、鄉下的俱樂部和海濱旅館。牠在大戰中雖然已經損傷了一些，但在以後狂熱而不穩定的膨脹時期，牠又會極有希望地復活了。直到後來經濟恐慌發展到殘酷的階段時，這種有閑階級才沒落下去。

「經濟階段」這一名詞其實是錯的。因爲這個階段的一切實在並不經濟：爲了停止了支出，事業就要受到摧殘而不能進行，除了縮小市場中一得有能耐的投機家外，沒有一個人再能夠變得富一些或相對地富一些。只有銀行能賺錢。當事業停頓的病態擴大開來後，交通就減少了，當企業消沉的時候，欠債的國家或公司都不再還債，於是那些幸運兒和富人們既

本利無着，一面慈善家又還要向他們募捐。他們的銀行家和他們的律師先後的通知他們。首先是這一個可靠地方的錢沒有着落，後來又是那一個可靠地方的錢沒有着落。賴債的潮水上昇了，把担保品一個個的沈没進去。倘若他們把財產賣出和窖藏起來，那麼匯兌的變動，還是要把他們的本錢的大部份吞没的。在一九三三年一個金融報紙上就說過，「任何物品大都在跌下去，失眠的夜却在漲上來。」在別墅中的揉皺了的枕頭上，轉側充滿着自責的腦袋，和那處在貧民窟中挨凍的失業者的心焦，正有着同樣之感。

一册柯柏脫的日記 (Diary of Titus Colbett) 中寫着作者在一九五六年，騎了自行車，從羅馬治黎維拉到波爾多去。他起初是一個藝術的鑒賞者，在英國內地徵收局做過好幾年事情，當過傢具、繪畫等的估價人。他的旅行，好像是出於好奇心。他十分討厭那種從日內瓦到波蘭多沿途必須換錢的麻煩。他又好像暗中負有外交或領事的任務。但這一點，他是十分小心地不肯說出，或者因為他是被派去做報告的。就為這樣，所以他的使命是未有過紀載。

其中有關於一段凄涼的海岸的描寫，我們現在讀來還是十分有趣。他在年青的時候就

交游廣闊，二十歲已經熟識了蒙地卡羅凡是他到過的地方，常有人招待他。在他筆記中說：有幾百個美秀的山莊，被人捨棄了，關上了門沒有人要買，山莊的主人留下一個老管家看守着。當地百姓，有時候竟公開的對牠搶掠。從前極秀美的花園，現在已經不能保持牠的舊景。玫瑰、石榴、夾竹桃、龍舌蘭、仙人掌、松、柏、棕樹、和蔓草，大都長得異常荒亂，賺不到錢的旅館，慢慢地變成了廢墟；自來水管破了，流出水來洗滌了道路，平房大都被農民占據了去。在羅馬帝國衰弱下去的時候，這荒廢的同樣命運，一定也會落到肯佩尼亞(Compagna)和諾普爾斯灣無數的別墅上，但是這回是更快的一個衰落。他說，道路非常不整齊，但是有許多道路標記和路旁的廣告，像在對交通的新道，作着無言的呼籲。當他正在自行車上疑慮着會不會找不到一個清潔而招待殷勤的旅館來過一夜時，他就見到一塊有着凸出金字的招牌，不過上面已有些剝落，這招牌面向着他的油燈：

著名廚師
超等旅館　摩登裝璜
設備周全

店主和客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些別墅和花園之主人與寓公又到那裏去了呢？那些到這裏來游憩的幸福的主顧們又在那裏呢？他們中的許多人顯然是逝世了，因爲黎維耶拉的主人，多半是半老和老邁的人，此外都是回到他們自己的老家去度貧困的生活了。他們充滿了厭倦的回憶，雜在一般的窮人之間，沒人辨認得出。

柯柏特去訪問過荒廢了的蒙地卡羅老跳舞地。以及半新的體育俱樂部。在他訪問的前幾天，英國酒排間的天花板，已經跌下來了。「這個看來廢墟不大，」他說，「年輕的時候，我記得這些地方是很大的。」

在這個著名的花園裏，已經自殺過一些賭徒們，結束了他們的苦惱。現在這花園中是長滿了藤蔓。

但是在這樣普遍的衰落中，偏偏還有一點例外，對這個例外的意義，我們的觀察者極重視，就是空中還能繼續交通。羅馬和馬賽間，他記得極準確，他見過十三架飛機，朝東或是西飛行，他在還未起身前的早上所聽到的兩架還不在內。「我疑心我在廿五年前是不是曾經看

見過這許多，——他這樣寫着，於是繼續說明這些機聲將預示出貿易的恢復、和秩序的恢復的可能。在尼次和馬賽，他還看見過輪船的往來，「不但是漁船，而且還是載重一噸以上的船。」他們在尼次正在建造一隻相當大的船，他計算起來可有三千噸的容納。由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間，造船業除了這一件事外，我們就不再看到過其他的紀載了。一九四〇年前，大船的建造，已不是一有錢賺的商業了。」我們可以確定，在五十年代之初，世界上沒有那個地方造過大小的任何種航海船。在這破了產的行星上的運輸業，已經是在日漸紊亂下去。現在研究歷史的人正在希望得到這種極速衰落的統計。

村柏特見到從馬賽到某一內地的石礦間有一段鐵路，上面在行駛火車，（用的是汽油引擎）他覺得十分驚異而且充滿了希望。他向來認為世上不再會有鐵路的交通了。倘若交通已經降到不能獲得生活費，無力修獲鐵軌和對付流動的支出。投機的購買者，也不復要它雖然從前它是極有價值的財產。這類財產，在地球上已經變為破爛的東西；碎而生了銹的鐵軌，給永埋在龍舌蘭和野花之中。他講到昔時法國南部的美麗的棧道，沿着巴黎——里昂—

地中海岸，他怎樣騎了自行車走狹路，不走大道。農民們已經把廢業的鐵軌，看作便利的鐵鑛，因此鐵軌已經剩餘無幾了，枕木多半拿去當柴燒。

他敘述他在福賴巨（Foggia）地方的一個飛行場和一個西班牙籍的美國飛行家，作了一段極有意義的談話，這一位飛行家在戰時最初服役於波蘭，繼又服役於德國最後又在法國服役，柯柏特所得的印象是貿易已見恢復的顯著，他好奇地看到橡皮、香料、汞、錫錠等，從東方的天空運來；他又看到鐘、錶、指南針、刀、針、鈕扣、玻璃等的東西給運回去，大部分是將物品互易，利潤極大，好像許多有理由，可以希望這類通商慢慢地發展。戰後剩下來的飛行家，可以發展而成空中商賈，他好像還是初次曉得。那些空中商賈已經組成一個還不能聯絡得十分密切的世界組合，來維護天空的剩航線和天空的燈塔。

柯柏特說，他已看見了航運的恢復。

「我們要對牠加以注意，」飛行家有含儲地這樣說着。

「你們也裝載乘客嗎？」

「當然的，祇要他們能付足了乘資，」

「這可證明文明是回來了！」柯柏特這樣地喊了起來。

「不，這是在開始的新的文明！」

他好像是初次引起柯柏特張開眼睛來，看見他的腦中，已經發生一些觀念？他說「我們已不需要創造一個世界的王國，因爲那已成爲一個腐老的思想了！在今日的世界上凡控制了空中和運輸的人，他就是控制了世界。我們何必再要王國一類的東西呢？」

柯柏特深深被這話所感動，他再繼續由法國而到波爾多，因爲在那裏他要提取一筆款子，他把這個問題考慮了一下，並且把他所想到的記下來。他把這新的「世界運輸組合」和那些漢沙商人 (Hansa Merchants) 相互比較，得到一個趣味的結論。漢薩商人在羅馬帝國覆亡以後，曾對波羅的海岸和北歐的文明的恢復，發生重要的作用。柯柏脫詳細思索之後說，「原來世人從未在歷史中給予有組織的運輸和貿易以一個適當的地位。」

他在波爾多地方，出賣了自己的脚踏車，恰好足夠買一張乘飛機到雷布格的 (Le

Burget）栗，（這是一個有着攸久的歷史的靠近巴黎之古城的飛機場）後來再從那裏飛到了享登。他的飛機，在勒曼司降下來交換貨物從此以後，對於免除了乘車在不平坦的馬路上顛簸，而得到無限的愉快。

接他所描寫，那毀壞了的法國的大森林，正在開始恢復起來，所以隱約可見一帶短短的叢林，他俯瞰小塊的田地，繞在舊城市的周圍，道路縱橫，井然有序。他在飛機場，用新的目光來觀察飛行師和機器匠，從他們這方面，可以曉得世界運輸怎樣使較好的五金工廠和電氣工廠恢復起來。他也看見了勒曼司的精美的教堂，牠還像在他學生時代所看見的一樣完美，他歡呼不止。他描寫地面上的坪中早年飛機的先驅者曾樹立過的紀念碑，至今依然存在，同時亞米斯（Amiens）的大教堂，也沒有受到損壞。

在日記的結尾，他現出一種憂傷的語調。大概他有好多年沒有去過英國了，所以當他見到倫敦郊外的荒蕪狀態，使他十分驚歎。兒童時代他就住在倫敦，且也十分的愛倫敦。海德公園中有一部份，已經不顧人民的反對，變成飛行場，但他看見了那重建的倫敦中心區域是一

種沒有計畫，而且使人厭惡的樣子。他反對建築物充塞於城市中心，和防空設備的建築式樣，他認爲這些建築很像一堆「有病的」菌。他問：「英國人什麼時候才學會能夠設計的呢？」之後，他就用一種奇怪的預言家的神氣，懷疑泰晤士北部斜坡的低窪處水量還沒有完全浚乾。和地面下層的柔軟，能不能支持得住這樣多的不穩的新建築物而不至于倒陷，以及舊城市的生活，是否能夠回到這一部份來。

他的憂慮只在十年後，就給證實了。泰晤士河的河道變成彎彎曲曲，斯脫蘭特(Strand)，佛里特全街，昆赫爾(Cornhill)，和最可惜的我們在那時代的圖畫和攝影中十分熟悉的、倫(Christopher Wren)爵士的美麗的聖保羅大教堂也倒在其中，和在大火中毀滅了。凡是看見過歷史圖畫一百卷的，——連小孩都看見過。——不定記得舊滑鐵盧橋的怪狀，牠皺成華帳一般，還有極有名的克買巴的針(Cleopatra's Needle)的上面刻有象形的文字，埃及金字塔歪斜得難看，被空襲的榴霰彈炸下了一些碎片。牠傾斜着好幾年了，後來終於倒在圍着長堤的拉謨伯司折爾息(Lamdeth Chelsa)湖水裏。

二 在毁滅中的美國

關於二十世紀中葉幾十年中舊大陸的歷史進程上面，已經有了總括的概說。對於這一個主要的歷史進程，連屬於歐洲的有些地域，也是例外的；牠們的發展各有其道，但是沒有那些主要國家一般的悲哀和強烈。比方像西班牙，就是一九三一年誕生的西班牙牠所作的一切，是一個過於忙着自己的事情的旁觀人。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論拉丁語言的或英國語言的美洲，多半沒有加入這些情熱和激烈的事件裏。他們在自己的國境內。也有和舊大陸相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各種困難。當三十年代初金融的波瀾過後，在歐洲紛擾而生的恐怖，至牠們那時的影響也慢慢的小了。他們私人資本主義的衰退，有着特殊的形式和特殊途程。

但是，他們終於捲入沒落的漩渦，這我們可從一件過去有過爭論的事實清楚地知道。二十世紀世界崩潰的直接緣故；並不是戰爭，第一是貨幣不穩；第二是因生產率增加而社會混亂。第三是疫症流行。人們每天的生活，大都是經濟的，非好戰的，而經濟的生活，却被債權人所

殺害了。倘若一九〇〇年世界已經成爲一個國家，倘若那時牠那私人經濟積蓄的通貨還是收縮的，那麽牠的崩潰，一定也像牠以前發生過的情況一樣。倘若牠在那時分裂爲一百個好戰的國家，但有一種貨幣制度，限制債權人而讓工業盡量發展，牠也許能舒展出足夠的力量，雖然在戰時，再過一世紀也仍可以達到互相毀滅的目標。貨幣之崩潰，是使世界發生混亂，衰弱和災荒的直接的緣由、倘若沒有這一次崩潰，那麽人類即到屠殺和窒息之前，還能夠亟急和努力進行一點事業。整個說來，倘若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人類進步到能夠克服金融的障礙時，那才會好。

從前一切反戰運動不發生効果的緣由，懂得我們只要處在一個健全的貨幣制度的重要時期，就可以十分了解。這一點，我們向來就堅持着的，我們已經從六個觀點，解釋過債權人和傳統對抗的關係。如果美洲和舊大陸的經驗的相像，那就更可以切實說明，使我們明白這個教訓了。

美洲社會從他們開始脫離了歐洲的政治體系後已經經過了相當的發展階程，對於脫

離舊大陸的事變而獨立進行，並和前者發展的律例是不相適應。雖說牠是獨立進行，但不能說是完全的獨立，因爲牠是在同一個行星之上。而且在整個的十九世紀裏，美國人之心理，南北完全是一樣的，完全被孤立的觀念所飽和，學校、報紙和一切政治的重要聲明，對我們的百姓說，新大陸是一個新的世界，牠沒有遭遇舊世界的傳統的專橫；正在向着和平、自由、機會和新生活走去。牠不欲和舊大陸的許多國家與政策共同成立「有連帶責任的聯盟」。牠情願忘掉種族關係，情願和文化的集團決裂，用這一個代價來忘掉歐洲的仇視和爭吵，並建立更廣大的一種生活方式。從華盛頓一直到威爾遜時代，雖然發生過南北戰爭和更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美國人總相信自己的性格是標準的，對別的各國抱着傳教似的慈善態度。他們固然明白有許多事情自己懂得的太少，但相信要比別國懂的更好些。

十九世紀歐美的整個時代在經濟和物質上都有特快的擴展。美國發達的迅速，使牠自己得深極深印象，却不理會歐洲是進步得一樣快。因了歐洲大批移民的結果，美國人口在一百年內增多了八千萬光景。但歐洲那時向外移民雖多，自己的人口也增多了二萬四千萬光

景美國人有一種理想以爲他的人口比歐洲增多得更佳。牠的生活，實際上也擴展了，和歐人的擴展一樣，是得力於思想和發明之進步，及由舊大陸而來的人力。而在牠那廣闊的大陸上，貢獻於擴展的各因素之增加的快，是和歐洲的過程不同的。他生活在相仿的進步之體系中，但和大西洋對岸的發展却更不同起來了。

那一世紀的全部的過程中，運輸和交通的發明，正在把從前相互間交通須幾個月才能到達的地點，縮成了幾個鐘頭或是幾分鐘的距離。

因了交通這樣進步的結果，大西洋兩岸一時親密一時疏遠，便成了二十世紀所特具的一點。這好像兩個並排的大陀螺的旋轉；牠們剛一接近觸撞，一忽兒就又顫動着分離了。又像複雜的兩部機器，本可結成一部世界的機器的，但其中旋轉的齒輪，屢次相聯結而又沒有成功，互相摩擦成聲，並且發出猛烈的火星來，結果仍是分開了。自十九世紀的末葉起，生活相互統一的力量，正在預備把美國和歐洲聯合成一部機器。到二十世紀中葉倘若有人觀察而得到了結論。說這次的聯結已經失敗了，那我們是不妨原諒他的。

我們在這一本歷史裏，已經給予亨利福特、威爾遜、羅斯福第二，以顯著的地位。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美國曾經大膽地向着歐洲前進，而後來又縮了回來，仍回到自己的四周。美國有一政論家叫做西蒙茲(Frank H. Simonds)的，曾於一九三三年出版一本簡明的小書叫做美洲能夠家居嗎(Can America stay at Home?)把孤立政策在經濟恐慌的最初幾年的情形寫得十分透澈。這一個恐慌，把貪得無厭的個人資本主義的野蠻，好的壞的都告了一個結束。他指出從羅斯福第一(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開始發動帝國主義的偉大的企圖後，怎樣和歐洲時近時遠，怎樣無力脫離舊大陸，而又不能斷然地加入他們之間。他發表他的高見却不肯作後盾，堅持着道德的裁判却不肯負責。在歐人看來，我們可以引用西蒙茲的句子說，「美國的關心和平是十分顯明的，似乎正努力把使徒約翰的傳道，和派雷特(Pontius Pirate)的方法結合在一齊一樣。像美國的這種矛盾的努力，正因爲牠是美國智慧中的摩登和樸質的自由的粗糙的混合物。

美國共和國一開始就對歷史起了反抗，這真是一個新見解。就牠出現的時期說，比列寧

的蘇維埃共和國還要新鮮，牠一起頭就不能賡續支持牠那新態度，而又不能加強發揮其思想。牠產生了一些高等學校，培植了一些人。祇是在獨立以後的一世紀，才正確地想了一下自己。在這以前，他讓那薪給很微的男子和喜歡重複的婦女來示民衆教育。牠的身子在無限的生長，在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之內，牠生活在船來的精神食糧上。結果他是十分生糙，對於牠的使命發生無限的感覺，却缺乏機智或力量去實行。威爾遜這樣愚蠢的安排，但又這樣拿世界和平的聰明自詡，這也許成爲那時美國心理的最高表現。

十九世紀時的美國人的心理，並不是一種笨拙的心靈。牠是一個無限大的還沒有受過教育的心。牠雖然愚昧，可是十分自由。其宗教的復興及其政治的動態恰恰相像。我們研究純正美國生活的故事，可自其中見到爲懺悔和說教的露營會，以及有組織的情感的宣傳會等。我們想起燃火的佈景，以及難聽的說教的聲音和興奮的歌聲。這些民衆的感情的波浪，這些集會（常是在森林裏）以及他們唱的贊美詩，他們的訓誨、呼聲，代表了懺悔和快樂的信仰，以及美國的精神生活。這種生活首先是自然而然的膨脹，繼着是自然而然的收縮，這情形在

美國之於世界使命的盛衰中正充分地反映了出來，真正的美國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極端動的復興，只能見於受到世界經濟崩潰的恐慌之時。當經濟衰退劇烈時，美國退出歐洲之複雜的糾紛，同時有簇新而更勇敢的決心去明白社會生活之要點。

真的，美國內在的形勢中之一切東西，完全在於刺激思想。美國經濟的崩潰，開始時竟是比歐洲的還要快。建築工業，已經到達為大量生產的令人見而目眩的高度，所以牠墜下來的時候更是沉重。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美國還相信自己是全球最繁榮之一國；到了一九三三年，其國內的失業人數，比了不論那一個大陸上更是絕望而可怕。但是，他們並不努力於做有組織的改革；因為他們缺乏用革命的方式來團結之能力，他們的反抗，多屬於個人的，或是犯罪的秘密團體。社會未曾推翻，而牠已陷於迅速崩潰和秩序大亂。犯罪的洪流，經濟的恐慌，求儉省的瘋狂的努力，以及後來民眾教育的被摧殘和信任，秩序和交通的崩亂，——這些是我們已經一般地說過的後果，在這一個廣大而較為無歷史的區域，表現得最嚴重和最是典型。羅斯福第二，和這些現象勇敢地奮鬪，可惜他太遲了他已經沒法阻止這種崩潰的趨勢。

在歐美是一樣的有一種崩潰的時期到來。牠並不像大家所能猜測的在一個確定的日期中的突然崩倒，但是，每天總有對着崩倒走去的事件發生。美國與歐洲相同：政府成了倒賬的空殼，稅收一天減少一天，華盛頓聯邦政府萎靡了，雖然不會弄成國際聯盟的樣子，但是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我們看到同樣的情形，市政府成爲獨立的機關，臨時之統治、公民聯會、法律秩序維持會、工人自衛會，還有公開的工人蘇維埃（在新墨西哥和亞利莎納）各地都活動起來了。在藍山和在太平洋沿岸；一九四五年出現了一個獨立的小小共和國，實行着一種循道會、技術統治、和道格勒斯計畫（Douglas Plan）的混合主張。猶太實際上已成了一個自治的稅收獨立的國家，仍實行牠的當初的摩蒙教（按即一夫多妻的教，）爲國教。但各處大都沒有從形式上脫離合衆聯邦的事實。

此外，在史冊上還有一九五八年華盛頓的描寫，是一個曾任英國大使館的參贊寫的、上面寫着他某次進謁白宮，在白宮與卡盧素總統共餐。那時總統雖然任期已滿，但還在繼續職務，因爲繼任的總統，在到首都的路上，忽然在亞拉該內山脈的地方失蹤了。因此關於上次的

選舉又已起了極烈的暗鬥，在永刻茲（Yonkers）投票櫃前的衝突之後，兩個分立的總統，正在互相奪取紐約的主權，他們早已斷絕了紐約和新英格蘭的交通。

對於這位來客，總統極有禮貌地接見，問起歐洲形勢中的許多極表同情的聰明的問題。他說美國將來一定希望很大。他說「復原」之日已經很近了。米西西秘河上已經恢復輪船的交通，政治雖然仍是不寗，然而棉花又已開始北運。只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間，已經有過一百四十輛汽車運到南美，但在去年，祇運去七十二輛。金鷄納霜、咖啡一類的物品，藉物易物的新的貿易方法，推行得還算順利。依他看來事業的前途，極有起色。他承認一九二九年以來的經濟恐慌，的確出乎預料地延長太久和情形太劣，這回的失敗，已經使美國的百姓嘗遍了艱苦但他們的忍耐，足可以對得起他們共和國的先烈了。最後他說的是英語兩大民族間所常致的祝辭。

午餐雖平凡却很豐盛，有頂好的肥肉和各種蔬菜，總統很坦白地以純正的民主主義自誇，這些食物完全是他得力於黑人「祕書」而親自在白宮後的猪圈中飼養及花園中種植

的。秘書的事務，像是限於家事方面而與公事無關這些黑人，他們之被任命的政治理由，叫人十分不解，裏面有若干人竟不識字，卡盧素夫人乃一祖籍愛爾蘭的貴婦人，她很想談談在華盛頓的管家婦的困難，因爲聯邦的收入慢慢地不可靠起來了，但總統立刻阻止了她，這顯然認爲這些家事恰好顯示出一個國家的財力。

那時全國遣派議員出席國會的州，只有三分之一，其餘各州有的認爲費用過巨，有的認爲不需要，所以一個代表都沒有派來。這位參贊在國會，看見一位議員正在國會的議壇上，作着一種長篇的講述；他的衣衫十分襤褸，那裏既看不到一個新聞記者，也沒人去費神傾聽他的講詞。這人顯然是在靠說話延長時間藉以打消一項立法的提議，但這這位參贊找不出一個能夠同他說明內幕的人。

第二天，參贊和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高德重的愛達和（Idaho）州的有辯才的波拉(Borah 1865—1970)參議員共餐。他舉止最爲適當，進餐時談話未曾間斷。其實他必得這樣才可使他的客人幾乎不能插進話去，問他幾個早己想好了的問題。他對他的國家也存着極

大的希望。他承認在他的活着的過去，美國人的福利顯然在一點點的減退。他不反對統計數字，就與煤鋼鐵的噸數、鐵道的哩數、普通商品和汽車的大量生產數字說，同過去比較起來大都是有害的。「但一個人的生活並不單靠麵包，我們還須透澈地觀察一下當時的人心。」美國的元老說。

人心像是從來不曾有過比當時更健全的了。瘟疫，像來自上帝的一切同樣，是有理由滋長的。在他眼中，生活程度比昔日無論什麼時候都要高一些了；這說的是精神方面的向上。就工作方面說，浴室固然少些，但心靈卻比較純潔多了。他在年青時美國的自由的人民，躭於奢侈逸樂和放縱，但現在這一切完全成爲過去的事情了。美國比起從前的不論什麼時候來都更和昔日殖民地時的誠樸和純潔相接近了。

接着，波拉攻擊歐洲的虛偽——尤其是英國的外交，這話雖與上面有一些不相銜接。他像是在背述想了很久的演說，忘卻英國外交早已改變。他在談話開始前，顯然已經聽得「參贊」這一個名兒，這便把他的心思引到「從前」去了。他又轉而談述現勢。他堅決地認爲美

國在牠的以往之過程中曾有過比現在還要黑暗的時期。在百五十四年前，英國的戰勝軍隊，曾經縱火燒過華盛頓。在現在這種衰退——倘若可以稱爲衰退——中卻絕未發生過這類的事情。甚且從胡佛任總統後的衰退時期，也不曾有人想到過要燒華盛頓。

後來，這一位旅行家又往芝加哥大學、科侖比亞大學、哈佛大學以及其他許多的文化中心參觀。他那敏銳而聰明的評論，同我們所觀察的心理反應，十分符合。這種心理反應，就在那時已經從古老的弛緩的習慣的心理中，很快地產生了簇新的更完美的美國意識來。

這教育中心的適應新的環境，自然是有着各各絕不相同的方法。一切方法也並非都是進步的。哈佛大學使他記起了他讀過的關於西藏喇嘛廟的紀載。實際上我們在那裏找不出紙來寫筆記和練習，教師全由口頭傳授，學問全靠硬記。在圖書館則有着嚴密的防備免遭搶掠，比較重要的書籍，祇好鎖在極厚的玻璃匣裏張看，每天翻讀一頁。教師名望的高下，是照他們的學生人數而定的。他們有的是坐在教室裏，有的坐在樹陰下演講，有的在散步的時候演講。他們不但是名望各有高下，身體的健康也各不同，因爲這許多學生的任務，就是在替教師

及學校的土地上，栽植食物，在技術的和藝術的建築，紡織縫衣及編製草鞋。那時還有點文學作品，才能較高的學生在石板上寫些詩，這些詩如果被教員們重視時，就寫在房裏的壁上或者天花板上，這是偉大的樸素及研究的閒暇的一種表現。參觀者由伊里奥校長接待，校長穿着寬大的袍子，高大的個子是位有奇特面容的老者，其地位是承嗣他的祖父的。室中有大火盆一個，點燃着一對油燭，兩個學生站在一邊在不斷地剪去燭花。當校長進飲那簡單的湯，曼麗蘭的紅葡萄酒，豐盛的水菓及花生時，他談的話漂亮極了，談話是繼續得很久很久才停止。

造訪的尼科爾生參贊覺得這雖很古雅但並不有用。他承認這種生活是簡單而又文雅，但在他看起來也是毫無效用。但是他不向校長透露這意見，讓校長儘自說下去不受到辯駁，校長說到哈佛怎樣使英吉利國教的文化，最後的精錬和淨化，把古典主義和高潔的基督教融於一爐，而且還帶着忠君的思想，

「在這裏有國王嗎?」造訪的人發問。

「說不定是一位真的國王，」校長惋惜地認明：「我們決定獨立宣言的無效，可是我們

仍找不出英格蘭的合法的國王來，我們所以也沒有把對個人的態度確定。但我們是有一種忠君的態度，爲我們所深自慶幸的。」

就是研究的主要科目，希臘時代托勒密的天文學，及荷馬的詩，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神學。學生僅有的閒暇不是用於體育方面的。他們像是完全拋棄了那些典型的美國大學的遊戲，如棒球和足球等等，校長談起這類游戲的時候，總說成「最近的發明。」砍樹和割草是重要的戶外工作。

對於這種高雅的理想的陳腐教育是有趣的，因爲在不久以後牠的蹤跡快斷絕了。這些和校長自己的人格是非常有關係的。當他年高去世以後，在一九八一及一九八三年嚴寒時候，這一個陳舊的基礎已經是完全爲人們所拋棄荒廢了。

但是把科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來相比一下，是有着絕不相同的對照的。這兒，新的德文特學派的思想的影響很爲明顯；杜威、魯濱孫、巴恩士 (Harry Elmer Baroes)，福斯笛克 (Raymond Fosdick)，俾耳德 (Beard) 夫婦和他們的同伴的種種傳統全都活

著雖然紐約城已爲人所不重視，但因爲牠的空無人住的高入雲霄的大廈不穩固而危險了但在赫貞江上面仍有着很多的貿易和製造等活動。大的鐵橋仍可供負重的騾馬通行。貫成南北間非常有價值的大路，他們給與這地方以一種特有的商業的重要性。那邊的和芝加哥的工人和學校的職員有密切的接觸，他們正以巨大的注意來研究他們所稱的「復興的重要問題。」

尼科爾生寫道：「他們不承認文明的崩潰。他們在這裏所談的就同在華盛頓所談的相同，全是有關於胡佛以來經濟衰落的問題。如此樂觀的人我從未曾見過，說是事情遲早要恢復過來的。在英國事情，就不是這樣，有一夜有一種巨大的爆炸和地震，那被稱爲「無線電城」的一簇高大建築在夜間崩圯了。在晴明的早晨，我去先賢祠，那邊一片白茫茫的塵土還在上升好多大衆正在注視，並且傾聽那小屋角塌毀的聲音。他們是一點也不沮喪。『還可以多消滅一些，』那站在我旁邊的一人說，『我們總要把這類東西擺脫的。』」

尼科爾生他對於科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課程作着一篇很是詳盡的敍述。科學

試驗室之佈置，和試驗工作之相等重要對他有很深的印象。「當我曾參觀洛克菲勒化學試驗室的時候，發覺得我幾乎回復了一九三〇年代，」他說。但他更感動于社會學工作的進步狀況。「他們造成了一種並非爲進行訴訟而存在的律師」他寫過，「我想他們所須裂的新法律正是這地方最感興味的事情。我的父親將不承認牠是一種法律。這是社會生理學和病理學以及從那兒所生出來的社會治療術。在這裏有一兩個人，比如哈米爾頓 (Pooper Hamilton) 和林開 (Rin Kar)，他們的談話是一種啓發的教育。他們不相信我們在英國所說的關於『人羣的夕照』的臆說。」

這是他的觀點也可說是樞紐的觀察。但是最可注意的就是將基礎英語施於實用的策略也嘗試過。西班牙語和英語正漸漸變爲一種可交互用的文字，直到二十一世紀的初期還是如此。法文的教授已大量減少，古典文字的研究（希臘文和拉丁文，）照牠的絕對緘默看起來，已經統統拋棄了。

我們的旅行者從芝加哥飛到第耳木 (Deardorn) 的福特飛機場，看到了重要工廠的

廢址以及重築起來的居留地在那裏的技術學校中逗留了數日並且參觀了一下尚未布置好的「美國生活博物院。」他看見到在飛行場廣地四周有數十方哩的耕熟了的土地曉得了舊日福特把工作人員的時間分配爲農業生產和機械工作的思想，依然不曾廢止這都是可驚奇的。在第特瓦(Detroit)有紡織和靴鞋的聯合工場。那邊每年可有一千多輛的汽車和「幾百架」(！)飛機的出品。那裏有一座精巧而小型的無線電台。

經理說，「我們是保持着聯絡的，」那「我們不去干涉人家，我們也不被人家干涉。這道的郵政現在也由我們在寄遞不錯加拿大和墨西哥還能通。現在關於國界，誰也不來煩擾我們了，我們也不去管這些。市面不好的時候我們就縮小動作的範圍，我們去耕種田莊和做各式試驗。」

我們在這本歷史中專選了這福特的和平船的冒險來做我們歷史轉變點的標記。「大創作家」的福特的成功，早已完結了。但這裏所提到的經理那好像是他的兒子愛德塞爾，(Edsel)他在繼續他的漂亮而誠實的父親的事業。

王於那地方的能夠「縮小活動範圍和繼續進行，」並不是誇大的話。每一個污穢世界來的游歷者，他們都注意於每件東西的「清潔。」愛迪生的工廠，依然是福特所重建過的哪種狀況，我們還在尼科而生博物院中看到第一次做的留聲機和電話，以及最早試驗的汽車和飛機。

「這也像那時候一樣新鮮，」他說，「在我們自己的和我們父親們的一生，我們已經看到了自有世界以來的最大的文明的開始、勝利和崩壞。我們已經瀏覽過機械的大量生產的全部歷史。」

「一些都不是牠的歷史，」經理說，「牠的歷史還沒有開始呢。」

以後接着來了極長的談話。談話的要旨，那個游歷家，像是用對話式寫下來的。牠對歷史研究者的興趣，就在我們現在還有見證。牠表示當全世界陷於貧窮、秩序混亂、不一致的農民生活中時，機械運輸系統的活力正可表現出來。我們可以把第耳本的談話，同了柯柏脫所報告的飛行家的談話參照起來。同樣的是舊制度最後死亡的認識。「那些國王和國會一類的

事，完全像羊肉樣的死了。」第耳本的經理說，「銀行的生意。那是死掉得更早了。」

「那麼，以後來的是些什麼呢？」

經理指了一隻往上飛翔的，在蔚藍色的天空中聽不見和差不多看不見了的飛機說？「這個。」